

丁滄林文集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录

中国新闻史研究

20 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	3
中国古代报纸	13
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的新道路和党报 理论的发展	21
关于《文艺新闻》和袁殊	33
附 袁殊对《文艺新闻》及《记者座谈》的回忆	37
“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是怎样公之于世的?	47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小型报浅议	50
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报刊	57
灾难与改造：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变化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	64
增强党性 坚持改革 ——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50 周年	69
1947 年的反对“客里空”运动	74
同常芝青通信前后	79
附 常芝青致丁淦林信	81
1956 年我国新闻工作改革概述	82
学习戈公振先生的爱国、乐业、创新精神	90
韬奋小传	93
邹韬奋的报刊广告观	100
像邹韬奋那样热爱新闻工作 ——纪念杰出的新闻记者邹韬奋逝世 40 周年	104
从《申报》的发展看史量才的胆识与才干	107
有益的尝试 ——关于王中同志新闻观点的提出及其意义	110
王中对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贡献	116

新闻传播学研究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121
加强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建设	129
切实发挥党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36
新闻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140
写好抗日时期上海新闻史	143
《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前言	147
军事新闻学	
——一门新学问	152

新闻传播教育研究

简议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	157
大学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应该怎样确定?	162
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	170

教案选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	183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203
简评一则 1949 年的消息	239

附录

丁淦林：与历史同行	245
-----------------	-----

中国新闻史研究

20 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

在新闻传播学科的各个分支中,中国新闻史研究起步较早,在 19 世纪后期就出现了有关中国报刊史的文章,如《邸报别于新报论》(《申报》,1872 年)、《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王韬,1876 年)、《中国各报馆始末》(李提摩太,1895 年)等。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也发表了一些同类文章,如《本馆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1901 年)、《苏报案纪实》(章士钊,1908 年)、《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胡汉民,1909 年)等。这些文章,或描述史实,或史论结合,但总的看来,数量不多,论题零散,论述浅显,远不足以使中国新闻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917 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在《东方杂志》上连载,并作为附录收入《上海闲话》一书于同年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它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起步。从 1920 年开始,上海、厦门、北京等地一些大学陆续创办报学系或新闻系,《中国报学史》或《中国新闻事业史》成为一门必修的课程。教学的需要,直接推动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当时正在上海《时报》任职的戈公振(1890—1935),于 1925 年应聘在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讲课,《中国报学史》一书就是他在教学过程中收集资料撰写的,1926 年 6 月定稿,1927 年 11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与此同时,一些历史较长的报纸,纷纷出版纪念书刊,如《时报馆纪念册》(1922 年)、《最近之五十年》,即《申报五十周年纪念》(1922 年)、《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1923 年)等。这些书刊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

当然,更具重要作用的是,当时的新闻界、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热心的研究者和积极的支持者。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新闻史在学术研究领域中逐渐显露出来,朝着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这些人士当中,最为突出的是戈公振。他在编报的同时,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邹韬奋曾以“迷”字为题^①,撰文赞扬戈公振收集报刊史料的专心致志精神。在撰写《中国报学史》时,戈公

^① 心水:《迷》,见《生活》周刊第 4 卷第 30 期(1929 年)。

振曾向马相伯、丁福保、郑振铎等名家请教，还在上海《时报》上刊登《访求旧报》广告。

正是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中国新闻史研究加快了步伐，产生了像《中国报学史》这样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在《中国报学史》出版前两个月，即1927年9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蒋国珍著《中国新闻发达史》。这两部书，都对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但戈著将近30万字，篇幅超过蒋著一倍多。在内容、结构、体例、历史分析等方面，戈著均占优。所以，《中国报学史》问世后，《大公报》、《生活》周刊等报刊都作了评价，予以肯定和推荐。该书曾多次再版或重印，日本新闻史学者还将它译成日文出版。

戈公振曾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中国报学史》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的精心之作。应该说明的是，戈公振将英文 Journalism 一词译为“报学”，当时已有一些学者将它译为“新闻学”。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以评述报纸历史为主，也评述了杂志、通讯社、新闻教育、新闻法规等方面的历史，因而是一部全面的中国新闻史著作。这部著作对中国新闻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在多方面有自身的特色和优点，以下列举其中三个主要方面：

(1) 史料丰富，多为第一手资料。由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资料基础。书中的许多材料，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2) 对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从汉唐到民国初期，作了梳理和评述，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由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设计了第一个理论框架。

(3) 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由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表明中国新闻史研究应该朝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发展。

《中国报学史》历来为中国新闻学者所看重，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①。同时，中国新闻学者也看到，这部书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对于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社会作用以及经验教训等，论述太少；关于四个时期（官报独占、外报创始、民报勃兴、报纸营业）的划分，缺乏科学依据；不少史料有差错，1995年中国新闻出版社重版本的附录《史实订误》中列举了154条，实际不止此数。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序言》，《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报学史》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在学术上标志着中国新闻史已走上整体的、系统的研究轨道。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它为后来者的研究开拓了道路。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要达到建立独立学科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后,在20世纪30、40年代,我国处于连年战争的环境之中,学术研究的条件极为艰难,中国新闻史研究同许多学科一样,发展缓慢。其间,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只有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数种,没有出现具有全局意义的突破性成果。胡道静的著作记叙了《上海新报》、《申报》等报纸的历史,为个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忙于各项除旧布新的实务,学术研究相对滞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虽未全面开展,但大学新闻系仍继续开设中国新闻史课程,50年代初开始出版一些史料书,如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补编),其中挖掘、收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新闻史料。1955年,马列学院(即中共中央党校)开办新闻班,编写中国报刊史教材成为它的重要任务之一,由此拉动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展开(以现代为重点)。在胡乔木的指导下,该班教员于1956年初编写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胡乔木看过这个初稿后认为:报刊史应以报刊发展的历史为主;报刊史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対报刊工作者进行思想教育;报刊史是新闻业务教育中的一门极重要的课程。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讨论这个大纲初稿,与会者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如,整个报刊史应该贯串一个中心思想,可以从秦汉写起,各个时期应有一个突出的中心,要阐明革命报刊的作用,要写报纸发展状况(包括少数民族报纸的状况),要写报纸的文字体裁和风格,要写报纸业务,要写著名报刊活动家和著名报刊,要写报刊干部培养,等等。围绕大纲与教材的编写,马列学院新闻班还收集与整理了大量现代报刊史料。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马列学院新闻班编写教学大纲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显然不同于戈公振时代。可惜新闻班在1957年下半年停办,人员调出,大纲编写工作中断。但是,研究工作转移到其他单位继续进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运用和发展了马列学院新闻班的成果,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两校新闻系分别编写了《中国现代报刊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两书,贯彻了马列学院新闻班教学大纲的精神。马列学院新闻班的一些成果,也陆续面世,如1958年先后发表的《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李龙牧)、《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丁树奇)等,都是扎实的个案研究。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前期,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新闻史的

研究。前辈新闻工作者潘梓年、许涤新等回忆了《新华日报》的历史，夏衍、邓拓、廖沫沙等也畅谈了报纸工作经验。这些都为深入研究提供了生动的材料，然而也有些人把这看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切正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都停止了。而极“左”的新闻观点却风行全国，尽显盛气凌人之势。1968年9月1日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极“左”的新闻史观的代表作。它全面否定1949年以来的新闻宣传的革命性及其成就，认为建国初期的新闻宣传是“为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是“自由化”，60年代更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由此，党的报纸（包括机关报），如《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之类，都成了“旧报纸”，都应该被封、被冲、被夺权；邓拓、吴冷西、梅益等，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清除。这篇文章，颠倒是非，专横武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可以“立此存照”。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一些成果很快就问世了，其中有不少是多年的积累。如方汉奇的《报刊史话》（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的《中国广播史料选》（197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的《人民的喉舌——邹韬奋论报刊》（1980年）等。1981年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1983年出版的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都是多年研究的力作，史料丰富，论述全面，是本学科领域中具有基础性的著作。1979年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创刊、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大学》等杂志和1980年创刊、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新闻学论集》丛刊，都发表了不少新闻史论文。

1985年出版的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著作。李龙牧（1918—1996）曾经是马列学院新闻班教员，是《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的起草者之一，1957年后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他的这部《史稿》，注重史论结合，贯彻和发展了马列学院新闻班教学大纲的精神，着重阐释新闻宣传的政治思想倾向与社会作用（特别是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从马列学院新闻班的大纲到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一次尝试。其特征是，以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为主线，着重评述新闻宣传的原则与内容，分析新闻宣传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于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点，由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历史描述转向历史分析。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又一次突破，它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

展,成为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较为稳定、成果较多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大纲的思路指引下撰写的专著与教材(包括李龙牧的《史稿》)中,乃至在课程教学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主要是:对于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与业务经验阐释太少;有些部分重复或演绎革命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在某些问题上,有“左”的观点。这些问题的出现,也同大环境、政治气候有关。1957年以后,强化了“左”的观点。

人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是在8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新闻史研究正在恢复与重新起步,一面整理已有成果,一面反思既往。80年代后期,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历程。由方汉奇主持的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编写工作启动,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迈向新阶段开始的标志。编写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点项目,从1987年通过立项、确定架构、组织编写队伍,到1992年、1996年、1999年分别出版第一、二、三卷,前后共12年,有来自24个单位的47位学者撰稿,全书共263万多字。这部多卷本,集中展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既全面阐释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又系统评述了新闻宣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总结了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它的优良传统和新闻宣传发展的自身规律,其篇幅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材料之厚实、建构之完整,都是同类著作所未有的。它的问世,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突破。至此,中国新闻史研究有了三次突破。这三次突破,各有特点,各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重大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大致上说,第一次主要在新闻史料和新闻事业发展沿革描述方面,第二次主要在新闻报道内容及其社会政治作用的评析方面,第三次主要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及其经验评述方面。每次突破都把中国新闻史研究推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三次突破的成果,还有其他许多研究成果,包括台港澳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①,使得中国新闻史成为一门颇有积累的独立学科。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新闻史是具有较为扎实基础、能够持续发展的学科之一。

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首先是研究队伍壮大,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研究队伍从原先的高校教师为基本力量,发展到几个方面人员的结合,即社会科学研究专业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及各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

^① 台港澳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了不少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如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朱传誉的《宋代新闻史》、赖光临的《清代官报兴起之研究》、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王慷鼎的《新加坡华人报刊史论集》等。笔者对这些著作未作全面研究,因此本文暂不论列。

的新闻研究人员)、新闻单位的研究人员(新闻单位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地方新闻志编写人员、离退休的老新闻工作者和高校新闻院系教师等多方面的人员,汇合成一支强大的研究力量。1992年6月,成立了以推动中国新闻史学术研究发展为宗旨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它是经民政部批准的一级学会,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史学术团体。此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设有史学研究会(史学会),还有一些媒体史的研究团体,如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绥日报史学会等。

其次,学术阵地扩大,学术研讨活动增多。各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办的新闻传播学类刊物,如《国际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大学》(复旦大学)、《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①,以及《新闻学论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论坛》(南京大学)等,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新闻史的文章。全国性的新闻刊物《新闻战线》(人民日报社)、《中国记者》(新华通讯社)等,也时有刊载。中国新闻史学会出版了不定期的会刊《新闻春秋》,各地新闻志编写机构也出版了史料性的刊物,如《重庆报史资料》、《武汉新闻史料》等。新闻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也时有举行,其中有全国性的,如中国新闻史学会多次举办研讨会,广播电视史学会每年都开研讨会;也有地方举办的,如上海市在1991年举办的“抗战时期上海新闻史学术讨论会”和1992年举办的“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暨发扬党报传统学术研讨会”等。还有为历史上著名报刊,如《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拂晓报》等举办的研讨会。

再次,成果丰硕,展示了学科的风貌。在70年代以前,新闻史论著寥寥无几,而80年代以来,新闻史学科的论文、著作、教材、回忆录、工具书等,纷纷问世,生动地体现了学科发展的形势。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诸类:1. 通史。除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外,还出版了数种属通史性质的专著,各校的教材也都是通史。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国家教委高教司编),是一个通史教学大纲,也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中仅有的一个由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制订的指导性大纲,成为各校编写教材的依据。2. 断代史。已出版数种中国当代新闻史专著与教材,如《中国当代新闻事业》(钟沛璋主编,1997年)、《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方汉奇、陈业劭主编,1992年)等。对先秦、唐、宋、明、清各朝代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都有专著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于1979年创办《新闻研究资料》杂志,出至1993年停刊,后改出《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

问世。3. 专史。出版最多的是广播电视史著作,如《中国解放区广播史》(赵玉明主编,1992年)、《中国电视简史》(郭镇之著,1997年)等;有关媒体和人物的史书也出版了不少,如《延安〈解放日报〉史》(王敬主编,1998年)、《邵飘萍传》(华德韩著,1998年)等;新闻法制、广告、编辑、评论等方面的历史,都出版了专著;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也在积极开展,1994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白润生编著)。4. 地区史。各地都在编写新闻志、广播电视志,其中有不少已出书,还出了一些专著,如《上海新闻史》(马光仁主编,1996年)、《江西苏区新闻史》(程运主编,1994年)等。5. 图史。新华通讯社在1991年出版的《新华社六十周年(1931—1991)》,是一本以图片为主的史书;2000年问世的《新中国传媒50年(1949—1999)》(许中田总主编),是图文结合的史书;而王绿萍编辑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幻灯片》,则是以图片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直观教材。6. 工具书与史料书。工具书如《中国报刊辞典》(1992年)、《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史和、姚福中、叶翠娣编,1991年)等;史料书如《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1979年)、《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1982年)、《戈公振年谱》(洪惟杰编著,1990年)、《〈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1949)大事记实录》(方蒙主编,1993年)等。此外,还出版了通俗读物,如《报界档案系列》(方汉奇、李彬主编,1999年)是一套丛书,共10种。

综上所述,中国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三次突破和1980年以来的进展,已经建立了较为扎实的学科基础,使得中国新闻史成为一门独立的、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它毕竟是后起的学科,进入发展期也仅有20多年,学术积累不多,而空缺的课题却不少。随着时代的进步,还会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研究。在这世纪交替的时候,中国新闻史学科应该同其他学科一样,乃至同我国的各行各业一样,认真总结过去,积极开拓未来。特别是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新闻史应该大力加强学科建设,争取有更快、更大的进步。为此,有许多问题要思考,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下列举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要做填平补齐的工作。

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有不少尚未涉及的部分,也有比重失衡之处,还有“语焉不详”的,这些都需要补充,以臻完备。从地区看,中西部的、东北的太少;从个案看,有不少重要媒体,如北京《晨报》、沈阳《盛京时报》、上海《字林西报》等,都缺少系统的研究;从内容看,对新闻规律和业务经验的阐释还相当粗浅。有些论断,虽已被广泛采纳,但仍需深究。如汉口《昭文新报》被认定为中国人

自办的首家报纸,其主要依据是上海《申报》的新闻报道,理由并不充分,还应进一步找寻足够的可靠的依据。至于在办报思想、新闻作品、编辑方针、经营管理、新闻学术、文风等方面,需要填补的空白更多。

第二,学科内涵应扩容。

80年代以来,我国对传播学的研究进展很快,作为它的分支之一的传播史,也有学者在研究,还出版了有关中国传播史的专著《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孙旭培主编,1997年)。虽然我国已确定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为二级学科,但这两个二级学科实际上呈现相互借用与融合的趋势。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新闻宣传与大众传播备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其自身也不断有所创新,如因特网,数年之内就成了强势的传播工具,我们必须及时地作历史记载与跟踪研究。因此,中国新闻事业史应该、也有可能充实与更新内容,扩展为中国新闻传播史。当然,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要在理论观念、内容选择、结构安排等各方面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出现新的格局、新的面貌。

第三,研究要细化深化。

细化,就是要多作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断代研究。个案研究注重第一手材料,是整体研究的基础。汉口《昭文新报》找不到原件,难以作出最后定论。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第一家外文报纸——《蜜蜂华报》(葡文,1822年创刊),原件存在澳门。有的青年学者,为了研究这家报纸,专门学习葡萄牙文,取来原件,剖析其内容,写出了博士学位论文和其他文章。专题研究,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学说史、新闻法制史、新闻业务史以及人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断代研究,如大陆学者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明代新闻传播,台湾学者研究宋代新闻传播,海外华人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都取得了有很高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充实了学科的内容,提高了学科的水平。然而,在细化上,我们还是有做不完的课题。例如,元代的新闻传播情况,我们就不甚了了。对于《大公报》的“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主张这类容易产生歧见的问题,更需要作细致的分析与论证,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论断。

细化,有助于深化。深化,就是要在全面考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强理论观念的阐释与客观规律的探索。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沿着这样的思路向深度行进:历史过程的描述——经验概括——规律探讨——哲理分析。中国新闻史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因为它是蕴含在大量的历史现象之中,只要我们的理论与方法正确,下工夫去作深入的研究,是会有所发现的。其实,我们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已经在作理论分析,只是深度不够,没有从哲理的视角去

探究。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诞生于城市,不久被迫转移到农村,在农村求得生存与发展后,又主动转移到城市,成为建立全国新闻事业网络的基础。我们描述了这一历史过程,也概括出了若干经验,但作为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仍需作深入研究,还可以同外国的情况作比较,最后从哲学的高度加以解释。对于中国新闻史上的许多具体做法、经验与观点,应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判明其价值与意义。如,30年代《救亡日报》的成功经验“报纸杂志化”,今天仍值得学习,但不问具体条件一哄而上搞“杂志化”,那就背离了这一历史经验的本来价值与意义。

第四,把中国新闻传播史置于国际背景中来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研究中国新闻史基本上就中国论中国,从国际意义上考虑不多。这在以往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则需要调整观念,从国际背景再认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衍变与发展的历史。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新闻事业都处于为生存而奋斗的境地,但也就在这个时期,它们都加强了同国外的沟通。国民党组建了国际新闻处(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国新社)。多年被新闻封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迎来了外国记者。美国的、苏联的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在“大后方”,在中国的一些战区,包括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采访活动十分活跃。胡愈之去新加坡办报,顾执中去印度办报,都起了沟通中外、有利于抗日的的作用。然而,对于这类新闻活动,我们研究不多,其过程与经验在新闻史专著与教材中写得很少,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报道和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报道等,突破了西方国家的新闻封锁,起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作用。对这些报道,我们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在一些论著中只描述了过程,对经验与意义的评述很少。至于在新闻学术上,美国、日本、苏联对我国有较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其利弊得失,以利学术发展。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要放开眼界,同时观察中外,对中外作比较分析,从世界大局与各国关系来看中国的历史现象。

改革开放的中国,理所当然地要参与国际新闻交流与竞争。这就需要知识与经验,其中包括历史知识与历史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有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合法的新闻斗争经验;建国后,对外新闻报道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都应该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以丰富学科的内涵,并为新闻方面的国际活动服务。

第五,改进研究方法。

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作逻辑

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重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重视对主客观条件与历史环境的分析,重视全面评论历史现象,这些都是必要的,今后应该继续坚持。但是,过去对定量分析重视不够,也缺少比较研究。今后我们要加强计量的、比较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工作更为现代化、科学化。

总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基础很好,客观条件也有利,在新的世纪里必将出现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局面。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中国古代报纸^①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特征

在古老的中国,报纸有许多名称,例如,“状”、“报”、“报状”、“状报”、“邸吏状”、“朝报”、“塘报”、“驿报”、“邸钞”、“阁钞”等。人们又习惯地把这些古代报纸,统称为“邸报”。于是,邸报成为与中国古代报纸基本上等同的概念了。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某一家报纸的专称,在历史上找不出一种以“邸报”或“朝报”为报头的报纸。

中国古代报纸——邸报,究竟有什么特征呢?

它经历了古老而漫长的道路。从唐代(有人说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其间,有时兴旺,有时冷落,却总是缓慢地发展着。

它的内容不同于今天的报纸。它刊登的是皇帝的谕旨、宫廷动态、官员的任免升降奖惩、臣僚的奏章等。不仅没有专电、专文,甚至连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

它的形式也不同于今天的报纸。它只是一个材料又一个材料的抄录,没有专栏、标题,更没有消息、通讯、评论等不同的体裁。

它是由朝廷或其他官方机构发布的,而不是由报馆出版的。那时根本没有作为独立行业的报馆。

但是,总的说来,它不是官方文书,而是起着传播新闻作用的报纸。它刊载的材料,不是作为具有行政效力的法律和命令下达,而是让人看了能从中了解情况。

二、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

中国古代报纸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始于汉、始于唐两种。

^① 本文原为讲稿,写于1984年,发表于1986年。

认为始于汉的,主要根据有二:一是《汉书》、《西汉会要》等史书中,有关于“邸”的记载,从中推断出汉代可能有“邸报”;二是20世纪初,英国籍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地区挖掘、盗走一批汉简,其中有“边报”材料。

有人说,“邸报”始于汉的说法是戈公振提出来的。戈公振对中国新闻史作过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治学态度是严肃的,他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①一书中提出:“汉有‘邸报’乎?”根据《西汉会要》的一条记载——“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和这条记载的注释——“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戈公振引申说:“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起也。”显然,这只是一种推论,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就在这部《中国报学史》中,他又笼统地说:“‘邸报’始于汉唐。”在1931年撰写的《新闻学》^②一书中,他进一步明确地说:“不过报的流行,到唐代才有确证。”

“邸报”始于汉的说法,在解放前较为流行。有人甚至写文章说“邸报是汉武帝时产生的”。但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却指出:有关汉代的史书上,只有关于“邸”的记载,而找不到关于“邸报”的记载,“邸报”一词到宋代才有;汉简中的“边报”材料,不过是当时上下级联系的“官文书”,算不上供别人阅读的报纸。

近年来,不少新闻史研究者倾向于“邸报”始于唐的说法。这种说法的证据较多,《旧唐书》上有“报状”一词,在一些唐人著作中多次出现“报”、“报状”、“条报”、“杂报”等词汇,如诗人、散文家杜牧在《与人论谏书》中说:“前数月见报,上披阁下谏疏,锡以币帛,僻左且远,莫知其故。”^③有些唐人著作还写了具体情节,如孙樵(孙可之)的《经纬集》中有一条关于“开元杂报”^④的记载,说他自己曾“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他起初以为这些材料记的是“朝廷近所行事”,后来有人告诉他,“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报于外者”。他便将这些材料与《开元录》核对,结果“条条可复”。尔后,他到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不同于“数十幅书”上的描写,进一步证实那不是当时的材料。因此,他把这“数十幅书”称为“开元杂报”。

孙樵关于“开元杂报”的记载,是中国新闻史书刊上常常引用的材料。从这个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确有发布“邸报”的可能,因为要用它来报道朝廷的事情。同时,仔细分析这个材料,还可以看出,所谓“开元杂报”,指的是唐代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5年印行过四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重新出版(三联书店)。

② 戈公振的《新闻学》一书,写于1931年,194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出书时戈公振已逝世。

③ 杜牧:《与人论谏书》,收入《樊川集》。

④ 孙樵:《读“开元杂报”》。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孙可之集十卷”条中篇名为《读“开元杂报”》。

开元年间(公元713年至741年)一些朝廷消息的汇集,不是报纸的名称,即不能加书名号;“开元杂报”是手抄的,不是印刷的,因为孙樵说他读后感慨系之,“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即孙樵将得到“数十幅书”的经过和他的读后感写在书帛的后面)。“开元杂报”的传播范围很小,孙樵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人士,中进士后授中书舍人,他对“开元杂报”尚且如此珍视,一般人恐怕是难以见到的。此外,如果说孙樵看到的“条报朝廷事者”是报纸的话,那么,他到长安后才能看到,这也证明了当时报纸传播的范围确实狭小。

除了始于汉、始于唐两种说法以外,还有一些说法,如,有人说,《春秋》是新闻记事,先秦时代就有新闻事业;也有人说,商周之际已有新闻事业萌芽,诗歌、国语、国策都是“当时新闻之流亚”^①。这类说法,论据不足,难以成立。

三、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

如前所述,汉代有“邸报”只是一种推论,但汉代确实有邸,也就是地方当局(郡国)的驻京办事处。办事处的官员(郡邸长丞),同地方当局当然有联系,要互通信息。但没有材料能证实,这种联系和互通信息的工具就是报纸。

到唐代,地方当局(藩镇)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机构,称为上都邸务留后院,负责的官员称为上都邸务留后使,习惯上又通称为邸、邸吏(或邸官)。邸吏负责通报京城消息和呈递奏章。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上都邸务留后院改称上都进奏院,上都邸务留后使也相应地改称上都进奏院官。这些进奏官都编辑“进奏院状”(或“报状”),与地方长官(节度使)通消息,内容是皇帝言行、朝廷政务、大臣奏章,以及官员的任免升降奖惩等事项。根据进奏院可称为邸、进奏官可称为邸吏的习惯,有些书刊上将“进奏院状”称为“邸吏状”,或称为唐代的“邸报”。

但据现有材料证明,“邸报”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人的著作中。尤袤的《全唐诗话》中有一则记载:“韩翃久家居。一日,夜将半,客扣门急,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翃愕然曰:‘误矣。’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在宋代文献和宋人著作中,不仅有叙述“邸报”、“状报”内容与传递情况的记载,甚至还有读报的细节描写,例如,有一则记载说:某人“一日方进食,进奏院报至,且食且读,既而抵案恸哭,久之哭不止,复弹指骂詈

^① 参见秦理斋:《中国报纸进化小史》(1922年发表)。

久之……”^①

在我国古代报纸最为发达的宋代，有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第一，改组进奏院，统一发布“进奏院状报”。宋代初期像唐代一样，由地方当局（路、州、郡）在京城设进奏院，各自编辑“进奏院状报”。在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取消各地在京的进奏院，改组为中央一级的上都进奏院，成为朝廷的一个机构，进奏官也改由中央委派。这样一来，“进奏院状报”的性质也改变了，原来是各地了解中央和京城消息的工具，现在成了朝廷向各地发布消息的工具，具有中央政府机关报的性质。在内容上也有所不同，除诏令、奏章以外，还有宫廷和皇族生活情况、政治事务、战争情况等方面的材料。这些是北宋时的情形。到南宋，“进奏院状报”继续存在一个时期后，在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年至1194年），由定期发布改为每日发布，从此被人们称为“朝报”。

第二，建立“定本”制度。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开始实行。办法是由进奏院将它所编好的报纸样本，送交枢密院审查（后改为门下省审查），进奏院以审查通过的样本为标准本向地方发布，不能增删或改动。《宋史·刘奉世传》记载：“熙宁三年，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熙宁三年，为公元1070年。）这则记载一方面说明报状要经过审查后才能传递给各地；另一方面说明邸吏抢先并冒充书信寄出，这就成了未经审查的非法报纸——“小报”。

第三，出现“小报”。这是一种未经审查、自行抄传的报纸，从南宋初年起就有了。当时人们把这种“小报”叫做“新闻”。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一书中说：“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这种“小报”，流传较广，有很多读者，但也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为当权者所不容。担任过中书舍人、吏部尚书等官职的周麟之，向皇帝提出了“禁小报”的请求，他写道：“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诤张之说，眩惑众听。如前日所谓召用旧臣，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竟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出，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召有

^① 陈师道：《后山丛谈》。

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①这段文字,剔去作者的偏见,倒是一篇介绍“小报”的材料,既具体又生动,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小报”的内容、性质、消息来源与影响。

中国古代报纸在宋代是处于最发达的时期,到元代就大不一样了。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元代报纸的记载极少。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用了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载的一则有趣的社会新闻:“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荣邸近属也。所居尝独毁于火,于是乡人呼为‘王火烧’。同时有黄瑰者,亦越人,尝为评事。忽遭台评,云其积恶以遭天谴,至于独焚其家,乡人有‘黄火烧’之号,盖误以王为黄耳。‘邸报’既行,而评事之邻有李应麟者为维扬幕,一见大惊,知有被火烧之事,亟告假而归。刺史李应山怜之,馈以官楮二万。及归,则家无患,乃知为误耳。”^②周密是宋末元初人,如果他所记载的事情确实发生在元初的话,那就可以这样说:第一,元初仍有“邸报”;第二,这种“邸报”也刊登社会新闻;第三,地位不很高的文人(扬州刺史的幕僚)也能看到这种“邸报”,因而它可能不是朝廷正式发布的,却有点像南宋的“小报”。元代究竟有没有正式官报,这还是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在明、清两代,中国古代报纸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了发展。明代的“邸报”,是朝廷正式发布的,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同时还有报道军情的“塘报”和性质与南宋“小报”相类似的“朝报”。在明末,出现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可以用书名号标明的报纸——《京报》。它的内容来自“邸报”,但“邸报”是朝廷发布的,而《京报》则是民间报房经营的(当然要经官方同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出刊过“牌报”,就是将消息、文告等材料写在木牌上,发往各地公之于众。

清代继续发布“邸报”,又称为“邸钞”、“阁钞”。因为这种报纸是由负责传递官方文书的提塘(官名)抄传,并经由驿站寄送的,人们又称为“塘报”、“驿报”。这种报纸的内容简单,基本上只有谕旨和奏章,又是手写抄传,阅读范围不大。咸丰元年(1851年),张芾奏请刊刻“邸报”,竟被皇帝申斥为:“识见谬误,不知政体,可笑之至!”这项谕旨中还指出:“所有刊发钞报,乃民间私设报房,转向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③

① 周麟之:《论禁小报》,收入《海陵集》。

②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

③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15卷。

在清代报纸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京报》，它的材料来自官方，由内廷特许报房刊行。它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宫门钞”，即宫廷消息，包括任免事项、政治事务等；二是“上谕”，即皇帝的诏旨、敕命等；三是“奏折”及其他公文、报告。清代后期，在《京报》继续刊行的同时，又创办了一批官报，其中有朝廷办的《政治官报》（后改名为《内阁官报》）；中央各部门办的，如《商务官报》、《学部官报》等；地方政府办的，如《北洋官报》、《南洋官报》、《湖北官报》、《安徽官报》等。这时，国内已创办近代报纸，有中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办的，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务报》、《国闻报》等，都办得很有声色。于是，出现了官报、《京报》、近代报纸三者并存的局面。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时，《京报》和各种官报停刊，中国古代报纸便到了终点。

四、中国古代报纸的印刷与发行

我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印刷报纸？这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清末民初人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说，“开元杂报”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用这个说法后，许多人作过考证，都作了否定的结论。其实，孙樵自己也说是写在“帛”（丝织品）上的。目前没有材料证明唐代存在印刷报纸。

宋代官办的“进奏院状报”，许多材料都说它是手写抄传的。但也不能断言没有刻印本，因为宋代刻印书籍较为普遍。也许发布时是手抄的，传出后便有人刻印了。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闰十一月，监察御史张戢上奏说：“窃闻近日有奸佞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这里所说“印卖”的，当然是一种印刷物。

明代有印刷报纸，而且是活字排印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写道：“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崇祯十一年为公元1638年。这里所指的邸报，实际上是《京报》，顾炎武是按习惯称呼写的。至于明代朝廷正式发布的“邸报”，清代朝廷正式发布的“邸钞”，则都是手写抄传的。

关于清代报纸的印刷情况，戈公振作过分析，他说：“嘉道间，报纸多木版印刷；咸同间，始多铅印，但印机甚陋，每小时只印一二百小纸；光宣间，石印机与铅印机输入日多，报纸每日可出数千大张，然所用犹普通之印机也。”这里是指全国所有报纸而言，其中官办的和外国人办的，印刷质量较好；而由报房经营的

《京报》，印刷质量则较差，长期用木刻活字，甚至用泥制活字排印，全是手工制作，到光绪末年才改用铅字。《京报》通常为日刊，封面用黄纸，“京报”二字用红色印，为宽三寸、长六寸的长方形，每一册，少者五六页，多者几十页。

中国古代报纸的发行方式，基本上有三种：一是朝廷发布的“邸报”，除在京城中央部门抄传外，通过水陆驿站向地方传递；二是非法报纸，办报人自行在都市出售，或在中央与地方官员中出售；三是明、清《京报》都由报房发售。

报房最早出现于明末，到清代有所发展，北京正阳门外曾经有十多家报房。《京报》从收集稿件、编辑、排印、发行都是由报房办理。清廷内阁每天发布“邸钞”或“官文书”，报房于中午或下午派人去抄录，当天排印，出版单张的、没有封皮的“宫门钞”，黄昏前后发行。晚上再排印谕旨、奏折，同“宫门钞”合订成一册《京报》，第二天发行。这样既争取了时间，又保持了内容的完整。不同报房发行的报纸都叫《京报》，材料来源相同，但取舍不同，因而售价不一。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二月一日起，各报房公议实行统一价格。时间性强的“宫门钞”的价格，甚至高于整本的《京报》。报房雇用一批送报人，每日给订户送报上门，同时零售。《京报》主要在北京发行，也有少量带到外地销售的，南方有的地方（如苏州）还翻印《京报》出售。一些近代报纸（如《申报》）时常转载《京报》的材料。

五、还应深入研究

中国是文明古国，东汉已能造纸，唐开元年间起有雕版印刷，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术。从这些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古代可能很早出现报纸，而且可能印刷得很好。但是，可能毕竟不等于现实，要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需要下工夫研究。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道路，它的历史作用，它在新闻业务方面的特点与经验，等等，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应当承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报纸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例如——

（1）缺少实物。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清代《京报》，明代《京报》就很难找到了。再往前，只能在古书中找旁证，作分析和推论，几乎没有实物。

（2）史籍中有关古代的报纸记载并不多，只是到唐代才有一些，宋代比较多，元代极少，明代也较多，清代则既有记载又有实物。

（3）在概念上理解不一。什么叫古代报纸？它的特征是什么？怎么区分古代报纸和“官文书”？古代报纸和近代报纸有何异同、有何关系？在这类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统一的意见。

最近几年,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显著进展,在古代报纸研究方面有专著出版,文章也多起来了。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是我们全面地、系统地学习中国新闻史不可缺少的部分。

(原载安徽《新闻刊大》,1986年第2期)

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的 新道路和党报理论的发展^①

一、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的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报刊上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文章不少,但更多的是对于列宁思想和俄国革命的评述,因为“走俄国人的路”已经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他们把俄国革命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包括列宁办报思想与俄国党报经验,作为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和学习榜样。

列宁办报思想与俄国党报经验,最初在中国传播时,是作为列宁建党学说的一部分,同筹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两次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讨论建党问题。蔡和森提出,首先“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②。显然,这同列宁在《从何着手》、《怎么办》等著作中所阐明的建党主张是相契合的,同俄国的经验一致。

为准备建党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在1921年4月7日出版的第3期上,译载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当时译文题为《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这是列宁在1920年7月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其中第1条规定:“日常的宣传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第12条又规定,党的报刊,“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确定党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时,贯彻了列宁的思想,借鉴了俄国党报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

^① 本文为讲稿,曾收入《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作为其中一节,题为《党报工作的新道路和党报理论的发展》。

^② 《蔡林彬给毛泽东》,见《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此后，在党的许多文件中，都引用了列宁有关党报的观点；在实践中，采取了与俄国党报相似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包括青年团、工会、妇女组织的报刊，有的公开宣布“本报是有组织活动的表征”^①；有的未作声明，实际是按照党报原则办的。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共产党人还把党报工作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带到统一战线的报刊工作中去，汉口《民国日报》支持湖南农民运动的宣传即为一例。

然而，紧张的现实斗争、繁重的宣传任务，使得党报来不及总结自己的经验，党报工作者也不可能作冷静的理论思考。即使是列宁的论述和俄国的经验，也没有作系统的阐释，而只是粗略地片断地介绍和引用。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在《中国青年》上译载时，多处有关报刊工作的论述恰恰被删节了^②。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得革命者重新重视理论。1929年开始，中国思想界再度出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仅1929年和1930年两年中，就有100多种。起初着重译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随后列宁的著作被译介越来越多。1933年，《列宁选集》中文版在苏联出版，其中选有多篇论报刊的文章。这就为中国革命者从列宁原著中学习党报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又出版了许多介绍苏联的书籍和文章，其中也有涉及报刊的。同以往相比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播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的文章与书籍，数量增多，内容也较为系统、较为全面了。

列宁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③这一著名论断，就是在20年代末介绍进来的，并且很快得到广泛引用，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基本要求。1929年9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刊载《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其中第一节题为《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阐释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的办报思想，引用了列宁的著名论断。1930年3月26日出版的《红旗》第87期上，发表

① 《向导》周报同人：《敬告本报读者》，载《向导》周报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

② 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一声译，当时译文题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载《中国青年》第6卷第19号（1926年12月6日出版）。与1982年《红旗》杂志第22期所载译文相比较，一声译文没有第一至四自然段，其他各段也多处有删节。是译文删节，还是原文版本不同，有待查证。

③ 列宁《从何着手？》（1901年5月），《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8页。

《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它的第一部分题为《列宁论党报的作用》^①，对列宁的著名论断作了具体解释。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革命者来说，列宁的思想既是黑暗中的指路明灯，又是一种鼓舞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列宁的著名论断成为办好报刊的响亮口号。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出版100期，发表了李富春、博古、邓颖超、凯丰等撰写的纪念文章，都要求《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②。报社还把列宁的这一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

列宁办报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帮助。1930年5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召开之际，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与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召集各国代表，讨论宣传工作，作出了《国际工人通讯运动的任务与工人通讯员之国际关系》^③的决议案，要求各国党报“建立国际的关系，需要苏联与外国各个报纸保持相互的关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全文译载了这个文件。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办报情况，在中国党的报刊上也时有介绍。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组织，曾经给中国党的报刊以具体帮助。如1935年创刊的《救国时报》，一度在莫斯科编辑。在中国党报工作者中，特别是在其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具有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经历，如蔡和森、瞿秋白、秦邦宪（博古），他们为传播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作出了贡献。

二、共产党在国统区办报的方针与方法

在生气蓬勃的大革命骤然失败时，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活动几乎陷于瘫痪局面。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21日发出的第四号通告中，分析当时的情况是：“自从第五次大会以后，中央的宣传和鼓动更陷于停顿的状态，近来武汉政变，全国反动，全党的宣传和鼓动尤其少，几乎等于零；到处只见反革命派攻击和污蔑本党的宣传和鼓动，而看不见本党的答复，更加谈不上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宣传和鼓动了。”中共中央指出，这种状况“若不急起纠正，则将陷党于更大的损失”。在这个通知中，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宣传工作大纲，对报刊的出版与发行

① 该文其他各部分的标题为：《中国党报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党报与各地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发行问题》。

② 博古的文章题为《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李富春、邓颖超、凯丰的文章也都引用了列宁的名言。

③ 1930年5月10日《红旗》，此处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开始恢复与重建党的新闻宣传阵地。从这时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撤出上海前后,共产党坚持在国统区出版报刊,发挥了党报党刊的积极作用,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客观条件变化,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报刊具有重要作用。过去国共合作,有利条件多,工作渠道多,如今党不能公开活动,同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主要靠报刊。因此,报刊在党的工作中所占分量加重,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极其重视报刊工作,除了规定宣传报道任务以外,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这条战线,其中主要有以下诸项。

1. 成立党报委员会^①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成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工作”,“同时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分别成立了党报委员会,领导党的报刊工作。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其中关于“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部分有一项规定:“自中央、省委以至有党报的地方党部,都应当将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在组织上划分清白。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党委充当”,“宣传部应与党报委员会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但宣传部不能代替党报委员会”^③。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当在这一决议案通过之前或者同时。

1930年5月10日出版的《红旗》第100期,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1931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其中一项为“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的一切领导”。这里之所以重申,是因为王明上台,改组了中央政治局,也成立了新的党报委员会。1931年下半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将中央党报委员会改称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由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兼任。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仍决定设立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仍由张闻天兼任。193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凯丰、王明、博古、周恩来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廖承志任秘书。这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正在筹办《解放》

^① 有关党报委员会的情况,参见王凤超:《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历史沿革》,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1988年3月出版)。

^②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1924年,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③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周刊,同时管理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和中央印刷厂。直到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统管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和出版局。中央党报委员会同时撤销。

2. 发展通讯员

关于组织工农通讯员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提出。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有“工农通讯员问题”专项。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通讯员队伍成为紧迫的工作,是报刊的任务,也是各级党组织的责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1929年6月25日通过的决议案中规定:“建立与训练工农通讯员,是地方党部与支部共同应负的责任。”在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两次公布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规定各省至少要有1名中央党报通讯员,其任务是给中央党报写稿并提供当地政治形势与群众斗争的情况;省委应对中央党报通讯员的工作加以督促和指导。

一些地方党组织也对通讯员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如中共江苏省委在1931年3月8日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中规定:“上海的工农通讯员在最近三个月内至少须发展到200人”^①,并将名额分配到上海各区。

共青团、工会、妇女组织及其他革命团体也积极开展通讯员工作。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北省委,于1932年9月发出《关于建立〈列宁青年〉通讯员的工作条例》^②,规定各个团组织都必须指定专人担任通讯员,条件是“相当了解中央路线,文字通顺”,任务是为刊物写稿。这个条例还规定,北平、天津、唐山的通讯员每星期必须送稿两次,省内其他各地则为一次。

所有党的报刊,都将发展通讯员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和基础工作。除了建立经常联系以外,还注重培养、训练通讯员,帮助通讯员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特别是对工人通讯员,报刊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教他们写新闻。有些报道,是工人提供材料,报刊工作人员编改后成文的。《上海报》将《采访须知》发给通讯员,还召集通讯员开会讨论写稿问题。

3. 建立发行网

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共产党的报刊是被取缔的,不能公开发行。《布尔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党报的决议》(1931年3月8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关于建立〈列宁青年〉通讯员的工作条例》,载《北方列宁青年》第4期(1932年9月)。

塞维克》、《红旗周报》等曾用伪装封面的办法，能销售一部分，但很不稳定，也很危险。根本办法还是建立自己的发行网，秘密发行。

在艰苦的斗争中，党的报刊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发行网，具体做法是：

(1) 通过党和革命团体的组织系统发行。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关于日报及地方党报的供给材料与发行工作，必须切实责成区委、支部负责，尤其是中心产业支部要首先担负起这种责任。”工、青、妇组织和其他革命团体，也担负了报刊发行任务。

(2) 动员全体党员做发行工作。把推销党报、帮助建立发行网，作为每个党员的责任。1930年5月10日，《红旗》第100期发表《党员对党报的责任》一文，提出党员必须担负起工农通讯员、发行工作、阅读党报三种责任。

(3) 把通讯员工作同发行工作结合起来，通讯员在提供稿件的同时，担负发行任务。

(4) 建立专门的发行工作机构。1931年初，中共中央成立出版部，领导报刊、书籍、小册子及其他宣传品的出版与发行工作。从省委到支部各级党组织，都成立了发行部或设有发行员。同年3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提出了建立全国发行网的计划。

除上述措施外，这一时期党的报刊还在采访、编辑、文风等方面，有着自己的做法。如全部采用白话文，还有某些工人语言。就总体而言，党报工作比以往丰富了、前进了，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在中国大幅度地付诸实践。然而，这还是初步的、幼稚的，在“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占主导地位的是照搬照抄，远未解决从中国实际出发办报的问题。

三、党报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当革命事业在城市中遭到严重挫折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转向农村，在那里创建工农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它具有中国特色，纠正了照搬外国模式的错误思想。党的报刊也随之深入农村，在这条道路上得到了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展。

在农村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在领导军事行动的同时，重视宣传工作。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的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

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因此，宣传成为红军的一项重大工作，作为宣传武器的报刊也应运而生。红军各部队和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办起了报刊，并在30年代初期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党报系统。其中有在瑞金出版的、中央级的报刊，也有在各根据地出版的地方报刊；有党和政府的机关报，也有军队、工会、共青团和其他革命团体的报刊。这个报刊系统的出现，为中国新闻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办报，以此为开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或在军阀统治下，或在外国租界里出版党的报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建立了政权和军队，而由于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报刊的出版条件虽有所改善，但毕竟不是执政党的报刊，经常受到国民党右派的压制和排挤。只有在革命根据地，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是出版条件的变化。在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办报，不像在国民党统治下秘密办报，也不像国共合作时期用国民党的名义办报。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公开宣布自己的性质和使命，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各革命团体联系群众、指导工作的得力工具。在物质条件上，也获得了基本保证。

其次是报刊宣传报道内容的变化。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的宣传斗争，是“地下”时期和国共合作时期党报的基本内容。当然，这两个方面也成为革命根据地报刊的重要内容，但不止于此，还有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方面。《红色中华》既要报道反“围剿”战争和土地革命，又要宣传积肥和春耕，还有发行公债、学校教学等多方面的报道。作为军队报纸的《红星报》，除军事与政治报道外，还要发挥“俱乐部”的作用，刊载故事、歌曲和游戏材料。即使是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内容也有很大变化。在政治宣传方面，不再以揭露为主（对敌人和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仍有相当多的分量），还要报道政权建设、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在军事宣传方面，不是单纯报道战局，而是既报道红军的作战，也报道红军的思想建设和官兵生活。革命队伍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与表扬，成为革命根据地报刊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见报，辟有专栏，这是前所未有的。

再次是工作方法上的变化。在国统区，党报工作只能以秘密的单线联系为主要方式。而在革命根据地，党的报刊也是人民的报刊，办好报刊成为全党、全体人民的分内事情，可以动员广大社会力量来关心和参与报刊工作。报刊工作人员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他们的业务工作受到人民政权的保护。报刊同党政

机关、社会团体,都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可以获得各方支持和协助。在报刊界内部,各单位之间也建立起团结、协作的新型关系。

第二,报刊深入农村这一大变革开始实现。

我国报刊历来是办在城市里,供城里人阅读。革命根据地报刊是办在农村里(包括农村小城镇),以农村人民为主要读者对象,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

革命根据地是在贫困、落后的农村中建立起来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世代务农的农民,文盲一般占90%以上。中央根据地的寻乌县,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该县人口中识字的占40%(其中不少只识200字,或只能记账),不识字的占60%，“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①。在这样的农村环境中,报刊是稀有品,不少农民甚至没有见到过。共产党来了,建立了工农红军和人民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渴求长进。报刊一出现,就受到他们的欢迎。他们从报刊上懂得了革命道理,增长了知识,还学习了文化。有些人把读报与识字相结合,不识字的还可以听别人读。圩场设有“读报团”,逢圩日^②读报,如中央根据地上杭县才溪乡圩场,每次圩场读报,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③。

报刊深入农村,不仅从无到有,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实现报刊与农村人民的结合,真正成为农村人民群众自己的报刊。在中国报刊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充实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报刊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坚定的革命性和良好的作风,如宣传无产阶级世界观、面向工农读者、发展工农通讯员等,都在同时期报刊中独树一帜。它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当然,这种特色和传统在早期是幼稚的。因为,党的报刊没有稳定的工作程序,也不可能系统地总结经验,而且党处于幼年时期,多次出现错误路线,党的报刊也随着宣传过错误主张,采取过错误的工作方法。

在革命根据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的报刊是真正的自由报刊,没有政治压迫,也不受私人资本的控制,可以按照党的意图和人民的需求办报。这种实践条件,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没有的。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根据地,都充分利用了这种有利条件,开展新闻宣传活动。在中央根据地,从1931年《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等报刊创办,到1934年红军撤离瑞金,开始长征

① 《寻乌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0页。

② 圩场,即集市;圩日,即赶集日。

③ 《才溪乡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之前,新闻宣传活动很活跃,创造了很多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报刊的优良传统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主要有: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报道与宣传,如有关扩大红军、反“围剿”战争、建设工农政权、土地革命等方面的宣传报道;

——依靠人民群众办报,如发展工农通讯员、培养工农作者、建立“读报团”等;

——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表扬;

——因陋就简,艰苦奋斗。

但是,由于处在紧张的反“围剿”战争的环境中,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瑞金后“左”倾影响又日益严重,因此没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有些做法(如批评与表扬),起先是正确的,以后发生偏差。总之,中国共产党报刊的传统在这一时期仍然是不成熟的。

四、党报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党报事业的发展,实践经验的增多,人们在理论上的认识也加深了。在党的文件、报纸社论和文章中,不仅有工作部署,也常有关于报纸工作理论观点的阐释。专门论述报纸工作的文章,也逐渐增多。经验和理论都比以往前进了一步。以下介绍的是,这一时期党报工作中几个主要的理论问题。

1. 关于党报的性质

自从中国共产党报刊产生以来,报刊具有阶级性,党报是党用以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等基本观点,都是公认的、无疑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们对于党报性质的认识,具体化了,深化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二是明确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工农群众的报纸。

关于前者,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写道:“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此前后,一些革命报刊上虽有类似的观点,但以明确的语言作出论断,这是首次。这一论断的出现,同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统区,阶级营垒分明,矛盾尖锐,国民党当局利用报纸“围剿”革命力量。这一论断,反映了现实。但是,由于《红旗日报》是在立三路线控制之下,这一论断用以说明某些现象时又被导向“左”倾错误,偏离或歪曲了客观现实。比如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在目前国民党的白色

恐怖之统治之下，一切公开发行的报纸，都是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拥护者，都是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这种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的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

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论断，得到广大革命者的认同。有的用“武器”代替“工具”。如说：“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①

关于后者，《我们的任务》一文是这样表述的：“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在革命根据地，《红色中华》既是政府机关报，又是“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②。

2. 关于党报的作用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在国统区“地下”出版的党报就作了介绍。那时的党报，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宣传、鼓动作用，其组织作用体现在建立通讯、发行队伍上。

在革命根据地，报纸面向社会的各行各业、各种工作，需要在多方面发挥作用。即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军事、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都要发挥报纸的作用。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作深入探讨，但在革命根据地报纸工作的实践中，是把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三者统一起来看待的。它既作为奋斗目标，又作为行动口号和工作要求。《红色中华》在政权建设、扩大红军、查田运动、节省退债等多方面，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如节省退债宣传，1933年3月《红色中华》提出“努力节省经济，无偿的退还公债票，支援战争”的号召，接着提出具体指标，随后又开辟“经济动员统计”专栏，每期报上公布各地节省、退债数字。8月10日，李一氓^③在《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一文中提出：“公债的退还，《红中》尽可以代收，按期宣布数目，按期转交财政部。——在白区的抗日捐款给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资产阶级报纸的组织作用，可以给我们作参考。”这种做法和看法都是简单化的，但说明当时人们对“组织作用”的理解，就是报纸直接参与某些实际工作。

3. 关于党与党报的关系

关于党与党报的关系，有些基本观点是早已明确的，如党报是党的事业的

^① 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181页。

^② 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载《红色中华》1933年8月10日。

^③ 当时署名氓。

一个组成部分、党报必须宣传党的政策等。这一时期,在实践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见解,主要有:

(1) 党报是党实现领导作用的工具。处于国统区“地下”的中共中央,在1929年提出:“日报一定要严正的代表党的意见。”^①1931年又提出:“用党报方式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以党报的社论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的分析与策略上的指导”^②。在革命根据地,批评过把党报工作看成单纯“文字工作”的错误思想^③,强调党报应该发挥“政治上的领导作用”^④。

(2) 各级党组织要善于利用自己的报纸。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及一些地方党组织都办了报纸。地方党组织在办好自己报纸的同时,要尽力支持中央报纸。在革命根据地,《红色中华》作为中央级报纸,受到全党的重视。李一氓提出:“《红中》应该有力量来领导”地方报纸^⑤。张闻天还批评个别人“以为利用自己的机关报,就是利用它来登载自己油印的文件,关于如何经过报纸来进行活的领导,却是不了解的”^⑥。

(3) 党员对于党报的责任。1930年5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党员对于党报的责任》一文,提出担任通讯员、做发行工作和阅读党报是党员的责任。1931年7月1日,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又发表李卓然的《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一文指出:“读党报,替党报做文章,帮助党报的发行,是每个党员实际工作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4. 关于党报上的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

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是革命根据地常有的内容,几乎每家报纸都设有专栏或专页。一些论述报纸工作的文章,对此也多有涉及。如张闻天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中提出,党报要“把不好的现象揭发出来”,同时“赞扬在军事、政治、经济、劳动各个战线上的英雄”。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的意见》一文中提出:《红色中华》在报道根据地的社会改革和群众积极性时,只有笼统的叙述,

①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② 《中共中央通知第二〇三号》(1931年1月21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

③ 参见李卓然:《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1931年7月1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④ 参见狄康(瞿秋白):《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1933年),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

⑤ 李一氓:《论目前〈红中〉的任务》,载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

⑥ 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1930年12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页。

没有具体的描写；而揭露坏现象和缺点时，又“往往不提党的纠正政策”。

革命根据地报纸之所以重视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除了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外，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报纸性质的认识。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观点，特别是要用具体事例教育群众、要进行社会批评、要成为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等主张，为革命根据地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所反复引用。张闻天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中引用约 800 字，为列宁文章全文的一半。

然而，革命根据地报纸在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时，也存在着“左”倾错误。批评的调子越唱越高，“残酷斗争”的气味越来越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报工作中，除了上述四个为人们所广泛注意的理论问题以外，还有些已见端倪或已有涉及，但当时尚未引起重视，而以后成为重大问题的。以下两个便是。

一为调查研究和调查报告。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在《斗争》上的《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在《青年实话》上的《模范乡的文化教育》，都是调查报告。他在《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查田运动的文章，也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当时，调查研究和调查报告对于报纸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未被人们认识。

二为宣传纪律。这一时期，宣传纪律没有作为普遍问题提出来，但已出现个案。1933 年 12 月 11 日，《红色中华》第 134 期刊载了郑茂德偷骡子的报道，其中有“回来就与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一句，与事实不符，《红色中华》在 135 期（12 月 17 日）作了“重要更正”。但是，《青年实话》编辑部竟在该刊第 3 卷第 4 号（1933 年 12 月 17 日）上，用四号字标题《红色中华的造谣》，指责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宣传部了解有关情况后，于 1933 年 12 月 29 日作出《关于〈青年实话〉的决定》，指出《青年实话》是“诬蔑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企图将少共中央局的《青年实话》同中央政府的《红色中华》对立起来。中央宣传部认为这是绝不能容许的现象，特给《青年实话》编辑部以严重警告，并于《红色中华》与《青年实话》上公布这一决定”。两报随即照办^①。

（原载《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2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① 《青年实话》第 3 卷第 5 号（1933 年 12 月 31 日）、《红色中华》第 139 期（1934 年 1 月 1 日）分别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决定。

关于《文艺新闻》和袁殊

《文艺新闻》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上海的一家小型报(周刊),它的创办人袁殊是个传奇式人物。1960 年 3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新闻》的影印本,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袁殊的所在单位。直到 80 年代初,才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随后又打听到他的工作单位。1984 年,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委托与袁殊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士,对他进行了访问,主要谈《文艺新闻》、《记者座谈》等新闻工作经历。7 月 10 日、11 日访谈,记录经袁殊看过,但未公开发表。我根据访谈记录中的部分材料,写过一篇题为《“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是怎样公之于世的?》文章(署名史述之),刊载于《新闻大学》杂志 1988 年冬季号。现将访谈记录与拙文一并发表,供研究者参考。

袁殊(1911—1987),湖北蕲春人,原名学易。1919 年,跟随父亲到上海。少年时代,就读于立达学园。1927 年初参加北伐军,“四一二”事变后不久离开部队,从南京回到上海,参加狂飙社,成为该社演剧部成员。演剧部由向培良主持,成员有马彦祥、柯仲平、陈凝秋(塞克)等。1929 年秋,赴日本留学,专攻新闻学。1930 年 7、8 月间回国。1931 年创办《文艺新闻》,身份为文艺新闻社代表人。同年 10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按照党的指示在社会活动中改变颜色,由左派变为灰色,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从此,他开始了情报工作生涯,但仍以新闻工作为公开职业,先后曾在上海新声通讯社、外论编译社、《译报》、《中国评论》、《华美晚报》等单位任职。他还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的成员,担任过日伪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主干、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要职,主持《新中国报》和《杂志》(期刊)。他利用这种特殊身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从上海转入解放区,改名“曾达斋”,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55 年,因潘汉年冤案受牵连,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1967 年服刑期满,又遇上“文化大革命”,被继续关押。1975 年 5 月,被押送到湖北的一个农场“劳动就业”,

直到1979年12月才回到北京。1982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合议庭宣布袁殊无罪,撤销1955年的判决,同时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此时,他已是古稀老人,病痛缠身,但仍热情接待来访者,应约撰写回忆文章,还翻译日文小说。1984年,他曾赴南京、上海、杭州、无锡、苏州以及湖北蕲春等地,作故地重游,赋诗作文,感慨系之,但毕竟垂垂老矣,力不从心,不久又病倒。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①。

袁殊一生的事业是从新闻事业开始的。他热爱新闻学和文学,乐于从事新闻工作。1931年,他曾对当时在《文艺新闻》兼任编辑的夏衍说,他决心以新闻为终身事业;把英语的journalism译为“集纳”(或“集纳主义”),是他的首创^②。袁殊把办《文艺新闻》作为一种尝试,认为这张报纸是“雏形的报纸”,这家报馆是“雏形的报馆”,而“这雏形的标准,主要依据于近代的新闻学原理”^③。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当局实行高压的新闻统制政策,而共产党的领导层又屡犯“左”倾错误,在这样险峻的形势下,众多的左派报刊都存在时间不长,有些只出一两期就被查封。《文艺新闻》坚持公开出版了一年又三个月,确实不容易。在中国新闻史上,它算得上是一张成功的“合法”报纸。它创造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例如,不打左派旗号,而以独立的、客观的面貌出现,报馆地址公开,报纸公开发行;灵活运用编辑手段,讲究宣传策略(突出的事例是披露“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重视同读者的联系(曾组织《文艺新闻》读者联欢会);善于利用各种社会条件,同国民党当局周旋;按时出版,不脱期,等等。这些都是袁殊努力的结果,夏衍曾这样写道:“我不止一次和冯雪峰、钱杏邨等人称赞过袁殊的积极和能干。”^④

袁殊写了不少新闻理论文章,还积极策动或参加组织新闻团体。就在办《文艺新闻》期间,他同新闻学者任白涛、黄天鹏、谢六逸、陈望道等过从甚密,报上经常刊载新闻学文章,开辟过一个“集纳版”,在徐宝璜逝世一周年时还发了纪念文章。在袁殊主持下,《文艺新闻》发起组织中国新闻学研究会。1931年10月21日该会成立,26日发表宣言,说明该会成立的动机与目的,宣布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⑤。中国新闻学

① 有关袁殊的经历,参见《袁殊文集》,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一书中的《〈文艺新闻〉及其他》节,三联书店1985年版。又,将英文journalism译为“集纳”或“集纳主义”,袁殊曾征得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新闻学者任白涛的同意。参见《记者道》一书,1936年上海群力书店出版。

③ 《文艺新闻》第1号第1版关于赞助人聚合的报道,1931年3月16日。

④ 夏衍《懒寻旧梦录》一书中的《〈文艺新闻〉及其他》节,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⑤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言》,载《文艺新闻》第33号,1931年10月26日。

研究会执委会还通过了研究纲要,规划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要求建立“新兴新闻学及新闻事业之有历史价值的基础理论”^①。1932年3月20日,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许多会员成为它的基本成员,但袁殊却未参加。

袁殊的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他与同行们来往很多。1934年夏,袁殊与恽逸群、陆诒、鲁风、吴半农等相约,每星期聚餐一次,自由参加,自由议论。起初只有几个人,以后增至10多人,甚至20多人,大家在一起边吃边谈,从时事到业务,无所不谈。大家觉得从交谈中收获不小,有人建议最好出个刊物,扩大影响。于是,就产生了《大美晚报》中文版上的《记者座谈》周刊,每逢周五出版。从1934年8月31日创刊,出至1936年5月7日,迫于时势休刊,共出90期。袁殊为《记者座谈》写了许多文章,后汇集成《记者道》一书,1936年11月由上海群力书店出版,作者署名怀云。《〈座谈〉休刊的话》也收入了本书,袁殊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一段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话:“现在,这个周刊正式休刊。但是,这不是终结,整个中国的新闻事业,追随着整个中国的命运,必然有很多更困难的和更有希望的前途;而新兴集纳学术运动,也必然有无止境的更新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的结束,也可以说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袁殊还写过一首歌词《新闻记者歌》^②,经过施谊(孙师毅)^③的修改,交聂耳谱曲,可惜聂耳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溺水身亡,成为永远的遗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曾对在上海负责党的文化和宣传工

① 《文艺新闻》第60号第6版有关报道,1932年6月20日。

② 《新闻记者歌》歌词全文如下:

从清晨到深宵/我们的职责:新闻报道。/不问风霜寒暑,/在街头奔跑;/申诉人间苦难,/给社会知道。

今天的消息,不要疏忽了:/到处满灾荒,人们早受不了;/边疆沦落尽,敌人还在开炮。/快记录事实,把真相传报,/确实,详细,最要紧,莫造谣!

今天的消息,不要疏忽了:/新的战争,到处在爆炸,/民族自救的烽火,正在燃烧!/内勤、外勤,都一齐动员罢,/在职业前哨,也就是斗争的前哨!

今天的消息,不要疏忽了:/帝国主义者,大肚吃不饱;/社会恶势力,更在逞强暴。/打开镜箱,照出他们醉生梦死的微笑,/提起笔来,揭发那些蝇营狗苟的奸巧。/轮转机上,洪水般印出了我们的报,/轮转机上,洪水般印出了我们的报。

舆论的权威,要大众支持,/神圣的职业,是我们的瑰宝,/不准无耻的家伙,去卖身投靠,/万万千千的读者,要求着精神的面包。/莫自夸帝王无冕,/我们要举起“集纳”的旗号!/大家准备三千毛瑟,有笔如刀!

③ 孙师毅(1904—1966),电影剧作家、歌词作家,时任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编剧。

作的胡愈之、夏衍等,传达党中央指示:广泛团结爱国新闻工作者,组织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贡献更大的力量。在周恩来的倡导和支持下,胡愈之、夏衍、杨潮(羊枣)、恽逸群等迅速筹建新的团体,袁殊参加了这一活动。同年11月4日,范长江、杨潮、夏衍、恽逸群、邵宗汉、朱明、袁殊(碧泉)等商定,新组织定名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1月8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南京饭店宣告成立,通过了简章,推选范长江、恽逸群、杨潮、袁殊、朱明为总干事,邵宗汉为候补干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为今天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从2001年起,11月8日这一天成为中国记者节。袁殊为这一团体的组建出了力,只不过此后他迅速改变了面貌,同这一团体再也没有联系了。

袁殊是我国报告文学的最早的研究者和提倡者之一。1931年6月11日,他在上海劳动大学劳动文艺研究会就报告文学问题作了讲演。7月13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18号上,发表了的文章《报告文学论》,对报告文学的内涵、特点和意义等作了论述。《文艺新闻》还发表了夏衍、楼适夷等人的评论报告文学的文章,并刊载外国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张报纸成为我国最早的倡导报告文学的阵地之一。

《文艺新闻》和袁殊,在中国新闻史上已占有一席之地,我提供的只是一些研究资料,期待今后能够看到更多的材料与研究成果。

(原载《传播学研究集刊》(I),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袁殊对《文艺新闻》 及《记者座谈》的回忆^①

1928年底^②，我同我从前的爱人一起去日本东京求学。在东京，我托日本大学的一个叫后藤朝太郎的老教授，为我办了入学的证明。此人曾在中国当特务，是日本搞中国情报的间谍。后藤是我去东京后遇见的。当时，很多中国学生都求他帮助在日本大学上学。他也专为中国学生干这种事。这老头怪得很。他穿的是中国的长袍马褂，戴一顶西瓜帽，帽顶是红色，每天在日本大学附近的马路上优哉游哉地晃荡。因此，他认识很多的中国学生。当时，他认识中国学生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打听中国的政情，而是为了认识这些学生从而能吃中国的饭菜（中国饭菜在日本声誉很高）。他在中国时，常去上海的“青莲阁”。

他有时也在日本大学新闻学学科上自由地讲中国报界的情况。日本大学对这个“老宝贝”，舍不得放弃。他出书啊，出了很多，不是有关新闻学的，而是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以及甲骨文字的考证。这些书在当时日本发行是很广的。在日本大学，我学习新闻学，也曾想学航空，但未能如愿。

1929年^③暑假，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我找工作无门路。我的爱人叫马景星，去日本时学习西洋画，在日本女子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她家是上海南汇县大团镇有名的大地主。她一生不问政治，我们未正式结婚，只是同居。我一生都没有正式结过婚。马景星画画消遣，我想当记者，可无门路。

这时，我碰见一位朋友，带我去北京，找一位高级军人保送我再赴日本学航空，继续兼学新闻。我到了天津和北京，正值张学良发出“巧电”入关，结果困在北京两个月。后来设法弄到钱，回到上海。

我一直想当一名职业记者，既是当事业，也是生活的依靠。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办报。马景星支持我，她对我说：“你无论干什么事，我都同意。”我

① 本文是访问袁殊的谈话记录，访谈时间为1984年7月10日上午，11日上午、下午。访谈记录经袁殊审阅，注释为丁淦林所加。

② 应为1929年底。

③ 应为1930年。

说,只要你同意,你就得帮我找钱,有钱才能办报。于是,她回到南汇乡下,筹集了500块钱。这笔钱在当时不算少,那时上海物价很便宜。我就是用这500块钱创办了《文艺新闻》周刊。那是1930年2、3月的事。编辑部设在上海福州路杏花楼后面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刊物在“勤业印刷所”印刷。

我找了朋友翁从六负责印刷和发行。我自当总编辑。我从一开始就规定,刊物收入所得不支持任何个人的生活。所有人包括我在内,生活费用另谋。翁从六靠朋友周济,我靠马景星家里和我写文章的稿费。所有以后的工作人员,在《文艺新闻》都是尽义务的。我当时住在法租界西爱贤思路。每天在家编好稿件,去编辑部编排。翁从六把编辑部选在杏花楼,是因这里距上海大报馆所在地望平街很近的缘故。杏花楼后的房子,是我们从二房东胡慧珠那里租来的,每月租金15块。这个胡慧珠也办了个无聊的流氓小报叫《报报》。

为了说明我办《文艺新闻》的原因,首先我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当时上海报纸很多,有中、英、法、德、日和白俄报纸。日文报纸有三种:《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日日新闻》和《上海日报》。这些报纸一直到抗战的末期,才合并成一张报纸,叫《大陆新闻》。我还想说一点的,是上海的英文报纸。最大的是英国商人办的《字林西报》;第二个是《大陆报》,主编人是为宋美龄接待外国人的董显光;第三个是《大美晚报》,主编人是美籍华人,燕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袁伦仁,此人到抗战末期在美国升任国际社和合众社的远东部主任,在东南亚活动。外国的新闻垄断势力,影响着上海中国报界。外国在上海还设立了许多通讯分社,最大的是美联社上海分社,美国资本的还有合众国际社。英国资本的有路透社。法国通讯分社,当时叫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苏联塔斯新闻社也有分机构。日本的是共同社,当时叫同盟社,在上海也有分社。日本各大报在中国都派有特派员,一般每家有四五人。例如,《朝日新闻》在上海有“朝日新闻社上海局”(日本文惯称“局”),还有“日本新闻社上海局”和“读卖新闻社上海局”。

我特别要说的是,日本通讯社和报纸的记者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第一种是特务机关出身的并由特务机关派到中国当记者的职业特工人员;第二种是因为同那些驻在中国的日本间谍交了朋友而为特务机关工作的半职业特务记者。中日关系紧张,矛盾日趋尖锐。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件”。

中国报界的情况更糟。

旧中国的报纸,要想任用一个记者,对平民百姓出身的人来说,那是很难的。上海的报纸记者,不是流氓的徒弟,就是同资本家或富豪有关系,有政治背景的人。上海的黄金荣和杜月笙,在新闻界很有影响。黄、杜这些大流氓头子,

我都认得,那是以后我放弃《文艺新闻》工作,作为一个通讯社的职业记者参加上海记者工会时的事。上海记者工会有执行委员 20 多人,我是其中之一,而《申报》的唐世昌在执委会中就是杜月笙的代表。当时,《新闻报》每天发行 15 万份,《申报》每天 10 万份。除《新闻报》记者李浩然和顾执中等少数人外,其他大报记者几乎都是招摇撞骗的流氓记者。怎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首先拜杜月笙等人为师爷,成为门徒,经常参与分赃。这些流氓记者接受有钱有势力人的钱,也有的人接受鸦片商和赌场老板的钱,整天在旅馆里包房间打麻将,吃、喝、嫖、赌,全不干正经事。另外,这些记者对那些涉及上层的桃色事件,也是看有钱有势人的眼色行事。谁多给钱,就给谁干。尤其是当时的军阀政客,都想在上海拉几个记者,给他们吹喇叭。云、贵、川、青海等地方的地方军阀们自不必说,就是像冯玉祥这样正直的旧军人也敷衍几个记者。他的军师长到上海来吃、喝、玩、乐,都交过几个记者朋友。我记得冯玉祥反蒋时,骂吴稚晖是“苍髯老贼”。上海没有一家报纸敢登,但是《时事新报》给登了出来。这就是军阀之间斗争,反映在新闻界的一个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办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改变上海新闻界的腐败落后状况,这是我的意志;二是要以记者的身份列入新闻界,作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这是我的行动。

但是从什么地方入手呢?我想,我办《文艺新闻》周刊。首先还是要像刊物名字所说的一样,专门报道新文化界的消息,反映进步的文化思想。其次,我也想从小报办起,以后发展成大报。办大报的想法我未向任何人谈过,这只是我私下里自己的一个愿望。

在这里,我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我同文化界的关系。

我家原在湖北蕲春县。我父亲早年参加了同盟会,以后思想转变。他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国民党革新派。他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半途在船上被机器碰伤返回中国。以后在安徽、湖北和山东当县长。后来完全消极,代替马超俊(孙科的人)协办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我幼年没受父亲多少帮助,8岁跟着母亲来到上海,住在表兄董纯才家。董纯才比我大8岁,以后当了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兼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我和董纯才一起去浦东中学读书,我上附属小学。董纯才毕业后改读光华大学,以后去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学习。我在上海一直读书,在浦东三林高等小学学习,以后又转入“立达学园”学习。之后,过了一段流浪生活。我好读书,喜欢文学。1928年去日本前,我参加了“狂飙社”,中心人物是高长虹。成员有当时活跃的青年文学家,如向培良(搞戏剧)、柯仲平(诗人)、高歌和尚钺(解放后任人民大学教授,当时是党员)。

“狂飙社”是许多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青年文人团体。还有一个成员叫郑效洵，解放后当过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现在退休，他是精通英文的翻译家。“狂飙社”后期，大家都很穷，在这前后，我在文学活动中认识了楼适夷、潘汉年、陈望道、姚蓬子、郁达夫和行为心理学家陈德荣等多人。以后，我就东渡日本求学去了。

去日本前，我也认识任白涛。他是自由主义的文人，是从前《申报》在河南的通讯员。后来，他对《申报》落后的编辑方针不满意，就去日本学习新闻学，回国后写了《新闻学》那本书。我们关系很好。

办《文艺新闻》之前，我同陈望道、任白涛和谢六逸（复旦大学文学教授，第一任复旦新闻系主任）等人口头商量，他们一致说好。任白涛鼓励我说：“新闻界非搞个改造不可！一定要改造一番！”在一阵酝酿之后，我在四川路新亚饭店请了包括以上三人在内的十几个人作为赞助人，举行了一次茶话会，以后《文艺新闻》就正式诞生了。

作为创办人，我所持的新闻理论是什么呢？

老实说，在日本学习新闻学，我没有多少新的启发。中国的新闻理论陈腐不堪，什么“无冕之王”、“有闻必录”，什么“记者一支笔胜过三千支毛瑟枪”等等。我没有发现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新闻理论。在创办《文艺新闻》前后，我陆续从上海的日文报刊书籍中读到了列宁和苏联的新闻观点，心里为之一振，觉得这是新兴阶级的新闻学理论，是为劳苦大众说话的新闻理论。例如列宁有一句话说，报纸不单要起到宣传鼓动作用，而且要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我认为，苏联的报业发展好得难以想象。我就翻译并编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有时去大学演讲，有时投稿。我提出建立一个新兴阶级的新闻理论的口号，并为此而努力。当时，我并没有提出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新闻科学”的口号。30年代，中国对苏俄的消息实行封锁，但是日本却密切注意苏俄的情况。我们很多有关苏俄的消息，是从日本报刊书籍中得到的。

我的为建立新兴阶级的新闻科学的口号，既说明我认识有所提高，也说明当时我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未做对苏联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

《文艺新闻》具体体现自己的新闻理论，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广泛报道左翼文化界的活动，反映进步文化思想。

关于左翼文化界的报道，在当时是很少的，我们则相反。冯雪峰和我有一次以上海工人暑期训练班的名义，秘密在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二楼会议室里，为鲁迅组织了一次演讲会。担任演讲会记录的叫于海，是我爱人马景星的好朋友，曾住我家。他是上海美专的青年，为《文艺新闻》设计美术刊头或写些记录

性的文章,解放后曾在《烟台日报》当编辑,最后听说在新华社工作。演讲会后,我根据于海的记录,未作内容的更改就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以后鲁迅又根据登在《文艺新闻》上的记录文章作了补充修改,定名为《上海文艺之一瞥》。当时,郭沫若在东京。在上海的李一氓把《文艺新闻》寄给他,郭老对鲁迅的观点很赞同。抗战前,郭老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沧州饭店,我去看他时,他对我说:“鲁迅这篇文章还很好。”

又如《文艺新闻》首先报道了“左联”五烈士牺牲一案,引起舆论界的广泛注意。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冯雪峰来到《文艺新闻》对我说:“有一条重要消息你敢不敢登?”我问:“什么消息?只要是公正的消息我都能登。”他就告诉我,“左联”有五名作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了,他特别指出“胡也频就是丁玲的丈夫”。我说:“这我知道。”他又说:“现在白色恐怖很严重,社会上不知道这件事。”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我有个办法。你公开写信给《文艺新闻》,内容不提五作家被杀一事,只说五作家下落不明,请代为查找。我在消息来源上做些技术处理,不披露姓名,只署名是《文艺新闻》一读者。”就这样,我又提出让雪峰找来五作家的照片,按我俩商量的办法,和来信一起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这立即引起社会上的同情和关注。广大读者纷纷来信表示气愤。接着,我又发表了第二封雪峰授意别人写的来信,报告五作家已在龙华被警备司令部杀害了,这就更激起了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痛恨。我把措辞激烈的读者来信,编改得温和一些,以便不至于使刊物倾向性过分明显,在《文艺新闻》上继续登载。有的读者来信介绍五烈士的生平和文学事业,我也刊登出来,受到读者的欢迎。据我所知,当时五烈士实际上是准备赴江西参加中华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的上海地方代表。但我不知道国民党当局是否因此而判他们死刑。

过后的一天,五烈士之一冯铿(女)的哥哥冯白驹同志到编辑部找我。他当时是党员,“流落”在上海,获悉妹妹牺牲的消息后,他来编辑部和我谈话。我们在四川路上一同散步,我问他:“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我准备回乡下去打游击,看来中国革命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来完成!”他走了。以后,他成为经过艰苦卓绝斗争壮大成长的海南岛著名革命武装琼崖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另外,《文艺新闻》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瞿秋白和鲁迅的文章是由冯雪峰每次带给我,并嘱咐我不要随意修改内容。瞿秋白在党内失势后,暂住鲁迅家。他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新闻》上,主要是批判以王礼锡和胡秋原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第三种人”,他们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王礼锡主编《读书月刊》,

出版机关是广东军人办的神州国光社，经理叫曾献生。当时，文学上也有一种“第三种人”，但影响不大。

夏衍也常来《文艺新闻》。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顾问一样的人物。我们是好朋友。我就是这时认识他的。夏衍和《文艺新闻》有一件事可稍提一下。“报告文学”这个名称就是夏衍最初和我谈的。“报告文学”是指日本出现的墙头小报，日语叫“壁新闻”。昭和初期出现于日本的工厂和学校，中国话就是指“墙报”，是作为日本思想运动的一个武器发展而来的，内容多是对当时社会表示不满。夏衍曾对我说：“像这类文章，你们应该多多提倡。”楼适夷那时就曾翻译过两篇有名的日本“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一个是湫川一奈子(女)，一个是宫本百合子(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的夫人，当时还不是)。

第二，举办读者联欢会，团结进步青年。

《文艺新闻》读者联欢会我不负责，是由王达夫负责。他可能是党员，原来在四川当教师，到上海后由楼适夷介绍来的。适夷当时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个人，不要钱，只做义务工作。”在读者联欢会上，下层穷困的文学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到《文艺新闻》交流思想和生活及创作感受，热闹热闹，效果很好。有时夜晚也在这儿开会。

第三，成立《文艺新闻》演剧部，当时叫“曙星剧社”。

这是读者当中喜欢演戏的人组织起来的，楼适夷参加。我写过一个剧本，题目叫《工厂夜景》。我的好友郁达夫在《文艺新闻》上写文章，认为《工厂夜景》和高尔基写的《夜店》内容相似，后来我读到高尔基的《夜店》，发现内容有所不同。适夷写的剧本叫《SOS》。当时所谓剧，其实很简单，就是活报剧，内容都是反映下层群众生活的故事。演员中有位华侨青年，是暨南大学(上海)的学生，后来到了苏区。他会写字，懂中国的古董，和李一氓很要好，是个才子。广州解放时，他任第一任市长。他就是朱光同志。和朱光一起的还有一位叫严僧的青年，以后参加红军长征，牺牲在路上。也有后来变消极的青年。北京女学生爱霞当时也参加“曙星剧社”，后来进了明星电影公司，以后走了下坡路。抗战高潮时期，北京学生曾演我们的剧目，这是当时还是北大学子的于伶以后告诉我的。我们的剧社常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沪西和沪东公开演出，观众多是穷苦的工人。

第四，我本人应邀去各大学演讲，提倡办报。

我办《文艺新闻》出了名，常应邀去大学演讲，内容就是谈新闻理论。我的理论来源，就是我从日文翻译编写的一些苏联新闻理论，我称为“新兴阶级的新闻科学”。我的讲话和文章，后来汇编成一本叫《学校新闻讲话》，出版于1932

年7月,任白涛写了序言。我手头的这部复印本,是最近中央党校一位同志帮助搞的。我当时认为,校报可以影响学生思想并形成左翼舆论中心,后来这为事实所证明。当时大学里,党团员是不少的。另外,我也写了一些批判旧新闻理论的文章。

第五,《文艺新闻》经常报道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状态。

例如,我们曾有“街头音乐家”类的专栏报道。同情人民的疾苦。实际就是谴责旧制度的黑暗。这是很多大报不乐意做的。

第六,《文艺新闻》提倡工农通讯员活动,欢迎劳动群众积极写稿。所有工作人员,自始至终不拿任何薪水,完全是尽义务。

《文艺新闻》最初发行3000份,以后升到5000份,最后将近10000份。经济完全独立了,有些书报广告就不收费,都作为朋友关系处理。另外,所有给《文艺新闻》的投稿,包括名人在内,都从未付过稿酬。

《文艺新闻》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它已成为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约见谈话的可靠地点。除夏衍、潘梓年和冯雪峰等人外,丁玲也常来这里。她不是会我,而是会约定的进步人士。我当时对这些并不十分清楚,但党已把我看成左派。不久,1930年6月,潘梓年找我参加“中国文化总同盟”,就是由于我办《文艺新闻》方向对,比较成功的原因。《文艺新闻》事实上已成为以后成立的“文总”的外围机关的公开刊物。我当选为“中国文化总同盟”五人常委之一,代表新闻界。其余四人是,茅盾和丁玲代表“左联”;田汉代表“剧联”;朱镜我代表“社联”。我做的工作,实际上是“文总”各团体间的联络工作。“社联”下面还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代表就是曹荻秋,当时叫“小曹”。

《文艺新闻》发展后,又搬到交通路附近租的两间楼上楼下的房子里。这是鸳鸯蝴蝶派的徐枕亚分租给我们的,每月给他40元钱。

我当时也很穷。原先由于在横浜桥景阳里和匡亚明住在一起的缘故,当匡亚明为光华书局办了一个学生杂志时,我就投稿给他,得到些稿费。实际匡亚明未待杂志出版就离开了。我开始写文章就登在这个刊物上。以后我写的稿子,都是以新闻改革为内容,投稿得些钱,补贴生活。

《文艺新闻》停办的原因很简单,表面上是由于不断受到上海一些流氓小报和御用文人的攻击,其实主要是由于党要求我政治态度的转变。“九一八”事件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鉴于我办《文艺新闻》已出了名,有了影响,党指示我“尽可能地变成一个小市民”,改变政治立场,由左向右转。而我立场转向,则由党通过其他途径通知进步的文化界。这样,《文艺新闻》最终停办。而以后的我,新闻活动事实上已不是第一重要的工作了。

我改了名字,叫袁道逸。“道逸”二字是鸳鸯蝴蝶派时髦的字眼儿。

1931年10月,在南京西路一家白俄大咖啡店里,我入了党,就是一次谈话,没有党旗宣誓,介绍人是潘汉年和王子春。王子春后来去苏联,肃反时被斯大林枪毙了。

当《文艺新闻》发展时,上海的一些大报对此一般不理睬,那时我就专心报道左翼文化活动的新闻工作。倒是一些流氓小报骂我太左,说我是共产党。

关于成立新闻学会研究会一事是这样:

该会并未真正成立,一直是在酝酿。我记得我同任白涛和黄天鹏这些年纪较大的人有过成立新闻研究会的动议。没有最后成立的原因是当时我忙于《文艺新闻》。另外,他二人思想比较旧,是旧民主主义者。黄天鹏是因为国家社会党的背景才到《时事新报》当编辑的。我同他关系很好。

《檄全国新闻记者》一文是我写的,但与“左联”无关。张一君我不认识。我当时接近拉拢的人有陆诒(顾执中得意的学生)和鲁风等(真名叫刘祖澄,解放后任上海公安局宣传科长)。鲁风在上海沦陷敌伪时期,任我当“汉奸”时办的《新中国报》总编辑,而恽逸群是该报评论部主任。恽逸群的前任是汪馥泉(复旦名教授)。抗战期间我的经历很复杂,这里就不说了。

对成立新闻研究会,“文总”的人也不积极,态度既不反对也不赞成。他们认为我找的人还不纯粹,不够左。像陆诒,当时较幼稚,是个民主主义者,以后当然跟《新华日报》走了。我当时认为,研究会应当同“左记联”合并为一体,办成仿照“左联”和“教联”一样的进步团体。“左记联”一位姓彭的同志很左。他的活动,名义虽然是“左记联”,但实际他接触的多是工人群众,是他来找我商量发动成立新闻研究会的。

我们对于成立新闻研究会,意见不一致。以后,没有举行过什么活动。

“上海报学社”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汤增_敏和徐则骧攻击我们太左,但具体说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汤、徐二人每月都接受潘公展给的工资,是文化特务。大体说来,这些人是CC系的御用文人。当时上海的小报,只要骂左翼文化界,CC系就给钱补贴、就支持,特别是在那几年。我们左,也只是到一定限度,而他们仰国民党鼻息,则是事实。至于反击,已记不清了。

关于“左记联”成立,通过斗争纲领和“开办国际新闻社”一事,我不清楚。我始终未参加“左记联”组织和活动。1931年秋,我政治态度开始要转变,我不可能再积极参加左翼文化界的活动了。在我漫长复杂的一生经历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集纳批判》一事,我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说的是,“集纳”二字是我早先发

明的。有一次，我同任白涛交谈，我说英文 journalism(新闻)这个词中文可译成“集纳”两个字，意思是“集中采纳”的意思(正如毛主席后来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一样)。以后，“集纳”二字在文化界流行起来。谢六逸有一次对我说：“这个字翻得好!”郭沫若也用了这两个字。鲁迅也用这个词。

关于《记者座谈》，我的回忆是这样：

我发动“记者座谈”这一形式的聚会，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没有任何章程，只是口头约定。每个星期六晚上在外边饭店，常常是在四马路一带，约请一些有影响的报纸记者和编辑吃饭，边吃边聊。我对大家说：“我们每周六见一次面，谈谈新闻改革问题。大家写写文章，然后找个地方出版。”我记得开始是在一家报纸出了周刊，但没出几期就因我们的言论同该报编辑方针发生矛盾而停下来，现在回忆不出当时是哪一家报纸了(我记得没有出 90 期，发刊词是我写的，以后不了了之)。

以后，由吴半农(华东通讯社记者兼《大美晚报》编辑)出面，说通《大美晚报》出了个副刊，刊登我们的文章，这个副刊就叫《记者座谈》。说到这个吴半农，我再补充一件事。吴半农是当时“新闻界十弟兄”之一。“十弟兄”换帖，是我的主意。我召集了恽逸群、杭石君(《新闻报》名记者，背景有黄金荣，当时是上海公安局的科长，而局长是陈立夫的哥哥陈希曾)、鲁风(刘祖澄)、章仙梅(《新闻报》材料科科长)、陆诒、吴半农等，还有几个人我回忆不起名字了。我们在杭石君家吃了一次酒饭，成为“换帖弟兄”。至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有不便谈的复杂原因。

我自 1932 年夏秋放弃《文艺新闻》后，转到“新声通讯社”当跑政治和外交新闻的外勤记者。就在这里，我遇到了恽逸群同志，他比我大几岁，任编辑。我们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那个吴半农和逸群是同乡，也是好友。吴半农思想执中间态度，但与我同逸群感情上相通。解放后，恽逸群把吴半农要去到《解放日报》工作，吴半农在南京栖霞山处理一个小矿山事宜时，恽逸群主张《解放日报》把那个小矿山买下来。后来，这事同恽逸群受组织上误解有关。

《记者座谈》没有编辑委员会，主要是陆诒和刘祖澄二人奔走联络。

我们同国民党的言论政策经常发生矛盾，具体情况我难回忆出来。如能找到《记者道》一书，其中有些话可以帮助回忆。当时能同国民党言论政策对抗的刊物，只有韬奋办的《生活》周刊有勇气这样做。我在《记者座谈》副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后汇编成《记者道》一书。

对国民党的攻击，我们没有反击过。对策就是不理睬。

我现在确切记得经常参加《《记者座谈》》吃饭和讨论的人有：恽逸群每次必到，陆诒和刘祖澄（即鲁风）也必到，吴半农必到。

另外，参加《记者座谈》的大部分人，是各报纸和通讯社有影响的跑政治和外交新闻的记者。所有参加的人，我都了解他们的背景和思想倾向。当时，有些大报的人似乎闻出点味，他们认为我利用这个活动方式在搜集情报，但他们认为我思想立场已改变，是为国民党服务的。

不能说《记者座谈》是党用来团结进步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方式。因为一开始，我就打定主意不标榜任何党派，而且参加的人政治态度差异很大，左、中、右都有，有的人是客观主义者。但广泛团结上海的记者这一点做到了。其次，这些记者接受我提倡的新兴阶级的新闻理论，这一点我和恽逸群都同他们谈到。

那个时候，上海各报记者彼此竞争很厉害。我提出，每星期六在苏州上火车。因为当时国民党要人每个星期六都乘火车回上海吃、喝、玩、乐，我登车采访过宋子文和汪精卫等人。宋子文在1933年和1934年，两次在上海招待各报纸的政治和外交新闻记者，我们当然也参加。

《记者座谈》和党的领导及与“左联”无关系。参加的人在当时，据我所知，除我以外，没有党员。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是注意团结进步记者的，但我的想法是团结联系的人更广泛些才好。我有我的目的。

我的正式职业是主办“外论编译社”和“中国联合通讯社”。在这两个机构中，都由国民党右派担任挂名社长，而由我担任实际主事的副社长。“外论编译社”社长是方焕茹，他是王明的亲信，留苏学生，曾任汉口中共市委书记，被捕后叛变当了特务。方焕茹原名方文奎，湖北黄梅人，是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小同乡。“中国联合通讯社”社长是郑用之，郑是黄埔学生（四期炮兵科）。

《记者座谈》停刊后，我对“左记联”活动仍然不接触，所以不知道以后的发展。1938年范长江在武汉成立“中国青年记者联合会”，主要报道中国地方抗战的消息，他是受潘汉年指示这样做的。

《记者道》序言是恽逸群所作。上边说的我曾一度失去自由，这事背景很复杂，半天也说不清，而且也不便多讲。

（原载《传播学研究集刊》（I），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 是怎样公之于世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五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白莽)、冯铿(岭梅)、李伟森(求实),在1931年1月中旬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联合行动队逮捕,2月7日被杀害于龙华。对于这一事件,国民党当局严格封锁消息。但是,这五位青年作家是许多读者所熟知的,他们的“失踪”,引起了人们的猜测,有的小报还报道了“某作家被捕”一类的传闻,却谁也没有料想到他们已经惨遭杀害。首先披露真相的是《文艺新闻》,时间在3月底至4月中旬。

《文艺新闻》是一张铅印四开小型报,周刊,1931年3月19日在上海创刊。主办人袁殊,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曾在日本学习新闻学,回国后同妻子马景星集资办报。袁殊同文化界人士有广泛的交往,同“左联”成员关系很好。就在《文艺新闻》创刊数天后,正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人冯雪峰,来到《文艺新闻》社,对袁殊说:“有一条重要消息你敢不敢登?”袁殊表示,只要是公正的消息,都可以登。冯雪峰就将五烈士被害的消息告诉了袁殊,他们为这一消息尽快见报,作了周密的安排。

1931年3月30日,在《文艺新闻》第三期第二版头条地位,赫然出现大字标题:《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副标题为《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踪迹》,还有一段醒目的按语(类似提要题):“二期发稿后,在许多来信中有下面一封信——打听柔石、胡也频、岭梅、殷夫等作家行止的。关于此消息,本报尚未有所闻,谨刊出原函,以待确实知道他们的读者来报告。唯吾人但愿后说之不确定也。”来信者署名“蓝布”,他在信中先是娓娓动听地陈述一番对于《文艺新闻》创刊号的读后感想,然后提出传闻柔石等人的失踪,有传闻他们已被枪毙,希望该报公布正确的消息,以安读者。信后还附录了上海《福报》3月22日关于胡也频被捕入狱的报道。

《文艺新闻》第四期(4月6日),对于“蓝布”提出的问题未做任何表示,煞有介事地静候其他读者提供信息。第五期(4月13日)第二版头条位置上又出现大字标题:《呜呼,死者已矣!》。副题为《两个读者来信答蓝布/李伟森亦长

辞人世》。也有一段类似提要题的按语：“自三号刊出蓝布君打探柔石等的来信后，继又接得曙霞、海辰二君来信，诂谓后说果成事实，而彼等竟已长作地狱鬼矣！按据后信，谓彼等致死之因，系由于‘左翼文化运动’，是诚开中国文化运动史记录上之大事矣。然而，死者已矣，读者其能勿有所感乎？（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谨以本报十期奉酬。）”两封来信的标题分别是：《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来信称赞“这几位作家平日都是很热心社会改造的”，“他们的作品都是代社会抱不平的，都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接着，在第六期（4月20日）第二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五烈士的照片，标题为：《五青年作家遗容》。以后陆续发表了纪念和回忆烈士的文章。

前后三封来信和五幅照片，都是冯雪峰提供的；而处理这些材料的编辑就是袁殊，版面、标题、按语都是他精心设计与制作的。五烈士被害事件真相公布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蓝布”的信刚刊出，就有一些读者写信给报社，表示同样的关切。“曙霞”和“海辰”的信发表后，又有许多读者写信表示对被害者的悼念和对杀人者的愤怒。冯铿的哥哥冯白驹，是从《文艺新闻》上得知妹妹牺牲消息的。他到报社找到袁殊，了解详情。袁殊问冯白驹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冯白驹说中国革命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不久他就回海南岛去了。

《文艺新闻》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后，许多报刊对这一事件也作了报道，也有保持沉默的，但没有胆敢否定事实的。关于五烈士被害真相的报道，显然对国民党当局是不利的。然而，《文艺新闻》为什么还能继续出版呢？重要的原因是它善于进行合法的斗争。它没有打出左派的旗号，却强调了“客观报道”。据曾在该报工作的夏衍回忆，袁殊曾当众宣布这张报纸的特点一是客观报道，二是尊重读者意见和为读者服务，三是定期出版，决不脱期^①。正是这三点，使得该报取得了读者的信任，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它的处境比其他左翼报刊好得多。茅盾曾经这样写道：“这张小报内容五花八门，引人入胜，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却为‘左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茅盾还指出：“从《前哨》（以及其他‘左联’的刊物）的迅速被禁和《文艺新闻》能够坚持出刊，使得‘左联’及其成员逐渐认清合法斗争的必要与重要，开始作策略上的转变。”^②此外，袁殊也善于利用各种条件，同国民党当局周旋，当时夏衍曾问袁殊：“对这份报纸为什么国民党不来干涉？”袁殊告诉夏衍，他和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有同乡关系，报纸出了问题向吴醒亚解释一下就可以了。袁殊还利用了吴

^① 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一书的《〈文艺新闻〉及其他》节。

^② 茅盾：《“左联”时期》，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醒亚同潘公展(主管上海文化与宣传工作的国民党官员)之间的矛盾^①。当然,《文艺新闻》由于它的进步立场,会遇到一些报刊的攻击,潘公展办的上海《界报》就不点名地指责过它。在这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文艺新闻》坚持了一年又三个月,于1932年6月20日出版第六十期后停刊。

(原载《新闻大学》,1988年冬季号)

^① 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一书的《〈文艺新闻〉及其他》节。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小型报浅议^①

一、小型报的兴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小型报曾经风行一时。像上海的《立报》、《救亡日报》,南京的《朝报》、《南京人报》,北京的《实报》,以及在香港出版、面向内地的《生活日报》^②等,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不下于一些大报。小型报这个称呼,也是在 30 年代时兴起来的。据曹聚仁回忆:“(上海)望平街上,一直有人从篇幅的大小来分别报馆的级别,对开的算是大报,可以参加报业公会。至于四开的,算作小报”,“《立报》首先参加了上海报业公会,乃称之为小型报”^③。

人们之所以采用小型报这个称呼,无非是要将它与通常所说的小报区分开来。当时有些小报格调低下,声誉不佳,被许多人(包括林语堂、成舍我)称为“蚊子报”。然而,我国小报却有较长的历史,清朝后期就有了,例如李伯元创办的《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等。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小报有较大的发展,拥有不少读者。1933 年,有人收集了 250 种小报(包括小型报),其中上海 63 种,南京 26 种,北京 44 种,天津 27 种^④。实际数字当然不止这些。小报数量众多,良莠不齐。戈公振曾经给予公正的评价,他在《中国报学史》中写道:“其优点乃在能记大报所不记,能言大报所不言,以流利与滑稽之笔,写可奇可喜之事,当然使读者易获兴趣。惟往往道听途说,描写逾分,即不免海淫海盗之讥。若夫攻讦阴私,以尖刻为能,风斯下矣。”^⑤小型报当然不愿与风气日下的小报为伍,它们要树立另一种风格。

其实,小型报也是早已有有的,20 年代成舍我在南京办的《民生报》便是一例。还有比这更早的。不过,小型报兴旺发达、大有与大报分庭抗礼之势,却是

① 本文在《新闻大学》杂志上发表时题为《三十年代中国小型报浅议》,收入本书时改为本题。

② 《生活日报》曾自称中型报,因其开张稍大于四开(但接近四开)。

③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 转引自燕京大学新闻学会《报学》,1941 年第 1 期。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6 章第 9 节。

出现在 30 年代。这个现象,具有明显的时代性。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人民大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奋起抗日救亡。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几个为小型报的发展起着开辟道路作用的重要因素:其一是时事政治新闻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内容,报纸必须将它放在主要地位,否则会失去读者,失去人心;其二是读者群扩大,不仅文化水平高的人要看报,文化落后的“下层民众”也要从报上了解天下大事;其三是在报纸工作人员中,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成为最活跃的、起骨干作用的力量。小型报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因素。以工作人员情况为例,《生活日报》有邹韬奋、金仲华、柳湜等通力合作;《立报》有萨空了、严谔声、谢六逸、恽逸群等主持编辑和管理工作;《实报》曾由李达、陈豹隐、沈志远、张友渔等轮流写社论。这些人为办好小型报作出了贡献。

同小型报相比较,传统的小报、大报在某些方面都有局限性。小报以刊载文艺作品和社会新闻为主,很少刊载(甚至不刊载)时事政治新闻,显然不合时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大报,可以大量刊载时事政治新闻,但篇幅多、内容杂、定价高,对于大众读者来说不如看小型报方便、实惠。更何况对于办报者来说,在资金、设备、纸张、人员乃至注册登记等方面,办小型报比办大报容易得多。《立报》创刊之前,有人对成舍我说:“上海能不能办小型报?如办大报,在申(报)、新(闻报)两大报高压之下,没有百万以上资本,恐怕是不容易和他们斗争的。”成舍我回答说:“像我们这种职业报人的经济力量,在上海,只有办小型报,或能打开一条成功的途径。”^①结果集资 10 万元,便办起了《立报》。

时势造就了小型报;小型报也只有适应形势、宣传抗日,才能发展。《生活日报》在创刊词中宣布:“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它创刊初期,发行量就超过两万份,成为华南销数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立报》在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印数激增,为了争取时间,报头不再套红,发行量达到 20 万份的空前记录。它连续发表了 50 多篇曹聚仁在第一线采写的“本报战地特讯”,反映了悲壮的战斗局面,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作品。《实报》在“九一八”后,由于报道抗日消息,发起捐款活动,销数从两三万份增至四五万份。“西安事变”时,又发行到东北、西北和南方,销数达 14 万份。

①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二、小型报的长处与短处

小型报的特点是什么？有几种概括的说法：“大报小型化”，“小报大办”，“报纸杂志化”。

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小型报除了开张小以外，在版面安排、内容选择、机构设置、工作方法等方面，都类似大报。就是在向大报靠拢这一点上，小型报同小报有区别。小报的内容和作用，大体上相当于大报的副张。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是把小报与附刊相提并论的，他写道：“与大报副张颉颃者有小报，以其篇幅小故名。”小报只是与大报副张抗衡，而小型报的竞争对手却是大报本身。所以，有人认为“小型报乃大报的缩影”，它要“小中见大”，“以少许胜多许”^①。至于小型报采用杂志的某些做法，这在《生活日报》、《救亡日报》上最为明显。这两报对于国内国际形势、战局、战时文艺工作等，发表了不少综合评述性的文章，材料较为系统，分析较为细致。其他小型报也经常刊载时事综述，还将消息、通讯、文章和图片配套使用。这些都类似杂志。

小型报也发扬了小报的优点，主要是重视社会新闻，文字简短，笔调生动，能以“你无我有，你有我精”的办法同大报竞争。《立报》出版的第一年，自己采写的新闻报道中，属于“独有而最先报告的”事件共计 27 项^②，其中包括创刊当天发表的“顾竹轩案”。顾竹轩是上海帮会头目之一，一般的报纸都不敢碰，只有《立报》在其发案到结案的一年多时间里，陆续作了报道。

同小报一样，小型报由于其篇幅小，定价也就低廉。在 1935 年，《申报》每份售大洋四分五厘，而《立报》仅为铜元四枚。以大洋每分合铜元三枚计算，买一份大报的钱，可以用来买三份小型报，还有多余。小型报当然也比杂志便宜。还由于其篇幅小，携带方便，阅读方便，“五分钟能知天下事”。所以，有人写文章说“《立报》是立着看的”，等候公共汽车时可以看，在电车上站着也可以看^③。

大报的丰富性、小报的灵活性、杂志的系统性，都是小型报汲取的营养成分。在综合运用大报、小报、杂志三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小型报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的长处——这种优势和长处，也可以说是它的特点。同时，它也有自己的短处，主是要容量小，不能多登长文章，新闻报道容易浅尝辄止，栏

①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保衡：《拿真凭实据报告新闻》，载 1936 年 9 月 20 日《立报》。

③ 天笑：《立报是立着看的》，载 1936 年 11 月 12 日《立报》。

目也不能过多。对于小型报来说,千字以上就属长文,《生活日报》有一篇题为《从张垣到大同》的通讯,七千多字,连载五天,读者阅读很不方便。此外,小型报的广告少,也影响收入。

值得指出的是,“大报小型化”、“小报大办”、“报纸杂志化”以及“小型报乃大报的缩影”等,都只是形象的说法,不能作为对小型报特点的科学概括。因为,小型报是报刊中的一个品种,不是大报、小报、杂志三者的简单凑合,也不是大报一“缩”就成为小型报。它身上有大报、小报、杂志三者的影子,但它毕竟只能是它自身,是不同于三者的另一事物。从本文已做的分析看,可以这样说:小型报是篇幅小、内容精、版面活、定价低的大众化政治报纸。

三、“大众化”的办报方针

所谓大众化报纸,在西方国家,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有了。那是一种以社会上广大民众为读者对象的、以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的、售价低廉的小报。1935年,邹韬奋在美国时,考察了各种报纸,他认为赫斯特(Hearst)报系的报纸就是“小报化”的日报。他说:“赫斯特的报,往往迎合低级趣味的社会心理,把男女的秘闻,强盗的行径,穷形尽相的描述与夸大,同时便在这种引人注目的技术里散布他的反动的毒素。”这时,中国小型报也正在蓬勃发展之中,对比之下,邹韬奋认为:“我国近来小型报类颇有进步,有好些已经跳出了诲淫诲盗的老套。”^①

诚然,30年代的中国小型报也是以“大众化”为自己的办报方针的。《立报》提出过“报纸大众化”的口号,《生活日报》也提出过“内容应该力求大众化”和“文字要力求大众化”的目标。但是,它们的“大众化”方针,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有着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和具体的内容。

首先,它显示了中国报纸读者范围的扩大。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从“上层”走向“下层”。萨空了主编《立报》副刊《小茶馆》的第一天发表《向“下”走的告白》一文,提出“本栏的目的,绝对的希望,把它贡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谓的‘下层民众’”,“就是希望黄包车夫也可以走进来坐坐”。这同《立报》要让“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了解报纸的愿望,是一致的。邹韬奋更明确地表示,他主编的《生活日报》“是以最大多数老百姓为背景”的,“希望四万万五千万

^① 邹韬奋:《美国的新闻事业》,载《世界知识》第四卷第七号(1936年)。

同胞都把《生活日报》看成大家的公物”^①。这种向“下”走的趋向,为小型报的发展找到了社会基础。

其次,它表明了报纸对读者的重视。小型报有强烈的读者观念,努力使报纸成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立报》提出,要使全国国民“能读、必读、爱读,使他们觉得读报就像吃饭一样需要”^②。《生活日报》表示,它的“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③。小型报重视读者的需求,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依据。而3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众最迫切的需求是,团结御侮,民族解放。小型报抓住了这个共同愿望,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因此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报纸。

再次,它体现了中国报刊的服务精神。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生活》周刊为代表的服务精神,曾经受到普遍称赞,对中国报刊工作影响极大。小型报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以多种方式为人民大众服务。例如,认真处理读者来信,办好读者信箱专栏,聘请律师和医药顾问为读者解决疑难,发行上方便读者(拨个电话就可订阅)等。有的还开展了募捐活动,支援抗日部队。这种服务精神,使小型报和读者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人们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看到,中国的小型报不同于西方的“小报化”日报;中国小型报的“大众化”办报方针,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积极的、有益的、有效的方针。

四、精编——小型报的生命

同大报、杂志相比,小型报是以精取胜的。它在狭小的篇幅里,尽可能多容纳一些东西,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如巴金所说:“在一张小小的报纸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天里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一切,没有多余的巨大篇幅来耗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④这就是实行精编的效果。没有精编,就不可能有小型报。

精编,当然有数量上的要求,多了不行,太长也不行,因此精编包含了简编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要求,即内容精炼、形式精美,因此精编又不同于简编。应该说,精编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在这方面,邹韬奋、茅盾都发表

① 邹韬奋:《〈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载1936年7月31日《生活日报》。

② 《我们的宣言》,载1935年9月20日《立报》。

③ 同注释①。

④ 巴金:《我祝福立报》,载1937年9月20日《立报》。

过独到的见解。

邹韬奋说,编辑《生活日报》特别要注意的是:“选材精审,文字简洁。”^①这是经验之谈,它概括了精编的要求和过程。茅盾说得更具体:精编是“把新闻经过提炼,重新创造”,因此小型报的编辑部应该成为一部“提炼机”,把大报的精华提炼出来,而不应成为一部“压榨机”,把大量新闻压榨成“目录似的短条子”。他又说:“小型报应该做到人家冗长的地方它可以缩紧,而人家不来的地方它偏偏可以较长,较详,好比电影里的特写似的。”^②

精编的重点是新闻报道。当时,通讯社多,发的消息也多,重复和相互矛盾的现象很严重。大报全盘照登,使读者眼花缭乱,莫衷一是。针对这种情况,邹韬奋提出“编法研究化”的主张,要“使读者在短短时间内看了一遍便能得到很丰富而扼要的内容和很明确的了解”^③。为了达到这种要求,有些要综合改编,有些要重写,有些还要配发资料文章或图片。小型报精编,收效显著。张友渔回忆《实报》的情况时写道:“任何重要消息,《实报》都有,但编得短小精悍,消息重要而所占篇幅不大。我国和外国通讯社的重要消息,它都采用,但经过重新编写,保留各通讯社消息各自的特点,集中编成一条,使读者对重要新闻的全貌和不同的报道能够一目了然。消息既多而不重复,细心人还能从中看到消息之外的消息。”^④

精编涉及到报纸工作的各个方面,从社论、文章到副刊,从版面、标题到广告,都要着眼于精。以副刊为例,《立报》有三个副刊——《言林》、《花果山》、《小茶馆》,每个只有两千多字,真是在巴掌大的地盘上做文章。但这三个副刊都编得很精彩,各具特色。著名作家林语堂、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王统照等,都为《言林》写过稿,而它的主编则是由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教授兼任。这些名家写的短文章(一般为五六百字),很能吸引读者,使得小副刊起大影响。再以广告为例,小型报限于篇幅,不能像大报那样从第一版起就登大幅广告。《救亡日报》不登广告,其他小型报是有控制地刊登广告。《生活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把广告的地位划定,勿使广告割裂了新闻,而结果却能使新闻和广告俱保持着美观”^⑤。该报还宣布:“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不登。

① 邹韬奋:《编者的话》,载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

② 茅盾:《谈小型报的编辑技巧》、玄珠:《小型报的性质》,载1936年1月3日、8日《立报》。

③ 邹韬奋:《研究化》,载1936年9月27日《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7号。

④ 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⑤ 邹韬奋:《编者的话》,载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

换句话说,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①一般小型报,都是把广告登在中缝和边角的地位上,大小加以限制。

实行精编,对报纸编辑来说,无疑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需要有敏锐的思想,广博的知识,扎实的文字功底,更需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们既要查对资料、润色文字,又要赶上发稿时间,常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没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而许多从事过这项工作的人,都对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津津乐道。

(原载《新闻大学》第14期,1987年夏季号)

^① 邹韬奋:《〈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载1936年7月31日《生活日报》。

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报刊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五年又九个月。在此期间，抗日救亡成为许多报刊的宣传中心，同时还创办了一批以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为使命的报刊。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推动着报刊的发展，而报刊宣传又引导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在我国新闻史上，这几年是报刊宣传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在“九一八”之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国土上屡次挑起事端，已经引起中国舆论界的关注和抗议。如1931年6月和7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中村事件”和“万宝山惨案”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指出：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部分表现”，“不可仅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希望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可寒贼胆，民族惨祸，必可避免”。《申报》也在时评中指出，“中村事件”中，“日人之故作超出事实以上之鼓吹与煽惑，完全以对我东北积极侵略为其背景”。

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柳条湖事件，大举进攻沈阳，全国为之震惊。9月19日北平《世界晚报》要闻版，20日《世界日报》要闻版，都以整版篇幅报道日本的侵略罪行。《世界日报》的标题是：《国难至矣，速起御侮！日军昨陷沈阳！》。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件时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对事变作了报道，《申报》在时评中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时事新报》连续发表了十来篇社论，评述中日关系，反对日本侵略。《新闻报》也刊载了主张抗日的言论和报道。

显然，这里提到的一些报刊，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利益的，但在抗日问题上有一致的要求。这种要求，却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请愿要求抗日的时候，蒋介石要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要《大公报》主张“缓抗”。张季鸾应命发表了支持不抵抗政策的言论，引起了读者的强烈不满，大公报馆挨了炸弹，张季鸾自己也收到了装有子弹的邮包。但《大公报》毕竟是以“民办”面貌出现的，内部不乏主张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所以有

些消息、通讯和评论,同张季鸾的评论文章的调子不尽相同。至于国民党的党办报刊,当然是在严密的控制下,口径一致地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解,但也不能全然无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怒涛,只得采取两面推挡的办法,一方面七折八扣地报道日本的侵略活动,另一方面又竭力制造舆论,企图把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压下去。它们以“诉之国联”,“待公理之裁决”为宣传重点,掩盖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实质,尽力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剿共”,结果却反而激起人民群众的公愤,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曾经被群众捣毁过。

如果说,1931年9月开始出现抗日救亡宣传的一个高潮,那么,1932年1月淞沪抗战期间,便达到了这个高潮的顶峰。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奋起抵抗。上海新闻界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报刊除了出版专号、增刊、特刊和画刊进行宣传鼓动以外,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如募集捐款、开办伤兵医院、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救济难民等。

迅速开展起来的抗日救亡宣传,冲破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舆论沉寂局面,同时也使新闻界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史量才和《申报》的变化。

邹韬奋从1926年10月接编《生活》周刊正式开始新闻工作生涯,专心办刊物,宣传“安业乐业”,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并没有把他卷进去。但是,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他终于迅速走出改良主义幻想的圈子,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九一八”以后,他写了大量慷慨激昂的“小言论”,每期《生活》周刊上都有,有时一期登三四篇。1932年1月9日,他宣布《生活》周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生活》周刊出版了两期“紧急号外”,报道战地消息,鼓舞军民斗志。30日,又出版“临时紧急增刊”,发表《痛告全国同胞书》。随后,又组织各种支援前线的活动,生活周刊社日夜电话不停,来访者不断,不仅成了新闻中心,同时又发挥了作战部队的后勤单位作用。邹韬奋从此开始向共产主义者的方向迈进,《生活》周刊也成了全国影响最大的刊物,到1932年底发行量达到十五万五千份,创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史量才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新闻事业家,他从1912年接办《申报》以后,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但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申报》因为刊登帝国主义的宣传品《诚言》,受到爱国群众的严厉批评。大革命失败后,《申报》又采取了拥护蒋介石的立场。“九一八”事变、民族危亡的严酷事实,教育和推动了史量才与《申报》转向进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

的是,《申报》于1931年12月20日发表宋庆龄的一篇极为重要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的地位”,“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下,公开发表这样鲜明的主张,是极其危险的。这个行动,反映了史量才的爱国热情和追求进步的决心。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申报》除了积极宣传之外,也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史量才还出面发起组织上海地方市民维持会,并被选为会长,他的言行和《申报》的宣传,在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支援前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国民党当局看来,这种变化意味着脱离它的控制,抗日救亡宣传在人民中日益扩大影响更直接“威胁”着它的统治,它对此是不能容忍的。这时,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在国统区进行文化“围剿”。一切革命报刊都属于必须“围剿”之列。然而,蒋介石不像旧军阀那样,对于报刊只搞收买和镇压(这些他当然需要),他很看重报纸的社会作用,建立了一整套为他的反动统治服务的新闻事业网,其中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新闻工具,还有新闻行政机构。为了控制全国新闻界,蒋介石又制定了许多新闻法规,把一道又一道的沉重枷锁套在广大新闻工作者身上。如1930年颁布的《出版法》及1931年颁布的《出版法实施细则》,条文繁多,对新闻出版事业作了全面限制;1932年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标准》,公然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鼓动阶级斗争者”为“反动的宣传”;1933年颁布的《修正新闻检查标准》,进一步规定“各报社刊布新闻,须以中央通讯社消息为标准”;同年又颁布《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修正首都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手续》和《上海市新闻检查所暂行组织条例》等,从此不仅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建立了新闻检查所,并且开始实行原稿送检的办法,钳制舆论的手段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对全国新闻界作有效之统制”,全面实行统制新闻的政策。

蒋介石的这一套统治办法,是从德、意法西斯那里学来的。1931年5月5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在御用的“国民会议”上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今日举国(指中国——引者注)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在他的号令下,法西斯宣传猖獗一时,如1933年创刊的《社会主义月刊》和《汗血月刊》等都公开打出法西斯旗号,刊登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照片和吹捧文章,甚至国民党中央的《中央月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等也成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阵地。与此同时,蒋介石精心组建特务系统,1932年建立复兴社、蓝衣社和1933年建立别动总队,其组织机构与活动的方式都仿照

德、意法西斯。特务分子虎视眈眈地盯着报纸、刊物，许多进步新闻工作者背后常有“尾巴”跟着。那些国民党当局可以任意解释的法规，加上这些无孔不入的特务，严密地控制着新闻界。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动辄受罚，爱国新闻工作者的生命安全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新闻界遭迫害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突出的可举出几件。

一是邹韬奋被迫流亡和《生活》周刊被迫停刊。邹韬奋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大为不满，派胡宗南找他谈话，要他改变态度，“拥护政府”。邹韬奋坚决拒绝，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小时。他预感到《生活》周刊可能被扼杀，在1932年10月就写了《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备用。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他是同邹韬奋一起，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的。在朋友们的力劝下，邹韬奋于7月14日离开上海，出国避祸。临行前，他对《生活》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在写给戈公振的信中说：“为本刊事业计，亦应借此暂离，以缓和对方对《生活》之紧张。”但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紧张”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剧烈。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达了查封《生活》周刊的命令。12月16日，《生活》周刊出版最后一期，刊登了一年前邹韬奋写的告别文章。

二是史量才被刺。史量才既是《申报》的总经理，又是拥有相当雄厚资本的民族资本家，在上海社会各界中有较大的政治影响。他公开参加抗日救亡的行列，具有一般人不可代替的作用。在淞沪抗战期间，正是他主持的《申报》号召商店开市、银行开业，宣布“本埠民食无虞，存米足支两月”，为稳定市场、安定人心做了许多有益的宣传工作。1932年12月29日，史量才亲自出席民权保障同盟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这个异乎寻常的行动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申报》多次报道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扩大了救亡团体的影响。加以《申报》在1932年和1933年大力进行事业革新，进步倾向日益鲜明。鲁迅用40多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40多篇文章，茅盾、巴金等著名作家也为《自由谈》写稿，使得这个副刊成了各方瞩目的思想文化园地。《申报》及其所属事业，如《申报月刊》、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等，吸收和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参与工作。史量才和他的事业的声势壮大，特别是同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使蒋介石难以控制，深感威胁，决心予以“剪除”。于是，在1934年11月13日，当史量才乘汽车从杭州回上海时，在途中遭到特务枪击身亡。

三是“新生事件”。《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刊，杜重远主编。4月5日，邹韬奋在致戈公振的信中说：“《新生》确为《生活》后身，乞兄为

之撰文。”《新生》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坚持了《生活》的传统,只是“小言论”专栏改名为“老实话”,主要由杜重远执笔。生活书店将《新生》第一期赠送给《生活》的老订户,有些读者竟以为是《生活》复刊了。邹韬奋当时在国外,仍不断给《新生》写稿。1935年5月4日,《新生》第2卷第15期上发表易水(艾寒松)的杂文《闲话皇帝》,议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皇帝权力问题,其中说到日本天皇是无实权的,真正的统治者是日本军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借口此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查禁《新生》周刊,惩办主编。同时日本浪人又在上海街头游行、闹事。本来,《闲话皇帝》一文是经过国民党中宣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盖章发证的。国民党当局企图索回签证,被杜重远拒绝。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于6月22日查封《新生》周刊,杜重远被判刑一年又两个月。

但是,抗日救亡的呼声是压不下去的。因为,国土被蹂躏,人民遭劫难,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不呼号?不抗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愈是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就愈是高涨,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也愈为活跃。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要侵占整个华北,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原来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也在迅速恢复之中。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宣传也随之出现又一个高潮。

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学生报刊。燕京大学的《燕大周刊》在1935年12月初,发表埃德加·斯诺的长达万言的通讯《毛泽东访问记》,使许多青年从这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情况。学生运动起来以后,《燕大周刊》连续增出十多期《一二·九特刊》。北平市学联出版了《学联日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也出版了报刊。这些报刊消息灵通,言论直率,深受广大青年学生欢迎,也得到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

影响最大的是邹韬奋主编的报刊。邹韬奋于1935年8月底从国外回到上海,11月便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这时,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大众生活》创刊号上宣布,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该刊三大目标。北平传来“一二·九”运动消息,他不仅在刊物上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还寄了几千份给北平市学联。这个刊物的发行量曾达到20万份,又创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1936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下,《大众生活》停刊。6月,邹韬奋在香港出版《生活日报》,他在发刊辞中宣

布：“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8月，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准备将《生活日报》迁至上海出版，但国民党政府不予登记，结果只能出版《生活星期刊》。11月23日便发生了“七君子”事件，邹韬奋被捕入狱。但他和他的报刊，已经在代青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国民党当局无法改变的。

一批同邹韬奋、生活书店有密切关系的刊物，在抗日救亡宣传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34年创刊的《世界知识》、《读书生活》，1935年创刊的《妇女生活》、《生活知识》，1936年创刊的《永生》、《现世界》、《新认识》等，都是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宣传者。这些刊物的具体任务和读者对象各不相同，但在“一二·九”以后，都结合自己的特点，以抗日救亡为宣传中心。以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为例，是以“提倡读书”，“把读书融化在生活中”为目标的，它发表的艾思奇的《哲学讲话》、薛暮桥的《经济常识五讲》、高士其的《科学小品》等，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它积极支持学生的斗争，批评胡适破坏学运的言论，1936年1月开始还在封面上印上这样一行字：“生活斗争、民族解放、理论指导的半月刊。”同时，把“信箱”专栏改名为“救亡信箱”，公开声明：“本栏选稿标准，以参加实际活动的人写的为原则，旁观人的文字一概不录。”

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办了不少报刊。如北平的《华北呼声》，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救亡情报》等。这些报刊，发表救国会的文件，报道救亡活动的开展情况，反映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还有一些学术、文艺刊物，如《中国农村》月刊、《盖旦》月刊、《光明》半月刊等，或从理论上，或以艺术形象，“尽救亡之责任”。

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这是一张四开的小型报纸，实行精编，很有特色。由于有爱国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参加工作，《立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申报》在史量才被刺后，态度趋向保守，不敢得罪国民党当局。但在“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第四天，即12月12日，《申报》发表了题为《学生运动之复兴》的时评，表示赞同学生的行动，认为“北平学生代表全国民众而为宣言可也”。《大公报》的老板吴鼎昌在1935年参加国民党政府，当了部长，胡政之和张季鸾也受到蒋介石的殊遇，使得该报直接听命于蒋。但在全国人民奋起救亡之际，《大公报》也发表了一些抗日言论，特别是1935年下半年至1937年期间，陆续刊登了范长江采访西北、内蒙和陕北时写的充满爱国热情的通讯。这些作品，不仅当时为广大读者所传诵，而且其中的一些篇章随后也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的传世精品。国民党的某些派系和地方势力的报刊，也主张抗

日,采取了与国民党中央有所不同的态度。

在这个以“一二·九”运动为开端的抗日救亡宣传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在国统区新闻界工作,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很强的业务能力,如恽逸群担任《立报》编辑,经常写社论,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又能巧妙地通过国民党的审查。张友渔担任北平《世界日报》总主笔,也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还在国统区办了一些秘密发行或半公开发行的刊物,如《华北烽火》、《国防》、《长城》等。1935年12月9日,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救国时报》(主持人为吴玉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以海外华侨为主要对象,发行到43个国家,国内销行到各大城市和四川、新疆等地,最高发行量达到两万多份。《红色中华》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恢复出版,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同年4月24日,又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加强了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

总之,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在“九一八”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兴起——压抑——发展这样一个过程。大体上说,1931年和1932年为兴起阶段;从1933年到1935年上半年,抗日救亡宣传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新闻界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战斗;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标志,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出现了较大发展的局面。到1937年,抗日救亡舆论在全国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尽管国民党当局仍然实行“爱国有罪”的政策,制造了“七君子”事件那样的冤狱,查封了许多报刊,但终究抵挡不住争取民族解放的巨浪,全国绝大多数报刊先后进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轨道。

(原载《新闻大学》第10期,1985年夏季号)

灾难与改造：抗战时期 中国新闻事业的变化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

在 1931—1945 年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中，中国新闻事业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其损失之严重是难以估量的。

——在辽阔的中国东北大地上，中华民族的新闻事业被日本侵略者摧毁殆尽。日本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它的新闻事业完全由日本军方操纵，成为鼓吹战争和进行奴化教育的工具，以宣传“民族协和、王道精神、日满一心一德”和“大东亚共荣圈”为基本任务，欺世惑众。伪满的“弘报处”在日本关东军报道部、调查部的直接指使下，严禁关内报刊输入，严禁收听关内广播，东北人民处于严密的新闻封锁之中。

——在大片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建立殖民地新闻体制，即日本侵略者的新闻事业与汉奸的新闻事业并存，而由日本军方直接控制。战前上海、北平、南京等繁荣的新闻中心不复存在了。

——在一度存在的上海“孤岛”上，日本侵略者与汪精卫汉奸集团多方施加压力，迫害爱国报刊，阻挠抗日宣传，还用令人发指的手段威胁、戕害新闻工作者。日伪特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杀害朱惺公、张似旭等多名爱国报人！

——在前线和敌后游击战的战场上，许多新闻工作者牺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其中有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何云，德国作家、记者汉斯·希伯。

——在后方，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和一些民营报刊被迫西迁，设备资财“大抵随国权以俱沦”，困难重重。又屡遭敌机轰炸，人员与设备损失巨大，新闻工作者生命时时在危险中。

如此等等，难以尽书。一言以蔽之，中国新闻事业在战祸中破碎了，倒退了。

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作全面的调查和系统的研究，查清真相，引出教训，使后人毋忘前事，毋忘国耻。在中国新闻研究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新闻事业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关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抗日根据地报刊、“孤岛”抗日报刊、重庆新闻界、桂林新闻界以及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等方面的研

究,都有很好的论著问世。但是,对于这场战争中新闻事业的灾难、损失和教训,调查与研究还做得很不够。例如,从剖析日本侵略者的新闻政策与措施,到查清中国新闻界的损失,以及编辑殉难者名单与事迹等诸多方面,都需要用扎实的研究成果去正确、全面、具体反映历史本来面貌,让人们充分认识日本侵略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破坏的严重性。

在战争灾难面前,中国人民和中国新闻界没有低头,没有屈膝,而是奋起抵抗,在爱国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反侵略战争。毛泽东主席在他的名著《论持久战》中曾指出:“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①中国人民和中国新闻界在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同时,也深刻地改造了自己的新闻事业。

这种改造,就是中国新闻事业在战争中争生存、求发展所产生的变化。它首先表现为,军事与政治宣传报道成为新闻工作的中心。不论何种类型或何种政治背景的新闻事业,都必须走上为抗日战争服务的轨道,否则便难以为业,甚至被国人唾弃。因此,对于抗日战争的态度是关键所在。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得人心,在它领导下开辟的许多抗日根据地,铅印、油印、石印以及手抄的报刊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本来偏僻落后的县城肤施很快成了先进的抗日指挥中心延安市。它也是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国民党新闻事业大举内迁,也起到某种程度的异地发展作用,但由于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大受人们欢迎。一些著名的民营报刊投身抗战行列并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出现。《大公报》一度宣传“缓抗”挨了炸弹,很快转到宣传抗战的立场上后,读者就恢复了对它的信任。张季鸾先生甚至提出:“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②

从实际出发,适应环境,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需求,是办好新闻事业必由之路,在战争期间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主要在农村发展,扎根于广大农民群众之中,有广阔的活动天地。这是最切合当时实际又具有深谋远虑的发展战略。因为,“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② 《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见《季鸾文存》第2册。

都是为的农民”^①。抓住了农民,就取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可靠基础,这已为当时及随后的实践所证明。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和一些民营报刊在内迁之后,也显然改变了在大城市办报的作风与方法,从多方面和多角度去适应中小城市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战前新闻事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状况相比较,战时新闻事业则深入到内地和中小城市,同人民大众更为接近了,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在抗日战争中变化的又一表现。

加强了国际联系与对外新闻交流,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在战争中变化的一个表现。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国际上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海外华侨亟需了解中国战局,海外华文报刊亟需来自中国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国际新闻社做了扎实的工作,它从193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到1941年初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向海内外报刊发去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和国际评论稿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增强了海外采访力量,扩大了对外发稿数量,《中央日报》也加强了国际新闻。《大公报》的国外通讯是最能吸引读者的部分之一,朱启平、萧乾、杨刚作为该报特派员先后采访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和美国大陆,他们所写的通讯与消息为该报增添了光彩。重庆《新华日报》努力开辟国外新闻来源,除了有莫斯科专电外,还同纽约、加尔各答等地以及美英等国的进步通讯社建立了联系。该报乔冠华(于怀)执笔的“国际述评”,是最具特色的栏目之一。许多外国记者采访了中国战场,有些还访问过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和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实绩,影响很大。他们的贡献同样载入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史册。

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经受了锻炼,队伍壮大了,水平也提高了。这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在战争中变化的表现之一。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国新闻工作者的队伍不断恢复和扩大,尤其是在抗日根据地,几乎是从无到有地组成了一支新闻队伍。大批青年人加入到新闻工作行列,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年轻人成了新闻队伍的主体。还有一批文化人(理论家、作家、艺术家),如艾思奇、夏衍、廖沫沙等,积极从事报刊工作,在提高报刊的理论水平与文化品位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中造就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包括著名的记者、主笔、评论家,如范长江、邓拓、羊枣等。他们都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步,继而在抗日烽火中挑起报刊工作大梁,并有力作问世,成为著名报人的。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各类新闻工具、各个新闻单位以及每个新闻工作者,在战争环境中都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在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如重视战地采访和军事宣传、加强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与评论的针对性、改进发行办法等。而所有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我国新闻事业整体结构的变化,出现了新格局,这就是:从独家扬威到三足鼎立——尽管三方面力量是不均衡的。

众所周知,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及其政府控制了全国新闻事业,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被镇压到几乎没有孑遗的地步,民营新闻事业迫于形势只能附和执政当局。新闻阵地基本上是国民党的独家天下。直到1932年,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新闻机构还有大动作——《中央日报》实行社长负责制、中央社总社改组并迁出中央党部、中央台扩充发射电力(由500瓦改为75千瓦),这表明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力图走上自己设计的稳定发展的轨道。

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而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却宣传不抵抗政策。从《申报》与史量才、《生活》与邹韬奋政治态度左倾到史量才被刺、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杜重远被判刑以及《生活》、《新生》先后被查封,一件又一件的事实,使得人民群众对于国民党及其新闻事业的不满与对抗情绪日益强烈,国民党对全国大局的控制因此日益困难。这种态势,到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后才有改变。国民党方面,仍然掌握着全国政权,直接统治着大片地区。它的新闻事业在国统区占有主导地位,在国际上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工具,活动余地很大。国民党控制的重庆、桂林、昆明、西安等城市,成为战时的新闻与文化活动的中心,那里虽有不同政治观点的报刊,但国民党宣传工具仍能左右一切。国统区的地盘虽比战前大为缩小,但它的新闻事业经过战争初期的短暂缩减后,战争中期开始恢复,后期则达到战前水平。据统计,国统区战前有铅印报纸1000多家,1939年减为400多家,1944年又增至1100多家。

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有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30年代初在革命根据地重建时特别重视贯彻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等基本原则。“九一八”事变后,它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为民族解放斗争作宣传鼓动。八年抗战中,它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主要是:1942年,以《解放日报》为榜样,结合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党报改革,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明确了党报的性质、任务、风格、文风和办报方针与工作方法,党报走上成熟的发展道路;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取得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合法新闻活动的经验;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党的新闻事业网络,积累了执政党办新闻事业的经验,并为党的新闻事业向城市和全国发展奠定了基础;党在新闻活动中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国内外新闻界广交朋友,深得各方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事

业迅速壮大,成为在实力上与规模上可以同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相抗衡的一支力量。

第三种力量(或称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的报刊,在战时出现发展的形势。有实力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新民报》等,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在“大后方”站稳了脚跟。地方实力派的《国民公报》、《新蜀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广西日报》、《云南日报》等,比战前更为活跃,有时左右逢源,有时左右不讨好,但它们在政治斗争的天秤上毕竟是有分量的。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兴起,也随之出现一批以争取民主为己任的报刊,其中《民主周刊》等影响不小。

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第三种力量的报刊,三者共存,又联合又斗争,这是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新格局。这种格局,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社会地位与实力影响。它冲破了战前国民党独霸新闻阵地的局面,因此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然而,这种局面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其中隐藏着矛盾和斗争,这又成为通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桥梁。

中国有句古话:“多难兴邦。”关于中国新闻事业,或许可以说“多难兴业”。经历了抗日战争之后,中国新闻事业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兴”,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并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原载《新闻大学》第46期,1995年冬季号)

增强党性 坚持改革^①

——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50 周年

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到现在已经50年了。这次改版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它的经验和精神哺育过老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又成为我国现在的和未来的新闻工作者的学习宝库。

《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到改版时不过10个半月,为什么急需改革?这是因为它的工作中存在问题,“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②。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了《发刊词》,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创刊初期的《解放日报》,积极宣传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政策和策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解放日报》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报道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它发表了一些好作品,如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国民党缺少什么》等,至今读来仍令人兴味盎然。但是,这时的《解放日报》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主要是脱离根据地的实际,对于根据地的群众斗争反映太少,对于党的政策在根据地实施的情况反映太少。就版面而言,不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习惯地按照“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的顺序安排,国际新闻、空泛的评论和长篇译文占据了大量篇幅。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以后,《解放日报》宣传不力,一些重要新闻放在不显著的地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还多处出现。总之,“还没有具备党报所必需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③。

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实行的路线是正确的,给《解放日报》规定的任务和方针也是正确的,而且毛泽东同志还一再指出,在根据地办报,应该

① 本文在《新闻大学》杂志发表时,作者署名史述之。

② 《致读者》,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社论。

③ 《致读者》,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社论。

以宣传党的政策和根据地军民为主。然而,有些同志另有看法,在办报思想上很不一致。报社中有的同志没有摆脱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影响,头脑中的办报模式是苏联的《真理报》和国统区的《大公报》。以此为标准来办《解放日报》,怎能不出问题!同时,报社工作人员中,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在根据地办报的经验,党报观念薄弱,容易受教条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从国统区来的年轻人,热情很高,但对国统区报纸的了解多于对根据地报纸的了解,对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了解多于对无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就不是一次或几次批评所能解决的,而是确有必要进行一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大家的思想水平,才能统一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日报》的改革,也就是报社工作人员在认真学习、自我教育的整风运动中提高觉悟,改进工作。

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解放日报》的整风与改革。3月14日,他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①这就是党中央对《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要求。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致读者》的社论,总结创刊以来的工作,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需要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之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当天该报头版除社论外,刊载10条新闻报道,其中9条为国内新闻,1条为国际新闻,头条新闻是有关陕甘宁边区减轻公粮公草的报道。从此,有关党的政策和根据地军民活动的报道,占据了《解放日报》的大部分篇幅和显著地位。

改版后,《解放日报》继续深化改革,基本内容是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9月初,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日报》既是党中央机关报,又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这就使《解放日报》同它所在的西北地区党组织直接联系起来,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从当地实际出发进行宣传。西北局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解放日报》工作。这时,毛泽东同志认为:“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②

关于“全党办报”的方针,《解放日报》于9月22日发表社论《党与党报》,从理论上作了阐释。社论指出:“报纸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这句名言中的“集体”,不是指报馆同人,而是指整个党组织。“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个巨大集体的喉舌”。因此,一方面党报工作人员要做到“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

① 《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版。

② 《给何凯丰的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版。

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党报不但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另一方面,“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包括党的领导者、领导机关和各工作部门,直至全体党员。只有这样,党报才能真正成为党的喉舌。

由于“全党办报”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得“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办好党报,有了根本保证。经过三年的努力,《解放日报》的整风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达到了预期的效果。1945年5月16日,创刊四周年时,它提出以发扬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作为新的努力目标。

《解放日报》从改版开始的这一场改革,创造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党报工作经验,标志着中国的党报工作从此走上成熟发展的道路。认真学习《解放日报》的经验,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无疑对推动我国新闻工作前进有着重要作用。《解放日报》的经验,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学习不同的方面。联系当前实际,我们可以学习、思考的内容不少,以下仅举数项。

一、始终把增强党性放在首位

《解放日报》在它的《发刊词》中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在改版期间及其以后,它反复强调党报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政策,与党呼吸相通,“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①。它要求在报纸的一切篇幅上,都贯彻党的观点;党报工作人员要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各个工作部门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不自以为是,不做“无冕之王”,而应做“公仆”,有恭谨勤劳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党性的表现,都是《解放日报》倡导的。

在增强党性与坚持改革、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这两个方面,《解放日报》处理得很好。关于前者,它以增强党性作为改革的目标,而坚持改革又为增强党性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证。关于后者,它一再表明自己是党报,又是人民大众的报纸或“天下人的报”。人民大众的活动,是报纸的主要内容。改版后,有关工农兵及其他劳动者的报道,经常上头版头条。

《解放日报》改革的经验证明,党领导下的报纸,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① 《致读者》,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社论。

都应该具有坚强的党性,表现形式可能不同,水平不能降低。新闻改革不是“淡化”、削弱党性,而是维护与增强党性。

二、注重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解决问题

从1942年2月全党整风开始之后,《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社论和论文,分析整风与改革中的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生动地体现出报纸改革的过程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共中央西北局加强《解放日报》工作的措施,首要的一条就是,“责成各级党部在党内进行关于党报的教育工作,使每个党员干部认识对党报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党性不好的一种具体表现。而经常看党报,帮助党报的发行及组织党报的通讯工作,则是每个党员所应当努力的责任”^①。

改革呼唤理论。因为,大量新事物需要从理论上阐明,求得理解。也是因为,在改革中情况纷繁复杂,正确与错误,顺利与挫折,时而交织在一起,需要在理论指导下看清、抓准。理论帮助人们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解放日报》改革时期是探讨新闻理论的风气最盛的时期之一。《解放日报》的许多社论和论文,其中包括社论《致读者》、《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和陆定一同志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都具有理论价值,成为后人研究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必读篇章。它们涉及诸多新闻理论问题,如“全党办报”的原理、新闻定义、新闻本源、新闻真实性、文风、新闻工作者的品德与修养等。

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解放日报》之所以进行改革,为的是清除教条主义影响,提倡按照根据地的实际需要办好党报。它曾经指出:“我们是在农村里办报,这与在大城市里办报又大不相同”,“因为有这一特点,所以大城市里适用的有些方法,在我们这里不能照抄来用”^②。这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办报路线。

以国际新闻为例,重庆的《新华日报》可以大量刊载,《解放日报》也要报道,但须处置得当。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多登一点国际新闻是必要的,但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是国际新闻占首位。改版前,大量国际新闻上头版,而且采用外国

^①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见1942年9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本报创刊一千期》,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社论。

通讯社的电讯,不加删节,几乎成了它们的义务宣传员。边区、延安的重大事件报道,被挤到次要地位。这种不加分析地唯国际新闻是重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改版后,头版主要刊载边区、延安的报道,也有国际新闻,如4月4日的头条就是有关苏联红军作战情况的新闻。定期发表的《十日国际述评》,也放在头版。

今天,我们在城市里办报,与延安时期的情况大不相同,不能照抄那时的做法,但基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解放日报》曾经提出:“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①许多在延安学过这项本领的老前辈,都认为那是终身难忘的时期。作为后来者,我们的本领要在实践中学,同时也要向历史学,向老前辈学。

(原载《新闻大学》,1992年春季号)

^① 《本报创刊一千期》,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社论。

1947年的反对“客里空”运动

“客里空”早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一个常用词，人们借用它来泛指假报道、浮夸作风和弄虚作假的人。而最先借用这个词的是《晋绥日报》，由它发起，1947年下半年在各个解放区同时开展了一个声势很大的反对“客里空”运动。离现在，已经整整35年了。

“客里空”是苏联剧本《前线》中的角色之一——一个惯于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战地特派记者。剧本在苏联发表于1942年9月。延安《解放日报》在1945年5月19日至26日，连载了萧三的中译本，6月1日发表社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这篇三千多字的社论，只有一处提及“客里空”，并未强调这个典型的现实意义。

过了两年，到1947年6月15日，《晋绥日报》刊载了《前线》中有关“客里空”的部分，还在编者按语中指出：“编者作者应更加警惕，并勇敢地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这是第一次在报纸上提出反对“客里空”的问题。6月25日、26日，《晋绥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文章用读者反映和报社调查的材料，说明“有不少的‘客里空’或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被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客里空’与比‘客里空’更坏的人已引起读者较普遍的注意”。文章提出：“如果将其不真实的原因及其动机或‘客里空’式的思想作风一起揭发出来，更为欢迎（编辑改错的亦希望尽量揭露）。今后报纸将陆续刊出这些材料，以引起大家的警惕注意。”

为什么《晋绥日报》此时此刻如此尖锐地提出反对“客里空”问题？这和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土地改革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共中央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一场激烈的深刻的社会革命开始了。宣传土地改革，成了报纸和通讯社的工作中心。对于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来说，这时比过去更需要报纸。他们关心报纸的宣传，对照农村的实际情况阅读报纸。而对报纸和通讯社来说，这又无疑是一

种严格的群众监督。正是因为这样,群众发现了报纸和通讯社工作中的问题,对于那些向壁虚构、是非颠倒的新闻报道意见最大,甚至由此产生不信任报纸宣传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晋绥日报》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旗帜鲜明地在报纸上加以揭露,公开作自我批评。与此同时,编辑部内部认真检查工作。它借用“客里空”这个剧中人,来形象地概括存在的问题,既生动,也恰当。《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一文发表后,在广大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读者纷纷给报纸提供材料,写信支持报纸的行动。所以,发表这篇文章就打响了反对“客里空”的第一炮。接着,《晋绥日报》陆续发表有关材料,有读者的揭发,也有编辑、记者的检查。

显然,《晋绥日报》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解放区新闻界具有普遍意义。8月28日,新华社总社编辑部发表文章《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指出:“《晋绥日报》这次的反对‘客里空’运动,在人民新闻事业建设过程中是有历史意义的”,“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单位部门及个人,均应普遍在公开的群众性的方式下,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要由此开展一个普遍的学习运动”。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结合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形势,论述开展反对“客里空”运动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社论指出:“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是土地改革中的一个收获,它必将使新闻工作更加向前推进一步。这种自我批评不仅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要学习,而且一切工作部门都应当向它学习,以便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九一”记者节晚会上讲话,号召晋绥解放区全党开展反对“客里空”运动。他说:“我提议不仅报社同志要检查客里空,要全党都来公开检查,各个部门都来检查,报纸要号召把反客里空推广到各个角落去,号召大家自我批评,凡属邀功自满假报情况的错误,应公开向党报承认错误,这样会使我们的工作大有进步。”同日,新华社在题为《纪念“九一”,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社论中也指出:“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客里空’,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惕。”9月18日至21日,《晋绥日报》编辑部、晋绥新华总分社联合发表《关于“客里空”的检查》,从新闻报道中的问题到立场与作风问题,作了系统的检查。

晋绥的经验在各个解放区迅速推广开来,各地报纸和通讯社都认真地全面地检查了工作,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大致上可以这样说,1947年9月是反对“客里空”运动的高潮,而检查“客里空”的活动则一直延续到1948年春天。这个运动的收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

反对“客里空”运动,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是反对假报道,捍卫真实性。《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一文列举的“客里空”报道十三篇,我们仅就本文讲到的情况加以分析,可以分为几类:(一)向壁虚构的一篇(把地主写成中农);(二)捕风捉影,片面夸大,把假象当成事实的三篇(如,只听当事人的一席谈话,未经核实,就把一个有问题的人写成英雄);(三)粗枝大叶,数字、地名或细节失实的三篇;(四)译电、校对差错,编辑改错的三篇。此外,有三篇存在争议,即有人说真,有人说假,未核实。以后各报陆续揭露出来的“客里空”报道,情况分类与此相似。根本问题是新闻报道不真实(全部假的或部分假的),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方面的问题则是造成不真实的原因所在。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我们党不仅历来重视,而且从理论上作了科学的论述。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从一开始就强调实事求是,提倡老实的、科学的态度。1942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在题为《宣传唯物论》的社论中指出:“我们只有说实话,只有大喊大叫的去宣传实话,在那里才存在着和生长着我们的全部希望,全部力量。”1943年9月1日发表的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对于新闻的本源和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陆定一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事实”。他指出:“只有我们,才能实行一个方针,这个方针使我们的新闻十分真实。”1945年3月23日,《解放日报》在《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篇社论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这些都说明,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不可动摇的原则。反对“客里空”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在实践上维护了这项原则,抵制与批评了违背这项原则的言行,使得“客里空”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第二,发扬了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在报纸上的公开揭露“客里空”的各种表现,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是反对“客里空”运动的基本做法。这种揭露是具体的,有时间、地点、人物、题目,还有读者意见、编者说明、作者检查等各方面的材料。例如,第一篇被点名为“客里空”报道的是通讯《女游击队长李桂芳——绥远人民抗战故事》,刊登在1946年5月26日《晋绥日报》副刊上,作者成青昭,在部队工作。“这是一篇完全撒谎的通讯”,当天报纸被地方党委扣发。这些情况都在1947年6月25日《晋绥日报》上公布了。8月24日,又在报上发表了成青昭的检讨。他说,在医院里遇到李桂芳,只听了她自己讲的那套经历,便信以为真,“怀着争功夺利的个人想

法,深恐怕别人知道了材料去采访”,没有作任何检查核实就发稿了。成青昭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表示应承担责任。

各个解放区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全面地、系统地检查了“客里空”的表现,分析了产生的原因,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其规模之大,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新华社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所说,“公开的自我批评是我们的有力的武器,这种公开的自我批评,不但不会降低我们党的威信,相反的,它只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因为只有我们的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事业才是这样郑重其事,这样负起责任”。解放区各新闻单位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后,失去的是“客里空”,得到的却是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高度信任。据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公布,该报发行量1947年5月份为11234份,到1948年5月份上升到25329份,增长一倍多。

第三,整编了新闻队伍。

“客里空”的出现,同队伍不纯有直接关系。由于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不纯而带来的问题,会反映到新闻工作中来。例如,《晋绥日报》1946年11月22日发表通讯《李宏瑞和他们的武工队》,12月27日发表《李宏瑞又建奇功》,但李宏瑞的真实身份是日寇便衣特务,日寇投降后混进我地方武装,杀人抢劫,强奸妇女,破坏革命,罪行累累。1947年3月27日,李宏瑞被群众公审后枪决。4月21日,《晋绥日报》发表《李宏瑞当众伏法》的消息。出现这类问题,当然同记者的采访作风有关系,但主要原因还是敌人用伪装遮盖起来了,要识破他,需要时间和条件,不是记者能一眼看穿的。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新闻工作。1946年下半年,一些报纸刊载了地主“献地”、政府奖励的报道,也是对实际工作的反映,责任不全在报纸。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对报纸、通讯社来说,自身存在的组织不纯、作风不纯,更严重地影响工作。混进来的坏人是极少的,对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来说,是改进思想作风的问题。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改革,新闻工作者应该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一边,人人需要过“土改关”。因此,提出“锻炼我们的立场和作风”的口号,是及时的、必要的。反对“客里空”运动同“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结合,成为整党的一个部分。新闻工作者还轮流下乡,参加土改运动,在群众斗争中经受锻炼。

第四,改进新闻业务。

在反对“客里空”运动中,新闻业务有了很大的改进,比较突出的是编者按语的使用。运动开展以后,来稿来信猛增,《晋绥日报》采用加编者按语的办法处理。对于因农村交通不便,来不及一一核对清楚的材料,用编者按语加以说

明、补充；对于观点上有问题的材料，用编者按语来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的看法；对于政策问题，用编者按语作具体解释。这样，增加了见报稿件的数量，
读者来信也上了头条。从按语中表现的尖锐、泼辣、鲜明的态度，受到读者的热
烈欢迎和称赞。由于采用群众来信来稿增多，报纸上的专栏也多了，版面也活
泼了，每篇几百字的《编后话》、《三言两语》、《小评》、《短论》等小栏目的文字，适
合农村干部、群众阅读。

反对“客里空”运动，是在土地改革反右倾时酝酿、开始的，随着运动的迅速
开展，声势不断壮大，又出现了“左”倾偏向。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同志为
中共中央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及时向全党
敲起了警钟。这个文件分析了“左”倾错误宣传的各种表现，要求各中央局、中
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及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工作人员，检查工
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文件列举的是“左”倾错误宣传的主要的基本的方面，
我们从新闻业务的角度还可以列举若干具体表现。例如，在编者按语中，有的
追究责任过头，有的片面强调依靠贫雇农而忽视了团结中农，有的超出舆论范
围而直接干预实际工作。又如，检查“客里空”表现时有过火之处，1947年9月
19日，《晋绥日报》刊载的《反党八股以来的技术观点》一文（《关于“客里空”的
检查》长文的一部分），竟说1942年以来“非但未收到真正反对党八股的效果，
而且在工作中更发展了技术观点”。又如，1947年9月25日，晋冀鲁豫《人民
日报》发表的该报通讯科的文章《从内邱通讯工作来看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基本
问题》中，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对立起来，说“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通讯员，
只有先学习工农通讯员的思想作风，端正为群众服务立场，然后才能执着自己
的文化武器，配合工农共同推进农村报道工作”。

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
报》编辑人员发表谈话以后，解放区各新闻单位逐项检查工作，总结反右反“左”
的经验教训，使得新闻队伍更加步调一致，为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
利作了准备。

（原载《新闻大学》第4期，1982年秋季号）

同常芝青通信前后^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计划编辑几本学术资料书,目的是为师生提供学习与研究的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后来只出版了《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两本;还有的没有出版,其中《1947年的反客里空运动》一书,拟定了入选的文件、文章与资料目录,完成了收集材料工作。但在征求有关人士意见时,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人反对出这本书,认为反对客里空运动是“左”的产物。

当时我的想法是,真实是新闻工作的生命所系,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用“客里空”来指代虚假报道和浮夸作风,形象生动,给人印象深刻。然而,人们往往只知“客里空”就是虚假,而不知其由来。所以,介绍1947年解放区新闻界的反客里空运动和剧本《前线》中有关客里空的描述,是有必要的。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反客里空运动,其是非功过可以自由评说,我们编书出版正是为人们讨论提供足够的材料。既然有了不赞成的意见,我们就把出版事宜搁下,再征询意见,再作访问与商讨。我们找的第一位就是同反客里空运动关系至为重要的常芝青。

常芝青(1911—1985),是一位老干部、老新闻工作者,山西交城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战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该报改名《晋绥日报》后,任总编辑、社长。他是1947年《晋绥日报》开展反客里空活动的主持者。1956年,他发表的《在晋绥日报的年代里》一文^②,对反对客里空运动的全过程作了详细介绍。当然,主要讲成绩,却也讲到“左”的倾向问题。他是这样写的:

9月1日在我们编辑部掀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学习和检查工作热潮。在本报出版7周年的时候,陆续发表了若干关于编辑部在新闻业务思想方面的检查总结的文章。

^① 本文是2002年写的一个材料,未公开发表。

^② 常芝青:《在晋绥日报的年代里》,载《新闻业务》1956年第6期。

这些检查基本上是好的,可是在检查中,“左”的倾向已经萌芽,在个别问题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主要表现在对抗日战争中的工作有割断历史,否定过去成绩的倾向。

当时,对于这种“左”倾的萌芽,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当群众已经充分发动,革命风暴冲击着一切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冷静的头脑,我们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在惊涛骇浪中,需要乘风破浪,“逆水行舟”,否则,就有使自己淹死的危险。

1948年1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指出了报纸有的“按语”主观,追责任追得太紧,不够实事求是等“左”倾偏差。

这是个警钟。它及时地阻止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报纸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虽然为时不及两月,但它对工作的损害是很大的。虽然报纸所犯的“左”倾偏差是整个边区工作的问题,但报纸却助长了错误的发展。这是个严重的经验教训。

1956年以后,常芝青多次在发言和文章中介绍反客里空运动,基本观点未变。1982年10月,我们教研室将编书情况与问题,写信告诉他,着重向他请教如何看待“左”的问题。11月10日,他给我们写了回信。

在常芝青的这封信中,有两点是很明确的:一是1947年9月18日至21日连载的文章《关于客里空的检查》是“左”的错误的集中反映;二是土地改革实践中的错误影响了报纸宣传,但同反客里空的历史价值关系不大。在这封信中,没有提到人的问题,即打击面过宽,伤及无辜者的问题。1983年7月18日下午,我和同事胡志寰一起去常芝青家当面请教,他热情地抱病接待我们。当我们问及当年反客里空运动中挨整人员的情况时,他动情地说:“当年搞艾柏、康舒新、康溥泉,都做得过分。艾柏没有同地主女儿结婚,而且那个女的家庭成分不是地主,而是富农或富裕中农。反客里空时,艾柏不在报社。康溥泉当时只是个通讯员。”他的声音低沉,明显是体力不支,他身边还有钢质的氧气瓶。我们不便多问,交谈十几分钟后便告辞了。他的话虽然不多,但坦诚、亲切的言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信,我一直保存着,或许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时还用得上。

2002年写于上海

• 附 •

常芝青致丁淦林信

丁淦林同志：

您好！

贵教研室来信等，已接读多日，因病未复，请原谅。

《晋绥日报》在反客里空运动中有些“左”的、过头的做法，1948年曾检讨过。产生这些“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当运动获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支持后，特别是当新华社发表社论表扬和推广这一运动后，我们的头脑发热，甚至忘乎所以。1947年9月18至9月21日，在报上连续发表的四篇检查客里空的文章，是报纸“左”的错误的集中反映。四文的共同之点，是对抗战时期的工作，有否定一切的严重偏向。这四篇东西，都是现在不宜发表的。

报纸在揭露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文章中，引用了郝家坡土改工作团的一些材料。对于那些材料的准确性究竟如何，是现在需要研究的。

郝家坡土改工作团，在康生的统治下，搞了一些名堂。土改中有些“左”的错误做法，是出自他们那里的，如追查所谓化形地主，就是较典型的例子。这表明，对土改工作中发生的“左”的偏差，康某是起过恶劣作用的。这对于报纸当然都有影响。从对研究反客里空运动这一历史经验角度来说，却没有多大的关系。在此须特别申明：以上看法，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未必准确，仅供您参考和批评。

关于运动的史料中，有些资料本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是不是有必要考虑，在能够满足和方便有研究任务的师生同志们的阅读、使用的前提下，为了防止流传过广，做出一些规定。我对学校情况很不熟悉，提不出具体意见，请谅。

此信因身体关系，写得很潦草，甚歉。有何示教和要我效劳的事，来信请直接寄我。我在家里养病。谨祝

教安！

常芝青 11月10日

1956年我国新闻工作改革概述

在中国新闻史上,1956年可以说是改革年:报纸改版,广播增加节目,通讯社改进新闻报道,整个新闻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1957年上半年,改革继续进行;下半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改革中断了。

这一年多的改革,目的是探讨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途径和方法,在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本文主要介绍这次改革的基本情况。

建国初期,政治运动连年不断,新闻工作以宣传报道阶级斗争为重点,是必要的,正确的。到1956年,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基本上结束了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制度,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全国工作的重点可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于是,新闻工作也面临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而实现这个转移,首要的是必须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教条主义在那时的主要表现是,不加分析地搬用苏联的经验和做法。本来,我国新闻工作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经验,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很快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人民新闻事业系统;建国初期,这个系统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改革、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毕竟是个新课题,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特别是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在经济建设的宣传报道日益显得重要的情况下,人们急切地希望学习别国的经验,应该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把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视为唯一正确的东西,机械搬用,既不注意我国的国情和传统,又排斥其他国家的经验,结果是谬种流传,贻误工作。例如,有个苏联办报人说过,“报纸上的稿件,应该百分之百的正确”。于见,我们的同志中也有一种论调说,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7页。

“报纸上发表的言论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它只能使报纸陷于被动的地位。

“内容枯燥,讨论缺少,语言生涩,形式呆板”——山东《大众日报》曾经这样概括读者对该报改版前的意见^①。可以说,这是新闻工作改革前报纸的通病。读者厌恶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纷纷提出批评。新闻工作者也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还上书领导,提出改革意见。

党中央及时注意到新闻工作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加强了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于1956年5月28日,分别听取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长篇讲话;6月16日,又召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和新华社负责人谈话。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一开头就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他说:不分好坏,不看条件,一律接受,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在我们的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他又说:我们的新闻报道,学习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不活泼。我们不能学这种党八股。刘少奇同志对于新闻报道和广播工作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在新的形势面前,读者(听众)、党委、新闻工作者,都想到一起来了,形成了共同的愿望,因而,新闻工作的改革势在必行。

新闻工作者是敏感的,从1956年初起,就议论纷纷,酝酿改革。但从全局来看,改革的标志是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

《人民日报》编辑部从4月中旬开始,发动全体人员检查工作,并向各省(市)委、中央有关部门、县以上的报纸编辑部和各方面读者征求意见。各新闻单位也都是这样,把广泛征求读者(听众)意见和编辑部检查与总结工作,作为改革的前提。江苏《新华日报》在6月份成立了言论、新闻、群众工作三个专门小组,系统地总结关键性的经验。《大公报》举办了展览会,从对比材料中看出问题,找寻改进办法。

《人民日报》在检查工作和听取读者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方案,6月20日报告党中央,7月1日起改版——从四个版改为八个版。当天发表题为《致读者》的社论,说明了将着重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工作。党中央于8月1日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批转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希望各地党委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工作。此后,全国新闻界掀起了改革热潮。《人民日报》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改

^① 山东《大众日报》1956年9月15日社论:《大家动手办好大众日报》。

革,一举大变。有的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则采取“先刷新门面”的办法,即从改进排版和标题做起,然后改进内容及其他。新华社根据刘少奇同志讲话的精神,就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同时还研究了长远的改革规划。关于广播,7月25日至8月16日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广播会议提出:让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更多的节目,是全体广播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会议认为,广播电台应该以新闻性和文艺性的节目为主,今后首先要改进新闻报道。

这次改革的中心是,冲破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束缚,在新的形势下,把新闻事业办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成为党联系群众的工具,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方面军。改革涉及新闻工作的许多方面,这里只能简略地介绍其中一些方面的情况。

一、改进新闻报道

这是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也是变化最显著的一项。改革前,新闻报道量少、面窄,《人民日报》原先每天只有一万多字的新闻,其中公报新闻和政治动态占了不少篇幅,反映人民生活的就更少了。改版时,《人民日报》明确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各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改出八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在数量上将增加一倍半左右”^①。改版后的《人民日报》,达到了这些要求。《人民日报》和其他许多报纸,都扩大了报道范围,不仅有政治要闻,而且有人民生产劳动、物质文化生活、精神面貌、民情风俗等方面的报道,甚至某些“生活琐事”也上报了。引人注目的“花边新闻”出现了。大量的报道是令人高兴的,也有一些是并不令人愉快的——关于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报道,以及揭露官僚主义、违法乱纪行为的报道。

二、开展自由讨论

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报纸有一度只刊登一种见解,对于有争论的问题只登结论,不搞讨论。这样,形成一潭死水的局面。《人民日报》带头冲破这种局面,刊登观点不同的文章,组织多种形式的讨论。《大公报》从1956年8月2日

^①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社论:《致读者》。

起,在报上开展《当前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讨论,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五百多件来稿。讨论的效果很好,吸引了广大读者。讨论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价值的。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报纸刊登学术讨论文章,开辟学术动态小专栏,有些报纸还组织了对于某些实际问题的讨论。广播电台也向听众介绍正在进行的学术讨论。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仅使新闻事业富有生气,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种舆论工具的作用,“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①。

三、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多年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1950年4月19日,党中央作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4年7月17日,党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重申:“为了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级党委应该充分地 and 正确地利用报纸这一有力武器。”决议还指出:“多数党委和报纸对于这一工作不是基本上进行得好,而是基本上进行得不好。”在这次改革中,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所加强。许多报纸采用消息、评论、杂文、小品文、漫画和图片等多种形式,开展批评。也有的报纸开辟了专刊和专栏。一般说来,对事不对人的批评,如批评轻视理论学习、产品质量低劣、会议风气不好之类,搞得比较活跃,而在点名批评方面遇到的问题比较多,有的报纸不久就取消了批评专刊或专栏。当时流行过一种讽刺小品文,是从苏联学来的,用文艺笔调写作,形象生动,语言尖刻,但被批评者往往感到自己被丑化了,不易接受,在细节描写上容易夸大(有的是虚构)。因此,到1957年初就不多见了。

四、认真处理来信来稿

关心读者的要求,重视读者的呼声,是各报在改革中一项共同的目标。有一家地方报纸统计,改革前信稿采用率只有万分之五左右,改革后用综合、摘编、发内部参考等方式,使采用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以上。《人民日报》的各个版(包括副刊)都刊载读者来信,其他许多报纸辟有读者来信专栏或专页。

^①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社论:《致读者》。

五、改进文风

同1942年延安整风中批评过的“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党八股相比较，这次改革前的党八股的特点可以说是，闭着眼睛说教，板起脸孔训人。社论、评论文章被奉为“指令”，似乎读者只能恭读、照办。新闻报道在大题目、老题目上兜圈子，标题与版面更是单调、老一套。改进文风，是这次改革的重点之一。改版后的《人民日报》，社论题材广了，还增加了就实论虚的小言论，提要 and 编者按的运用也更灵活了。《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都注意根据自己读者的特点写社论。有的省报还提出，社论要做到“文章写得好，公道在人心”。变化最大的是新闻报道。新华社提出了新闻的四个基本要求^①，第四次全国广播会议也提出了广播新闻要做到“多、快、短、好”。一批好的新闻、通讯作品出现了，例如，邓拓同志采写的《访“葡萄常”》（195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集体采写的《当你们熟睡的时候》（1956年7月21日）、杨璞、续磊同志采写的《“梁山伯”结婚了》（1957年1月8日）。标题、版面也恢复了我国报纸的传统做法，变化多样，美观大方，还出现了许多读者欢迎的专栏，如《话说天下大事》、《科学知识》、《文化宫》、《市场漫步》、《产品质量评介》，以及言简意赅的《编后》、《随笔》等。

六、办好副刊

各报普遍增加了副刊。《人民日报》在1951年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除了出过《抗美援朝专刊》、《读者来信专页》外，没有另出副刊。改版时才恢复副刊，即第八版上半版，没有刊头，内容是各种体裁的文艺性的轻松活泼的小文章。1957年4、5月间，《人民日报》副刊上开展了关于杂文（当时也称为小品文）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十多篇各抒己见的文章，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挥杂文的作用、如何写好杂文的问题。可惜这讨论中途停止，未获结果。

^① 新华社新闻的四个基本要求是：1. 新闻应该有普遍兴趣，能引起共同注意。是为广大读者写的，不是为少数专家写的。只讲主要的，不讲细节。2. 新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在每个时期报道要有中心。3. 简短，一般新闻长三五百字。4. 报道及时，在正确的基础上力求快。

七、调整机构,改革工作制度

适应改革的要求,许多报纸编辑部都调整了机构,加强编辑、采访、通联、言论等业务部门,精简行政管理部門。有些新闻单位聘请了老报人、作家、理论工作者担任顾问。《人民日报》聘请了一些作家、诗人为特约记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写的颇具特色的通讯。《文汇报》采取聘请社外编委的办法,吸收专家、学者参加报纸工作。许多新闻单位还修订了各项工作制度,特别在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时效性,处理来信来稿,开展调查研究,定期征询读者意见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八、改革新闻教学和开展新闻理论研究工作

在新闻教育方面,从1954年起,我们全盘地搬用了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其实,苏联那套东西,只不过是马列经典著作与文件上的词句,加上经验举例,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又脱离中国实践,空洞地作“五性一统”^①的说教,学生不愿意听,教师也深感索然无味。随着新闻工作改革的开展,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于是,在编辑部的会议中,在业务刊物上,在大学新闻系的课堂里,展开着热烈的争论,人们的理论兴趣浓厚起来了。报纸的性质与任务,读者、党委和报纸的关系,指导性与趣味性,中国报纸的传统,新闻的基本要求,社会新闻,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新闻学等方面的问题,当时都提出来了。大学新闻系教师自编教学大纲和教材,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

总之,一年多的改革,进展很快,成效显著。广大新闻工作者思想解放,刻意求新,为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了许多尝试,使报纸、广播受到读者、听众的普遍欢迎。1956年10月1日起,国家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学校中私人需要的报刊实行自费订阅的办法,许多报纸的发行量都没有下降,有些报纸还提高了很多。如《北京日报》,1956年发行量由七万三千份上升到十二万份左右。上海《新民报》晚刊,解放以来发行量长期停滞在两万份,1956年下半年进行改革后,办得生动活泼,上升到十多万份。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4月28日停刊,5月1日在北京出版《教师报》。随后不久,又决定迁回上海恢复出版《文

^① 指党性、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的说法。

汇报》，本来只打算发行五万份，10月1日复刊后，办得很有特色，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发行量一开始就达到十多万份。

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于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有着不同的认识。

改革之前，许多新闻单位进行了有关改革的方针和方法的大讨论；改革开始后，新闻界思想活跃，边改革边争鸣，从指导思想、理论观点到具体做法，都有争论。有的单位甚至出现不同见解争论，相持达数月之久的局面。这种争鸣是正常的，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有益于推动改革。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到1956年底，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缺点，例如，思想教育和方针政策的宣传有所放松；经济建设报道有所削弱，对于搞好工作经验和生产报道的问题重视不够；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时，没有十分注意分别轻重缓急，区别能办到与不能办到、现在能办到与将来能办到等不同情况；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存在失实、不加分析、不讲分寸等毛病。此外，有的报纸没有注意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而是盲目套用别的单位的做法，你搞个副刊叫“辣椒”，我便搞个副刊叫“生姜”。有一段时间，不少报纸过分地渲染了吃穿用，以致有的读者批评说：“党中央号召艰苦朴素，报上宣传鸡鸭鱼肉。”

当然，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改革中出现若干缺点，甚至出现某些错误的主张和做法，是难以避免的。1957年初，从中央到地方，各新闻单位都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然而，有人认为改革搞过头了，有人担心会动摇党性原则，背离党报的传统经验，甚至有人提出了不要用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说法。

1957年下半年起，改革中断了。然后，人们有意或无意地不提它。在1958年初，有个单位出版过一本题为《党报的党性原则》的书，汇集了许多新闻工作文献资料，而《人民日报》的《致读者》这篇重要社论，却未入选。这自然是一种看法的具体表现。

1957年及其以后的几年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可能旗帜鲜明地肯定这次改革，但也没有明确作出否定的结论。只是到了“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这次改革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的典型，横加批判^①。今天当然要为它平反，恢复名誉。然而，究竟如何看待这次改革的意义，如何分析这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则是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的。

^① 参见《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和北京《人民日报》改版,是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当天发表题为《致读者》的社论说:“改革的目的是,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是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经过整风运动,延安《解放日报》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达到了预期的改革目的。1956年7月1日,北京《人民日报》改版的当天发表了又一篇题为《致读者》的社论,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它从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当然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因此可以说这两次改版,都是为了使报纸更好地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两者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也就不一样。如果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为办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人民的报纸提供了基本经验,作出了具体榜样;那么,《人民日报》带头进行的新闻工作改革,则是为办好社会主义时期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开辟道路,创造经验。

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虽然没有进行到底,但它的重要的历史意义是谁也否定不了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问题也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中断多年的新闻工作改革,又在进行了。当然,这不是简单的继续,而是在新的形势、新的条件和新的基础(包括大量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上稳步前进。

(原载《新闻大学》第3期,1982年秋季号)

学习戈公振先生的 爱国、乐业、创新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事业和精神,已载入史册,将代代相传,至于永远。戈公振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在新闻工作实践、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等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爱国、乐业、创新精神,已经成为鼓励后人前进的教材。

戈先生毕生从事新闻工作,热爱自己的职业,辛勤劳动,乐此不疲。正是这种乐业精神,使得他的卓越才能迅速在事业上展现出来。1913年底,他刚到上海时,只是著名报人狄楚青主持的有正书局的一名学徒,第二年就被狄楚青调到他所主持的《时报》工作。数年之间,戈先生从校对到助编、编辑,一直升到总编辑。他在认真做好报纸工作的同时,从事新闻理论和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随时随地都用心观察,收集材料。1929年6月,邹韬奋先生应邀参观戈先生的新居,看见室内满箱满架的中西书刊,墙壁上贴着各国报刊,连卧榻旁边墙上也贴了好几种。邹先生感叹戈先生“报迷程度之深”,并风趣地写道:“戈先生早已断弦,不想续,他说并不是要标榜什么独身主义,不过觉得如此自由些,我看他好像已把自己嫁给新闻事业了。”^①这种专心入迷的研究,是戈先生乐业精神在深层次上的表现。

作为实践者,戈先生在报纸工作中力求创新。上海《时报》曾经以业务改革著称,这同戈先生的努力分不开。在他主持下,《时报》附张《图画周刊》于1920年6月9日创刊。这是在中国报纸上出现的第一个现代画刊,它主要刊登新闻照片,也有绘画,用道林纸、铜版印刷,图片精美,文字说明简洁。它一出现就引起全国报界的重视,为一些大报所仿效。1930年5月18日,《申报》副刊《图画周刊》创刊,戈先生主编。这也是一个很出色的画刊,当时人们认为在技术上可以同《纽约时报》的《星期画刊》媲美。

作为学者,戈先生思想深邃,见解精辟,在新闻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一书,就是一部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

^① 心水(邹韬奋):《迷》,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30期,1929年6月23日。

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报学”，当时是作为英文 Journalism 的对译词汇^①。书中既写了报纸、杂志的历史，也写了通讯社、新闻职业团体、新闻法规和新闻教育的历史，而且从汉唐报史资料写到成书之前新闻界现状，材料丰富，立论鲜明，是第一部中国新闻事业的通史专著。这部书，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分期等方面，都有创见。它的出版，对于中国新闻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出书之后，戈先生还继续收集材料，以求充实内容、订正差错。1927 年底访问英国时，他在大英博物馆看到昔日遍访未得的几种报刊，喜出望外，认真做笔记，写成《英京读书记》一文（1955 年重印《中国报学史》时，增补入书，作为附录）。直到 1935 年 10 月 22 日，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还留下有关修改这部书的遗言。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新闻学术界树立了典范。

对于新闻教育，戈先生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报馆工作可以取得经验，但“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才，则报馆不如学校；学问与经验，两不宜偏废也”^②。他本人就曾在上海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主讲《访事学》、《中国报学史》等课程。1927 年、1928 年他第一次出国，考察了西欧各国、美国、日本，加深了对新闻教育的认识。1929 年 4 月，他发表《新闻教育之目的》一文^③，全面分析了西方国家新闻教育的内容与特点，提出了中国新闻教育应注意之处。他认为，不要把新闻教育简单地作为职业教育，而应该让学生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他说：“新闻教育，应该包括这几种：（一）理想的政治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法律、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外国语；（二）理想的商业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国民经济及统计学、私人经济、地理、重要的法律和英语；（三）理想的省报或地方报的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国际公法、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特殊的法律；（四）理想的文艺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哲学、历史和本国文学。”关于新闻学，他认为不能只讲报纸的过去和现在，而要讲“报纸的标准和规律”。归根到底，新闻教育的主要目的，要给学生——未来的记者以“一种精神上的立脚点，指明他能够站而应该站的地方”。他还主张在广大青年中普及新闻学知识。这些看法，至今仍给新闻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启迪。

戈先生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者。爱国精神贯穿在他的全部活动和论著中。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他抨击了阻碍新闻事业发展的封建势力，而

① Journalism 一词，通常译为“新闻学”，但到 1948 年仍有人主张译为“报学”。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③ 戈公振：《新闻教育之目的》，载上海《报学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29 年 4 月出版。

对太平天国“设新闻馆”的倡议，却列专节介绍；对于早期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他尖锐地指出：“若就近日之外报言之，几一致为其国家出力，鼓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关于外交问题，往往推波助澜，为害于我国实大”^①；对于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国人的办报活动，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和充分的肯定。他第一次出国考察返沪后，写了《世界报业大观》^②等文章，评述西方各国报业的趋势，对中国报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如同前面提到的新闻教育问题一样，戈先生考察、研究外国的事情，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的有关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使戈先生的思想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忧国忧民，痛感民族危机的深重，呼吁举国一致抗日救亡。1933年3月，他第二次出国，到了苏联。同年，邹韬奋先生在莫斯科与戈先生作过数次长谈，“深感觉到他的猛烈进步”^③。

邹韬奋先生是戈先生的挚友。1932年邹先生提出创办《生活日报》的计划时，就决定聘请戈先生为总编辑。1935年夏，邹先生在上海筹办《生活日报》，电邀戈先生回国参加工作。这时有许多人劝戈先生不必急于回国，戈先生却认为“国势重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④。他毅然于当年10月15日回到上海，不幸的是归来仅一个星期就与世长辞。当时，上海一些报刊广泛宣传了戈先生的精神和事迹。《读书生活》杂志主编李公朴先生在《哀念戈公振先生》一文中写道：“本刊向不随便谈与大众无关的问题，更不肯随便歌颂个人的行为。但这次对于死未多时的戈公振先生却特别提出介绍，因为他有很多可供我们作模范的地方。”^⑤

在今天，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戈公振先生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模范！

（1990年12月1日，在上海市“戈公振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原载《新闻大学》，1991年春季号）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② 戈公振：《世界报业大观》，载上海《报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出版。

③ 邹韬奋：《悼戈公振先生》，载《世界知识》第3卷第4期，1935年11月1日出版。

④ 同上。

⑤ 李公朴：《哀念戈公振先生》，载《读书生活》第3卷第1期，1935年11月10日出版。

韬奋小传

想做新闻记者的穷学生

韬奋，原名邹恩润，1895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永安。他祖父做过福建延平知府，父亲却只是福州的一个小小的“候补官”，家境贫寒，最困难时还领过救济粮。韬奋从小聪明好学，五岁开始读书，十四岁考入福州工业学校。父亲为他设计的前途是当工程师，因此特地送他到上海读书，1912年考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1913年升入中院（中学），1917年又升入上院（大学）电机工程科。

但是，韬奋学的是工科，爱的是语文与历史，想的是做新闻记者。他喜欢跑阅报室，一进去就找《时报》，看黄远生的“北京通讯”，每篇必读，而且对作者产生了感情，希望自己将来成为黄远生那样的新闻记者。

韬奋是有名的苦读学生。星期日别人逛公园，他却在寂静的校园里读书。他争得了“优行生”的资格，免交学费，但生活费仍无着落；他半工半读，假期担任补习教师，课余写文章，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1919年2月，他只得停学，去江苏宜兴县蜀山镇当家庭教师，半年后又回到上海。

后来，他索性改学文科。1919年9月，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还是半工半读，晚上在校图书馆工作，课余写稿，兼任家庭教师，以微薄收入维持学习生活。

接编《生活》——毕生事业的开端

1921年7月，韬奋在大学毕业了。毕业后的半年时间里，他先后在厚生纱厂、上海纱布交易公司任英文秘书，在申报馆处理英文信件，在上海青年会中学任英文教师。1922年，他写信给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毛遂自荐。黄找他谈话，看了他的作品，还调查了他的为人，决定聘请他为职教社编辑股主任。虽然只是半天工作，但总算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职务。还有半天，另谋兼职。

1925年10月,职教社为“传播职业教育的消息”,创办了《生活》周刊,王志莘主编,每期印一两千份,赠阅为主。韬奋为它写过稿。1926年10月,王志莘去银行任职,韬奋接任主编。正如他自己所说:《生活》周刊是“能使我干得兴会淋漓,能使我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从这里开始,他在新闻出版工作岗位上,奋斗终生。

韬奋接编后出版的第一期,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讨论与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成为《生活》周刊的一个传统特色。不久又开辟“小言论”专栏,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作,亲切感人,成为《生活》周刊的又一个传统特色。他还提出选材要注重“有趣味、有价值”,编排方式要新颖,照片插图要悦目。

创业的条件很艰难。一个小小过街楼,三张办公桌,两个半人(一人兼职),就是编辑部。韬奋是“光杆编辑”,所有文章全由他包写包编,曾经用十来个笔名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没有资料,就“跑街”——去书店找,买的极少,大都是靠脑子记住。1928年11月18日,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小言论”《喂,阿二哥吃饭》,第一次署名“韬奋”。他曾向朋友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

思想“与时俱进”

年轻的韬奋,在思想上受到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1927年中国大地上革命与反革命搏斗的风暴,没有把他卷进去。他安然地搞“职业教育”,宣传“安业乐业”、“勤勉诚实”。但这只是韬奋在探索中走过的一小段路。他有艰苦生活的经历,有同职业青年交往的体验(曾去宁波、武汉、济南等地考察)。关心人民大众,追求社会改进,是韬奋思想的基本方面,也是他前进的基础。1930年12月,他提出“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

日本侵略者的炮声,蒋介石集团镇压爱国青年的枪声,使韬奋看清了现实,从改良主义幻想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迅速奔向“时代的前线”。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的那期《生活》周刊上,韬奋写道:“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他一口气写了四篇“小言论”!11月,他以《生活》周刊社的名义发起援助东北军抗日捐款,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1932年1月28日,上海抗战爆发,韬奋满腔怒火写《痛告全国同胞书》,每日编发一两期“紧急号外”,为十九路军发动捐款,征集物资,开办伤兵医院。《生活》周刊社成了新闻中心,询问战局的电话昼夜不停。在极为紧张的生活中,韬奋感到自己同广大爱国群众融合在一起,兴奋无比。

这时的《生活》周刊，已经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1932年1月9日，韬奋在刊物上公开说：“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终必成立。”国民党当局对此大为不满，由胡宗南出面找韬奋谈话，要他改变立场，“拥护政府”。韬奋针锋相对说：“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能变，“只拥护抗日政府”。双方辩论，竟达四个小时。

韬奋没有被压服，而是更坚定地写文章表明“绝对不愿开倒车”，中国“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为此“无法避免重大的牺牲，那也只有暂时忍耐，无所用其踌躇”。这些言论更激怒了国民党当局。《生活》周刊被停止邮寄，有些读者被逮捕，这个发行量达到15万多份的、全国影响最大的刊物有被扼杀的可能。于是，韬奋在1932年10月写了《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备用（1933年12月被迫停刊时果然用上）。

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上发表《梦想的中国》一文，首次署名邹韬奋。1月上旬即作为正式用名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此同时，这个名字也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韬奋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为了应变，《生活》周刊正式宣告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脱离关系，同时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韬奋任总经理。7月中旬，韬奋被迫出国，乘船赴欧洲。

在逆境中坚持学习和写作

出国之前，韬奋决定把在国外的见闻和感想，陆续写出来，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整装待发时，他赶写了《萍踪寄语》的第一篇。7月14日下午开船，8月7日抵达威尼斯，在船上24天，写了通讯二万二千字。

韬奋在意大利、瑞士、法国参观访问后，于9月30日到达伦敦。他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访问报馆，每天看十多种报纸和几种杂志，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他说：“我有时感到身体不舒服，或烦躁，一到这里静寂地看了几点钟的书，身心都感觉舒适起来，心绪也平和起来了，真觉得有意想不到之效力！所以，这是我离开伦敦时最留恋的一个地方。”1934年2月至4月，韬奋先后访问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4月18日回到伦敦，继续埋头读书，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有关他们的传记，作了大量笔记（一年以后，根据这些资料写《读书偶译》一书）。7月14日，韬奋赴苏联。在船上，他采访船长和水手，同美国学生交上了

朋友,还自学俄文。到苏联以后,他考察了一些城市,还参加了莫斯科暑期大学学习。白天听课或访问,晚上写稿,忙个不停。9月底又回伦敦读书和写作,直到1935年5月中旬离英赴美,8月27日回到上海。

韬奋回上海后就积极筹办刊物,同时整理访美资料,着手写《萍踪忆语》。1935年11月16日,《大众生活》创刊,韬奋鲜明地提出,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三大目标,还号召读者“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社会,不是替旧社会苟延残喘”。12月1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他的言行,又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6年2月底《大众生活》被封,3月初韬奋化名出走香港。

韬奋一到香港就为办报而奔忙。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创刊,这是他主编的唯一的一张日报。同时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出至7月底,接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准备将《生活日报》迁上海出版,以便“面向全国”。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在上海只出了《生活星期刊》。韬奋不畏强暴,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此时全国各界救国会已成立,韬奋任执行委员。11月23日凌晨,韬奋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史良。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他们被拘押了二百多天。韬奋在狱中坚持斗争,还抓紧时间写完了《经历》等书。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在狱中,韬奋写道:“我要掬着这枝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937年7月31日出狱后,他以这种精神投入了抗日宣传。

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韬奋昼夜连续工作,19日就出版《抗战》三日刊(一度改名《抵抗》)。这个在炮火中诞生的刊物,“内容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它刊载了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朱德彭德怀就职通电、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有关材料。11月12日,上海沦陷。韬奋经由香港、广西,于12月中旬到达武汉。

韬奋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同中国共产党一致。他到武汉不久,就去八路军办事处访问周恩来同志。当时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及其出版物,影响遍及全国,海外华侨中也有许多读者。国民党当局企图控制韬奋,对他软硬兼施:一面威胁说“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另一面又几次拉他参加国民党,甚至以三青团的“中央干事”职务为诱饵。1938年初,蒋介石亲自出马同韬

奋、杜重远谈话,要他们“注意到组织的重要”。韬奋没有上圈套,却在此前后一再表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劝他暂时留在党外,以民主人士身份发言影响更好,共产党人会把他作为党内同志看待。

1938年3月,韬奋参加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被推举为名誉理事。7月7日,《抗战》与《全民》合并成《全民抗战》。10月中旬,武汉战局紧张,《全民抗战》迁重庆。

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

1938年,国民党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韬奋被聘请为参政员,7月初在汉口参加了第一次大会,以后在重庆又参加了几次会。他利用这个讲坛,与中共参政员相互配合,对于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的言行作坚决斗争。

1938年10月下旬,参政会在重庆开第二次大会。韬奋提出《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在审查这项提案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图书杂志审查事务的刘百闵却说,实行“原稿审查”办法,是根据第一次大会上韬奋的一项提案作出的。韬奋完全没有想到,居然会这样无中生有。他当即声明,在第一次大会上他的提案没有一个字提到什么“原稿审查”!经过力争,韬奋的提案在审查会上通过了,但“撤销”被改成“改善”,与原意不符。在大会辩论时,刘百闵又说“原稿审查”是王云五向政府请求的。韬奋不信,马上打电报给在香港的王云五。王回电说“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弟去年绝未向政府请求举办”。当时正是大会辩论的最后几分钟,韬奋宣读了电报,全场为之震动。他的提案不仅通过了,而且恢复了“撤销”二字。

但是,这对国民党当局没有任何约束。相反,书报审查更加严厉。《全民抗战》每期两万八千字,审查时被抽掉的稿件平均每期为四分之一,有时竟超过一半。社论常常被迫改写两三次。1941年皖南事变后,韬奋写的社论被扣,《全民抗战》“开天窗”抗议。2月10日前后,韬奋和夫人沈粹缜,从小路到曾家岩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22日,《全民抗战》被封。韬奋不能再在重庆活动了,于25日只身出走,3月5日到达香港,夫人沈粹缜带了三个子女于五六月间秘密抵港。韬奋一家在香港生活困难,范长江正在筹办的《华商报》给他预支稿费。4月8日《华商报》创刊之日起,连载韬奋的《抗战以来》,至6月底登完。5月17日,《大众生活》复刊号出版,出至新三十号,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停刊。

永远在人民中间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韬奋在“贫民窟”避难。1942年1月初，中共华南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指示，将韬奋、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转移至内地。韬奋一行，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于1月10日离开香港，13日到达东江白石龙镇。

由于国民党当局密令通缉，4月初韬奋到广东梅县江头村化名隐居。9月下旬，他又告别江头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险历程，穿过国统区、敌占区，于11月中旬到达苏中解放区。在解放区，他先后会见粟裕、陈丕显、黄克诚等同志，同陈毅军长（当时在安徽）几次通信，信中写道：“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不幸的是，病魔扑向韬奋。在江头村时发现耳病，曾用中草药治疗。1943年2月上旬，病情恶化，新四军军部派专人护送回上海，医生诊断为癌症，住院治疗。陈毅军长曾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治病问题。10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派徐雪寒同志专程来沪看望。韬奋写了一封热情的信请徐交华中局。信中要求赴苏北，说：“我死也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病床上，韬奋满有信心地对从桂林来的老同事徐伯听说：“希望病愈之后再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二三十年”，还说要办一个日报，以偿夙愿。1944年初，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提笔撰写《患难余生记》，计划写五章，因病情又恶化，写完三章便再也写不下去了。同年二三月间，陈毅军长亲自嘱咐徐雪寒再度来上海看望韬奋，韬奋激动地说：“我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党中央，请你代我起草一份申请书，请求党在我死后，审查我的一生行为，如果还够得上共产党员这样光荣的称号，请求追认我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徐雪寒很快就将代拟稿交给了韬奋。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仍然没有好转。6月1日深夜，又突然昏厥。2日，召集亲友口述遗嘱。但是，直到这个时候，韬奋还希望能为人民多做工作。他对夫人沈粹缜说：“等我病好了，我们就一定到延安去。在那里可以接触到许多新东西，学习到许多新东西。我要用这枝笔再好好为人民工作几十年。”但病情日益严重，7月21日嗓子失音。24日早晨7时20分，韬奋与世长辞，终年49岁。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韬奋家属，高度评价韬奋的一生，并表示：“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韬奋献身于事业,不治私产,却给中国人民——特别是新闻出版工作者,留下了丰富的珍贵遗产。毛泽东同志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种伟大的精神,贯穿在韬奋毕生的事业中。他主编了七个报刊,出版了几十种著译,多次总结过自己的经验,多次对新闻出版工作作过精辟论述,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继往开来的巨人之一。正如中共中央的唁电所指出:“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原载上海《新闻记者》,1984年第7期)

邹韬奋的报刊广告观

韬奋先生很重视报刊广告。在他主编《生活》周刊期间，曾亲自出马向外商拉广告。1932年3月5日，他在发起创办《生活日报》的文章中，提出了9项建议，其中第4项为“广告”，第3项与第5项为同广告有密切关系的“张数”和“销数”。1936年6月，《生活日报》创刊以后，他写了许多篇文章阐释办报的有关问题，其中多次对广告作了具体论述。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他写了22篇回忆生活书店历史的文章，其中5篇同广告有关。他的有关报刊广告的理解，是他办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韬奋先生所处的时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斗争错综复杂，有时会出现一张报纸有两种方针、唱两种调子的现象。例如，副刊提倡新文化，社论却鼓吹复古。韬奋先生反对这种分裂的现象，主张“言论、新闻和附刊，要打成一片，采取一致的态度”^①。广告，作为报刊的一个局部，当然也不例外。他办《生活日报》时指出：“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②将广告置于新闻、言论同等的地位，同样采取负责的态度，这是韬奋先生关于报刊广告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论及《生活日报》的广告时，韬奋先生还指出：“在广告的登载及选择上，生活日报也要显出它的特色。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③这里说的“特色”，同他常用的宗旨、方针、动机、目的、使命等词汇，含义近似。他一贯重视办报宗旨，从1926年10月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后，每创办一种报刊或每逢关键时刻，他都要旗帜鲜明地宣布办报宗旨。报刊各方面的工作都以实现自己的宗旨为出发点和归宿。广告必须遵循和体现宗旨，这是韬奋先生关于报刊广告的一个基本观点。

韬奋先生认为，《生活日报》的“特色”是“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

① 韬奋：《统一性》，载《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50号，1936年9月13日。

② 韬奋：《〈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载《生活日报》第55号，1936年7月31日。

③ 韬奋：《〈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载《生活日报》第55号，1936年7月31日。

利为最后目的”^①。这里,他说的是“最后目的”,即归根到底不是为了赢利。但是,为了维持报刊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对社会作贡献,在经营过程中是要力争赢利的。这也是韬奋先生的一贯的思想。早在1928年他就说过:《生活》周刊“因销数激增而广告涌进所得的收入,都尽量用来力谋改进本刊的自身,由此增加读者的利益,由协助个人而促进社会的改进”,“就是赚了钱,也还是要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②。后来,在1940年他又从这个思路出发,对报刊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这是事业性的含义,“但是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严格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是商业性的含义。他认为,这两者要兼顾,要统一起来,而不应对立。他还具体指出,出版事业有赚钱部分,有蚀本部分,除以赚补蚀外,还要提供发展资金。他说:“我们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能为了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③用这些论述来观察报刊广告,可以正确地认识它在报刊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即报刊广告是报刊整体事业中的一部分,它具有商业性,但必须服从事业性,在报刊宗旨设定的范围内经营,而广告业务的繁荣,又为报刊事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为了办好报刊事业,需要发展报刊广告,而报刊广告效力的强弱却有赖于报刊销路的大小,因此,韬奋先生主张“在销数上着眼”,这也是他关于报刊广告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说:《生活日报》“为保证广告之效力计,按时请会计师检查销数,正式公布,广告价格依实际销数而随之增加”^④。

韬奋先生关于报刊广告,还有一个多次重申的基本观点是,对于广告的内容要有所限制,广告在版面上的位置应划定。他说:《生活》周刊对于广告“限制非常的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

① 韬奋:《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载《生活》周刊第7卷第9期,1932年3月5日。

② 韬奋:《〈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1928年11月18日。

③ 韬奋:《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载《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④ 韬奋:《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载《生活》周刊第7卷第9期,1932年3月5日。

登”^①。——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正值 30 年代初，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高涨，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全国风行一时。《生活》周刊还连续四次免费刊登《国货介绍表》，分类介绍国货的品名、出品者。尽管《生活》周刊有这样不登、那样不登的限制，它的广告仍然很多，每期刊登五六十则以上，引起上海广告界的震惊。这主要是由于刊物办得好，销数大，同时经办人员得力，手段高明。《生活》周刊的广告也出过差错。1931 年 7 月 4 日、11 日出版的该刊第 6 卷第 28、29 期，连续刊载“上海女子中学招生”广告，随即发现这所学校正在向主管部门申请成立董事会，还没有立案。《生活》周刊第 6 卷第 30 期便停登这则广告，31 期（7 月 25 日）刊出《本刊重要声明》，说明事情经过，承认疏忽，表示歉意，并声明停登广告、“自愿牺牲广告费”。

在筹办《生活日报》时，韬奋先生又提出，该报“广告价格，以性质分类。如奢侈品则取费较日用品为高，婚丧则取费较谋事为高。拒绝大广告，提倡小广告。凡不忠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②。

在版面上，新闻、言论、广告各得其所，配置合理。韬奋先生说，《生活日报》“把广告的地位划定，勿使广告割裂了新闻，而结果却能使新闻和广告俱保持着美观”^③。他还要求该报在“新闻下面登性质相类之广告，使眉目分明，读者极易寻觅”^④。《生活日报》从 1936 年 6 月 7 日在香港创刊，至 7 月 31 日自动停刊，共出版 55 天。其中，每天 12 版的有 7 天，8 版的有 48 天。出 12 版时，广告约为 3.5 版；出 8 版时，广告约为 2 版。不论是出 8 版还是 12 版，有几个共同情况：一是头版没有广告；二是没有整版的大广告；三是广告一般在版面的边角或底部；四是有些广告，排在与文字内容相近的版面，如学校招生广告排在文教新闻版，书刊广告排在副刊版。这种格局，无疑同该报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使命有关，但在当时已是繁华商业都市的香港，一张自负盈亏的报纸，能做到这等地步，实在不容易！

办好报刊广告，需要有得力的经营管理人员，韬奋先生对于这一点深有体会。他感慨系之地说：“在上海报界做广告业务的，往往最初替报馆工作，等到发达，总是宣告独立自办公司，大发其财。我曾在上海几家报馆里做过事，亲见

① 韬奋：《生活史话》，载《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② 韬奋：《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载《生活》周刊第 7 卷第 9 期，1932 年 3 月 5 日。

③ 韬奋：《编者的话》，载《生活日报》创刊号、第 2 号，1936 年 6 月 7 日、8 日。

④ 韬奋：《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载《生活》周刊第 7 卷第 9 期，1932 年 3 月 5 日。

有几个广告界、‘大亨’，都是这样出身”^①。但是，在生活周刊社工作的徐伯昕^②，却“始终没有丝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终涓滴归公”^③，而且多才多艺，能拉广告，又会制作广告，还在工作中广结善缘，义务为客户设计广告。韬奋先生在赞扬了徐伯昕的事迹后说：“因此我们的广告多一家，便好像多结交了一位朋友，他们对于我们的服务精神，都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平日固然继续不断地登着长期的广告，遇着要出特号，需要增加广告的时候，只要伯昕先生夹着一个大皮包，在各处巡回奔一趟，便‘满载而归’”^④。在广告工作方面，也要“严守人才主义”^⑤，重用那种具有真才实学又专心办事业的人——这也是韬奋先生关于报刊广告的一个基本观点，徐伯昕正是体现这个观点的榜样。

以上所述，是韬奋先生报刊广告观的一个梗概。他对于报刊广告的论述，散见于许多文章之中，没有专著或专论，但在同辈的新闻工作者中，他在这方面的言论是较多的。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论述发表于 30 至 40 年代，也就是他在思想上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在报刊工作上已积累丰富经验的时期。因此，他的论述不仅切合中国报刊工作的实际，是可信可行的，而且在理论观点方面也是当时最先进的，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他有关广告的论述，为中国报刊广告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新闻大学》，1996 年春季号）

① 韬奋：《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载《生活》周刊第 7 卷第 9 期，1932 年 3 月 5 日。

② 徐伯昕：（1905—1984），出版家。江苏武进人。1926 年起，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1932 年，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历任经理、总经理。1944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文化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等处任职，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

③ 韬奋：《生活史话》，载《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④ 同上。

⑤ 韬奋：《正在积极筹备中的〈生活日报〉》，载《生活》周刊第 7 卷第 13 期，1932 年 4 月 2 日。

像邹韬奋那样热爱新闻工作

——纪念杰出的新闻记者邹韬奋逝世 40 周年

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工作，主编过七个报刊，写了几百万字的新闻通讯和评论，还出版了几十本著作。他热爱自己的职业，说这是“能使我干得兴会淋漓，能使我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1895 年出生在福建永安，1912 年起在上海念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地方是阅报室，上海《时报》上刊载黄远生写的“北京通讯”，每篇必读，他还大量阅读梁启超的政论文章，由此产生要当新闻记者的愿望。因为家境困难，他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利用课余时间做图书管理员、家庭教师，还经常向报刊投稿。1921 年大学毕业，1922 年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1926 年 10 月，担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走上职业稳定的道路，正式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生活》周刊于 1925 年 10 月创刊，以传播职业消息、进行职业教育为宗旨。出版的头一年，每期只印一千多份，大部分是分赠给职教社社员，没有订户，销售很少。邹韬奋担任主编后，立即进行改革，在他编的第一期刊物上就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他提出刊物要成为读者的“一位极好的朋友”，选用“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让作者（包括编者）同读者在刊物上“促膝谈心”。他认为办刊物就是“为社会服务”，因此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办好刊物上。写稿、编辑、校对、处理来信、接待读者，他样样都干，甚至还替读者代购书刊和衣物。他的努力，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支持。《生活》周刊的每期发行量 1926 年为两千八百份，1932 年达到十五万五千份，成为当时全国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1930 年，成立了“书报代办部”，1933 年正式建立了生活书店。

在旧中国，做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是极不容易的。利诱、威胁和诬蔑会凭空而来，生命也常常处于安危莫测的境地。邹韬奋在种种艰难险阻面前，从事新闻工作的意志始终没有动摇，手中的笔从未放下。

1932 年 1 月 9 日，邹韬奋宣布《生活》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并表示：“深刻认识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几天后，国民党当局派胡宗南找他谈话，企图强迫他改变立场，邹韬奋坚决表示：“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一个认清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立场上，对于中国的前途，我认为只有改变生产关系，而后可以促进生产力。舍此之外，并无第二条出路。”他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小时。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流言蜚语，说邹韬奋“发了财”，“造起大洋房了”，又说他是“国家主义派”，“已口头上答应加入”国家社会党。邹韬奋在刊物上公布这类说法，表示在任何诬陷面前“决不屈服”，并说“我认为挫折磨难是锻炼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机会”。

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10月，《生活》周刊被查封。然而，作为新闻记者的邹韬奋，在国外期间利用一切时机进行采访，不断向国内发稿，仅海外通讯《萍踪寄语》就有30多万字。1935年8月他回到上海，11月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出至1936年被封，他又被迫出走香港。但他仍坚持战斗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同年6月，在香港出版了《生活日报》——他主编的唯一的日报。8月，他回到上海一面主编《生活星期刊》，一面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1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7月31日才获释。在狱中，他整理了几十万字书稿，写完了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的《经历》一书。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他写道：“我二十年前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这时的邹韬奋，已经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出狱后不久就创办了《抗战》周刊。

新闻记者是个容易出名的职业。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一年多后，就有人“恭维”他。他一再在刊物上声明：“‘韬奋’不过是专用于本刊上的笔名，我个人不配著名，也不愿著名”，“只愿终其身做一个无名小卒”。然而，他毕竟出了名。到30年代，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华侨中，都享有盛名，以致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把他作为知名人士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是，邹韬奋仍然以新闻记者自居，勤勤恳恳地写稿、编刊物、处理读者来信。1938年10月，在生活书店《店务通讯》上发表的《韬奋自述》中，他写道：“我的生平志愿只是要做主笔，做新闻记者，目前被公推勉任本店总经理，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希望能早有同事接手。”这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主编《全民抗战》，直到1941年被查封。

“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邹韬奋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全民抗战》被查封，他又到香港恢复出版《大众生活》。香港沦陷后，他踏上艰苦的历程，经过游击区、国统区、沦陷区，于1942年11月抵达苏中抗日根据地。在这里，他特别高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

每天忙于参加各种活动,还积极为报纸写稿,打算办刊物。但是,不幸发现患有癌症,不得不于1943年3月秘密回上海治病。在病床上,他念念不忘要办一张日报,以偿夙愿。他忍痛撰写《患难余生记》,写了五万多字,由于病情加重而没有写完。6月,在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时,他还说病愈后要赴延安,“我要用这支笔再好好为人民工作几十年”。7月24日上午7时20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根据他临终的请求,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邹韬奋说过:“能视事业如生命,事业未有不兴的。”正是他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了热爱新闻工作、献身新闻事业的光辉典范。今天,为了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办成理想的新闻事业,需要大批像邹韬奋那样“视事业如生命”的新闻工作者。

(原载浙江《广播电视业务》,1984年第6期)

从《申报》的发展看 史量才的胆识与才干

史量才先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报业家。从1912年出任申报馆总经理到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22年中,他参与经营过多家企业,担任过多种职务,但始终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办报上,《申报》成为他“一生心血之所凝结”^①的事业。在经营管理《申报》的实践中,充分展现了他的胆识与才干,为中国报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史量才是一位深谙世态变故、足智多谋的人物。原先处于困境的《申报》,在他的主持下,不断壮大,即使遇到种种困难与艰险,也一一化解,退而能生存,进而得发展。以下,就此作一些粗略的介绍。

史量才主持《申报》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12年10月至1927年4月。

这时,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当道,连年混战,政局多变,而民主革命力量还很薄弱,讨袁失败后,正在重新组合。军阀统治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是残暴的,也是愚昧的。他们对报纸这种现代传媒并不熟悉,控制的手段也较为简单,即一手拉拢收买,给津贴;一手镇压,封报捕人。所以,只要不同军阀发生正面冲突,报纸还有活动的余地。史量才的“不偏不倚”中立态度和《申报》重新闻、轻言论的表现,正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是在乱世之中求生存、图发展的谋略。

然而,这时史量才也有麻烦和风险:其一是袁世凯派人要史量才支持恢复帝制;其二是席子佩搞突然袭击,控告申报馆拖欠薪金,史量才败诉,被判赔偿24.5万两银子(相当于申报大楼建筑费75万两的1/3);其三是主要投资者张謇、应德闳、赵凤昌要求退股,抽出资金;其四是在五卅运动期间因刊登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诚言”广告,受到爱国群众的冲击。所有这些,使史量才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他在处理时,头脑清醒,办法灵活,都得以妥善解决。如,他坚决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申报》在1916年元旦又按照上海日报公会的决议,在公元纪年下加上了“洪宪元年”字样,只不过特别小。这是一

^① 《史量才先生之生平》,见《申报月刊》第3卷第12期(1935年12月15日)。

种消极对抗的方式,换言之,也是一种委曲求全的妥协方式。至于刊登“诚言”广告,申报馆地处租界,有难言之处,但终究承认错误,切实改正,取得了群众的谅解。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史量才充分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除了筹款还债以外,他大量购进日本卷筒纸,又从美国购买新式印报机,还建造了报馆大楼,使他独力经营的申报馆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化、企业化的报馆。这正是他有眼光、有魄力、有办法的综合体现。

第二阶段是1927年4月至1931年9月。

以“四一二”政变为起点,中国开始走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①。在《申报》中出现“共匪”一类字眼,实属大局使然。《申报》虽然唱低调,但史量才仍在筹划发展。1927年购买了《时事新报》的部分股票,1928年发行量达14万份,当年11月19日出版两万号纪念特刊。在一派风光之中,史量才建立英美式报业托拉斯的构想也浮现出来了。作为实现这一构想的重要一步,就是1929年1月收购福开森的《新闻报》股票。新闻报股份公司共有2000股,其中福开森持有1300股,另700股为华董持有(包括汪伯奇、汪仲苇的数十股)。从外国人手中购回股权,本来是值得称赞的,却意外遭到强烈的反对,出面的是《新闻报》汪氏兄弟和部分职工,积极支持他们的是国民党当局。这场股票风波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此事却有一个明显的信号:英美式自由主义的办报路线在中国行不通。

史量才没有办成托拉斯,但改革、发展报业的雄心未变。他自己在事业上有进取心,同时也看重有事业心的朋友。1929年4月,他聘请戈公振为总经理助理,负责调查研究、调整机构和改进报纸等工作。热心于文化教育工作的黄炎培、陶行知,也成为他的挚友。他们常在一起讨论报纸工作。这种同气相求的交往,增强了史量才的胆识与才干。1931年初,他们商讨了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问题,同年9月1日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

第三阶段是1931年9月至1934年11月。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民族矛盾上升,全国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史量才和《申报》迅速改变了多年以来的低调附和态度,公开提出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申报》由此进入了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史量才也成了有广泛影响的爱国进步人士。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由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而停顿了的“纪念年”，于1932年底恢复进行。当年11月30日发表《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宣布了改进的方针与措施。这次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报纸的内容和版面，如新闻与广告的改进，副刊《自由谈》的革新等；二是出版书刊，如创办《申报月刊》、《申报年鉴》，出版《中国新地图》等；三是兴办社会文化事业，如开办新闻函授学校、流通图书馆等。这次改革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经验。

史量才一方面热衷于抓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非常投入。例如，他亲自为各个新设机构物色负责人，还亲自邀请他们就职。他同《申报年鉴》主编张梓生第一次见面时，只说了一句话：“新成立的部分，一切很难先定，经济无问题，当用便用。”原来他事先已了解张梓生是一位谨慎从事的人，可以不必多讲，放手让他干^①。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频频在公众场合露面，乐于担任会长、议长等职务，何以如此胆壮？他的回答是：“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②在抗日救亡活动中，他不仅同原先的朋友亲密合作，增进了友谊，而且接触了更多的群众，从而受到精神鼓舞。《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印证：“本报同仁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尤其本报以六十年悠久的历史，每月读者至少在百万人以上，更无异于为社会一架伟大的教育机器。如何运用这架机器？如何使这机器发生伟大的力量和伟大的效能？当然，绝对不是本报少数同仁所能胜任，而是需要着大众的伟力加以推进。”正是这种“大众的伟力”推进了史量才的胆识与才干。

史量才以自己的胆识与才干经营管理《申报》，使它的发行量从7 000份，逐步增长至15万份；使它从一张报纸，发展成为以报纸为中心的庞大事业群体。而更重要的是，在报纸改革、报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他本人走向进步的历程也成了一个历史的典型。

史量才是成功者。他之所以被杀害，不是他的失败或失算，而是蒋介石实行反动政策的需要，是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中国新闻工作者会永远记住史量才先生。

（原载《上海新闻界》，2000年第1期）

^① 张梓生：《个人记忆中的史先生》，见《申报月刊》第3卷第12期（1935年12月15日）。

^② 马荫良：《哭史先生》，见《申报月刊》第3卷第12期（1935年12月15日）。

有益的尝试

——关于王中同志新闻观点的提出及其意义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王中同志曾就报纸工作改革和新闻学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主讲了新闻学理论课。但是,王中同志对于新闻学的研究工作仅仅开了个头,《大纲》未及终篇,他的观点就被斥为“反动理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代表思想”,受到批判。这不但对王中本人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禁锢了新闻学的研究工作。今天,我们有必要、也完全有条件根据实事求是的方针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王中的新闻观点,努力促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工作繁荣起来,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是在“百家争鸣”中提出来的, 对报纸工作改革中提出的问题作了理论探讨

新闻学是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对于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应该从提出这些观点时的政治形势和新闻工作状况,来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1月25日,当时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处于高潮之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又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

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新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了。

新闻事业应该最敏锐地反映客观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促进各条战线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为了起到这种作用,新闻事业本身就要首先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从指导思想到工作方法,从宣传内容到表达形式,都应该有显著的变化。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有许多重要论述。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提出要“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报刊应当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①。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列宁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报刊的性质、任务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宣传方针。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指出: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后,城市中各方面的工作,包括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②。

建国以后,新闻事业在宣传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宣传了经济建设、科学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而从整体来看,宣传的重点是在阶级斗争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我们是缺少经验的。当时又不加分析地搬用了苏联的经验和做法,给我们的新闻工作带来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例如,有个苏联办报的人说过,“报纸上发表的稿件,应该百分之百的正确”。于是,我们的同志中也有一种论调说,“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应该百分之百的正确”。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但谬种流传,影响不小。在一个时期里,我们的报纸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严重,内容枯燥,形式呆板,没有自由讨论,甚至搞得像“布告牌”一样。这种状况当然不能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形势,必须进行改革。《人民日报》于1956年4月开始检查工作,7月1日改版,并着重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工作。其他各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也纷纷进行改革。

在这次改革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新形势下的报纸性质和任务问题,党报和党委、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指导性和兴趣性、知识性的关系问题,等等。这类问题,既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又需要作深入研究,从理论上加以回答。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着人们研究理论问题,各抒己见,自由讨论。在新闻界,在大学新闻系,在广大读者中,研究新闻

①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学、讨论新闻工作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空气活跃起来了。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主要有:新闻事业产生于社会需要;报纸具有两重性;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进行读者调查,考虑读者需要;指导性和兴趣性、知识性并不矛盾;按经济区域办报以及其他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与建议等。这些观点在“百家争鸣”中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于搞好报纸工作改革和推动新闻学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二、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有益于 加强新闻学理论建设

我国新闻事业,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不少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与直接参与下,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毛主席、周总理对新闻工作有大量的论述,亲自撰写和修改了许多稿件,党中央有许多关于新闻工作的指示和决议。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为建立具有我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基本条件。但是,我国在新闻学的研究方面,长期以来是落后的,这样的学科理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在我国传播,开始于20年代。那时,在党的文件和党、团报刊上,曾经多次引用或介绍列宁在《从何着手?》和《怎么办?》中关于党报的论述。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成了革命报刊努力实现的原则。在30年代的革命报刊上,已经出现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提法。到40年代,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党报工作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提出了许多具有我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和办报原则。例如,关于全党办报的理论、方针和措施,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理论指导我国党报工作实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的环境中,不可能组织力量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不可能解决建立独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问题。

新中国诞生后,引进了苏联的新闻学教学大纲和教材。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苏联的大纲和教材并不科学,而是机械地搬用马列辞句和苏共决议,再加上若干事例,内容贫乏,脱离实际。以此为蓝本讲授新闻理论,学生不愿听,教师也深感乏味。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建设我们自己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必须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总结我国历史上的和当前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同时也要批判地研究外国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王中同志是沿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他作了有益的尝试。他的新闻观点包含了若干特点。

第一,探讨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新闻事业是一种上层建筑,它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新闻事业也有其本身的特点,“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闻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王中同志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产生了新闻事业”,“它根据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而不是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意志。王中同志不赞成简单地把新闻事业说成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论断。他曾经一再说明,“新闻事业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观察,我还是说是社会产物,包括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意义”,“无产阶级的报纸,一产生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把王中同志的观点称之为“社会需要论”的话(其实,王中同志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归结为什么“论”),那么,这个“社会需要论”应该是正确的,而不能用作打人的棍子或压人的帽子。

第二,把研究办报和看报,即研究为什么办、怎么办和为什么看、怎么看结合起来。王中同志指出:“资产阶级新闻学把群众作为报纸的顾客,无产阶级新闻学则把群众作为报纸的主人”,“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写稿、做标题、安排版面,都要为读者着想,不仅新闻报道要适合读者需要,而且要让读者在报上讲话。报纸应该经常进行读者调查,了解读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王中同志的这些看法,同我们党历来强调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天下人的报”的思想是一致的^①。1940年,毛主席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曾经指出:办好报纸,“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同“社会需要论”一样,如果这个观点叫做“读者需要论”的话,它也是正确的,不能成为棍子或帽子。

第三,注意研究新闻事业的特点。王中同志指出,“新闻事业作为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和其他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能够成为阶级利益服务呢?”这就需要研究新闻事业的特点,研究新闻事业本身的规律。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新闻事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有其特殊的矛盾性;新闻事业中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又各有其特殊的矛盾性。王中同志是注意到对这些特殊的矛盾性的研究的,他认为报纸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和

^① 《致读者》,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社论。

言论来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报道什么,怎么写,什么时间见报,直至标题、版面,都有阶级烙印,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如果一张报纸新闻很少,言论照抄文件,那就不能成其为报纸了。

第四,重视对新闻工作实践的研究。王中同志研究新闻学,是从研究新闻工作实践入手的。他访问过一些新闻单位,同许多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不回避实际工作中的矛盾,对于报纸工作改革中提出的问题,他力求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

但是,王中同志致力于新闻学研究工作只有一年时间,他并没有完整地提出一个新闻学理论体系。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原拟写十多讲,后来只写了三讲。即使已经写出来的部分,也是初稿,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在讲课和参加座谈会时口头表达的意见中,不够成熟之处就更多些。王中同志是抱着在“百家争鸣”中参加讨论的态度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例如,关于报纸的两重性问题,王中同志最初的提法是工具性和商品性,以后认为不够准确,曾考虑改用宣传机关和企业、党性和人民性、A性和B性等提法。他试图用这些概念表达的基本思想是:“阶级斗争工具是必须结合着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发挥作用。”与此类似的个别论断和提法,我们都应该联系其基本思想加以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三、重新评价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 是为了促进新闻学研究

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工作,本来底子就很单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又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控制舆论大权,他们用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无产阶级党性,使党报成为帮报。他们全盘否定1956年的报纸工作改革,诬蔑那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新闻战线上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鼓吹“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弄虚作假,抄袭、篡改成了写稿的“诀窍”。在他们那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只有法西斯主义造谣术。在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夺回了舆论大权,新闻事业在拨乱反正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当前,新闻战线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在坚定不移地把宣传工作的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有大量的新课题需要作理论研究。恢复和加强新闻学研究工作,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不仅是正确处理历史问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需要。除了王中同志

1956年提出并着手研究的问题中,有不少今天仍然值得研究以外,还可以从有关王中同志的这个事件中引出研究新闻学的经验与教训。这里,略举几点。

第一,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在我们面前有大量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正由于它新,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可能一时看不清;新闻学的研究课题,一般都同现实政治有密切联系,可能一时“吃不准”。因此,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独立思考,深入研究,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新闻学是科学,需要大家来研究、讨论。片面的或错误的见解,在所难免,只能用平等讨论的态度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统一认识,不能靠作政治结论来解决问题。周总理说过:“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①周总理一再表示,他的意见允许大家讨论、商榷。我们在新闻学研究中,应该造成一种自由讨论的良好风气。

第三,重视调查研究。研究新闻学,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多多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从事新闻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更应该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学习。

第四,注意研究外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对于外国的东西,不能盲目照抄,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但是,谈“资”色变,不去了解外国情况,也不行。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研究外国的东西,并引为借鉴。

第五,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根本。毛主席说:“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②

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次生动的、具体的新闻学讨论。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推动新闻学研究工作蓬勃开展。

(原载《新闻学研究》(内部未定稿)第1期,复旦大学
新闻系新闻学研究室编印,1979年5月)

^①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王中对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贡献^①

各位前辈、各位老同学、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贺王中同志从事新闻工作 55 周年暨 80 寿辰，并且重温他的新闻观点，研究他的新闻学术思想。这不仅表达了在座各位对于王中同志的尊敬和爱护，也体现了在座各位对复旦新闻学院的关心和支持。我们新闻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衷心感谢各位的光临。

王中同志原来姓单，名勳，山东高密县人，1914 年出生，1935 年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1936 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改名王中，在东北军中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940 年转移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山东滨海区《农民报》总编辑，《鲁中日报》总编辑，山东《大众日报》编委、通讯部副部长，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主任，济南《新民主报》编辑主任等职。1949 年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室军代表、秘书股长，参加新闻出版系统的接管工作，同时参加华东新闻学院的创建工作，担任学院教务长。1950 年调至复旦大学，任教授、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他主讲政治课，生动活泼，常常笑声满堂，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觉悟。

在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王中担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副教授兼新闻系主任等职。他尊重专家学者，重视团结知识分子。1956 年 10 月 1 日，《文汇报》在上海恢复出版，当天发表他用“张德功”这个笔名写的杂文《治学与为人》，就是采用陈望道先生的话，演绎成文的。他经常向陈望道先生请教，可以说是诚心诚意，毕恭毕敬。

1956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改版，标志着一次规模宏大的新闻改革运动的开始。就在这个时候（7—8 月间），王中率领新闻系部分教师赴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访问，研究新闻改革的经验和问题。回来后，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主讲《新闻学概论》课。他重视研究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启迪人们思考的新闻理论观点。如，报纸不是阶级斗争斗出来的，而是在一定

^① 本文是 1993 年 4 月 24 日在复旦大学《祝贺王中教授从事新闻工作 55 周年暨新闻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办报要有读者观点，满足读者需要；党报具有两重性——工具性和商品性，等。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办经济区域报纸。他认为人们除了政治生活以外，经济、文化等生活都是以交通、文化、经济中心的城市联结周围，像苏南有些城镇的群众就要看上海的报纸，由中心城市联结周围农村，报纸在中心城市出版，发行快，内容丰富，与人民经济文化生活更贴近，不至于成为刊登文件的“布告牌”。王中的这些新闻观点和主张，是为当时的新闻改革开路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新闻改革理论家，在理论探讨上，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1957年10月16日，在上海市第十三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问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他归纳为六条：（一）提倡要根据报纸的特点来进行宣传，反对报纸和内部文件不分；（二）提倡通过新闻和说理来指导工作，反对直接地简单地讲“必须如此”、“应当如此”；（三）提倡通过宣传大多数人感兴趣、有需要的东西来指导工作，反对只是面向少数干部；（四）提倡多做调查，分析社会状况和读者对象，分析读者关心的事情及其同各方面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消极等待上级指示；（五）提倡报纸上应有对读者有用、但不是直接从事政治宣传的东西，反对机械化、绝对化、一切非政治性不可的倾向；（六）提倡报纸上不光登政治材料，还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反对像苏联报纸那样，尽登大块文章，不同意苏联教材中把报纸说成是刊载时事政治材料的定期刊物。

王中是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的。此后，曾一度在我系的新闻史教研室工作。他伏案读报，研究了“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撰写了《〈民立报〉等报的“迂回宣传”》、《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等论文，材料厚实，有独到见解。

1963年王中调到复旦教学科学部任自然科学教学组组长，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右派”帽子，虽然在1960年就摘掉了，但在“文革”期间又被戴上，作为“大右派”被批斗，身心遭到摧残。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右派”问题于1979年1月得到改正，恢复了职称、职务和待遇。他在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的同时，又主持创建复旦大学分校，担任校长。他作为著名的新闻学家，被聘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1981年，他力主创办《新闻大学》杂志，并撰写了《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等一系列论文，深化了他的新闻观点。

王中具有多年新闻工作实践的经验，又有多年从事新闻教育的经验，所以，他在新闻教学和研究中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并富有创造性。他主持复旦新

闻系工作,在办学思想和办学方法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这方面,我们有切身感受,但缺乏系统研究。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很可称道的。

第一,把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放在首要地位。1956年他在新闻系“蹲”下来,首先就抓这一点。他自己带头研究新闻理论,主讲《新闻学概论》课。他认为,新闻理论应该成为新闻实践的先导,报纸一有行动,我们就能看出它的性质、目的和发展方向。

第二,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功的训练。50年代他抓青年教师的培养,有几个做法给我们印象很深,一是要每个青年教师写一篇“党与党报”的论文;二是经常召集青年教师在一起议论各种问题;三是鼓励青年教师上讲台。80年代初,在他的支持下,新闻系还采取过青年教师写文章、老教师讲评的做法。王中重视学生的文史知识学习,《中国古代散文选读》这门课程,就是他主张开设的。

第三,提倡独立思考,鼓励有创见者。他对于学生写的有创见的文章,特别喜欢。有的因此被他提名留校当教师。他还打算开一门“毕业论文写作”课,可惜没有实现。

第四,注意学习、运用新知识。对于新鲜玩意儿,他特别感兴趣,从新知识到新产品,他都喜爱。他在讲课中引用的事例,大都是新鲜的。1957年初,他就引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知识。在他主持下复旦新闻系的《新闻学译丛》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介绍外国新闻学说的刊物。1978年,又在他的建议下,复旦新闻系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课程,还出版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这个不定期刊物。

这几点,如果认真研究总结的话,我想对办好新闻学院一定会有很大帮助。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祝王中同志健康长寿!

(原载《新闻大学》,1993年秋季号)

新闻传播学研究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①

一、缓慢行进的历程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产生的。目前公认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于1815年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创办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于1834年3月发表的《新闻纸略论》,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刊的文章,全文只有300多字,简要地介绍了西方报刊的历史与现状。这时,外强中干的清王朝,对于外国人来中国办报、传教,采取排斥态度。外国人办的报刊很难在中国传播,只能在中国沿海的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秘密散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作为征服者,大量涌入中国,介绍西方报界情况的新闻报道和文章,经常在中文报刊上出现。中国知识分子成为近代报刊的读者,逐渐了解到报刊的性质与功能,有些人还参加了外国人创办的报刊工作,他们从切身体验中看到报刊的重要作用,学会了办报刊。当着“救亡图存”活动兴起的时候,报刊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手里的重要工具。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领袖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亲自领导过报刊工作,发表过许多有关报刊工作的见解,其中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就是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因此,人们在考察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历史的时候,需要重视这个事实: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中,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兴邦的改良浪潮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连绵不断,报刊成为其中最活跃、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所有报刊,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同政治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闻工作实践中注重政治目的,在新闻学研究中强调政治因素,成为不可抹煞的时代特征。中国新闻学研究在政治风云变化中,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进展缓慢。

^① 本文是1991年2月28日在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演讲的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萌芽阶段。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康有为,在1895年提出“设报达聪”的主张,他认为创办报刊能使“百官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翌年,他的学生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去塞求通”论。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报刊能通上下左右,所以“报馆有益于国事”。在中国新闻史上,梁启超第一次提出报刊能起耳目喉舌作用。尔后,他多次发表论述报刊工作的文章,在报刊的性质与作用、报刊优劣标准、报刊宣传艺术等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学识渊博,既采用中国的传统观念,如古代的采访民风习俗,又引述了西方的近代观念,如报刊应成为政府的监督者和国民的向导者。

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松本君平著作《新闻学》的中译本,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1913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美国记者休曼所著《实用新闻学》的中译本。这两本书的问世,预示中国新闻学研究将进入系统化的理论探讨阶段。

1915年9月,陈独秀(1879—1942)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的揭幕。形形色色的西方学术观点,都作为新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新闻学也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一门新学问,1918年10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机构,也是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它的出现,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个研究会担任主讲教师的有著名的记者邵飘萍(1886—1926)、著名的新闻学者徐宝璜(1894—1930)。1919年,徐宝璜出版了他的讲稿《新闻学》,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该书《自序》中,徐宝璜写道:“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及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这些话符合该书的实际,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水平。研究会还创办了《新闻周刊》。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阶段。在这10年里,有1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新闻系或报学系,其中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新闻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新闻学研究的前进。一些影响较大的新闻学著作,如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就是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是第一部中国新闻事业的通史专著。这本书既写了报纸、杂志的历史,也写了通讯社、新闻业团体、新闻法和新闻教育的历史,从汉唐报史资料写到成书之前中国新闻界的现状,材料丰富,立论鲜明。该书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分期等方面,具有创见,至今仍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作者戈公振

(1890—1935)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学者,曾在上海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新闻系任教。这本书就是他的教材。

在20年代,还成立了一些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出版了一批新闻学书刊。1927年1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同时创办《新闻学刊》,1928年改组为中国新闻学会,迁上海。1927年,《纽斯》杂志在天津创刊。1929年,《言论自由》杂志(上海报学社主办)和《报学杂志》在上海创刊。出版新闻学书籍的,有书局,也有报馆。如,上海北新书局的《新闻事业与社会组织》,上海世界书局的《中国新闻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新闻学撮要》,上海中华书局的《新闻编辑法》,上海光华书局的《中国的新闻纸》,上海时事新报馆的《最新实验新闻学》,上海时报馆的《世界报纸大观》,等等。总计在30种以上。

列宁的报刊思想,从20年开始在中国传播。1922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文章说,“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第15期《敬告本报读者》)。1923年6月,《新青年》杂志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瞿秋白(1899—1935)执笔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写道,本刊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从这些文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列宁办报思想的体现。1929—1930年,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布尔塞维克》杂志,发表了列宁《从何着手?》一文中有关党报的论述。“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名言,从此开始被反复引用。这对此后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学研究,都有巨大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争的磨难。新闻学研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时断时续,但仍在缓慢地进行。在这个阶段,出版新闻学书籍约100种以上,其中有综合性的《现代新闻学概论》、《综合新闻学》等,而数量居多的却是分支学科的和专题性的,如《新闻文学概论》、《编辑与评论》、《报业管理概论》、《新闻采访学》、《新闻与速记》、《街头壁报》等。

交流新闻工作经验、研讨新闻学术的专业刊物,也陆续出版。如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的《记者周报》(1930年)、上海申时电讯社的《报学季刊》(193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学研究》(1935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新闻记者》(1938年)、浙江省新闻记者协会的《战时记者》(1938年)、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学季刊》(1939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的《新闻战线》(1940年)、山西省新闻记者协会的《战地记者》(1940年)、《中央日报》的《报学》(1946年)和《报学杂志》(1948年)等。一些报纸也在版面上开辟新闻学专刊,如上海《大晚报》的《记者座谈》(1934年)、第三战区《前线报》的《新闻战线》(1940年)、延

安《解放日报》的《新闻通讯》(1942年)等。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广泛传播及其中国化,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从1931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农村根据地创办新闻事业,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在1942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中,以延安《解放日报》为中心,进行了新闻工作改革。一方面发表了许多社论,文章和文件,对于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报纸的党性、“全党办报”的方针、新闻的本源、新闻真实性等,作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阐释;另一方面又采取具体措施,如调整版面、发展通讯员等以改进新闻报道工作。1947年和1948年,新华通讯社也多次发表过有关新闻工作的评论,主要涉及新闻真实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作风问题。1948年4月2日发表的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10月2日发表的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观点的两篇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传统从此走上成熟发展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观点也从此较为系统化了。

邹韬奋(1895—1944)的报刊思想也是令人瞩目的。邹韬奋于1926年担任上海《生活》周刊主编,开始这个刊物只印刷一千多册,影响很小。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刊物迅速发展,30年代初达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它的主要方针是为读者服务。比如,它无偿地为读者代购书刊,为此成立了书刊代购部,随后又扩大成为生活书店。这家书店在国内曾经拥有50多家分店。1936年,邹韬奋提出,理想的报纸应该成为“人民的报纸”,它必须“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必须是全国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必须由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直接提供言论和新闻资料”。他还就新闻、评论、编辑、广告、管理等方面,作了理论分析,提出了具体主张。他的理论观点,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广大的新闻工作者。

二、新体制与新课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新闻体制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它包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新闻事业网和新闻行政管理系统。在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的1950年,全国(除台湾省外)有报纸382种,总印数79752万份;杂志295种,总印数3530万份;广播电台65座(不包括县广播站),新华通讯社在各大行政区设总分社,各省设分社。行政管理机关在中央为新闻总署,大行政区为新闻出版局、省(市)为新闻出版处。实现了对所有新

闻事业机构的统一领导和有效管理,是新体制的特点。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新体制,显然不同于1949年以前中国的新闻体制,也显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闻体制,这是不用说的。它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也不完全相同,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例如,它是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新政权建立后一切从头开始的。在革命根据地(后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长期领导新闻工作,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闻事业网络,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进入大城市后,吸收了多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能够迅速建立机构和秩序。

完善和发展这种新闻体制,办好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成为中国新闻工作实践的基本课题,也是中国新闻研究的中心课题。因此,对于各种现实问题作理论探讨,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同时,对于新闻理论、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也开展了研究。从1949年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新闻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经历了起伏波折。

1949年至1952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处于重新起步的态势。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1952年撤销)设有研究室,发表过研究文章。北京《人民日报》从1950年1月4日起,开辟《新闻工作》专刊(双周刊),共出15期,以后停刊,但《人民日报》仍经常刊载评述报纸工作的文章。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编辑专业(后改名新闻专业),着手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和讲义。

学习苏联,是从起步时就强调的。《新闻工作》双周刊创刊时就表示:“在讨论我们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便利的条件,这就是可以大量地利用我们的先进国家苏联的经验……本刊愿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方面,作有系统的努力。”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人们更急切地希望学习苏联经验。于是,请来了苏联新闻学专家,翻译出版了苏联新闻学教材,甚至大学新闻系的课程也按苏联的模式加以改造,如将《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报纸群众工作》三门课合并为《新闻理论与实践》一门。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理论与经验,无助于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发展。更何况苏联当时的新闻学著作,并不能构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有些苏联教材,只是领袖语录、苏共决议加上若干事例。运用这些著作和教材上课,学生不愿意听,教师也感到索然无味。

1956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改版——从四个版改为八个版,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明显的变化,主要是扩大了报道面,开展了自由讨论和改进了文风。其他各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均以《人民日报》为榜样,纷纷进行改革。一个全

国性的新闻改革热潮由此出现了。在改革中,提出了许多新鲜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得到解释,例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的报纸的性质与任务,读者、党委和报纸的关系,指导性与兴趣性,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社会新闻,中国报纸的传统,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在报刊编辑部的会议中,在新闻专业刊物上,在大学新闻系的课堂里,都有热烈的争论。人们探讨理论的兴趣浓厚起来了,使1956年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最为活跃的一年。这一年新办的新闻专业刊物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5年建系)的《新闻与出版》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学译丛》,新华通讯社的《新闻业务》等。

1956年新闻改革的目的在于,探索办好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道路。与之相适应的新闻学研究,就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而作的尝试,大学新闻系教师自编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目的也在于此。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并在讲课中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他主张,新闻学应该研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新闻规律。他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重视读者需要;报纸具有“两重性”——工具性与商品性(或A性与B性),即既作为宣传工具又要满足读者需要。王中教授的观点,引起了新闻界的热烈讨论。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新闻学研究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王中教授作为“错误理论”的代表人物而被批判。但是,新闻学研究并未停顿。50年代末60年代初,仍然出版了一批新闻学著作和教材,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报刊评论文选》、《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等。1957年12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创办《新闻战线》杂志,作为研究新闻理论、交流新闻工作经验、探讨新闻业务问题的园地。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江西大学、杭州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等十多所高等学校,陆续创办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扩大了新闻教学与研究队伍。江西、河北等省,还分别成立了新闻学会,作为学术研究团体。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学术团体停止活动,专业学术刊物停办,新闻学术研究不能进行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都抓住新闻工具,他们没有提出像样的新闻观点,只是反复强调“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要老生常谈”,“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他们利用新闻工具,为他们的活动制造舆论。他们在全国造成“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千报一律的局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新闻学研究逐渐恢复。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新闻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80年代的进展

(1) 机构和队伍的形成。在中国,研究新闻学的基本力量历来是高等学校新闻系师生和新闻界人士,此外没有专设的研究机构和专职的研究人员。即此一端,可以说明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不很发达的。到80年代,情况出现显著的变化,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闻学研究网络形成了: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新闻研究所,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专设的新闻学研究机构;随后,一些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新闻研究所;各新闻单位也成立了研究所(室)。除此还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新闻学会。高校新闻系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

(2) 出版物的兴旺。80年代出版的新闻学书籍有1000种左右,约为1903年至1979年出版总和的一倍。这些书籍中,有专著,有成套教材,有各国新闻学译著等。新闻刊物亦空前活跃,有数十种之多。

(3) 学术研讨活动进一步开展。1979年7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新闻理论教学座谈会,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首次全国性新闻学术会议。此后每年都有多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活动,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题性的。有些学会,还建立了举办理论年会的制度。除此,中国还多次举办有中外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如1981年11月的中国澳大利亚新闻讨论会(北京),1984年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协助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新闻界领导人圆桌会议(上海),1985年的传播学国际讨论会(上海)等。这些会议,不仅切磋了学问,又增进了友谊。

(4) 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早在194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就建议中国开设“公共关系”教育,但是,条件不成熟。过了30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研究公共关系学,并且发展很快,许多大学新闻系都开设了这门课程,一些研究机构也将它纳入了研究范围。

“传播学”这个名称,中国学者在1956年开始引用,复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译丛》曾将Communication一词译为“群众思想交通”。但是,传播学的研究过了20年之后才真正开始。1978年,复旦新闻系首次开设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以后,全国陆续出版了多种中外学者传播学著作,并召开过多次研讨会,传播学逐渐普及。宣传学,中国在20年代后期已开始研究。30—40年代出版过《实用宣传学》、《综合宣传学》、《宣传心理研究》等著作。也是过了几十年之

后,到80年代才重新开展研究。此外,新闻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社会学、新闻伦理学、广告学等,都逐步涉及。新闻学研究推动了这些相关学科的发展,而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丰富了新闻学的内容。

(原载《新闻大学》,1991年夏季号)

加强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建设

同文、史、哲各门基础学科相比较,新闻传播学是后起的学科。因此,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状况。

19世纪末,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学习西方、创办报刊的要求。他们对于报刊的功能与价值作了理论阐释。特别是梁启超,提出了国家应“去塞求通”,报刊是“耳目喉舌”等卓越见解^①。但是,那时还没有把新闻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中译本,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这本书一问世,立即引起一些中国报人的关注。郑贯公^②认为,由此书“足见办报一业,须有一种学问”,“夫学问既无,眼光何有?”在我国,这是最早提出需要研究新闻学的建议。1918年蔡元培为会长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这是我国研究新闻学的开端。

1919年,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③的《新闻学》^④出版,这是中国人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这部书写的序中,称它是“破天荒”之作,并明确指出新闻学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20年代,我国一些大学陆续设立报学系(新闻系),教学的需要直接推动了新闻学研究。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既是专著,又是教材。30年代和40年代,我国经历了多年战争,研究条件极为困难,在国民党统治区,新闻学研究的成果不多;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延安《解放日报》于1942年到1945年间,结合整风运动进行新闻改革,同时对于新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党性、真实性、新闻定义、新闻本源、新闻工作者的修养等,作了具体阐释,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准备了基础条件。

5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人们忙于各项实务,新闻学研究

①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载上海《时务报》1896年第1册。

② 郑贯公(1880—1906),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在香港《中国日报》任职。

③ 徐宝璜(1894—1930),江西九江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副会长。

④ 《新闻学》一书原系徐宝璜的讲稿,曾以《新闻学大意》为题发表在1918年《东方杂志》上。191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书名为《新闻学》,1930年改名《新闻学纲要》,由上海现代书店出版。

相对滞后；中期，一度“学苏联”，都是语录加例子，索然无味，毫无理论活力。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大好形势下，新闻工作改革之风吹遍全国。《人民日报》于当年7月1日改版，不仅在报纸工作改革的实践上起了榜样作用，而且还提出或重申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如“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日报》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等^①。新闻理论探讨与新闻改革相伴而行，相得益彰。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系主任王中教授主持下，也在改革教学的同时，开展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一方面组织访问团去一些省市向新闻工作者和读者作调查，了解他们对于新闻工作的意见与需求；另一方面，王中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②，并按照这个大纲讲课。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在制订改革方案时，对于几种主要的外国报纸也作了研究，其中有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日本《朝日新闻》、法国《人道报》等。我们复旦新闻系也对国外新闻工作和新闻学开展了研究，1956年创办《新闻学译丛》，既介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也介绍美国、日本的报纸版面和新闻学著作。Mass Communication 这一辞语，在《新闻学译丛》上出现，译文为“群众思想交通”；在王中的讲课中也出现，译文为“群众交通”。应该说，这是我国最早引用传播学知识。但在1957年下半年至1977年间，这一辞语在我国的出版物上消失了。

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在中国新闻学理论建设中，是有积极作用和学术价值的。它突破了照搬苏联教材的教条主义束缚，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新闻理论。这个大纲提出：新闻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社会需要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报纸具有两重性，即阶级性和商品性，既是宣传工具，又是社会商品；办报要有读者观念，重视读者需要等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正确的，至今仍为全国新闻学界所重视，仍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60年代前期，新闻学研究的重点转为整理马恩列斯有关新闻的论述和阐述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复旦新闻系提出了编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系”的设想，编辑了《马恩列斯论报刊》等书。但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新闻学研究立即停止，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得以恢复。

^①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社论：《致读者》。

^② 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在1957年曾作为批判材料，内部印发。1986年12月，《新闻研究资料》第三十六辑重新发表。

应当承认,从1949年到1976年间,新闻学研究进展缓慢,没有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学科理论体系,也没有耀眼的学术著作。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虽有新意,但毕竟只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不完整的理论框架,却也在“批判”声中被湮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迅速贯彻,使新闻学研究的那种不正常局面也得以迅速改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鼓舞下,从新闻学研究者到新闻工作实践者,众口一声认定新闻传播有自身的规律,应该形成本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国新闻工作实践有丰富的经验,应该上升为理论;中国新闻工作实践需要新闻理论指导。8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研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以下,列举一些新情况,以资说明。

其一,学术空气活跃。

此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新闻学是一门不起眼的小学科,甚至还有人认为“新闻无学”或“有术无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看法,除了一些人不了解实情和有某种偏见之外,主要是由于新闻学科研究力量薄弱,成果少。这也难怪研究与教学人员。新闻学历来被指认为“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突出政治”的年代,要写出有特点的、学术水平高的著作来,谈何容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顾虑消除了,精神振作了,思想活跃起来了。新闻学研究的转机最早凸现在学术讨论上。在70年代末尾的一年多中,不同见解的争鸣就出现了,从那时到80年代末,讨论了许多问题,如新闻与宣传问题、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问题、新闻价值问题、典型宣传问题、新闻真实性问题,等等。90年代以后,又讨论了新闻传播与市场经济问题、新闻法制问题、新闻策划问题,等等。各次讨论,既有理论探讨,也有经验交流,既生动活泼,又出成果。

其二,新闻学的充实与更新。

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我国教学与研究领域中的新闻学,以当代的观念来看,是传统的新闻学。具体说,早期是学习西方的传统新闻学,它的特点是以研究报纸为中心,以研究采、写、编业务为重点,如徐宝璜、邵飘萍的著作。50年代,引进了苏联的新闻学论著与教材,那是有浓厚的政党学说色彩的新闻学。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学研究在逐渐地、平稳地发生变化,由传统新闻学朝着现代新闻学的方向演进。这种变化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若干特点,如从研究以报纸为中心的新闻事业转为研究新闻传播现象;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研究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特征及其自身的运行规律;综合运用多种学科(传播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信息学、经济学等)的成果。新闻

学中原有的分支学科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内容都有所更新,又新增了广播电视新闻学、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等,学科内涵比以前丰富得多了,研究的方法也在更新,开始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与定性分析的方法并重。

其三,传播学研究的开展。

在1978年和1979年,已经有人提及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而开展研究却是在80年代。1978年10月21日,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在复旦新闻系的学术报告,介绍了日本研究大众传播学的情况。1980年,复旦新闻系开设了《西方新闻学说介绍》课程,评介西方新闻理论,其中包括传播学。1981年上半年,这门课程改为《传播学概论》,同年年底就国外传播学研究情况及我们的打算向中央有关部门打了报告,1982年1月13日,该部门复函表示支持开展研究。就全国而言,这时有些单位也在积极开展传播学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合作,于1982年6月至8月在北京地区开展抽样调查,同年11月该所主持召开了全国首次传播学讨论会。

近年来,传播学研究在全国广泛展开,出现了不少专著,还有专门的刊物,传播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大众传媒、受众、信息反馈等,已成为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抽样调查)都有了不少成果,在我国的新闻工作改革和新闻教学改革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其四,发达的边缘学科与边缘课题。

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运用多种学科知识作综合研究,因而它的相关学科、边缘学科很多。如新闻媒介管理学、大众传播社会学、新闻心理学等。还有更多的边缘课题,正在研究的有新闻传播与市场经济、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新闻与法制、新闻与伦理、新闻与美学等方面的边缘课题。各种学科的互动互补作用,使得新闻传播学科呈现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

其五,研究机构与队伍的壮大。

70年代以前,新闻学的研究力量主要是高等学校的新闻系科,全国仅有四五家。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新闻研究所,它是建国以来成立的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接着,一些地方的社科院或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会建立了新闻研究机构,如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新华社和许多报社,也纷纷建立研究所(室)。而高等学校新闻教育发展更快,80年代新建了一批新闻系。到90年代,全国设有新闻院、系或专业的高校达50多所,专业点100多个,专业教师1000名以上。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新闻单位三个方面汇合组

成新闻学科的研究队伍。这样强大的新闻传播研究力量,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还成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出版了《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学术刊物。

其六,领导重视,多方参与。

由于新闻宣传与大众传媒的发达,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的加深,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作理论阐释,实践呼唤理论,因而新闻传播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党政领导、新闻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国共产党有重视新闻宣传的历史传统,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到江泽民,以及其他领导人,专门对新闻宣传作过许多批示和讲话,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许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资深编辑记者,积极参与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虚实结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还建立了学术部和学术委员会,设立了学术奖。

各种情况、诸多因素集中到一点,就是出成果。在著作方面,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出版新闻学著作不足1000种,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著作,有1000多种。20年超过70年。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的著作中,有些质量相当高,如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史》,在新闻史学科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在人才方面,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学术梯队,已经初步形成。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活跃在研究的第一线上,朝着理论与实践并重、学贯中西的方向发展。

学科建设的进步,获得了社会和政府的承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5月决定将原属二级学科的新闻学,拓展为一级学科,定名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原有新闻学博士点2个,1998年增设新闻学博士点1个、传播学博士点2个。编辑出版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也进入了新闻传播学科的行列,这些学科都有宽广的前景。

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新闻传播学毕竟是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积累不多,基础单薄,从基本概念到理论体系都有待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完善。为此,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学科建设,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就基本思路和基本工作方法而言,我认为以下各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把理论建设放在首位。

新闻传播学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必须有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准确的、公认的基本概念。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科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某些基本概念还有争议,有的分支学科理论

框架还不完整,对于实践中的一些经验与问题还没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这些都是学科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学科建设的中心是理论建设,它必须始终置于首要地位。

新闻传播学科理论建设的重点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新闻事业和传播事业的经验,探讨在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新课题,把握全球新闻与信息技术发展的总趋势,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有利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文章与讲话中论及新闻传播的相当多,不仅有方针政策的阐释,也有实践经验的概括,还有上升为理论观点的精辟分析。例如,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中,着重论述导向的问题,他提出了新闻舆论的性质与作用,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的论断。这种生动而深刻的见解,应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既跟踪实践,又为实践中的创新开路。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学术研究取之不尽的资源。建立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是一种伟大的创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搬用,一些国家留下来的是失败的教训,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加重了理论研究的任务。我们应该认真、深入地研究本国的新闻传播的实践经验和问题,实践每前进一步,都要及时收集材料,作出理论分析。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正在改革中前进,有不少举措,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为其鸣锣开道,助其贯彻实施。例如,今年各地正在组建报业建团,这是新闻改革的重大举措,我们应该及时作理论探讨,评介我国历史上组建报业集团的经验教训,评介外国报业集团的历史与现状,论证我国组建报业集团的条件、办法与政策。理论研究以实践为基础,又从实际需要出发,发挥引导实践的作用,这才是既扎实、又有创造性的理论研究。

第三,及时了解与研究国外的有关情况。

新闻学、传播学都是“舶来品”,是从外国引进的。新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20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传播学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4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我国对于新闻学的研究,虽然起步很早,但由于长期闭塞,至今并不了解外国新闻学研究的全面情况;传播学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研究的,时间不长,仍处在起步的阶段。我们只有及时地对外国情况作充分的了解与分析,采取正确的对策措施,才有可能在学术上“后来居上”。特别是美、日和欧洲发达国家,拥有庞大的大众传播业、先进的传播技术

和众多的研究机构,我们从它们那里能够找到为我所用的东西。

第四,注重多学科结合,多学科协作。

新闻传播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有独立的学科体系,但它是在吸取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法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应用经济学、心理学、信息学等等,都为新闻传播学提供了养料。我们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该搞“多边外交”。可以请哲学家来同我们一起推敲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请语文学家来同我们一起推敲新闻文体理论,请历史学家来同我们一起评价新闻传播史著作,如此等等。我们还可共同建设新的边缘学科,共同研究边缘课题。当然,我们的主要目的仍在于运用各学科的成果来充实、发展新闻传播学。

第五,改进研究方法,更新研究手段。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加强了量化研究,有些单位还建立了社会舆论调查机构。虽然还存在抽样不够科学、数据尚欠准确等问题,但毕竟给新闻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新方法。今后我们还要从多方面继续改进研究方法。例如,把外国广泛采用的抽样调查、问卷调查,同我国历来采用的个别访问、口问手记、开座谈会、蹲点调查等传统方式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选用适当的调查方式。上海市交通便利,还可以建立稳定的受众调查网络。当然我们还要注意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

关于研究手段,我们学校是比较落后的。全国许多报社都实现了两个告别——告别铅与火,告别纸与笔。我们还基本处于手工操作时代,研究手段亟需更新。

总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中,新闻传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具备了继续发展的良好基础。今后,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在信息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将出现新的发展局面,我们应采取积极行动,认真准备,促其实现。

(原载施岳群、周斌主编《与历史同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切实发挥党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政治优势。为了在新形势下继承这一传统,发挥这一优势,中共中央于1999年11月初发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对新闻媒体提出了要求:“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增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大力弘扬社会正气。”这是党中央交给新闻媒体的重要任务,也是党中央寄予新闻媒体的厚望。作为新闻媒体之一的党报,应该带头贯彻执行。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党报既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更有长期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理应将这一工作做得更好;同时,社会各界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要善于读好、用好党报,切实发挥党报的舆论导向功能和喉舌作用。

党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特点

党报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是大众传媒,是广大群众与之天天见面的读物。党报通过新闻、言论与副刊(专刊)、广告,去影响群众、引导舆论,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之一。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其他阵地(如讲演、研讨会、展览等)及其他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书籍、专业报刊等)一样,党报并不是以强制性的方式灌输大道理,而是以传播信息、传播思想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党报也显示出自身的特点——

1. 广泛性

党报作为大众媒介,它面向社会发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丰富的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①党报遵循这个基本原则,最广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种种思想和意见、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使

^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大家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团结奋斗。

2. 时效性

作为新闻媒介,党报的新闻与言论,力求新鲜、及时和有效。读者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了解时事,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3. 深刻性

党报贯彻“政治家办报”的方针,注重总揽全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社会现实作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报道与评论。对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和社会问题,作科学的合情合理的阐释,力求做到局部与全局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协调。

4. 权威性

党报的权威性来自党的权威性。中共中央曾明确规定:“党委机关报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该把它们机关报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从政治上、组织上用大力健全和充实自己的机关报”,“党的机关报由党委书记之一直接加以领导,在重要问题上及时给以指示”^①。党报按照党委的要求作新闻报道与宣传,因而为人民群众所信赖。

党报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宣传

思想政治宣传是党报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之一,这是党报——党的思想政治宣传阵地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岁月,都是如此。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报担负着对敌斗争方面的繁重宣传任务,但思想政治宣传仍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对敌宣传,也重在说理,攻心为上。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已经在革命根据地执政 20 多年。而它作为执政党创办的第一张党和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1 年 12 月 1 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就辟有《党的生活》、《工农通讯》等专栏,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同一天创刊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在《见面话》中提出该报要成为“政治工作指导员”、“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还要成为“政治工作讨论会”和“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在 1942 年开始的全党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带头为《解放日报》写社论,还为它的第四版(副刊)拟定征稿办法。那时《解放日报》的专版、专刊中,除辟有《党的生活》、《学

^①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 年 7 月 17 日)。

习》、《青年之页》外,还有宣传科技知识和唯物论思想的《科学园地》、《卫生》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政权的领导者,党报作为政治思想工作阵地的作用更加突出。在50年代,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4月19日)、《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年7月17日)等重要文件,对于党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1956年《人民日报》带头进行新闻工作改革,在全国造成了思想活跃的局面。1958年1月12日,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专门就省报问题写信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指出“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显然,这5种作用的基础是思想政治宣传。同年5月19日,《北京日报》在《共产党员》专刊上开始讨论“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问题。这一讨论,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6月30日,刘少奇同志亲往报社听取汇报,并作了总结性发言。根据他的发言,《北京日报》于7月29日发表社论《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以后还出了小册子,发行量达350多万册。60年代,党报关于歌颂祖国、新道德新风尚以及雷锋、焦裕禄、王铁人等先进人物的宣传,都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报在思想宣传工作中的独特作用及感染力、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

如何进一步发挥党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一方面,外来的思想与观念大量涌入,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一些老问题和传统观念需要再认识和再评价;另一方面,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趋活跃,民主和法制观念在增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党报进行报道、解释和宣传的东西很多,党报应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就要求党报的办报方针、办报思路有较大的改进,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塑造人、以高尚的精神鼓舞人。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党报应成为思想中心

邓小平同志在1981年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①这是一个很高的且必须办到的要求。为了发挥思想中心的作用,

^①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党报要坚持宣传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要集中系统地宣传邓小平理论;要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要结合实际宣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及时地从理论上阐释各种社会现象和时事政治问题,特别要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教育。

2. 党报应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党报是社会舆论机关,应该充分地反映社会舆论,正确地分析社会舆论,因势利导,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所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报应该无条件地为党和人民造福避祸。因此,党报要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大舆论监督力度。

3. 党报应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园地

党报要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服务,积极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的宣传教育,宣传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先进思想,弘扬正气,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4. 党报要成为党的建设的园地

党要管党,党报要报道党的生活,党章上也规定了党员有在党报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讨论的权利。党报要把党员、干部的学习与思想教育放在重要地位。

总之,党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可以发挥作用的方面很多,认真办好党报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办报要同用报相配合,办报是为了用报,而用得又好又能促进办得好。在这方面,党报有着优良的传统。中共中央从办第一张政治机关报《向导》开始,就向党员提出阅读党报、推销党报和为党报写稿的要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①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重申“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同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加关心人民日报、支持人民日报,为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做出积极的贡献。”只要积极贯彻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党报就一定办得更好。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2000年2月27日)

^①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新闻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①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同任何一门学问一样,中国新闻事业史有其“特殊的矛盾性”。它同通史、革命史、思想史有密切关系,但又应有区别。不能把新闻史写成革命史加报刊名称。

在中国新闻史教学和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我们碰到过这个问题。5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们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讲课参考解放前的有关著作,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以及赵君豪、黄云鹏、任白涛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提供了许多历史材料,描绘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概貌。但是,这些著作的作者,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新闻事业的发展同社会阶级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而是用形式主义的方法罗列材料,孤立地看待历史现象。当年学生反映,中国新闻史这门课程枯燥乏味,报名、地名、人名、时间一大堆,搞不清、记不住。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开始搜集资料,研究中国报刊史,1957年因新闻班停办而终止。5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这部讲义,阐述了新闻事业在人民革命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党报的历史材料写得比较多,也写了若干业务经验。与过去的情况相比,这是从无到有,从注重报刊形式到注重宣传内容,应该说是一大进步。但是,这部讲义与革命史重复较多,有的部分与思想史区别不大,结构和体例上也存在问题。60年代几次修改,又受到“左”的影响。它没有解决新闻史应该具有自己特点这个问题。我们深切地感到,为了编出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映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体现我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新闻史讲义,需要继续努力,要做大量的艰苦的研究工作,同时需要得到各有关单位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① 本文是1983年7月9日在《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们从教学和编写讲义的实践中也体会到,如果注意以下一些方面,中国新闻史这门学科可能会鲜明地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第一,注重研究宣传内容的同时,认真、深入地研究新闻业务经验。我国新闻工作,在编辑、采访、写作、通联,乃至广告、发行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例如,邵飘萍采访政治新闻,邹韬奋采访欧美,范长江采访西北,邓拓采访“葡萄常”,各有特色,值得写进历史,供给后人学习、研究。即使是政治宣传和思想论战,也可以研究其宣传艺术、报道技巧以及政论文章的历史发展过程等。这一切,都应该成为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的沿革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概貌的同时,注意探讨它的内部结构变化和经营管理发展的历史进程。新闻事业的管理体制、工作制度、印刷和广播的技术等,都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应该在新闻史上有所反映。30年代上海《申报》的改革,除了副刊《自由谈》的编辑方针和主笔有变动外,又办了其他专刊,出版《申报年鉴》,设立补习学校和流动图书馆,还添置了新的印刷设备。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和1956年北京《人民日报》改版时,都采取了调整机构和改革工作制度等措施。各种措施都是报纸改革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丢掉某几方面不讲,当然不全面,不完全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三,加强对人物、作品、新闻学说的研究。新闻史要起到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的作用,使人们读了受到鼓舞,热爱新闻工作,了解传统和经验。为此,必须写人物——写他们的思想、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也要写作品和经验。名人、名篇、著名的标题和图片等,都应写上。邹韬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人至深;他的“小言论”如同两人亲切交谈,后人读了也会从中得到启示。在我国新闻史上,好作品、好节目、好标题、好版面、好图片多得很,如果能够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分析介绍,就会保持它们的光彩,成为传世精品。

第四,对于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类型的新闻工具,都应该加以研究,在新闻史上有所反映。在我们的新闻史讲义上,有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新闻活动、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的材料很少;民族资产阶级的新闻活动也写得不多。有些影响大的报纸,如《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益世报》等,都需要作专门研究。

第五,亟需开展对于新闻法规、新闻政策的历史研究。从大清报律到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法规、法令,都有研究的必要。建国前夕的《共同纲领》、建国后的几部宪法有关新闻工作的规定,更应研究。

在我们的讲义上,有关广播与电视的历史写得很少。从这次座谈会中,我

们学习了广播电视史,得到了很多材料,回去以后一定努力改写讲义,改进教学。希望今后继续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原载《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专辑》)

写好抗日时期上海新闻史^①

抗日时期的上海新闻事业,是有特色、有成就、有意义的。但在我们的新闻史教学中,讲得比较少,主要原因是缺乏材料,缺乏研究。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上海新闻界人士,特别是对那段历史有亲身体验的老同志,多作回忆,多作研究,多写文章,大家动手总结历史经验,写出一部内容丰富的上海抗日时期新闻史,作为后来者的学习材料。

上海新闻事业,历来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抗日时期,它又经历了巨大而复杂的变化,有种种新情况、种种新做法,足以在中国新闻史上独立成篇。就整体而言,抗日时期上海新闻事业的历史,可以划为三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有可以传世的经验与资料,也有不少尚待研究的问题。

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七七”到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区。这时期,上海新闻界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形成了全民怒斥日本侵略者的舆论。上海新闻事业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在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举几个例子,以资说明。

一是,上海新闻界率先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对敌。就在7月7日当天,周恩来偕同博古、林伯渠飞抵上海。7月10日,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夏衍谈话。周恩来说:“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汉年和章汉夫负责。此外还要办一些进步的杂志、剧团、歌咏团等等。”^②8月中旬,周恩来决定要夏衍协助郭沫若办一张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8月24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便问世了。

也在8月中旬,周恩来会见在上海负责党的文化和宣传工作的胡愈之、夏衍等人,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为了广泛团结爱国的新闻工作者,大力推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为民族解放而贡献更大的力量,需要把新闻工作者组织起来,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在周恩来的倡导和支持下,11月8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宣告成立。这个组织,从上海走向全国,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华全国新

^① 本文是1991年11月16日在“抗战时期上海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73页。

闻工作者协会。

二是,上海的新闻工作者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奋斗精神,在全国新闻界有广泛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邹韬奋。“七七”事变时,他还在苏州监狱中,7月31日出狱,8月3日应国民党政府之邀,赴南京“作十日之勾留”。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邹韬奋愤怒至极,当天赶回上海,并立即着手办刊物宣传抗日。六天之后,即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就与读者见面了。这般神速,这种效率,今天说来仍令人敬佩。

除了邹韬奋以外,当时上海还有一批很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如胡愈之、夏衍、恽逸群、萨空了、王芸生、金仲华等。他们的辛勤劳作,使上海的新闻事业格外显得有生气、有力量,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

三是,上海新闻事业不仅出色地报道了反侵略战斗,而且在新闻业务和宣传艺术上,也有创新。“八一三”后,上海许多报纸都派了记者到前沿阵地采访,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简明的笔法报道战况。许多“现场报道”,相当出色。曹聚仁为《立报》采写的“战地特讯”,在10月份几乎天天成为头条。他还连续报道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壮举。他的这些作品,都是短消息、短特写,其中不乏佳作。

上海各报一致报道战事,但又各自显示其特色。夏衍曾说:《救亡日报》是一张“既无广告,又无小市民喜欢的猎奇新闻的报纸”,它在“形式上和一般小报相同,但内容上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息,而是专靠特写、评论、战地采访以及文艺作品为内容的报纸”^①。这是对《救亡日报》特色的最佳概括。《救亡日报》正是具有自己的风格,才能为读者所欢迎。《立报》则以精编著称。《申报》、《大公报》等大报也各有自己的招术。可以说,战火纷飞的几个月,是上海各报工作最紧张的日子,也是各报创新最多、见效最快的日子。

第二阶段是“孤岛”时期,即1937年11月中旬至1941年12月上旬。这时期,坚持爱国宣传的上海新闻事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采取特殊的方式,发挥特殊的作用。这在中外新闻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四周是敌占区,中间一块外国人统治的租界,成为“孤岛”。“岛”上有代表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报刊,中国共产党的,重庆国民党的,汪精卫汉奸集团的,还有西方人的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各报工作人员的情况,更为复杂。租界当局同日本侵略者,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出现“孤岛”之前,爱国报刊利用租界条件求得暂时的生存,而日本侵略者则通过租界当局扼杀抗日宣传。1937年9月,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01页、404页。

邹韬奋办的《抗战》改为《抵抗》就是在租界当局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11月13日迁汉口出版时才恢复原名。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租界内抗日力量的打击,抗日报刊无法继续出版,有些内迁,有些停刊。

出现“孤岛”之初,中国共产党人试图用隐蔽的方式,创办中国人主持的抗日报刊,这就是1937年12月9日创刊的《译报》,夏衍、梅益等人主持编辑工作,全部刊载翻译材料,夏衍引用孔子的话形容它是“述而不作”。但是,它只出了12期就被取缔了。

在日本侵略者和租界当局都不允许中国人办抗日报刊的情况下,善于斗争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只得另觅可行途径。他们借用外国人的名义办报,争得合法地位。从1938年初开始,“洋旗报”就风行起来了。《每日译报》、《文汇报》都是1月下旬创刊的,挂的都是英商招牌。随后,《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中美日报》、《大晚报》、《正言报》等数十家报刊,打着英商或美商的旗号,先后创办。早已转到中国人手里的《申报》、《新闻报》也重新以洋商名义出版。原本由洋商出面办的《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又分别出版晨刊和晚刊。同时还有一批用洋商名义办的刊物出版,如《华美》周刊、《文献》月刊、《上海妇女》、《大美画报》等。中国人办的《良友画报》,也在聘请英国人为发行人之后,才得以复刊。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洋旗报(刊)”群。

挂着“洋旗”,貌似“中立”,实际为中国作宣传,数量又这么多,在新闻史上实属绝无仅有。因此,这些报刊的经验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既面对“孤岛”上的读者,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又作为重要渠道,沟通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与沦陷区。如1941年1月份发生的“皖南事变”,“孤岛”报刊就及时报道了真相,揭穿了谣言。“孤岛”报刊销行全国,还发行到东南亚地区和世界许多地方。所以,有人称“孤岛”为消息的“中转站”和战局的“观察哨”。

“孤岛”是各种力量角逐的场所,新闻界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在这里工作。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孤岛”新闻界的力量并不强大,但他们用各种卑劣、恶毒的手段,从递送恐吓信、投掷炸弹到跟踪、暗杀,迫害爱国新闻工作者。朱惺公痛斥特务卖国戕民的罪行,他的文章——《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发表在1939年6月20日《大美晚报》副刊《夜光》上,他的英勇精神,鼓舞了“孤岛”人民的反日伪斗争。还值得注意的是,杀人者打着“反共”旗号活动,他们的牌号是“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这说明,敌人最害怕共产党人,因为共产党人是最坚定的爱国者。

第三阶段是从“孤岛”陷落到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即从1941年12月8日到1945年8月14日。这时,日本侵略者统治着整个上海,新闻界处于

一片黑暗之中,日本加强了法西斯新闻统制。

消灭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新闻阵地,是日本法西斯新闻统制的主要目标。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上午,日军进入租界后就立即宣布查封《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9家“洋旗报”,还有20多家民营广播电台。1942年6月,日本宪兵队还先后逮捕了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的10多名外国人,其中有鲍惠尔(《密勒氏评论报》主笔,美籍)、奥柏(《大美晚报》记者,美籍)、伍得海(《远东周报》主笔,英籍)和《新闻报》发行人福开森(美籍)等。

日本侵略者实行严厉的新闻管制。日本军方控制上海新闻检查所,所有新闻稿件都要事先送检。对于无线电广播的管制更为严格,收音机要登记,七灯以上不准用,收听短波的要按军法处理。

日本侵略者强化它在上海的新闻机构。如《新申报》和《大陆新报》,原先是以日商名办的,后来都改组为军方所属机构。《大陆新报》还在南京、汉口等地出了分版。

在数量上居多数的,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新闻机构。汪伪集团在上海办了许多报刊,如《中华日报》、《平报》、《新中国报》、《政治月刊》、《中华月刊》等;也办了通讯社,即中华通讯社、伪中央电讯社上海分社;还有大上海广播电台。当然,所有这些机构都由汉奸出面,实际听命于日本军方。至于《申报》、《新闻报》,也是在日本军方的操纵下,恢复出版的。

但是,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并未止息。对于敌伪报刊,人们不订不看,它们只能强制推销。敌伪宣传机构遭到群众袭击的事件,多次发生。在极其严密的封锁下,日军屡战屡败的消息仍不胫而走,抗日新闻在群众中默默流传,直到抗战胜利,淞沪重光。

以上所述,只是抗日时期上海新闻事业的粗略概貌。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挖掘材料,如早期的上海沦陷区(即“孤岛”以外的上海市区)的新闻活动,抗日根据地报刊及宣传品在上海的传播情况;有些方面,需要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如抗日报刊的工作经验。总之,抗日时期上海新闻事业有好经验、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并载入史册,传诸后世。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战时期上海新闻文论集》,1991年12月出版)

《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前言^①

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从1926年主编《生活》周刊开始，毕生从事报刊工作，“干得兴会淋漓”，“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他主编过七个报刊，撰写的评论和通讯报道达数百万字，还出版了几十本著译。他在广大读者中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他的启发下，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投入人民革命的洪流。韬奋有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并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办报主张，特别是他主编《生活》和《大众生活》的经验，1932年和1936年关于怎样办《生活日报》的一系列论述，生动地体现了我国民主报刊的优良传统，也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办报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韬奋的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是我们加强新闻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益于推动当前报刊工作的改进。我们编辑这本书，目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基本材料。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种精神，贯穿在韬奋的报刊工作实践中，成为他的办报思想的核心。他所主编的报刊，真实地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不仅如此，韬奋还把办一张“真正人民的报纸”，作为他生平最大的愿望。他曾经多次设想、筹划过理想的报纸，认为这张报纸“必须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是大众“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同时在国内外10个地方出版，发行量达到500万份等等。韬奋还研究过列宁办《火星报》的经验和我党办《新华日报》的经验，从而加深了他对理想报刊的见解。他的办报思想和经验，实质上是一种人民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其内容涉及报刊工作的各个方面，下面列举的只是他的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报刊的基本任务是“领导与反映”。

韬奋认为，人民报刊的基本任务“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面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一个报纸对社会能起引导的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地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

^① 本文写于1980年1月，作者署名为复旦大学新闻系。

真正的利益,在这个立场上,教育大众,指导大众”。为人民群众说话,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是韬奋始终如一地奉行的原则。在办《生活》之初,他就规定刊物要替受苦的民众发出“对于社会的呼吁”,大量刊登反映群众疾苦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字。后来,他又明确提出报刊要作“人民的喉舌”,“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并以自己的锐利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罪行,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同时,韬奋又十分注意“引人向上”,善于结合各种事例和问题,教育与帮助人民群众。在他主编的报刊上,《小言论》、《读者信箱》和《国难课程教材》等专栏都办得很出色,成为指引人民群众前进的向导。还值得指出的是,韬奋在“九一八”后曾利用刊物发动几次捐款,组织广大读者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韬奋的实践表明,人民报刊是具有组织作用的。

第二,报刊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

韬奋主编《生活》后不久,提出刊物要成为读者“极好的朋友”的主张,尔后多次强调这一主张,直到他的最后遗著《患难余生记》的最后一段,还亲切地要求读者把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视为“最可靠最亲爱的好朋友”。韬奋身体力行,实现了自己的主张。通过报刊工作,他同广大读者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他“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而读者也以韬奋为良师益友,向他倾诉衷情,同他商讨问题,托他代办事情,亲如家人。他一有号召,读者群起响应,他遇到困难,读者群起支援。当他受到反动当局迫害时,许多读者主动掩护他,在这方面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在韬奋看来,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最重要的是必须关心读者的需要,努力办好报刊,同时也必须同读者建立经常的联系,努力为读者服务。他说:“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韬奋同读者联系,为读者服务的主要方式是:认真处理读者来信——作为主编的韬奋,每天都要亲自看信、复信,即使由别人代写的复信,他也要亲自看过,签上名以后才发出;办好《信箱》专栏;热情接待读者来访;读者委托代办的事情,尽力办到。

第三,“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

在编辑方针方面,韬奋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他反对雷同和模仿,主张报刊要有自己的风格。他说:“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他取舍稿件的标准是“有价值与有趣味”,既不赞成“老生常谈”,也反对“滑头面孔”,而提倡把“有益”与“有趣”统一起来,寓教育于趣味之中。在筹办《生活日报》时,韬奋系统地提出了对

报纸的要求,其中包括:广博的言论(每天发一篇社论、两篇以上专论,内容广泛),统一性(言论、新闻、附刊一致,新闻选材上硬性文字与软性文字分配均匀),广泛性(在民族独立、解放和繁荣的共同目标下,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生活),研究化(帮助读者了解新闻背景和前因后果,发表参考资料),文字大众化(用语体文写作,使初识字的人能看懂),等等。

第四,“明显畅快”的文风。

韬奋把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作为报刊的基本任务之一,因而一贯重视报刊文字的通俗易懂。他曾经宣布:“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他写文章,注意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短小精悍,亲切感人,深受读者的欢迎。在文风上,充分反映了韬奋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对广大读者,像同老朋友谈心一样,推心置腹,循循善诱;而对反动当局则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旗帜鲜明,锋芒凌厉。

第五,新闻工作者要有“视事业如生命”的精神。

韬奋热爱新闻出版工作,“乐此不疲”,奋斗终生。在威胁、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从未失去信心。他不仅亲自编稿、写稿、处理来信、联系作者、接待读者,而且还亲自跑印刷厂、看校样,甚至亲自拉广告。他办的刊物从未脱期,这在旧中国新闻界是少见的。他还刻苦钻研业务,“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对前人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他都采取分析的态度,引为借鉴。他曾经提出,理想的编辑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大公无私;二是敏锐的观察和卓越的识见;三是文笔畅达;四是至少精通一种外文。他还提出过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广博的知识、健全的体格,还要懂一点自然科学。

此外,他在广告、发行、经营管理、设备现代化以及新闻教育等方面,都有所论述,提出过许多切实可行的主张。他的一些著作,如《经历》、《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等,我们都可以作为新闻学著作,加以学习和研究。

韬奋由民主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在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中也有着深刻的反映。在主编《生活》之初,韬奋作为读者的“好朋友”,在刊物上交谈的基本上是求学、职业、婚姻等方面的问题,希望读者“安业乐业”,注重品德修养。他给刊物规定了“暗示职业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方针,而所谓“社会改造”,也就是实行以“力求政治清明”与“实业振兴”为“根本要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纲领。那时,韬奋及其读者都是尚未卷入革命潮流、正在寻找出路的人们,他们有要求进步的愿望和勇气,却看不清前进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韬奋的办报思想也只能是一种初步的、朦胧的人民报刊思想。

然而，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酷事实教育了韬奋，使他的思想与时俱进，逐步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他主编的刊物，也从以反映和探讨生活问题为基本内容，逐步转向以报道和评论时事政治问题为主。1930年，他宣布“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尤以时事为中心”，“振兴中国民族改进中国社会”。“九一八”事变的沉痛教训，更使他迅速觉醒。1932年1月，他又宣布《生活》已是“新闻评述的周报”，“以当前事实为对象”，“一切以正义为依归”。而且还具体说明，“我们所信守的正义，是反对少数剥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苦民众的不平行为”。同年，韬奋发起创办《生活日报》，要“为中国产生一个为民族振兴及民族福利而努力的舆论机关”，取材以“劳工疾苦”为第一位。在1933年至1935年被迫出国考察期间，韬奋进一步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办报思想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1935年11月，他在《大众生活》的发刊词中，提出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三大目标。接着，在《大众生活》的第二期上，刊载了韬奋写给读者的一封信，其中对于《生活》前期宣传的“职业指导”、“人生修养”等作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明确指出“避免《生活》的缺点，保留《生活》的优点”，“要比《生活》前进”的希望，并且号召读者“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不是替旧的社会苟延残喘”。1936年，韬奋关于《生活日报》的论述，是人民报刊思想的具体化。如果说，《生活》初期，韬奋的“好朋友”主要是知书识字的职业青年，那么，这时的“好朋友”则扩大为广大的人民大众，特别是“文化落后的大众”，包括“洋车夫和苦力，三家村的农夫”。这时他还强调指出：“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生活日报》“必须成为一切生产大众的集体作品，必须由各地的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直接供给言论和新闻资料，而不是由少数职业投稿家和新闻记者包办一切”。他把读者来信作为报刊的“真正的维他命”，建议设立全国通讯网。应该说，韬奋这时的办报思想，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报刊理论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韬奋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主编的报刊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与党的报刊作了有力的配合。韬奋从多年以来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韬奋坚守新闻岗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被迫出走香港，但仍然坚持撰写评论，出版刊物。1942年，他辗转到达抗日根据地以后，还计划办报。1944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念念不忘“办个日报，以偿素愿”。

韬奋留下的大量著述，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本书选辑的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计一百多篇文章(包括节录的),16万多字,各有不同的思想意义和史料价值。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加了若干题解和注释,并编写了《韬奋报刊活动大事记》、《韬奋主编的报刊介绍》、《韬奋的笔名》等三个材料作为附录。自然,这些文章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不有一定的历史烙印,有些是当时政治条件下的“奴隶的语言”。这需要阅读者作必要的分析,书中不一一加注。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上海韬奋纪念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上海图书馆等单位及原生活书店部分工作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承蒙韬奋同志的老战友、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胡愈之同志题字,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载《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军事新闻学

——一门新学问

军事新闻有学

读过今年6月出版的《军事新闻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后,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军事新闻有学。

任何学问,都源于实践。我国有丰富的军事新闻实践经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更是成绩辉煌,出现了著名的作品和杰出的记者,还形成了一支专业队伍。但在理论研究方面却是滞后的。在当时的国统区,出版过《战时新闻学》(任华明,1938年)等几本有关著作,内容都是阐释新闻学知识在战时的运用问题,没有新的理论建树;当时的解放区也发表过一些论文和著作,如《关于部队的报纸工作》(陶铸,1944年),主要是阐释方针政策与工作方法,也没有提升为学理。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军事新闻宣传的经验,但理论研究仍然没有及时跟上。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学术繁荣的形势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新闻学的要求也应时提出。在80年代,我国出版了多部研究军事新闻理论、历史与实务的著作,其中《军事新闻学简论》(毛文戎、史文亨),1988年率先对军事新闻学作了理论探讨。

创建于1984年的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作为军队院校中唯一的新闻教学与研究机构,理所当然地把建立军事新闻学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一项奋斗目标。他们在开设有关课程的同时,进行专题研究。他们提出编撰《概论》一书,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军事学重点课题,于1996年11月立项。课题组经过3年多的辛勤劳作,于2000年初完成书稿,5月通过鉴定后交付出版。这部《概论》,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完整地论述军事新闻学的著作。如果把军事新闻学比作一座大厦,这部著作就不仅描绘了大厦的外观风貌,而且介绍了大厦的内部结构与设施。

军事新闻学不是军事 名词与新闻名词的粘合

有自己的基本概念,有科学的理论框架,有独到的内容和材料,是这部《概论》的特点。

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性的思维形式,任何理论表述都离不开概念。只有具备了自己特有的、科学的概念,才能形成新的、独立的学问。《概论》除了采用新闻学、军事学的通用概念外,对于军事新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如军事新闻、军事新闻事业、军事新闻价值、军事典型报道等等,都作了认真的界定和诠释。每个概念的解释字数不多,而研究与论证的功夫却不少。以“军事新闻价值”这个概念为例,有关的中外书籍几十本,从中找出我国学者对新闻价值定义的见解以及国外有关资料数十条,经过反复分析比较以后才得出自己的见解,而对这个概念的释文仅有36个字。

《概论》的章、节、目,是精心安排的,各部分之间有逻辑联系,在整体上组成了一个合理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框架)。其中,有些部分是一般新闻学著作中所没有的,如“军事新闻事业的组织原则、宣传纪律和保密规定”、“军事新闻的谋略与策略”、“战事新闻传播与新闻学、新闻事业”、“战事新闻传播及其传播法则”等,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些都是新知识;有些部分,是一般新闻学、传播学著作中不可或缺的,如关于新闻的定义与特点的论述,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作用、职能的论述,关于受众的论述,关于党性、真实性、指导性、群众性等原则的论述,关于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的论述以及关于典型报道的论述等,这些部分也不是照抄照搬一般著作,而是在阐释基本原理时突出军事新闻宣传的特色。例如,在分析军事新闻的特点时,除了一般著作中列举的真实、快捷、精粹、鲜活以外,还加上了强烈、有“军味”两点。

《概论》以理论分析为主线,包括了军事新闻宣传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以及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素质等方面的内容。全书体现了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新闻思想和重要论述,既有军事新闻宣传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当代军事新闻宣传新情况、新特点的剖析,还引用了大量的例证,主要是中国的,也有外国的。

《概论》的这些特点说明,军事新闻学是新闻学和军事学交叉的边缘学科,是在充分运用这两门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的一门新学问。创新是它的生命所系,也是它今后继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如果不是“钻进去”研究,而只

是把新闻学名词和军事学名词粘合在一起,拼凑成书,那就不是军事新闻学著作,而只能是贴了军事标签的新闻学书籍。

是专著,也是教材

《概论》的主编盛沛林教授等5位撰稿人,都是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教师。他们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对军事新闻工作实践也有较多的了解。他们写书,是为了提高教学水平的需要,而教学中的问题又启发和推动他们作深入的研究。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相互补充,相互推动。这部《概论》,既是他们从1996年以来3年多集中研究的成果,更是他们从1984年以来10多年教学体验的结晶;它是专著,也是教材。

《概论》作为专著,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在理论上提出了问题,分析了问题,有自己的理念。由于展示了军事新闻的全貌,它成为普及这门新学问的最合适的读物,成为进一步研究这门新学问的基础性著作,也成为拓展新闻传播学科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概论》作为教材,它有明确的概念、清晰的论述,观点与材料统一,按“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浅入深,评价基础知识。因此,便于阅读。

当然,这部著作只是“概论”,即概要地论述军事新闻学,有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专论、专著问世。同时,由于军事新闻学是一门开始建设不久的新学问,不少方面还需要通过讨论、切磋,以提高其科学水平和准确程度。《概论》的出版,为这种学术讨论提供了一份较为完整的材料。希望这部书成为军事新闻学研究的一个“起跑器”。

(原载《新闻战线》,2000年第11期)

新闻传播教育研究

简议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①

新闻工作是面向社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因而它的从业人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一百多年前,我国第一位报刊评论家王韬曾提出,“秉笔之人”应是通才的主张,认为“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②。

但是,通才并不是“万宝全书”,不可能无边无际的什么都懂。新闻工作所需要的通才,是那些知识丰富、眼界开阔、动手能力强的人才。他们所“通”的是文化科学知识、社会知识和新闻工作特性与规律。据说日本有的报馆录用大学毕业生,第一年让他们上门推销报纸,随后当农村记者,期限不定,领导认为满意后才调回报馆工作;在编辑部,也是先跑某一条线,熟悉后又跑另一条线,这样积累多方面的经验,逐步了解全局,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要消除一种误解,即认为新闻工作没有专业性,只“通”不专,文科各系的毕业生不经培训就可上岗。我认识一些文、史、哲系科的本科毕业生,他们报考新闻学科硕士研究生,其中少数人早有准备,旁听了新闻系的主要课程,他们考得很好。其他没有旁听过的,有些没考上,有些考上了,入学后深感培养“新闻头脑”不容易。其实,这种“新闻头脑”正是新闻人才综合水平的体现。新闻事业像其他行业一样,有它的专业性,只不过新闻专业需要的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很多、很广。就知识结构而言,新闻人才的专业性主要反映在这些方面:一是熟悉新闻工作的理论与政策、历史与现状;二是掌握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三是对相关知识有较深的了解(如财经记者对经济学的了解),并能熟练地在新闻工作中运用。

究竟新闻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关于这个问题,前辈新闻工作者多有论列。这里仅举两例。

例一,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学者戈公振,1927年至1928年间曾作“环球之行”,考察欧、美、日各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1929年3月发表《新闻教

① 本文是1996年9月13日在台北参加“两岸新闻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②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载《弢园文录外编》。

育之目的》^①一文,指出:“新闻教育应该包括这几种:(一)理想的政治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法律、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外国语;(二)理想的商业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国民经济及统计学、私人经济、地理、重要的法律和英语;(三)理想的省报或地方报的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国际公法、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特殊法律;(四)理想的文艺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哲学、历史和本国文学。”这些都是帮助他们具备“活动能力的学问”。此外,还应该学习办报知识与技能,理解报纸工作的宗旨。

例二,杰出的新闻记者邹韬奋,1924年9月,在答复《生活》周刊读者关于“学习新闻学”问题时写道:“可把新闻记者所需要的常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自然科学,即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矿学等是。这一部分的常识,只要有优良高中中学毕业的程度便行。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科学,即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科学。经济学中特重政治经济学、财政学;政治学中特重法律、政治史、外交史等;社会学中特重社会问题、社会政策、劳动问题及心理学等。这第二部分的学识和全人类有更密切的关系,做新闻记者须有大学的程度才行。”^②此外,还应多读书报杂志,去报馆实习,至少精通一门外语。

这二位都是新闻工作的行家,他们着重讲的是新闻人才知识结构中的广博知识部分,没有多讲新闻知识。他们的见解至今仍可作参考。从20世纪20年代我国高校创设新闻系或报学系以来,各系都要解决课程设置问题,这种设置是对新闻人才知识结构的落实,即具体化和全面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新闻教育界曾多次讨论专业教学计划,目的在于使学校培养的新闻系学生,其知识结构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其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采用了苏联的作法,强调基础知识,特别是理论基础知识。60年代,讨论过论、史、工具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关系等,同课程教学有关的问题。那时又一度强调文史基础知识,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现过“两典一笔”的提法,即学习理论经典著作和古典文学作品,练就一枝生花妙笔。

“文革”期间,在“四人帮”指使下,报纸上曾鼓吹“堵死”从大学培养新闻记者的道路。1970年底,开始招收工农兵学生,主要学政治,文化知识和业务知识学习置于次而又次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新闻教育开始恢复和重建。进入80年代后,出现

^① 戈公振:《新闻教育之目的》,载《报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

^② 邹韬奋:《想念新闻学》(信箱),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40期(1929年9月1日)。参见邹韬奋:《征求一位同志》,载《生活》周刊第5卷第34期(1930年8月3日)。

迅猛发展的势头,新办的新闻专业(系)成批出现。从那时到现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局,对于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知识结构上突出表现为:急需学习大量新知识,主要是经济知识和国际知识;急需提高实用知识水平和动手能力,如计算机操作等;急需提高外语水平,增强同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于是,开办了一些新专业,开设了许多新课程,如大众传播学、国际新闻、公共关系、广告、新闻事业管理、计算机应用等。原有课程的革新,也在加紧进行。这种情况表明,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不仅具有社会性(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并且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变化而更新)、专业性(掌握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与能力)。

专业分细、新课程增多、原有课程革新,这三者是我国新闻教育的新趋势。这是前进的、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类现象:有的课程内容更新跟不上名称变换;有的课程一门变成几门,内容重复,甚至相互干扰;有的因人设课,或为增添教师工作量而设课;更多的是,课程随意变动,未经严格论证,也没有试行过程。这就使学生造成知识结构上的倚轻倚重、顾此失彼的缺点,不能得到合理的全面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重新研究我国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在新闻教育界达成共识,成为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的依据。

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大体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基础知识、应用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三者各有特点,它们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理论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当前需要的和未来需要的,必修的和选修的。

一、基础知识

它包括基本理论知识(哲学、中国经济建设理论等)、基本文化知识(中国史、世界史、中国古代散文选或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或语法修辞逻辑等)、专业基础知识(新闻理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新闻事业管理、大众传播学等)。

在新闻人才知识结构各个组成部分中,基础知识占的比重最大,它具有系统性、稳定性的特点。这类知识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不能起“立竿见影”的作用,却可以说是基本的营养素。基础知识深厚将会减少“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例如,1991年发生的海湾战争,事先不可能开一门叫做《海湾战争》的课程。但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又学过世界史,报道或评论这场战争就有了知识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人们常常有所议论。我认为应该

学,学了对文字精炼有所帮助,对编稿、做标题的帮助更为明显。可以开两门课程,一门叫《中国古代散文选读》,作为基础课程,力争联系新闻工作讲解。复旦大学新闻系在80年代初曾经提出选出文章50篇,讲解20篇,要求学生熟读或背诵10篇,每周讲课3学时,共一学年。这种做法只开了个头,效果尚可,但没有坚持做下去。另一门课程叫《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选学诗词歌赋与传奇,作为知识性课程,不用太多时间,每周3学时,开一学期,或每周2学时,开一学年。这些纯属我个人的看法。

基础知识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因为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应该有增有减,有所更新。

二、应用知识

应用知识包括专业性的(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影摄像、广播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制作、播音等),一般性的(社会调查、时事政策等),还有外语。

这类知识具有变动性和可操作性,随学随用,更新很快。但它也含有理论知识、器材知识和操作技能等不同部分。如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外语等,都有理论规律可循。

三、相关学科知识

相关学科知识包括一般相关学科(社会学、美学、经济学、法学、影视艺术等)、新闻边缘学科(大众传播社会学、宣传学、新闻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这类知识,面广,量也不少,具有选择性,各人所学可以不同。总体来说,应该兼顾现实需要与未来需要,特别要从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需要来选定科目。

上述各个部分,有机地组合成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发挥整体的作用。复旦大学新闻系有人曾经把新闻人才的基本特征通俗地说成是“头脑活络,笔头快”。当然,这种说法不够全面,还要加上思想品德好与活动能力强。老新闻工作者夏衍说过:“副刊编辑要做三件事,一、会出点子,二、会找人写,三、自己会动笔。”^①这里所说的脑子、点子、笔头等,都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表现,反映了

^① 《关于副刊的一些想法——夏衍同志谈副刊》,载《新闻业务》1962年第4期。

知识结构的实际水平。

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新闻事业内部,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具体要求。每个新闻工作者的个性和爱好也不一样。因此,在新闻人才知识结构的整体中,有人这方面突出些,有人那方面色彩浓厚些,这是合理的。许多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各有特色的、个性鲜明的,本文提及的四位就是如此。王韬能够写出一手好评论文章,原来是他作职业报人的同时,又是关心时事与研究强国之道的思想家。戈公振在编报的同时,热衷于研究中国新闻史,所以他的文章有学者味。邹韬奋写的小言论,平易近人,谆谆善诱,这同他研究过教育学不无关系。夏衍的新闻作品文采熠熠,因为他是作家出身。这四位前辈都是把他们的特性与个性,用于新闻工作,从而增添了光辉。

总之,培养新闻人才要重视建造合理的知识结构,也不要忽视个性和爱好。坚持基本要求,承认个性差异,这才是适途。

大学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 与课程体系应该怎样确定?^①

为了办好新闻教育,有许多问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如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育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本文主要讨论大学新闻系本科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问题。这是办好新闻教育首先要明确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70 多年历史的回顾

从我国大学新闻教育来看,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思路与解决办法,有着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到 40 年代末。20 世纪 20 年代是我国大学新闻教育起步和迅速发展的时期,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一些大学都开办了新闻学(报学)系科。在办学模式上,主要是仿照美国,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新闻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训练为教学重点。1929 年创建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制订办学方案时,就是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蓝本的。它的培养目标是“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与经营人才”^②,学制 4 年,设有专业课程 34 门,共 89 学分,其中业务知识课与操作(技术、练习)课程 17 门 41 学分,基本上占半数。另一半是论史知识课 8 门 19 学分,辅助知识课(《地理知识》、《时事研究》等)9 门,29 学分。此外,还有公共课(《国文》、《英文》、《军事教育》等)11 门 60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总计课程 45 门以上,161 学分。值得一提的是,课程中有《报馆组织与管理》、《贩卖新闻学》、《新闻广告图案》、《杂志经营与编辑》等课程。

1935 年,上海《申报》函授学校出版了一套新闻学讲义,共 17 讲,其中文史基础知识 3 讲,论史知识 4 讲,新闻业务知识与操作知识 7 讲,辅助知识 3 讲。

① 本文作为“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项目成果的一部分,曾在《新闻大学》上发表。

② 谢六逸:《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见《新闻世界》创刊号,1930 年 10 月出版。

重点显然也在实用知识与技能上,是仿美的。

在20世纪20~40年代的30年中,我国大学新闻教育基本上按照上述思路确定培养目标与设计课程体系的。其中,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延安、华中、东北办了短期的新闻班和新闻专科学校,教学重点是政治课与时事政策课,同时也学习业务知识。这是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快速培训应用人才。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新闻系科进行了调整,1952年起学习苏联的经验,制订新的教学计划,重新确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巩固基础与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1954年,更加具体化为“培养新闻工作干部,即从事报纸、通讯社与广播电台的文字工作人才”。这种对培养目标的提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新闻工作的单一性,即以文字宣传报道为主,在经营管理、图像新闻等方面不必强调培养专门人才。在“反右派”、“大跃进”之后,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加重了政治色彩,但核心仍是新闻工作者。

在课程体系方面,相应地削去了经营管理、广告等课程,新开了《报纸的群众工作》等课程,后又将《新闻学概念论》、《新闻编辑》、《报纸的群众工作》合并为一门大而无当的《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课。而最重要的变化是,把理论放在首要地位:在所有课程中,政治理论居首位;在新闻专业课程中,新闻理论居首位;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实验、实习)中,理论教学居首位。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苏联”高潮时尤为明显。

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初期,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环境较为宽松,学习气氛日趋活跃,学理论,学政策,学文史,谈古说今,议论风生。在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表述中,加上“新闻教学与研究人员”一句。在课程体系中,理论与政策课程、文史知识课程的分量加重,复旦新闻系出现了“两典一笔”的说法。两典,指马列经典著作和古典文学著作;一笔,指写作一枝笔。这几年,学生认真读书,理论功底更扎实了,文史知识更丰富了,政策观念也加强了。然而,从1963年下半年起,师生下乡下厂,课堂教学断断续续,伏案读书的气氛由此中断。

第四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原来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被否定,强调学员要成为“普通劳动者”,以社会为课堂,“结合实践进行教学”。什么稳定的教学秩序,系统的学习,乃至课堂讲授,都被斥为“修正主义”。虽然当时招收工农兵学员,但要求他们在大学“上、管、改”;虽然也设置了一些课程,但不成体系,而且说变就变,谁也无法预计教学效果。

第五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后至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人们的思

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的整个社会发生巨变,新闻教育也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对于新闻人才,不仅社会需要量大,而且需求呈现多样化,除了通用型的编辑、记者外,在对外报道、广播电视、经营管理、广告、公共关系等方面也需要专业人才。因此,开办新闻专业的大学迅速增多,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逐步拓宽,课程体系在充实和更新。开设了一批新课,如《大众传播学》、《广告学》等;原有课程的内容也有变动,如《新闻编辑》增添了激光照排的内容;加强了新知识、新技术(市场营销、计算机等)和外语课程的教学。

从70多年的历程看,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混乱以外,其他各个阶段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都是明确的、行之有效的,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毕业生经过实践检验,大多数能胜任新闻工作。

二、行家们的议论

新闻人才的培养问题,历来为新闻界所关心。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王韬到邓拓,对新闻人才的要求与培养,都有所论述。特别是邵飘萍、戈公振既为新闻工作行家,又在大学新闻系兼任教席多年,也堪称新闻教育的行家。他们对新闻教育的见解切实、具体、深刻。

邵飘萍办过报纸、杂志、通讯社,当过编辑、记者、社长,还去日本见过世面。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①,中学以上学校应开新闻课,大学应办新闻系。他先后推动和参与北京大学、平民大学、法政大学创办新闻教育,并指出:“自是而新闻学乃占我国大学之一席地矣,不可谓非新闻业前途之幸也。”他在大学新闻系讲课,“从探索新闻入手,渐及编辑营业诸事”。他撰写的讲义《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成为我国早期新闻学的重要专著。他还计划写《新闻编辑法》和《广告与发行》,可惜未及成书就惨遭杀害!

戈公振也是既从事新闻工作又热心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的人。在1927年出版的他的名著《中国报学史》中,有《报业教育》专节,评述我国新闻教育的历史和现状。1927年和1928年,他在欧洲、美国、日本考察报业时,也关注各国的新闻教育。回国后写了《新闻教育之目的》^②一文,介绍美、法、英三国新闻教育状况,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记者必须受新闻教育,就是大学教育,以

^① 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1924年3月出版。

^② 戈公振:《新闻教学之目的》,载《报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

外没有别法”。但大学新闻教育不能简单地视为只有职业训练的“记者养成所”，而是学生应学习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历史、地理、外语等多种知识，更应学习新闻专业知识，研究“报纸的过去和现在”，懂得“报纸的标准和规律”。

邹韬奋多次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回答读者关于读大学新闻系的问题，1941年在香港《大众生活》周刊上还介绍读者去重庆报考复旦新闻系。他认为，大学新闻系培养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拿笔的”即新闻记者，包括记者、编辑，他们除了学习新闻专业知识外，还应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达到大学程度，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应有优秀的高中毕业程度；另一类是“打算盘主持管理的”，或称“新闻事业者”，他们除了学习新闻专业知识外，还应“特重科学管理法、心理学、哲学、广告学，以及其他关于商业的常识”^①。

范长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和后期，于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先后兼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北京新闻学校校长。他在讲课中要求学员有为人民服务思想，要讲政治，又要业务精通、常识丰富，有“专业精神”^②。

这些卓有建树的前辈们的见解，还有其他一些人士的见解和新闻教育界多年的实践经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稳定的看法。主要是：1) 大学新闻教育十分重要，是培养新闻人才的主要途径；2) 大学新闻教育应培养新闻工作所需的各种人才，首先是编辑、记者和经营管理人才；3) 新闻教育应把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品格、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忠诚的敬业精神放在首位；4) 新闻教育应设计合理课程体系，使学生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较强的操作能力；5) 新闻教育应理论与实践并重。这些看法，在历来的新闻教育实践中基本上能够贯彻。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些传统观念和传统做法。

香港、台湾的新闻教育界人士也提出了许多深刻、中肯的见解。长期在香港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朱立博士，在1988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时曾撰文指出：“新闻传播工作的‘形’——编、采、写、制，当然应该教，但绝对不应该只以之为唯一的内容，而必须有其他专精的学科配合”，“它们一定得以专业的知识、宏观的通识和操守的陶冶为基础，缺乏了这些，充其量也只是挂了大学招牌的职业训练而已！”^③台湾学者郑贞铭教授在1994年1月指出：新闻教育不是技术教育、廉价教育、孤立的教育、僵化的教育、速成教育。他认为：“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新闻工作者应包括勇敢、机智、忍耐、有恒、好奇、想象力、乐观、

① 邹韬奋：《想念新闻学》，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40期，1929年9月。

② 范长江：《论人民的报纸》，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1辑，1982年5月。

③ 朱立：《大学新闻教育往何处去？》，载《潮流月刊》第20期，1988年10月。

主动、进取、思想敏捷、有适应能力,乃至写作技巧、写作速度……如此说来,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职责神圣,而且是任重道远。”^①1996年,台湾政治大学潘家庆教授、罗文辉教授、臧国仁副教授等,对传播教育核心课程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就院、系核心课程设置规划提出具体建议。这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改进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新形势下的思考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带动下,出现了许多新的有利于新闻教育发展的因素。

(1) 新闻工作的内涵丰富了。称雄百余年的报业有了新的发展,广播电视、对外报道、媒介广告等,都在新闻行业内大展宏图。经营管理加强,广告、发行的任务繁重。

(2)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等开展公开的新闻活动,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形式被广泛采用。

(3) 新闻学研究的领域拓宽,内容加深。新知识的引进,新观念的流行,新技术的采用,都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课题。边缘学科、新闻法制、职业道德等方面研究也展现了新面貌。1997年,原先的二级学科新闻学,拓展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并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各种因素对于新闻教育都产生了影响,提出了要求,而各种影响和要求的汇合点是人才需求。新闻媒体需要新闻人才,其他许多单位也需要新闻人才,不仅需要编辑记者,更急需经营管理人员(包括广告、发行人员),还需要新闻行政人员和新闻教学人员,等等。因此,新闻传播院系应该根据人才市场的多种需求和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条件,重新制订培养目标,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人才,仍然是新闻教育的基本目标,但在具体内容上应该有所变动或更新。在德育方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当然是必须有的,但同时应该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政策法规的教育,可以把政治方向、道德修养、法制观念、敬业精神等作为陶冶学生的精神品格的基本内容。在智育方面,要培育学生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这种结构应该体现既是通才又有特色的要求。新闻传播院系培养的是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通才,毕业生能够适应各种新闻传媒及其各部门的工作需要,也能在各种机构的新闻活动中担任组织与

^① 郑贞铭:《新闻教育的基本理念》,载《新闻大学》总41期,1994年秋。

业务工作。广电专业出身的也能编报纸,广告专业出身的也能当编辑、记者,新闻专业出身的也能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等等。在体育方面,学生应该有健全的体魄,精力旺盛,除了学习体育课以外,还应该学习卫生与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培养目标的制订和贯彻,都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因而具有时代特征。与20世纪50年代乃至与20世纪80年代前期比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闻人才,应该更多地学习邓小平理论,更多地懂得一点经济,更多地了解一些外国情况。

设计课程体系,是落实培养目标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新闻院系已经构成一套课程体系框架,各校大同小异。这个框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课程,一部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如政治理论课程、文史知识课程、体育、外语、计算机等;另一部分为专业课程,有专业基础课(如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史等)和专业课(如新闻采访与写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广告学等)。此外,还有相关知识课程、实验课和实习。从新闻教育的实践来看,课程体系有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作适当处理的。

1. 各专业课程体系是大同小异,还是小同大异?

新闻传播学类的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专业,各有自己的课程体系,而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目前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曾提出“坚持宽口径的办学方针”,“在新闻学共性的基础上,侧重广播电视的特性,办出特色”。他们的毕业生,70%在广播电视单位工作,30%在报社和其他宣传部门工作。这是一种办学思路。另一种思路是,以专业特色为主安排课程,新闻传播学的基础课程大量减少。有一个学校的广告系,必修课程(包括政治、体育、外语等公共必修课程)共138学分,其中“广告”字头的课程63学分,占46%,新闻传播学基础知识课程16分,仅占12%。显然,这是涉及对通才与特色关系的理解问题,“通”到何种程度,“特”到何等地步,需要认真作具体的研究。

2. 要不要确定两级核心课程?

设立核心课程,学生必修,有利于保证基础知识的学习质量。1990年6月,第一次全国新闻学科系主任联席会议上讨论过核心课程问题,提出《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事业》、《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新闻编辑》、《马列新闻原著选读》、《公关与广告》、《广播电视新闻》、《基础写作》、《古代汉语》、《中国当代文学》等13门为新闻学专业核心课程。但事隔多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当年的系(专业),现在成为院(系),这13门实际上是院

(系)核心课程。现在,当然需要作较大的调整。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院(系)有核心课程,专业要不要?我以为,还是以要为宜,因为这样可以全面保证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质量,还便于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当然,两级核心课程应该选定合理,搭配得当。

3. 新课程设置的标准和程序问题

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知识、新技术。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知识与技术,也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在新闻教育中的反映是,课程名目越来越多。但是,新课程的设立总得有一定的标准和经过必要的审核程序。比如说,要有明确的教学目的、科学的教学内容,要有教学方案和教材(讲义或提纲),还要经过论证、试讲等步骤来审定。课程内容不能太宽泛,如20世纪50年代的《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太狭窄也不行,如将消息、通讯、评论等,每种体裁开设一门课,这样过细就难免重复。在科学研究中,为了开拓新领域,应该研究边缘学科。但是,在教学中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就应该慎重。目前,属边缘学科性质的课程很多,如与心理学相关的有新闻心理学、广告心理学、宣传心理学、采访心理学等多门。与美学、文化学有关的课程也不少。看来需要筛选、确认,有的可以缩小为专题,不占一门独立课程的地位。

4. 处理好课程体系内部的几个关系

课程体系的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内部各种关系处理得当,不仅每门课程能各得其所,而且全部课程结合在一起能发挥整体优势。从横向看,各门课程之间应该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关系;从纵向看,各门课程之间应该是相互衔接,逐步递进的关系。目前,有些课程的某些内容有重复现象,例如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名记者,新闻史课要讲,名记者与作品课也讲,新闻采写课又讲,材料相同的很多,学生听了一遍又一遍。此外,对有些相同的材料,在不同课程中说法不一,甚至观点相左,这当然是个别情况。从课程性质与作用看,论、史、工具,基础知识、应用知识、相关学科知识,通识与专精,课堂讲授与操作训练等,诸如此类的各种关系,都要处置妥帖。为此,各类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与教学内容应明确划定,学时学分的分配应合理,整体安排应符合循序渐进的规律,切忌跳跃性或任意填充式的无序的排列。

5. 本科同中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前后衔接关系也应注意

大学新闻院系本科招生,连年报捷,生源量多质高。这为新闻教育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随着新闻知识的普及,一些内容已融入中学教学之中,如新闻写作的某些常识。这不仅影响大学的本科教学内容,甚至也涉及课程体系,如《基础写作》这门课应去应留或应革新,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展,有不少新成果要注入教学之中,使一些课程内容更新、加深,也可把有的课程或其中部分内容,提升到研究生阶段去学习,如《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可以在研究生中开展学习讨论。

课程体系是一项科学的设计工作,它的落实还要靠丰富的教学内容和良好的教学方法,那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的新闻教育的另一项重要课题。

(原载《新闻大学》,1997年冬季号)

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

中国新闻史教学历来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已有 80 年开课历史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以内容厚实见长。但是,近年来遇到不少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显露出危机。因此,亟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力争化危机为转机,开创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新局面。

在我国,新闻史课程的开设,同高等学校新闻系科或报学系科的创建是同步的。1920 年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就设有《新闻学历史与原理》课程。随后多所高校成立报学系科或新闻系科,都设有《中国报学史》或《中国新闻发达史》课程。这时我国的高等新闻教育,是仿照美国的办学模式,尤其是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为蓝本。该院第一学年第一学期设有《新闻史论》课程,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设有《新闻史》课程^①。

20 世纪 20 年代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的初创时期,这时中国新闻史课程的名称为《中国报学史》或《中国新闻发达史》。戈公振是最早的任课教师之一,他先后在上海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讲授这门课程。名著《中国报学史》,既是专著,又是教材。它是为教学需要编写的,为中国新闻史课程设计了理论架构的基本内容。

戈公振的任教和《中国报学史》的问世,为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新闻史》课程“立”起来了。当时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是介绍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沿革与概况,正如复旦大学新闻系首任系主任谢六逸所说:“中国报学史,讲授现在国内著名报纸的沿革与概况,本国报纸发达的经过,注重压迫言论的事实的研究,本国报纸所受国外报纸的影响。”^②显然,还未涉及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的学习。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少数学校的新闻系在困境中坚持办学,《中国新闻史》能继续开课已属不易,更说不上发展了。50、60 年代,中国

^① 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载《教育杂志》1930 年 12 月号,已收入《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② 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载《教育杂志》1930 年 12 月号,已收入《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新闻史教学却出现了崭新的局面。195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央责成马列学院设立新闻班”和“扩大现有的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数目”。当年9月,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后改名中共中央党校)就开办了新闻班,编写《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是这个班的一项重要任务。该班组织教学人员收集报刊史资料,编写教学大纲及重要报刊介绍,大纲草稿送胡乔木审阅。195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传达胡乔木对大纲及报刊史教学的意见,讨论大纲草稿。根据座谈会上传达,胡乔木认为,报刊史同思想史是有区别的,报刊史应以报刊发展的历史为主,叙述报刊在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他强调指出,报刊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対报刊工作进行思想教育,因此,必须详细地介绍一些杰出的报刊工作者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还提出,报刊史是新闻业务教育的一门极为重要的课程,革命报刊工作的基本问题,应该通过报刊史来加以阐述。

马列学院的大纲和胡乔木的意见,对中国新闻史教学影响巨大、深远。与此同时,苏共报刊史被介绍到中国来,请苏联专家讲课,出版了教材,也有不小的影响。再加以经历的大环境是,国内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到倡导“兴无灭资”革命化;国际上强调反帝反修。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新闻史教学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介绍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为主,以评述新闻宣传内容为重点,提出了与《中国报学史》截然不同的理论架构与内容安排。同初创时期相比较,过去注重历史沿革与概况,讲形式多,此时注重新闻宣传的历史分析,讲内容多,强调了新闻宣传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此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颇受重视,课时为每周3学时、一学年,专业基础课的位置稳固。但是,无论在教材上还是在课堂讲授中,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重复较多,有明显的、当时广泛流行的“左”的色彩。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70年新闻系重新招收学员开始,《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是新闻系的重点课程之一。当时明确规定“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而《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①一文成为教学的唯一依据。以这篇文章为纲,歪曲编造历史。

“文革”结束后,恢复《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新闻史教学也出现了繁荣局面。其主要表现为:1)各高校新闻院系都开设了《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一般为每周3学时、一学

^① 《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副题为《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本文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1968年9月1日发表。

期),它仍是专业基础课程,国家教育部新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也认定它是一门核心课程;2)除通史性质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外,一些学校新闻院系还开设了《新闻法制史》、《名记者与作品》、《新闻业务史》等以历史为线索的课程,出现了新闻史课程的群体发展趋势,而通史的内容也由此得以扩展,由新闻事业史拓宽为新闻传播史;3)从1987年起,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开考,把这门课程的教学推向社会,推向全国,使它具有广泛的普及性;4)教材建设进展很快,并出台了两个全国通用的大纲,即全国高等学校自学考委员会审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教育部)批准的《中国新闻史自学考试大纲》(1987年、1999年两个版本)、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1995年版)两者都具有规范作用;5)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人员的队伍扩大了,全国有数百人。所有这些,表明中国新闻史教学有扎实的基础,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新闻史教学中的问题和困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潮涌动的形势下,中国新闻史教学前进的步伐显得缓慢,一些矛盾和缺失凸显出来了,在某些方面存在危机。下面列举几点,以为例证。

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从教学内容到理论架构都较为陈旧,不能满足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需求。如前所述,我们的一整套教学思路与方法,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形成的,影响至今,其主要特点是,着重讲新闻宣传内容、新闻宣传领域的斗争和中共党报活动,很少讲信息沟通(特别是与国外的交流)、业务经验(特别是经营管理经验)和非党报刊的活动。在历史分期方面,古近代部分仿照中国通史,现当代部分直接采用中共党史的分法,未能充分体现中国新闻传播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自身规律。

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二是,统一的课程,不能适应“分流”的需要。我们历来只开一门《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这就是统一。然而过去只是单一的新闻专业,现在除新闻专业外,还有广播电视、广告、编辑出版、传播学等专业,过去只有本科层次,现在除本科外还有专科、专升本、硕士生、博士生等层次;过去只有全日制学生,现在除全日制学生外,还有在职研究生、自考生和夜校生,这些就是分流。适应这种分流的形势,有些专业就不开统一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分别改开《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广告史》等课程。由此,要不要坚持开设《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就成为尖锐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外,不同层次用同一种教材,教学内容相似,拉不开差距,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三是,学生的历史观念淡化,对于学习历史不感兴

趣。他们认为《中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程枯燥乏味,今天已经远离革命战争年代,也不再讲阶级斗争,过时的经验与知识毫无用处。他们不重视整体的知识结构,也不看重继往与开来的关系。

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之四是,师资问题。新闻史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十几人,80年代就有几十人,90年代增至百人以上,现在有数百人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中,有“转业”的,即从非新闻专业出身转教新闻史的,也有“兼任”的,即教其他课程兼教新闻史的。他们带来了学科融合的新气象,但他们要熟练地掌握新闻史教学内容,需要时间和其他条件(查阅资料等)。即使是任教多年的教师,也需要有时间和其他条件来学习新知识,研究新课题。但是,浮躁的学风和学校一些急于求成的措施,使他们忙忙碌碌,应付杂务,不能安心“坐冷板凳”。

如此等等,问题不少。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酿成日益严重的危机,势必导致专业基础课程的地位动摇与新闻史教学萎缩,势必削弱新闻史在培育学生素质与完善学生整体知识结构中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存在边缘化的趋势,新闻史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核心课程)的地位日渐模糊。我们应该直面现实,努力化危机为转机,为中国新闻史教学创造一个新局面。而从全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形势来看,目前正是我们审视以往、开拓未来的有利时机。这是因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与历史传统;在新闻出版界的“三项学习教育”中^①,也必然要涉及历史经验与历史传统;而更为直接的因素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教育事业迅猛发展,至今全国已有近400个专业点,理应接近或进入饱和状态。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巩固与提高的问题,即加强专业建设的问题,从全局的发展战略,到各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等,都需要重新研究。此时此刻,我们也应该在分析现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新闻史教学设计新方案,其中包括课程定位、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师资培训等。为了设计好这一方案,我们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学生的、教师的和新闻界人士的意见,而首要的是我们任课教师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明确的看法,达成共识。下面,提出几个问题,同大家商讨。

第一,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念,整合课程群体。

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新闻史教学基本上只有一门《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80年代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至今已经出现多门课程。我们应该树立

^① “三项学习教育”,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

“大新闻传播史”观念,及时地将多门课组合成一个群体,其中有新闻史,也有传播史;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通史,也有专史。当然,《中国新闻传播史》和《外国新闻传播史》是两门主干课程,它们的性质是专业基础课程,即新闻学类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此外,有的可列为专业必修课程,如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必修《中国广播电视史》(或《中外广播电视史》),广告专业的学生必修《中国广告史》(或《中外广告史》);有的可列为选修课程,如《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史》;有的可以列为专题讲座课程,如对传媒、人物历史的个案评介(《范长江及其作品》、《大公报史论》,等等)可组合成讲座课。

中外分别开课,还是合在一起?作为通史课程,长期以来是将中外分成两门,各自独立^①。如果能将两者合并成一门课程,中外一体,当然很好,但内容太多又太复杂,构建理论框架不易,需要作深入探讨和反复试验,才能确定。因此,近期仍以中外分别开课为宜,同时着手研究合并方案。至于广播电视史、广告史、出版史等,中外同样可分可合,或分合并存,可视具体条件和需要而定。

通史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细化,才分流为各种专史。专史有专业的,如广播电视史、广告史;专门方面的,如新闻传播法制史、新闻业务发展史;个案的,如新华日报史、斯诺的新闻活动。通史和各门专史课程的开设,显示了新闻史教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念,有利于课程整合,也就是根据不同内容与要求,确定各门课程名称与性质,划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与专题讲座课程,规定学时、教学方法与具体安排等。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从“大新闻传播史”观念出发,各个相关方面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为繁荣新闻传播史学科出力。

第二,增强全局观念,全面介绍历史。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是以现代(1919—1949)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中心进行教学的。学生们反映它是党报史,是解放区新闻史,是报刊的政治斗争史。这说明,我们在抓住“中心”的同时,对于全局关注不够。例如,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新闻事业占统治地位,民营新闻事业也有很大影响,小型报曾一度风行,而我们在课堂上对这些方面的情况讲得很少,连基本的数据也没有。

我们讲的是新闻传播通史课程,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反映历史全貌是基本要求。因此,必须有全局观念。这里所说的全局观念,在中国新闻传播

^① 另有一种情况是,将中外两个独立部分并在一起,成为一门课程——《中外新闻事业史》,只是课时上的合并,内容没有融为一体。

史方面是指全国观念,在外国新闻传播史方面是指全球观念,也就是要全面地叙述历史。讲通史有全局问题,讲专史也有专业的或专门方面的全局问题,地方史也有当地的全局问题。即使是个案,也不能只讲一点不及其余。当然,讲解历史现象总会有轻重、详略、主次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在全局观照之下的,有助于正确认识与理解全局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如何理解与运用“以我为主”的思想原则问题。胡乔木曾说:“《解放日报》改版,根本的关键,是‘宣传上要以我为主’。‘以我为主’这个思想非常重要。联系到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可以看出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原则。宣传上总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叫做‘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①这是“以我为主”的本来涵义——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思想原则。我们在介绍有关历史现象时,是努力体现这一思想原则的。如,在讲述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军事宣传和政治论争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将这一思想原则泛化,推而广之,用它来解释全部历史。

我们的立足点是,尊重历史,客观地全面地看待历史;我们的任务是,将历史的本来面貌,包括种种经验教训和曲折的历程,客观地全面地介绍给学生。为此,中国新闻史教学在多方面需要改革,例如:

——探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建设新的理论架构。这是中国新闻史教学面貌实现根本变革的关键。目前,有些教材或专著已对历史分期作了调整,但仍属局部的、尝试性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架构,它既不同于戈公振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架构,也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采用的第二个理论架构,而是全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三个理论架构。这一架构,应该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大局,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体现新闻传播事业特点,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史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为了建设这一架构,我们一要大胆设计,二要深入研究,三要反复试用,在此基础上全面推广。

——充实一些过去不够重视却有实际需要的内容。如,对于国民党的传媒与人物、中间派的传媒与人物、外国在华的传媒与人物,一般是放在斗争对象或陪衬的地位讲述,或者语焉不详。这就不够全面,也偏离了历史的全局。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历史事实,在全局的观照下,详其应详,略其应略,合理取舍,力避片面。

——要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对进步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作具体的、全面的阐释。进步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我们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它们不是任何时候都占主导地位,它们自身的发展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经历了曲折坎坷的道路。我们决不能搞变相的“三突出”^①。

第三,加强专业观念,显示专业特色。

相对于中国通史而言,《中国新闻事业史》是专业史,或者说是专业的通史。学生通过这门课程学习,能够了解这一专业——中国新闻事业产业与发展的历程,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作用,它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换言之,学生可以从历史的视野学习专业理论与知识,学习做人与做事。但是,我们在教学中讲得比较多的是一般的历史背景和新闻宣传内容,并且是按照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脉络讲课,对于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与历史经验介绍较少,专业特色不明显。而没有特色,就没有独立地位,就可能成为其他课程(如《中共党史》)的附属与补充。《中国新闻事业史》要成为有特色的新闻通史课程,应该调整与充实内容,在一些方面有所加强,例如:

——对于新闻思想与新闻理论的历史评析。从维新派、革命派到国民党、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和新闻观点,从王韬、梁启超到徐宝璜、邹韬奋等人的新闻思想,我们作了不少介绍。问题在于,只讲政治意义与介绍经验,从学理上分析不够;对有些人(如张季鸾、成舍我),讲得很不充分;对有些人(如胡政之、曾虚白),还没有讲到。

——对于经营管理的历史评析。经营管理与采编业务并重,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新闻界有这方面的传统。时务报馆由梁启超主持笔政,汪康年主持馆务,各扬所长。邵飘萍、邹韬奋、史量才等主持报刊时,都是两者兼管的。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根据地,情况特殊,新闻事业作为党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实行供给制,不计盈亏。而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仍然设有经理部,重视对广告、印刷、发行的经营管理。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中,这方面讲得太少,沿革不详,脉络不清,更不用说规律与经验了。

——对于新闻法制与职业道德的历史评析。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中,对这两者都有所涉及,但仅仅是个案介绍,较为琐碎,缺乏系统性。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历史上有过哪些新闻法规,有过哪些关于职业道德的论述和事例,更要让学生了解新闻法制与职业道德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其历史发展的轨迹。

^① “文革”中对文艺作品创作的要求,即,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对于人物、事例、作品的历史评析。增加有关杰出新闻工作者、突出事情与案例、优秀作品的评述,不仅能充实课程内容,加深学生对历史全貌的了解,而且能使课程教学生动活泼,提高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

此外,对于外国在华新闻机构和外国新闻记者在华活动的历史,也应该有所介绍。

第四,坚持史论结合,以史为本,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是《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大量的史实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观点,在历史中形成的理论是具体的、生动的、来龙去脉很清楚的。因此,这门课程在培育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新闻观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史”,是根本,不能离开“史”发空论。讲“史”,要“点”(历史现象)、“面”(历史概况)、“线”(历史线索)三者相结合。“点”要具体,“面”要周全,“线”要清晰。一些主要的历史现象,如重要文献、著名人物、优秀作品、重大事件以及重要新闻思想与工作经验等,要作为重点讲述,甚至要讲细节。但在课堂上也要避免作过细的考辨论证,那样会偏离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要求。

“论”,是对于历史的论说,往往是把历史过程讲清楚了,“论”的色彩也就出来了,如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中的改革,夹叙夹议地评介其经过情况,既有过程与做法的描述,也有党报理论的介绍。“太史公曰”式的简单点评和归纳性的专题评介(如维新派的办报思想),都是论说的形式,但都不能离开史实,这也是新闻史论与新闻学概论不同之处。

重视史论结合,目的是引导学生理解历史,有效地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和教育作用。

第五,改进教学方法。

新闻史课程历来采取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参观、访问、讨论等。但近年来客观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一是授课对象从单一的本科生发展为多层次、不同性质(全日制、自学、培训)的学生;二是教学手段和教学设施的改善,如计算机和多媒体的运用。这就要求教学方法作相应的改进,例如:

——不同层次要拉开差距。我曾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过新闻史课,我试用的办法是:对大专生与本科生,以课堂讲授为主,介绍基本历史知识,以现代和当代部分为重点(大专、本科有详略的差别);对硕士生,在课堂讲授的同时,指导自学,组织讨论,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政策与历史经验为主,重点在当代;对博士生,以课堂讨论为主,研讨重要历史现象和重要问题,如梁启超的新闻思想、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等。

——重视干部培训。与文史哲基础学科不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实践性较强,培训从业人员是一项重要任务。在我国庞大的新闻队伍中,多数是非新闻专业出身的,他们需要系统学习新闻专业知识,《中国新闻事业史》是其中必学的一门。对他们讲课,时间短、内容多,只能理线索、讲重点。特别是有些重大的、著名的历史现象,他们只知题目,不知内容,如“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与党报改革”,这个题目也许他们听过数百遍,但不了解其过程与意义。对此可以作系统的、全面的介绍。对于一些有特点的历史经验,如报纸杂志化、小型报精编等,他们很有兴趣,也值得仔细讲。

——与有关课程协调内容安排。广播电视专业、广告专业都要讲自己的专业历史;有些课程,如《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等,也多有涉及历史之处;也有些课程是直接讲述历史的,如《名记者与作品》。所有这些有关课程,我们都应该了解与尊重它们自身的需要,与它们协调,合理安排,各得其所。作为通史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具有综合性和基础性,视野开阔,能够融合各专业和各专门方面的历史,自成一格,而不重复其他课程的内容。

——重视技术手段的运用。计算机和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使用,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许多过去无法让学生阅览的资料,都可以放映出来,供大家观看与研究。此外,我们还可以选择放映一些电视片、电影片,使我们的教学更为生动活泼。

第六,革新教材。

在中国新闻史学科领域中,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教学同科研紧密结合在一起。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学术价值很高的教材,开了一个好头。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党校也是以编写教材为中心,开展报刊史研究的。80年代以来,教材建设速度加快。从那时到现在的20多年中,出版教材(教科书、讲义),包括辅助教材(大纲、文选、资料),估计在60种以上。数量不少,但在内容和体例上基本上是相同或近似的。从一方面看,这种情况表明我们的教材比较成熟;而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的教材缺乏创新。在培养学生的具体要求时有更新,新闻史研究时有新成果,种种条件时有变化的形势下,我们的教材也应该与时俱进,常有新面貌出现。

如果认可“大新闻传播”观念,注重全面性和专业特色,坚持史论结合,那么,我们应该重新编写教材,至少对现有的教材在内容和结构上作大幅度调整。编写方法也要有所更新。

有的教师曾经提出以人物为主线编写教材,像中国文学史那样着重讲作家和作品。按照这种设想,教材可以写得具体、生动。但是,采用这种写法困难很

大。新闻媒介同文学作品不一样,前者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后者是个体劳动的产物。特别是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是党领导下,集体劳动与集体智慧的产物,“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①。因此,媒介不能作为个人的事业来看待。但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也可能找到变通的办法。比如,或以人带事,或因事出人,或两者兼用。众所周知,解放前的一些著名人物,如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等,都被公认是他们各自事业的象征或代表,许多事情和某些思想主张都以他们为中心展开。解放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广泛的新闻宣传活动中,也涌现出不少成绩突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优秀的新闻作品,如抗美援朝中的魏巍与《谁是最可爱的人》,典型宣传中的穆青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

教材有统编的,也有自编或合编的,对此也有合理掌握的问题。自学考试是国家统考,需要统一组织力量编写供全国与地方使用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全日制本科,既要考虑全国统一的要求(研究生入学考试也需要),也可以有不同风格与特点的教材,全国统一的,可搞一个指导性大纲。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织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有7万多字,除章节、目之外,还有内容要点,太详细了,而且是1995年出版的,至今已有9年之久,可以重编了。新编的大纲,应该明确规范本课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不必过细,给讲课者多留些余地。教材可以一校自编,也可以多校合编,像现在一样不搞统编,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教材还有配套问题。一种配套是本科生、研究生各一套,或本、硕、博各一套。另一种配套是,教科书(讲义)、参考书(文献、资料书)、电子教材(碟片或盒带)、参考影视片等。

以上所述6项理念与方法,属可取可舍可改之列,革新的关键还在于我们任课教师的热心进取。目前正处于我国新闻教育大发展,课程需要重新整合之际,我们应该抓住机遇,适时设计新方案,以新的主张和新的成果造成新的发展势头。

(本文为提交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的论文,
写于2004年4月)

①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1942年9月22日。

教 案 选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

第一节 新闻传播从口头到文字

一、远古时代的口头传播

在人类生活中,信息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原始人,也会有举手、投足或呼叫示意之类的动作,只不过经历了由生存本能动作到自觉行为的过程。进入原始社会后,获取新闻信息逐渐成为人们的主动行为,交流新闻信息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最早出现的传播新闻信息的方式是口头传播。“元谋人”是早期直立人,处于有声语言形成阶段,至少应该有体态语。而距今约 70~23 万年前的“北京人”,已有清晰的语言;距今约 1.8 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运用语言相互沟通。可以说,中华民族祖先的口语交流与信息(包括新闻信息)传播,有万年以上的历史。随后便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有关传说。

司马迁写道:舜“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舜对一位名叫“龙”的人说:“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认为,“纳言,喉舌之官也。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信也”^①。

由此可见,在传说中,舜是重视了解各方情况的,设“纳言”这一官职的目的是沟通上下。那时还没有文字,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是语言,仍属口头传播时代。

二、文字传播的出现及其初步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在西安半坡村发掘了一个完整的原始居民村落遗址,其中有石制的刀、斧、铲、凿等,骨制的针、锥、钩、叉等,石制和骨制的箭头,还有陶制的

^① 转引自《五帝本纪》,载《史记》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8~42 页。

甗、罐、钵、盆、盘、碗、杯等。在陶制器皿上,绘有各种图案和动植物形象,还刻画了形状规则的符号,有二三十个之多。这些很可能是记事传意的符号。据考古测定,这些东西是距今约6 000年前的遗物,年代稍早于舜。如果把陶制器皿上的符号视为文字的话,那么,这就是具有萌芽性质的文字传播。但在远古时代,这类符号传播不可能取代口头传播。口头传播仍是那时普遍采用的方式。

到商周时代,中国文字逐渐定型,产生了甲骨文和金文。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都可以用来刻写,这就为文字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甲骨文中“边报”、狩猎等记载^①。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竞争激烈,出现了周游讲学、馆舍养士的风气,因而沟通信息、了解时局是必须进行的。如《晏子春秋》写道:“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②这就是说,齐桓公曾经以书面形式向下属作通报。那时还建立了传递文书命令信函的快捷邮路,连孔子也用它形容德政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③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直接影响新闻传播的,一是发展交通,一是统一文字。

修驰道、通水路、去险阻,有利于秦王朝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信息沟通。秦始皇以此为得意之举,仅在公元前220年至前210年的11年间,就五次沿驰道出巡,并多次在所到之处刻石记行,歌功颂德,以显示威风。但此举也起到记载与传播新闻信息的作用。

“书同文”,为文字传播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条件。一些广而告之的政令文书,无形中成了新闻传播的材料,如史学界所称的“四十字诏书”。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即建立统一国家的当年,发表诏书统一度量衡,全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这则诏书,报道了秦王朝建立的消息。据考古学家认定,这则诏书是用刻了字的10个木戳印在陶制量器上的,随着陶制量器的广泛使用而传遍全国。考古学者马衡说:“这实在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用。”^④

^① 参见《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居延新简》、《散见简牍合辑》等书,均为文物出版社出版。

^②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81页。

^③ 《孟子·公孙丑上》。

^④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

汉代使用的文字载体是竹木制成的简牍。它便于书写,比金石刻字省事得多。在出土的汉简中,除有关屯戍的记事与报告外,还有上行、平行、下行文书,甚至有邮递记录^①。其中有不少内容在当时应属新闻信息,这是官方新闻传播的方式之一,随后也可能有所扩散与转抄。

“露布”,又称露报,原意指不加封检的、公开发布的文书。在战国时期就有“露布”,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中说:“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由此可见,“露布”是进行宣传鼓动或传播新闻的一种方式。它直接面向大众,能取得现场实效。所以,汉代及其以后的封建王朝更多地将它用于发布军事捷报,把最新消息写在木板或丝帛上,高高悬起,以吸引读者。这是一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方式。

汉代在京城设有“邸”^②,在地方设有“传舍”^③,都是招待所性质的机构。往来过客,匆匆聚散,交流见闻应在情理之中;何况地方诸侯王还专门派员(郡邸长丞)驻京,负责沟通与联络工作,他们当然要关注各方动向,收集情报,这在客观上也起了传递新闻信息的作用。但是,史籍中未发现有关汉代邸报的记载,更无实物佐证。

西汉开辟了横贯亚洲的陆上商贸通道——丝绸之路,汉使张骞两度出访“西域”,推动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这理应是一次规模宏伟的新闻信息交流活动,但目前缺乏文字与实物资料,有待今后作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

三、多种形式的传播

在我国古代,原始社会解体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际交往的增多,信息交流也日趋频繁。新闻传播渗透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使用的媒介也是多种多样的。

以文字为媒介的,是使用最多的传播方式,有书籍、文书、记录材料等。相传孔子曾编辑、整理“五经”^④。他晚年读《易》,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⑤。从西周到东汉,先后出现石头书、竹木简书、帛书和纸书。许多书,包括经典著作,其

① 参见林梅村、李均时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汉代各郡国在京城设有邸。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西汉会要》第66卷。

③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句,注:“客馆也。”又,《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三年“沛公至高阳传舍”句,注:“师古曰:传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

④ “五经”,指《诗》、《书》、《易》、《礼》、《春秋》5种书;又有《六经》,即此5种再加上《乐》。

⑤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爱读《易》,因阅览次数多,使串联竹简的皮绳几次折断。

中都有—些内容属于新闻材料或时事言论。从周代起,朝廷(甚至诸侯王国)就设有史官,负责收集、记录、编撰历史,即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他们所记,也不乏当时的新闻信息。史官的设置延续了几个朝代。

以语言为媒介的,有诗歌、民谣、村头闲话、街市议论等。《诗经》就是一部民间流传诗歌的选集,反映了商周时代的社会生活与民情风俗,有些诗句很可能是从当时传闻或议论衍化而成的。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交往的日趋密切,诗歌传诵同新闻传播相伴而行。

以实物为媒介的,有烽火、旗帜、锣、鼓、符等。这些媒介主要用于传递军事情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早已被统治者引为警戒^①。“鸣金收兵”之类,更是古人的常识。鼓、旗也是古代传递军事信息的工具,如《孙臬兵法》中所说“夜则举鼓,昼则举旗”。虎符、兵符,是秘密传递重要军事情报的工具。

人际传播在古代有着重要作用,如游说、讲学、传递情报等,曾风行几个朝代。孔子周游列国,结交政要,讲学收徒,起了带头作用。战国时期,游说讲学之风更盛,知识分子的博学多识、能言善辩的风貌,充分展示出来了。他们谈论的材料,有不少就是时事见闻。在诸侯竞争中,搜集、利用情报也是屡见不鲜的。如信陵君的“食客三千人”中,就有为他提供情报的^②。

第二节 中国古代报纸的出现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③

从原始社会到魏晋时代,新闻传播无疑已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一部分,却没有诞生专用的新闻媒介,新闻信息同其他信息融合在一起传播。据考证,到唐代才有确证出现了专门用以传播新闻的媒介,即今人所说的中国古代报纸。

^① 《史记·周本纪》：“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② 《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③ 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有多种说法，除始于唐的说法外，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始于汉。它的主要根据是，《西汉会要》第66卷“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一句注：“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由“通奏报”，推论有邸报。但在史籍中，未见关于汉代邸报的记载，推论未能证实。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1章第2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在唐代人的著作和有关唐代的史籍中,已出现“新闻”、“编辑”等名词^①,至于“报”、“状”、“条报”、“杂报”等名词,出现次数更多。如杜牧在《与人论读书》中写道:“前数月见报,上披阁下谏疏,锡以币帛,僻左且远,莫知其故。近于游客处,一睹阁下谏草,明白辩婉,出入有据。吾君圣明,宜为动心。”^②有些唐人著作还描述了具体情节,如孙樵^③的《经纬集》中有一篇文章《读“开元杂报”》(又作《读“开元杂记”》)^④,记叙了他自己曾经“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内容为记录皇帝、臣僚的一些活动。起初他以为这些材料写的是“朝廷近所行事”,后来有人告诉他“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报于外者”。他便将这些材料与《开元录》核对,结果“条条可复”。尔后,他升官到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不同于“数十幅书”上的描写,进一步证实了那些材料记录不是当时政事。他感慨地记下这件事,把这“数十幅书”称为“开元杂报”。

从孙樵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所谓“开元杂报”,指的是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年至741年)一些朝廷消息的汇集,而不是一家报纸的名称;它是手抄的,不是印刷的,孙樵“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即将得到“数十幅书”的经过和他的感想写在书帛之后;它的传播范围很小,孙樵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文人,曾经为皇帝所重用,他对“开元杂报”尚且如此珍视,一般人恐怕是很难看到的。

然而,更具重要意义的还在于,孙樵的文章证实:唐代确有官方发布、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开元杂报”就是抄件。孙樵到长安后“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做法依旧,只是内容与开元年间不同。开元年间传播的是“皇帝亲耕籍田”、“百僚行大礼”、“皇帝自东封还”一类盛世景象,而孙樵在京城所见所闻的却是“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一类的政务琐事。两者都是“条布于外者”,没有根本差异,因此,孙樵的文章较为确凿、具体地证明了唐代的新闻媒介可能就是“开元杂报”一类的传抄材料。果真如此的话,人们就可以称它为早期的中国古代报纸。

孙樵记述的“报”,是朝廷发布的,而将朝廷公文与有关情报通向地方当局(节度使、观察使)的则是“进奏院状”。在唐代人的著作与有关唐代的史籍中,对于进奏院、进奏官及“进奏院状”(有时也称“报”)的记述很多。但是,这种“状”能不能算作古代报纸,至今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

① 参见《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1章第2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杜牧:《樊川集》卷十二。

③ 孙樵,字可之、隐之,关东人。唐代大中进士,授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军入长安时,曾随僖宗奔岐陇,迁职方郎中、上柱国。著有《孙可之集》。

④ 《四库全书总目》作《读“开元杂记”》,《孙可之集》等均作《读“开元杂报”》。

二、中国古代报纸的特征

中国古代报纸,通称为“邸报”。其实,它有多种名称,如“状”、“报”、“邸吏状”、“朝报”、“塘报”、“驿报”、“邸抄”、“阁抄”、“牌报”,等等。“邸报”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称谓。但所有这些名称,都不是专指某一家报纸,即不是专有名词。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一家冠以“邸报”或“朝报”之类名称的报纸。以“邸报”作通称,指代中国古代报纸,已是约定俗成了。我们不能用今天所见到的报纸形象去衡量古代的报纸。作为新闻传播媒介,古代报纸同现代报纸在基本功能上是相似的;但因时代条件不同,两者在许多具体方面又明显不同。那么,“邸报”按其性质应该是中国古代官报,究竟有些什么特征呢?

首先,它的内容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刊登的是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折以及官员的任免升降奖惩、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不仅没有专文、专讯,甚至连专门采写的新闻也没有。

其次,它的形式也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只是一个材料又一个材料的堆砌,没有分栏,也没有标题,更没有消息、通讯、评论等文字体裁的分野。它也没有四开或对开的版面,而是或抄在帛上,或写在纸上,或印成单张,并无定型。当然,也没有广告。

再次,它的发行与传递也不同于现代报纸。它是由朝廷或官方其他机构发布、由水陆驿站传递的,而不是由报馆出版、发行的。那时还没有作为独立行业的报业。

总的看来,它刊载的材料来自官方,有官文书色彩,但毕竟不是作为具有行政效力的文件下达,而是作为满足人们(主要是官员)了解朝廷动向的需求而抄传(或印刷传播)的。因此,它是一种新闻传播媒介,这种性质在它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日趋明显。

第三节 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

一、唐代的“报”与“状”

唐代是我国最早有报纸的朝代。唯其最早,所以面目不甚清晰,以至于后人在研究中有诸多分歧。如前一节所述,唐代有朝廷发布的“报”,也有来自进奏院的“状”。但“报”只有文字记载,无实物可考;“状”却有实物可供研究。

关于朝廷发布的“报”，根据历史记载可以推断：朝廷发布时，京师官员和各地驻京进奏官都会作抄录，随后转递传阅，因而它具有新闻传播的作用。这种推断是合理的，但需要进一步取证。

进奏院是唐代各地方当局（节度使、观察使）的驻京办事处，主要职责是招待各地来京办事的官员、转递公文、收集情报等。据《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记载，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诸道先置上都邸务，名留后使，宜令并改为上都进奏院官”。这是进奏院设置的开端。此前，进奏事务是由留后使承担的。再上溯至唐初，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起就为各州朝集使在京城建造邸第^①。但是，这些邸第是否编发过“状”或“报”？邸第与进奏院有无递嬗关系？这些都属疑案，有待进一步研究。

进奏院设置后，做了不少工作，柳宗元写过一篇《邠宁进奏院记》，对于进奏院的建立及其活动作了具体评述。关于进奏院状，许多唐代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如元稹、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著作中时有提及。进奏院状的基本内容为谕旨、奏折、官方动态等。

20世纪80年代，先后发现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各藏有一份唐代归义军的进奏院状（因归义军节度使驻所在敦煌，所以人称敦煌进奏院状）。英国收藏的是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前后，驻京城的归义军进奏院发回给归义军节度使的，主要内容为报告归义军派往朝廷专使晋见皇帝及与大臣交涉的情况；法国收藏的是，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前后，驻京城的归义军进奏院发回给归义军节度使的，主要内容为报告归义军专使在京活动情况。两者都是用毛笔写在纸上的。

从进奏院的角度看，这两份“状”都是它呈递给主官（节度使）的文书。但是，两者的内容并不是朝廷公文所载的，而是进奏院官员收集、归纳的，具有新闻报道性质。这类状，在进奏院发出前、在传递过程中、在主官收到后，都有可能抄录、传阅，因而它实际上发挥了新闻传播媒介的作用。可以说，它“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②。

二、相当发达的宋代报纸

邸报这个称呼，是从宋代开始的。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

^① 参见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一文，见《柳河东集》卷26。邠宁，唐代方镇名，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置，治邠州（今陕西彬县），辖地有今陕西、甘肃各一部分。

^② 引自《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章第2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一书的《邸报》条中,引用了《宋史》中《刘奉世传》、《吕溱传》和《曹辅传》的有关材料,说明“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即承此说。虽然邸报后来成为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报纸的习惯称呼,但在宋代与邸报同时并用的还有进奏院状、报状、邸吏状报、朝报等多种称谓,也都指的是同一事物,即中国古代报纸。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报纸还没有报头(专有名称)和编辑格式,只是一些新闻材料的抄录。

在宋代史籍与宋代人的著作中,关于邸报(含进奏院状、朝报等等,下同)的记述很多。其中有描述编发情况的,如《宋史·刘奉世传》和赵昇的《朝野类要》等;也有记载阅读情景与观感的,如陈师道在《后山丛谈》一书中写道:“乘崖在陈,一日方进食,进奏院报至,且食且读,既而抵案恸哭,久之哭亦止,复弹指骂詈久之,乃丁晋公逐莱公也。”^①王安石写过《读镇南邸报》^②诗一首,苏东坡的诗《小饮公瑾舟中》中有“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③句。在他们和其他一些宋代文人的诗文中,多次出现有关邸报的文字,这说明邸报作为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已在官员中流行。

与唐代相似,宋代初期,在京城有地方当局^④设置的进奏院,各自编发进奏院状。但这种情形,为时不长。因为宋王朝是在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第一个皇帝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多方面地削弱地方权力,强化中央集权,所以对于沟通中央与地方信息的进奏院,也必然要加以控制。

宋代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匡义,于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改组进奏院,由中央委派进奏官。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又成立了都进奏院,统一管理各进奏院。由此,进奏院和进奏官从代表地方当局的立场与利益转而成为代表中央政府的立场与利益。

改组后的进奏院和进奏官的基本工作任务,仍然是转递与发抄官方文书。他们编发的报状,原先是地方当局了解中央及京城消息的工具,而今却成了中央向地方发布新闻的工具。在编发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上,也与过去不同:以往是各地方当局的进奏院与进奏官自行收集材料,自行编发,改组后却要经过枢密院审核,甚至由枢密院官员(后为门下省官员)编定,进奏院与进奏官只负责

① 转引自朱传誉的《宋代新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乘崖,即张洎,时任陈州知府;丁晋公,即丁谓,曾封晋国公;莱公,即寇准,曾封莱国公。

② 见《王荆文公诗注》卷二十五。

③ 见《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迂叟,指司马光;醉翁,指欧阳修。

④ 宋代地方行政体制为路与府、州、军、监及县三级。其中,路是从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起设置,有20个左右;府、州、军、监有300多个;县有1200多个。在京城设进奏院的应是路、府、州等。

提供材料和发抄。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起,实行定本制度,办法是:进奏院将所编报状抄送枢密院,经该院审定,成为一种标准本,据此发抄。这种制度一直实施到南宋末年。其间,也有短期松动或取消,如王安石变法时,曾实行由枢密院官员抽检的办法。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赵昇在《朝野类要》一书中,将“朝报”列为文书的一个品种,并解释道:“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

宋代邸报的内容日益丰富,并趋于规范化,其基本内容是:皇帝谕旨及起居动态、臣僚章奏、官吏任免升降奖惩、战报等。这些方面的信息,都是官吏和士子们需要了解的。特别是在宋代地方经济日渐发达和军事活动频繁的形势下,邸报作为传播官方新闻的重要渠道,更备受关注。在严格的管理下,邸报的权威性虽然提高了,时效性却下降了,内容的限制也多了。于是,出现了“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①一类现象,为小报的发展让出了空间。

所谓小报,是一种未经官方审查、自行抄传(或刻印流传)的报纸。这种报纸的新闻来自官方,但传播者各取所需,甚至收入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真真假假,在所难免。赵昇写道:“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②这就是说,从皇宫内廷、中央政府部门,直到官府衙门,都有打听消息、制作小报的。小道消息成了“新闻”。

随着小报的迅速风行,泄密、失实等问题也频频发生,这给官方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官员提出应该查禁小报。曾任兵部侍郎、给事中、翰林学士、同知枢密院事等要职的周麟之,对此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他写道:“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诤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诏用,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竟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闻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也。”周麟之要求皇帝“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③。

从周麟之的文章中,后人可以知道小报的内容、形式、制作者、传播方式与

① 《宋史·刘奉世传》。

② 赵昇:《朝野类要》卷四。

③ 周麟之:《论禁小报》,载《海陵集》卷三。

传播效果等。其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和及时便捷的传播,是小报生存的主要因素。宋代的各个皇帝都曾明令禁止小报,甚至罚款、捕人、科刑、奖励告发,直到发配,但小报始终是禁而不绝,特别是南渡以后,甚至出现“以小报为先,以朝报为常”的局面。

三、元代报纸存疑

有关元代报纸的史料极少,其原因除了元朝立国时间不长、政府机构运作体制不完备以外,还有语言文字方面的困难。元代皇帝的诏令和重要公文都采用蒙古新字,而政府官员中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彼此语言不通,为此专门设置翻译吏员,包括蒙古译吏和回回译吏。这种情况,使得信息传播和材料流传困难重重。元代究竟有无邸报,至今仍是疑问。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引用周密所著《癸辛杂识》里的一则记载,说明元初有邸报。但此说现已被否定^①。

唐、宋时代设立的进奏院和进奏官,元代未设。元代政府中略似进奏院的机构是通政院,但它是专门管理驿站的,没有发布邸报的任务。元代没有门下省,但有给事中一职,担任此职的官员负责修起居注,没有“判报”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政府吏员中有宣使、奏差两类。这两者的职责基本相同,都担负着传达使命,但宣使的地位略高于奏差。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及行省、行台、行院等一、二品官衙中设宣使,六部及宣慰司、廉访司等三品官衙中设奏差。据统计,元代宣使配置数目是:枢密院 19 名,御史台、江南行御史台、陕西行御史台各 10 名,行中书省 40 名。奏差的配置数目是:吏部 6 名,户部 32 名,兵部 8 名,刑部 10 名,工部 30 名,宣慰司 16 名,廉访司 5 名^②。

宣使的具体工作是,宣读皇帝诏书与政府命令、传达长官指示以及催办政务、押运货物等;奏差则是“往来传达,实为行人”^③,既传达长官命令,又收集和

^① 周密《癸辛杂识》中的记载为:“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荣邸近属也。所居尝独毁于火,于是乡人呼为‘王火烧’。同时有黄瑰者,亦越人,尝为评事,忽遭台评,云其积恶已遭天谴,至于独燃其家,乡人有‘黄火烧’之号。盖误以王为黄耳。邸报既行,而评事之邻有李应麟者,为维扬幕,一见大惊,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归,刺史李应山怜之,馈以官楮二万。及归则家无患,乃知为误耳。”周密为宋末元初人,所记之事发生在宋末。以此证明元有邸报,不能成立。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1 卷第 1 章第 4 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参见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 1 章,劳动人事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同上。

汇报下属情况,有的还要管“文移往来”^①。显然,在工作内容与工作方法上,元代的宣使、奏差与唐、宋时期的进奏官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在重要衙门和重要官员中活动,上下沟通,传递信息,其中包括新闻信息。因此,可以说元代宣使、奏差的工作,同历史上进奏官的工作一样,开辟了一条官方的新闻传递渠道,其传递方式有文字的,也有口头的。

关于元代民间的新闻传播,历史记载不多。但在《元史》(特别是其中的刑法部分)和一些元代法律书籍中,有关查禁“妖书妖言”的规定和“断例”却不少。如禁止民间刻印的“小本卖于市”。“小本”有两种,一是刊载小说戏曲唱词的,一是传播新闻信息的。后者类似宋代的小报。在官方新闻传播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小报却不胫而走,官员要看,民间人士也要看。

然而在元代,影响更为广泛的是口头的新闻传播。这是由于文字传播受到了严厉的限制,而人们间的口头交流却是无法禁绝的。同时,元代口头新闻传播的发达还有更深的社会经济原因。元代统治者本来是游牧民族的贵族,入主中原后转而重视农业生产和封建制度的建设,经过世祖忽必烈推行的改革,元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恢复与发展,尤其是市镇经济日趋活跃。这些因素,直接促使人际交往日趋频繁,聚会机会增多。商业贸易的集场,文艺演出的集会,还有村民或市民自发的聚会,这些都成为信息交流的场所。有关的历史记载有很多,如,“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十一月,中书省大司农司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聚约百人,般唱词话,社长田秀等约量断罪。”^②

对于这种口头传播新闻和议论时政,元代统治者采取严令查禁、严厉处置的办法。早在太宗时期就规定:“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③此后,元代诸皇帝多次下令“禁聚众”、“禁集场”,甚至“禁唱货郎”。他们害怕的是“聚首众人,妄说乱言”^④。

四、明代报纸

明代继续抄传邸报,但没有设置进奏院和进奏官。邸报材料的提供者 of 通政司和六科。除了各省派驻京师的提塘官负责抄传以外,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府

^① 参见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3章,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

^② 《通制条格》卷二十七。

^③ 《元史·太宗本纪》六年正月条。

^④ 《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禁聚众》。

也派员或雇人抄录。

通政司的全称为通政使司,是一个沟通内廷与外廷、皇帝与臣民的中央行政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处理臣民章奏。只有为数不多的在京官员向皇帝报告公事的题本直接交司礼监文书房会极门收本处呈递,其他章奏都由通政司递进。由于数量太多,皇帝不能一一亲阅,所以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采用通政司在公厅拆封,书写副本,选择一部分上奏的办法。这种副本(有的是节写本),也通报给中央各有关部门,成为邸报抄传的母本。

六科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简称。各科设给事中,直接辅助皇帝处理公务^①。六科每日派员到会极门领取皇帝批复的章奏,将其中可以发抄的,逐日编辑成册,供各部门抄录,成为邸报的母本。此外,六科还有多方面的工作,如皇帝接见臣僚时记录谕旨,监察六部工作,参与议论朝政、考核官吏等朝廷重大活动,还可以对皇帝批复的章奏提出不同的意见(即“封驳”)。这些都扩大了邸报材料来源。

提塘官,简称为提塘,是各省巡抚、总兵委派的在京师处理文书的官员,这个职位是从明代开始设置的,其职责略似唐宋时代的进奏官。他们将在京城抄录的邸报,按其所需,加工复制,发回本省。

明代邸报的内容,比宋代更为丰富。有皇帝谕旨、宫廷消息、官员动态、军事活动以及臣僚奏疏等,还有农事、天象、灾害报道和社会新闻,如女性变男性、牲畜产怪胎等。据《明会典》所述“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门题奏本,逐一抄写成册”^②的情况看,明代邸报应是逐日发抄,每日一本,形式为书册式。

同唐宋时代一样,明代邸报没有报头,所以称谓不一。大多称邸报,也有称朝报、邸抄、钞报、京报、报帖、除目。还有一种称为塘报的,在名称、内容和传播对象上,与邸报都有所不同。塘报是传播军事信息的,通报何时何地发生了战事以及战况、战果等。邸报是由朝廷抄出后,外发至中央和各地的政府机构与官员,而塘报则是下级向上级所作的军情报告。当然,这只是具体而微的差别。就根本性质而言,塘报和邸报都是官方新闻传播工具。按照“邸报”一词指代中国古代报纸的习惯用法,塘报只是邸报的一个品种。

明代报纸的原件,迄今难见。但在明代人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邸报(包括塘报)的记载,有的还抄录了邸报材料。明代有些文人,有收集、抄录邸报的习

^① 明代设六科给事中,始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六科初为皇帝掌握的独立机构。洪武十年和十二年(公元1377年和1379年)先后隶属承敕监、通政司。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起,又成为独立机构,直属皇帝。

^② 《明会典》卷二一三。

惯,以此作为积累资料、分析时政、研究学术的途径。如顾炎武的祖父,70多岁时,足不出户,“阅邸报,辄手录成帙”,后来“老不能书,略取邸报标识其要”^①。终身不仕、专心写史的学者谈迁,也十分注意收集邸报。他写《国榷》一书时,曾经“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之邸报,补其阙文”^②。他在《北游录》中,还描述了收集与整理邸报的细节。

现有的较为完整的明代邸报抄件,有《万历邸钞》和《天变邸抄》两种。《万历邸钞》是神宗万历年元至四十八年(公元1573年至1620年)间的邸报抄件,但其中缺失不少,抄录时也经过整理(删节、增加摘由和注释)。台北于1969年出版了《万历邸钞》的影印本,共3册。《天变邸抄》在明、清两代多种著作^③中都可见到。它全文有2000多字,翔实记载了熹宗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北京地区发生的灾异事件^④。

北京图书馆藏有一份《急选报》,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出版。书册式,长24.6厘米,宽14.4厘米,雕版印刷。正文6页,用白纸印;封面用黄纸印,“急选报”三字加框。内容为吏部奉旨“急选”的162名官员的姓名、籍贯、职务。明史专家谢国桢认为:“盖此即为邸报之一种,草草板刷,以供传阅者。”^⑤有的中国新闻史学者认为,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报纸原件。

与一般文人相比,明代政府官员更重视邸报。他们通过邸报了解时局,掌握官场动向,甚至作为向皇帝或上级进言的依据。以瞿式耜为例,他是神宗万历年间的进士,曾任知县。思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升任六科中的吏科给事中,当年六月初九日他上《端相本疏》,向皇帝提出:“今后凡遇召对,即命史臣二人,簪笔入侍,记注详核,随于次日具疏奏呈,一面发抄,一面宣付史馆”^⑥。皇帝表示同意。崇祯皇帝死后,瞿式耜又在南明政权先后担任应天府丞、广西巡抚、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直接参与军事指挥活动,经常阅读塘报和钞报。他将其中的报捷消息,及时上报皇帝,如《塘报江西大捷疏》、

①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55页。

② 黄宗羲:《谈君墓表》,见《国榷》附录。

③ 明代金日升的《颂天庐笔》、佚名的《诏狱惨言》,清代张海鹏的《学津讨原》、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等著作中,都收录了《天变邸抄》。

④ 指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北京城内西南角突然大地震一声,天崩地塌,屋倒人亡的灾异事件。对此事件的性质与起因,尚属疑案。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曾在1983年4月30日至5月1日就此举行学术研讨。

⑤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⑥ 瞿式耜:《端相本疏》,载《瞿式耜集》卷一《奏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永城大捷疏》等。他还综合塘报材料上报,如《述各路塘报疏》等^①。

明代出现了“报房”。提塘官办公的地方称提塘报房,表明抄发邸报是提塘官的主要公务。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民间报房。万历年间曾任宛平知县的沈榜,在《宛署杂记》一书中记载,顺天府所属宛平、大兴两县民间经营的132个行业中,典当行等100个行业本多利重,而抄报行、卖笔行、刊字行、图书行等32行本小利薄,户部尚书张学颜等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四月上奏皇帝,请求准予该100行照旧纳税,而32行则查实豁免。皇帝降旨:“朕念都城小民。”^②略早于沈榜,曾任御前讲官的于慎行在其著作《谷山笔麈》中也写及报房。他写道:“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钞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有传者”,“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③这里所谓“报房贾儿”,当然也属“都城小民”。明末曾任御史的祁桂彪曾在日记中写道:“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予乃送之至李子木,令其服役焉”^④。这就是说,明代既有抄报行、报房,又有送报人,作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的报业,正在形成之中,其雏形已呈现。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明代后期,农民起义连续不断。思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起义军充分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新闻传播和宣传鼓动,其中常用的是旗报、牌报和揭贴,这些方式都很简便实用。

旗报,是将文字写在旗帜上,大旗招展,引人注目。有的骑快马传递,让人们尽快看到;有的插在众人聚集的地方,可以围观。明朝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在上皇帝的奏疏中描述旗报:“贼(按:指起义军)复欲反,遣人手执红旗二面,大书飞报贼情。”^⑤

牌报,是将文字写在木牌上,也是一种可以流动传观,或固定围观的新闻宣传方式。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起义军攻入北京当天发出的牌报上写道:“主上(按:指李自成)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祯跳(按:应为逃)紫禁城外。有能投首者,赏黄金千两。隐匿者,戮其全家。”^⑥

① 均见《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沈榜:《宛署杂记》第十三卷《铺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③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一《筹边》,收入《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④ 《祁忠敏公日记》崇祯五年三月初一日条。

⑤ 《杨鹤奏议》卷二十四。

⑥ 钱谦:《甲申传信录》卷六。

揭贴是一种传单,可张贴,可传阅,内容多为檄文、政策性的声明与公告等。如思宗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十一月,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在重庆散发和张贴缉拿张献忠的“招抚谕贴”,宣称“有能擒斩者,赏万金,爵通侯”。第二天,他家的厅堂、厨房、厕所等,多处贴有张献忠发出的揭贴:“有斩阁部(按:指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杨嗣昌惊恐万分,以为“左右皆贼”,精神失常,四个月后绝食而死^①。

农民起义军的新闻宣传,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非禁绝不可。对于其他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新闻传播,明代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也是严加禁止的。在明代的法律中,有许多严厉的规定,如“探听抚按题奏副传报消息者,缉事衙门巡城御史访拿究问,斩首示众”^②。明代没有“定本”制度,但严格控制抄传。“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③。由于限制过严,臣僚深感不便,崇祯年间的御史祁桂彪曾在奏疏中感叹“自抄传禁而情同射复,隔若面墙”。因此,他请求:“于诸凡塘报、奏章,苟非密切机宜、外廷必不可预闻者”,应“照常发抄”^④。但在农民起义和清军进逼的形势下,不可能放松控制。

五、清代报纸

清代官方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仍然是邸报,它也有多种称呼,如邸抄(钞)、阁抄、京抄、京报、朝报、驿报、塘报等。它的抄发制度也基本与明代相同,即由通政使司、六科发抄,提塘官抄录转发。它的内容为宫门抄(皇帝起居、官员觐见、典礼、任免等宫廷消息)、谕旨、章奏。

清代出现一种提塘小报,又称小钞,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三月,左都御史揆叙上皇帝疏称:“近闻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探听写录,名曰小报,任意捏造,骇人耳目,请严行禁止,庶好事不端之人,有所畏惧。”^⑤可见小报为科抄之外的产品,其内容来自官方,却是邸报所没有的,因而容易出现泄密、失实、歪曲等。这种小报在清代——主要是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多次出现,多次被查禁,有人为此被判刑,甚至丧命。

① 冯甦:《见闻随笔》卷上,参见《明史·杨嗣昌传》。

② 《明会典》卷二一〇。

③ 《明史·王应熊传》。

④ 《祁桂彪集》卷一。

⑤ 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二。

如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何遇恩、邵南山因编发小报被斩决^①。

民间报房的发展和京报的刊行,是清代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现象。早在顺治、康熙年间就有民间抄录或刻印邸报出卖的,但屡遭当局查禁。大约在乾隆中期(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左右)以后,民间报房有明显的发展。迄今为止,国内收藏最早的京报实物是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一家名为“公慎堂”的报房出版的。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1年至1776年)、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的京报,也是这家报房出版的。由此可见,公慎堂报房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北京的民间报房各自抄录、刊印的邸抄,都称为“京报”,它们各自有名号,如聚兴、周文、永兴等等,已见到有名称的有10多家,大都集中开设在北京正阳门外。这里离皇宫较近,便于抄录。

同官方发抄的邸报一样,京报的稿件也是从宫廷有关部门抄出来的,只是在选择上略有差别。各家报房出版的京报,内容大同小异。但是,官方的邸报只在官府和官员中传播,范围很小,也不公开发行,这同人们交往日益密切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不相适应,这种情况在清代中、后期越来越明显。因此,公开发行的京报,可以满足人们的新闻需求,能够起到一些“解渴”作用。而且京报的稿件来自权威部门,因此为社会各界所重视。当近代报刊在中国出现后,京报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一些近代报刊还转载或翻印京报。京报是中国古代报纸发展最成熟的形态。

在清代中、后期,地方报刊有所发展。从北京抄发的邸报和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有原件发至地方的,也有中途转抄或翻印的。公元1882年(光绪八年)3月4日,上海《申报》在评论文章中写道:“道咸之间,有所谓良乡报者,盖有信局特设于顺天之良乡,例发之京报出京后,由良乡按站雇人接递,省中官宪自出资以购之,而塘饷或裁或减各省不同,要之恶其迟延以示惩罚耳。然良乡报价贵,不易得阅,至有月需三五千钱者,于是省中之提塘又买良乡报而翻印售卖矣。”^②良乡(今属北京市房山县)靠近北京城,是出入首都的第一个大站,在这里买了京报通过“信局”^③传递,速度较快,各省提塘在良乡购买京报翻印也是

^① 雍正四年五月初五日,雍正帝召王大臣10多人在圆明园内聚会,吃过节粽子,提塘报房的小抄报道:“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圆明园叩节毕,皇上出宫登龙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其数十只,俱作乐,上赐蒲酒,自东海至西海,驾于申时回宫。”其中,登舟、赐酒、游乐等都没有,属严重失实。雍正帝以“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无为有”的罪名,判处何遇恩、邵南山斩刑。有关此事记载,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四,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四年五月庚子日。参见《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1章第6节,该书称:何、邵“是中国新闻史上因办报而获罪被杀的有姓名可考的最早的两个人”。

^② 《申报》评论:《论京报贵速不贵迟》,1882年3月4日。

^③ 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开办邮局(通称“客邮”),中国的民办信局和官办邮局也陆续出现。

图个快捷。这里所称“省中提塘”，即省塘，是兵部派驻各省处理公文的提塘官。省塘同京塘一样，设立报房，抄传邸报，翻印京报。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是在一些省会城市，也出现了民间报房，其经营范围一是翻印京报，一是出版辕门抄。民间报房派人去本省官府抄录文书材料，汇集成册出版，形式与京报相同，内容为上谕、本省公文、本省官府与官员动态等，这就是辕门抄。此外，还有一种称为“行在抄”的，是从皇帝行宫抄来材料出版的，形式、内容都与京报相同。

清代对于新闻传播的控制是极为严格的。几朝皇帝一再宣布，所有章奏未经皇帝允许都不得抄传。《大清律例》的刑律规定：“凡造讖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兵律规定：“凡平常事件，虽非密封，但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刊刻传播，概行严禁。如提塘与各衙门书办彼此勾通，本章一到即抄写刊刻图利者，将买抄之报房、卖抄之书办，亦俱照泄漏密封事件例治罪。其捏造讹言刊刻者，杖一百，流二千里。若有招摇诈骗情弊，犯该徒罪以上，不分首从，俱发近边充军。”^①在实际执行中，所立罪名更多，处理更残酷。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文字狱最多、科刑最重的是清代。而所谓文字狱，就是因文字写作和文字传播而致祸的惨案。与传播有关的案件有许多件，例如伪造奏稿案。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七月，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守备刘时达，为了不暴露办差赔累，伪造了一份奏稿和御批，伪托的上奏人是素有敢言名声的大臣孙嘉淦，奏稿的内容是列举种种理由阻止乾隆皇帝南巡。伪稿广为流传，还有人说已混入邸报。案发后，在全国各地追查，皇帝为此发出20多道谕旨，直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三月结案，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当年秋后斩决，卢鲁生的亲属缘坐，其子卢锡龄、卢锡荣也被斩决。在如此严厉的措施下，新闻传播的发展是举步维艰的。

第四节 中国古代报纸的印刷与发行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印刷

我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印刷报纸？这是一个尚待继续研究的课题。清末民初人士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说，“开元杂报”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述这一说法，并予以肯定。随后，一些学者经过考证，

^① 《大清律例》卷十九、卷二十三。

得出了否定的结论^①。其实,孙樵是在看过“开元杂报”后,“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未”的,也就是说,他的《读“开元杂报”》一文是写在原件后面的,而原件是书写在“帛”(丝织品)上的。此外,英国和法国收藏的两张唐代归义军进奏院状原件,都是手写的。目前没有材料证明唐代有过印刷报纸。

宋代官方的“进奏院状”,是手写抄传的。但也不能断言没有刻印本,因为宋代刻印书籍较为普遍,也许它在发布时是手抄的,传出后便有人刻印了。非法传播的小报,也可能有先抄后印的情况。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闰十一月,监察御史张戡上奏说:“窃闻近日有奸佞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这里所说“印卖”的,当然是非法的印刷物,其内容可能来自邸报,也可能来自小报。可以肯定,宋代有印刷报纸,而且流传范围较广(在都市里可买到)。

明代官方发布的邸报,仍为手抄;逐级抄传,仍为邸报的传递方式。同宋一样,邸报从宫廷或官府抄出后,出现刻印本。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道:“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②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抄出后复制的邸报,或者是民间报房的京报。因为在历史文献中,尚未发现官方发布刻印邸报的记载;邸报和京报在称呼上没有严格区别,常有混同。

清代的官方邸报,继续采用手写抄传的办法,而且被视为不可更改的传统。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江西巡抚张芾“奏请刊刻邸钞,发交各省”,咸丰帝不仅不予采纳,反而降旨申斥张芾“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并指出“所有刊刻邸钞,乃民间私设报房,转相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③。皇家的这种顽固守旧,一直坚持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改《时务报》为《时务官报》时,才算有了明显的改变,但手写抄传邸报的办法一直实行到清王朝的终结。

始于明代中后期民间报房的京报,最初是手抄的,但很快就有了刻印的。这是因为明代印刷技术发达,商人为了多赚钱就要多发行。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京报,是刻印的,没有报头和封面,日出一册,每册4页至10多页不等,书册式装订,高约24厘米,宽约18厘米,首页和末页都印有报房名称,这种京报

^① 历史学家向达在1928年发表的《唐代刊书考》一文否定了开元杂报是“唐人刻本”的说法。该文刊于《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1928年11月出版),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② 顾炎武:《与公肃甥书》,见《亭林文集》第三卷。

^③ 见《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五,或王先谦的《东华录》。

通称为“白本报”。此后,出现“黄皮京报”,就是加有黄色纸张封面的京报。封面上印有红色的“京报”二字,还印上报房名称。“京报”于是成为我国最早的报纸名称,但是各家报房出版的都用这个名称,所以还不是真正的专用名称。黄皮京报仍为日出一册(有时也出合刊),每册4页至10多页不等,书册式,高约22厘米,宽约9厘米。大多数京报都是用木刻活字印刷,清晰美观;也有一些是用胶泥活字印刷的,效果不如前者。到20世纪初,一些新式报馆,如上海的新闻报馆,还出版铅印的京报汇编本。

二、中国古代报纸的发行

自唐至清,历代官方的邸报都是经过邮驿渠道,从中央发往各地的。因此,邸报又称“驿报”。唐代的报(状)和宋代的邸报(朝报),都是由进奏院抄录、登记,然后交邮驿递送。在唐代,除了驿站外,还开始出现递铺。在宋代,有步递、马递和急脚递。其中急脚递,也称急递铺,速度达到日行400里,主要是快递边境文书。宋代的递铺直接为进奏院办事,周密在《武林旧事》一书中描写宋代皇帝在临安(今杭州市)举行大礼时写道:“诸州进奏院各有递铺腰铃黄旗者数人,俟宣赦讫,即先发太平州、万州、寿春府,取‘太平万寿’之语。以次俱发铃声,满道都人竞观。”^①明代和清代的邸报,都是由通政使司和提塘官交付邮驿递送的。

私自刊行的小报和复制(复抄或翻印)的邸报,历代都是自行销售的。特别是宋代以后,都市经济日趋发达,报纸也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出现。据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宋代临安“小经纪”(小买卖)繁荣,名目很多,书中罗列了183种,其中第一、二种即为“班朝录”和“供朝报”^②。

民间报房刊行的京报,从收集材料、编印或复抄到发行,都是自行办理的。清代内阁每天发布邸钞,报房派人去抄录,随后制作为京报。京报发行有零售,也有按月订的;有整本的,也有按内容分册出版的,如宫门钞、谕旨等都出单行本。早期的白本京报,是手抄的,工本费用较高,每月报费约为一两二钱。改为刻印的黄皮京报后,工本费大为降低,每月报费仅为二钱^③。后来再降为每月

^① 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大礼”。

^②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

^③ 有关京报价格,参见《北京报纸小史》一文。该文刊于管翼贤的《新闻学集成》第6辑(1943年中国新闻学院出版);又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1章:光绪末年,每两银子可换800枚大制钱,二两银子为1600枚大制钱。

三百文,每份十文。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价目,实际上各报房的售价不一。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初,北京的各京报报房商议统一价目,发表“京报房公启”并随报附送。公启中称:“兹由甲辰(即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日起,将报资酌定一律价目:大本八页、小本十页,每报每月取钱三吊;大本四页、小本五页,每月钱二吊;按日送阅宫门抄、上谕条,每月钱一吊。此后皆依定价送阅,庶阅者概不多费,于送者亦可借免赔累矣。”^①

京报有人专送。“北京城内所有送报的人都是山东人,都背着一个用蓝布做成、五尺多长、五寸多宽、两头有兜的报囊,囊上钉有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二字。”^②送报人分别属于不同的报房,各有自己的送报路线,不得越界,还成立了同业公会。北京附近的通州、良乡以及稍远的天津、保定,也有京报订户,也直接递送,但有的两天一送,有的三天、五天,甚至十天一送。其他省份,也有少数订户,送报时间有的长达一个月以上。不过,有些城市,如苏州,在街上可以买到翻印的京报。

^① 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② 齐如山:《清末京报琐谈》,载台北《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52年8月)。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第一节 外报在华的出现

一、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首批中文近代报刊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以农业小生产为本,商品经济不发达,新闻传播发展迟缓,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直到 19 世纪,邸报、京报等古代报纸仍然是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实现近代化和大众化,即在报业中运用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方法,报刊面向社会大众,报业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

在 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开拓商品市场与进行殖民扩张的势头正旺,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传教士、政客、冒险者来到东方,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鸦片和各类商品,还有西式的学校、医院和报馆,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观念和宗教意识。

最早来华办报的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1—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马礼逊是英国牧师,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于 1807 年 9 月 8 日到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又称耶稣教)传教士。但是,清政府反对传教活动,他只得隐瞒真实身份,用广州美国商馆“客人”身份作掩护,在中国领土上非法居留,学习汉语。1808 年他赴澳门,翌年被聘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翻译,遂以英国商人名义公开活动。他按照教会的要求,从事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辞典》的工作,还秘密吸收教徒。1813 年,伦敦布道会派米怜来华,协助马礼逊。米怜于这年 7 月 4 日到达澳门,但几天后当地政府限令他 24 小时内离境,他只得避居广州,学习汉语。1814 年初,在征得马礼逊同意后,米怜携带 2 000 册《新约》中译本,前往南洋群岛的爪哇、马六甲等华人聚居地区散发。当年冬回广州后,米怜又建议在马六甲建立对华传教基地,马礼逊立即同意。1815 年 4 月 17 日,米怜偕妻子和刻工梁发等人从广州出发,航行 35 日到达马六甲。随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印刷所和免

费学校。同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它是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通常简称为《察世俗》,英文名称一般写作: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它的出版,是马礼逊主持下对华传教的一项主要活动。米怜为主编,署名博爱者。他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中写道:“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这些话,说明了“察世俗”名称的由来。

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①,是《察世俗》的办刊宗旨。所以,它把宣传“神理”放在首要地位,大部分篇幅用来发表介绍教义和《圣经》的文章,如《圣经之大意》、《古今圣史记》等。其次,宣传伦理道德,当时它称为“人道”,如《论仁》、《父子亲》、《夫妇顺》等。它把忠孝仁爱作为神的意志加以颂扬。再次,介绍“国俗”,即各国情况,如《全地各国纪略》等。此外,还刊载天文地理知识文章,如《论行星》、《论地为行星》、《论日食》等。它还发表了一些诗歌、寓言一类作品以及“告帖”(即告示广告)。

米怜从主编《察世俗》开始,就表现出他确实“是一善于观察人的能手,能够机敏地抓住各种机会,以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与习惯”^②。他编辑的《察世俗》,封面上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③、“博爱者纂”等字样,文章中大量引用孔孟言论。他说:这个刊物“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便众位亦悦读也”,“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④。这个刊物采用略带文言成分的白话文写作,有评论、记叙文、故事、诗歌等,还用对话体、章回体。有些文章的末尾,写上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如第1卷第2期(1815年9月)上,刊载一则题为《月食》的预告性消息,全文如下:

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清明,呷地^⑤诸人俱可见之。

《察世俗》是雕版印刷,中国书册式,每月一期,在南洋一带华人聚居地区免

① 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1819年),马六甲英华书院1820年出版(英文本)。

② 英文《中国丛报》第2卷第235页(1833年)。

③ 《论语·述尔》。

④ 米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

⑤ 呷地,即马六甲(Malacca),又译吗啦呷、麻刺甲、麻六甲。

费赠阅,也有少量流入中国境内。米怜曾发表“告帖”,欢迎索取。起初每期印500本,后增至1000本。此外,每年出版合订本(全卷),印数少则500本,多则达2000本。有的文章还单独出小册子(如《张远两友相论》)。1821年,因米怜病重,《察世俗》停刊。出版7年,共7卷。

在《察世俗》之后,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外国传教士还办过数种中文报刊,其中有明显特征、影响较大的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通常简称《东西洋考》)。

《东西洋考》于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刊,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创办人、主编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或Charles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又作郭实腊、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普鲁士人,1823年加入荷兰布道会,1826年在荷兰鹿特丹神学院毕业后被任命为牧师,同时被派往东方荷属殖民地传教。1827年到爪哇,1828年到暹罗,曾在当地华人中活动,并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1829年退出荷兰布道会,而与英美传教士、商人、政客建立了联系,为伦敦布道会工作。1831至1833年间,他三次非法在中国沿海地区作间谍航行,收集军事情报,还绘制了航海图,参与走私鸦片。

郭士立主持的《东西洋考》,外形学《察世俗》,封面上印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孔子语录和“爱汉者纂”字样。也是雕版印刷,中国书册式。但是,内容却有着明显的变化。阐释教义的长文章没有了,宗教色彩淡化,论述伦理道德和介绍天文地理知识的文章也不多见。它以介绍西方文化、艺术、哲学、科学技术为重点,着重宣扬“西方文明”,反复劝说中国人改变对西方的旧观念(如视洋人为“蛮夷”等),主张中国应学习各国的长处。它每期都刊载新闻,以国际新闻居多,也有广东地方新闻,如有关灾民、医院的报道。新闻材料大部分译自外文报刊,也有一些是转载京报的。它是最早采用京报材料的近代报刊。它还开辟过“市价篇”专栏,报道广州的市场行情。这一切表明,《东西洋考》已有走出宗教报刊的倾向。

《东西洋考》于1834年5月出至第10期后休刊,翌年2月复刊,出至7月再度休刊。不久,郭士立被任命为英国领事的中文秘书,刊物改由“实用知识传播会”^①主办,该会重印《东西洋考》合订本(共二卷)1000部,并于1837年2月在新加坡复刊,实际是在广州编辑后寄新加坡印刷发行。1838年终刊,目前所

^① “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1831年11月29日在广州成立,宗旨是在中国传播西方技术、文化实用知识,成员为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和官员。

见最后一期是这年11月(农历九月)出版的。郭士立在随后的鸦片战争中,充当侵略者的翻译、向导和参谋。

在《东西洋考》前后出版的传教士所编的报刊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刊。创办人、主编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6,笔名尚德者)。该刊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看,都是《察世俗》的继续。1826年停刊。

《天下新闻》,1828年在马六甲创刊,主编是英国传教士吉德(Samuel Kidd, 1799—1843,笔名修德)。月刊,单张活字印刷,刊载中外新闻,格式像报纸,但仍为宗教刊物,还发表科学、历史、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文章。1829年停刊。

《各国消息》,1838年在广州创刊,月刊,石印。麦都思、奚礼尔(Charles Batten Hiller ? —1856)、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等编辑,主要内容为外国新闻和广州市场行情。仅出数期。

另据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一记载,在1837至1838年间,澳门出现过中英文合刊的《依泾杂说》,英文为铅字排印,中文为木板刻印,对照排列,内容“多有讥刺官府之陋规”,人们争相购阅,后为官府禁止。但未发现原件。

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首批外文近代报刊

来华的外国人在创办首批中文报刊的同时,也创办了首批外文报刊。中文报刊大多数是传教士创办、读者为中国人的宗教报刊,而外文报刊却大多数是商人、政客办的政治性报刊,主要读者为在华外国人,主要内容为分析交流中国情况,商讨对华政策与行动。

第一家在华出版的外文报刊,是葡萄牙文的澳门《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它也是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家报纸。1822年9月12日创刊,周刊,还出版了数种增刊。它是澳门葡人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的喉舌,基本内容为新闻、言论、公文、读者来信等。新闻报道有澳门的、葡国的、各国的以及船讯等。1823年9月27日,因立宪派的统治地位被推翻,保守派上台,该报改变了政治方向,同年12月26日停刊。

在《蜜蜂华报》之后、鸦片战争之前,澳门还出版了数种葡文报纸:《澳门钞报》(A Chronica de Macao),1834年10月12日创刊,初为周刊,后改双周刊,刊载新闻和政治稿件,1837年(一说1836年)停刊;《帝国澳门人》报(Macaista Imparcial),1836年6月9日创刊,每逢星期一、四出版,曾公开宣布“不与任何

政党发生关系,而只是尊重法律”^①,却因批评总督于1838年7月24日被封;《澳门政府公报》(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ado de Macao),1838年9月5日创刊,受澳葡当局庇护,重视澳门当地政治报道,曾先后更名《澳门公报》、《中国葡人报》,约在1843年停刊;《商报》(O Commercial)、《真爱国者》(O Verfadciro Patriota),均为1838年创刊;《澳门灯塔报》(O Pharol Macuense),1841年创刊。这些葡文报刊,最为关注的是澳门当地和葡国内的事情,对于中国时局议论不多。

在澳门,还出过一种英文周刊——《杂文编》(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又译《澳门杂文编》),1833年5月1日创刊,马礼逊主编,主要刊载基督传教的文章,也有一些政治与商业信息。出版4期后,因印刷厂被查封而停刊,4期共印2万册。

在外文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英文报刊。当时最为强大的殖民势力是英国,来华的外国人中也以英国人为最多(约占半数)。首批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就产生在外国人最多的广州。

《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刊。1827年11月创刊,创办人为英国鸦片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初为双周刊,1834年改为周刊。该报在第1期写道:“人们长期以来已感到对于中国的商业和其他方面消息的需要。人们将会看到,我们会致力于提供丰富而准确的最新物价行情,有关中国的报道也会占据相当的版面。”其实,它同东印度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是商业报道,也有强烈的政治性。它宣扬英国的殖民政策,鼓吹不平等贸易,为鸦片倾销辩护,主张西方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它还增出过《广州行情周报》。它不仅对在华外商有很大影响,还发行到南洋、印度以及英美本土的一些城市。1839年5月,该报迁澳门,鸦片战争后又迁香港,改名《香港纪录报》。

《广州周报》(Canton Press),1835年9月12日创刊,被认为是英商自由贸易派的报纸,反对东印度公司与垄断贸易派。它关注中国,重视报道中国当地新闻。魏源的《海国图志》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材料是译自该报。但在英对华政策上,它同《广州纪录报》一样,主张采取严厉措施推进不平等贸易,还积极支持英国对华鸦片输出。1836年(道光十六年),清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要求弛禁鸦片。同年10月13日,《广州周报》为此刊发一份号外,转载7月24日京报上的文件奏折。这是在中国出版的近代报刊的第一份号外。该报还增出过《商

^① 《〈帝国澳门人〉旨趣》,转引自英文《中国丛报》1836年8月号。

业行情报》。该报于1839年迁澳门,1844年3月停刊。

《广州杂志》(The Canton Miscellany),1831年创刊,月刊,仅出5期。

除英国人外,美国人也在广州办英文报刊。1831年7月28日,《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创办人是美国商人伍德(William W. Wood)。他曾是《广州纪录报》的第一任编辑,因与马地臣意见分歧而离职。在《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创刊号上,他写道:“我们深信,我们非常需要传播媒介,以传达别人无意谈论的意见和政策。”该报由此同《广州纪录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映了美英商人的不同利益。但在对华实施殖民政策和推进不平等贸易上,两者是一致的。1833年10月,伍德去菲律宾,该报停刊。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中国文库》),1835年5月创刊,月刊。它是在马礼逊倡议下、由美国商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广州同孚洋行老板)资助下创办的。编辑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是美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他于1829年在美国被封立为牧师,1830年在奥立芬帮助下来中国,先后在澳门、广州居住,马礼逊帮助他学习中文。裨治文以他的才干取得奥立芬和马礼逊的信赖,被委以编辑《中国丛报》的重任。他在发刊词中指出,这个刊物“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他还具体列出了博物(自然条件和物产)、商业、社会关系、宗教等方面需要调查的情报项目与要求。例如,“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的和长时间不间断的观察。”《中国丛报》以发表文章为主,也刊载新闻。它为读者提供情报资料的同时,还就对华政策进行了讨论。它是在更深的层面上为西方的侵略行为服务。它于1839年5月迁澳门,1844年10月迁香港,后又迁回广州,出至1851年底停刊。它长期由裨治文编辑,1847年起因裨治文经常在上海,改由格兰杰(James Granger Bridgman)编辑,1849年9月起又改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美国传教士)编辑,直至终刊。《中国丛报》以其丰富的资料,为后来的中外历史学界所重视。

第二节 外报在华的扩展

一、外报在中国境内迅速发展

外国人从办第一家中文报刊开始,就想方设法要在中国境内出版。由于中

国政府当局禁止传教,才不得不把出版中心设在马六甲。随后,有两三家中文报刊和十多家外文报刊在中国境内刊行,但集中在澳门和广州,其他地区尚无立足之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辟通商口岸,割让土地,“国中之国”的租界出现了,不准传教的禁令取消了,殖民主义者取得了在华从事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的权益,外报也从此开始在中国许多城市出版。19世纪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约有300多家,其中鸦片战争以前创办的只有20家左右,其余200多家是战后创办的。

在香港,英国殖民统治的建立,为外报的刊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香港成为外报最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在1841至1860年的20年中,香港创办外报20多家,超过全国各地外报的总和。比较著名的中文报刊《遐迹贯珍》、英文报刊《德臣报》、《孖刺报》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外报的发展超过香港,但香港仍有很大影响,外报数量仅次于上海。

在上海,鸦片战争后才出现近代报刊。第一家是英国商人奚安门(H. Shearman)创办并主编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周刊,1850年8月3日创刊。上海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是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主编的《六合丛谈》,1857年1月创刊,月刊。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外国侵略势力逐步深入中国腹地,上海在各国对华贸易中的枢纽作用日益凸现,外报也随之出现迅速发展的形势。1861年,英商字林洋行创办《上海新报》,是当地最早的中文报纸。从1862年起的10年左右时间内,上海新办外文报刊10多家,有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而同期香港新办外文报刊大约只有4家。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出现了影响很大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和《申报》。上海已成为后来居上的外报出版中心。

在其他通商口岸,大都是在鸦片战争后才有外国人去创办报刊的,如宁波最早的近代报刊为1854年创刊的《中外新报》(中文半月刊),汉口是1866年创刊的英文《汉口时报》,天津是1886年创刊的中文《时报》和英文《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①。广州在此期间也新办了多家报刊,如1865年创办的中文《广州新报》和《中外新闻七日录》等。

外国人的办报活动不仅遍及各通商口岸,而且来到了清王朝的都城——北京。1871年9月,外国传教士在京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并提议创办中文日报。1872年8月,该组织创办了机关刊物《中西闻见录》月刊。它是北京的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主编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

^① 天津曾在1880—1881年间出版过《北方邮报》(Northern Post),刊载海关资料,影响极小。

sons Martin, 1827—1916)和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它自称“系仿照西国新闻纸而作”^①,内容为介绍科学技术知识,报道各国近事与商业消息。1876年2月迁上海出版,改名《格致汇编》。

19世纪40至80年代的半个世纪,是外报发展的高峰时期,外报数量占当时中国报刊总量的70%以上(不包括邸报、京报)。各通商口岸和京城的外报,还向中国内地扩散,成为中国境内影响最大的新闻传播媒介。在此期间,外报在内容、形式、刊期以及结构类型等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与鸦片战争前大不一样。

二、中文宗教报刊的变化与《万国公报》

外国传教士向来把出版报刊作为传教布道的一种手段,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在中国取得了“自由传教”的权利,打着宗教旗号的报刊很快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据统计,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1840年以前不过10多家,1860年发展到32家,1890年达到76家。原先是基督教新教大力创办报刊,后来天主教积极跟上。1878年在香港创刊的英文《香港天主教纪录报》(The Hongkong Catholie Register,后改名《天主教纪录报》),是天主教在华办的第一家报刊。此后又出版了《益闻录》、《圣心报》等,其中《圣心报》从1887年6月1日创刊,出至1949年5月终刊。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所办报刊,不像以往的《察世俗》那样热衷于阐发教义,而是大幅度地增加商业新闻、时事政治报道,广告也越来越多。以《遐迩贯珍》和《益闻录》为例,《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是香港的第一家中文报刊。1853年8月1日创刊,1856年5月1日终刊。英国伦敦布道会所属机构马礼逊教育会主办,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先后担任主编。它是最早使用铅字排印的中文报刊,月刊,中国书册式,有中、英文对照目录。在内容安排上,占首要地位的是时事新闻报道与评论,以及“洋货时价”、“本地货时价”之类的商业消息,所用篇幅最多;其次为介绍科学文化知识的文章与报道;最后才是宣传宗教的文章与报道,所用篇幅较少。它有插图,还出过“招帖”(广告)增刊,随正刊发行。它规定:“凡印此招帖者,初次每50字要银半元,再印者则半初价。若50字以上,每字加一先令”。这是中文报刊最早的收费广告。就新闻体裁而

^① 《中西闻见录·序》,载《中西闻见录》第1号,1872年8月。

言,该刊的消息、通讯、简讯、评论等已具雏形。在政治倾向上,它无疑是维护英国殖民利益的。但对于中国国内某些问题,因为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也作过较为客观的报道。如对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法国公使赴南京与太平天国将领会谈等,它都作了及时的、真实的报道。

《益闻录》是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办的中文刊物。1879年3月16日创刊,初为半月刊,后改周刊,李林(字问渔,南汇人,1840—1911)主编。它以时事新闻为主,每期只有一两篇传教的文章。1898年8月17日与《格致新报》合并,改名《格致益闻汇报》,每周出两期,1899年第100期起简称《汇报》,并分别出版每周两期的《时事汇录》和每周一期的《科学杂志》。在政治倾向上,它公开维护法国殖民利益。1912年改出《圣教杂志》。

外国传教士在各地办的报刊,如上海的《六合丛谈》、北京的《中西闻见录》、广州的《广州新报》和《中外新闻七日录》等,都以主要篇幅刊载时事新闻、介绍科学文化知识,宗教宣传不多。这不仅是宗教报刊在某些内容和版面安排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宗教报刊为推行殖民政策服务的面目日益清晰。本来,马礼逊、郭士立等传教士同商人、政客、冒险家一样,来华的目的是要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使中华大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榨取利润的场所,使清王朝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鸦片战争前,他们不了解清王朝的虚实,在行动上带有试探性,当时最为适用的是传教的方式与语言。鸦片战争后,他们成了战胜者,可以公开宣扬自己的主张,于是脱下道袍换上官服,公然参加各种侵华活动。当然,外国传教士中也有一些是虔诚的教徒,一心一意以传教为己任,但他们的愿望改变不了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传教士所办报刊在政治与商业方面的作用,就远远超过了其在宗教上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自费创办的一家中文周刊《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教会新报》)。林乐知(Young Gohn Allen, 1836—1907)是以创办和主编《万国公报》而知名的。他于1858年在美国埃默里大学毕业后,立志当传教士。1860年6月,带着夫人和女儿来到上海。1861年赴天京(今南京),访问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1864年任上海广方言馆西学教席。1868年任中文《上海新报》编辑,就在这时他用“林华书院主人”名义创办《教会新报》(5月9日创刊)。其实,所谓林华书院,不是学校,而是他的住宅。《中国教会新报》完全是林乐知一人操办起来的——他自筹资金、自己编辑、自己发行,只是由美华书馆承印。在创刊号上,林乐知撰文说明办刊宗旨和方法。他写道:“兹特欲创其事,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近闻一

次,使共见共知,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亦可传到外国有中国人之处。”至于刊物内容,除“教会中事外”,“仍可讲论各种学问,即生意买卖,诸色正经事情,皆可上得”。

显然,《中国教会新报》不是纯宗教性的刊物。林乐知曾把该刊内容分成教会近闻、中外政事近闻、格致近闻等栏目,其中中外政事近闻栏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它发表了大量评论时政的文章,有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等人直接干预中国政治的言论,而最多的是林乐知的评论文章。

《中国教会新报》从第201册起改名《教会新报》,从第301册(1874年9月5日)起改名《万国公报》,并印有一行小字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改名后,除了卷期编号为《中国教会新报》的继续以外,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在体例方面,第一是全录京报,第二是“各国新奇事件”,第三是“教会近闻及各处信息”,第四是“西国制造机器军械电线天文地理格致算法各学”。在读者对象方面,从一般教徒扩大到政界和士农工商各式人等。《万国公报》虽然还有关于教会活动的报道,保持着宗教色彩,但不居主要地位,它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出至第750册(1883年7月),因林乐知忙于其他活动,无暇兼顾而暂时停刊。

1887年11月1日,同文书会在上海成立。这是基督教在华的最大的出版机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创办并任督办,林乐知任协理,还有英美德法等国驻华官员、在华的外国商人及其他知名人士参与和支持。1894年改名广学会。林乐知在《广学兴国说》一文中解释说,广学会“以广学为名,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也”。早在同文书会成立之初,他们就决定恢复《万国公报》,作为该会机关刊物,仍由林乐知主编。1889年2月,停刊5年的《万国公报》恢复出版,改为月刊。在复刊号上,由参加编辑工作的华人沈毓桂执笔的《兴复万国公报序》中写道:“五年以来,西国同人拟兴复者屡矣。兹林君稍加变通,于来岁正月为始,月具公报一册,计三十二页,合三万字。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评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事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各擷其精蕴,测其源流,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这些话又一次表明了刊物的内容与特点。复刊后,外国传教士韦廉臣、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丁韪良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

《万国公报》复刊之初,并不引人注目,每期销行不到1000份。随后,用大量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新闻与评论,很快为中国官员和文人所

重视。特别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它异常活跃,仅林乐知写的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就发表了30多篇。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是要求中国投降日本,亲近英美,参加拒俄。其中最为露骨的是第93、94册(1896年10、11月)连载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文章中说,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有12项“益处”:“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浚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通声气”。在文中林乐知进而公然主张“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还提出“先于东南方遴选二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这是一个变中国为英国殖民地的方案,它体现了《万国公报》的政治立场。紧接着,第95册(1896年12月)又发表了林乐知所写《拘禁逸犯》一文,攻击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诱捕,林乐知在文章中指责孙中山“在粤中鼓煽狂言,目光如豆”,主张将孙中山“械送回华,以伸国法”。

《万国公报》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也逐步上升。1898年总计38400份(平均每月3200份),1902年总计48492份(平均每月4041份),1903年总计54396份(平均每月4533份),达到最高纪录^①。1907年5月30日,林乐知在上海病逝,《万国公报》遂于7月出版至第222册后终刊。

林乐知在华40年间,除了《万国公报》停刊的5年以外,从未间断编辑工作。他在主编《万国公报》的同时,还主编《中西教会报》(1891年创刊,广学会主办)^②。1907年3月,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社会党之流弊》一文,英文原意为“社会主义不适用”^③。同月,他在广学会办的《大同报》上发表《大同报改良发刊词》,认为该报应做到“辅新政”、“匡教育”、“培人格”。这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两篇文章。他毕生辛勤写作,著译很多,还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创办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他结识了许多中国的上层官员和文人,受到清政府赞赏,曾被授予“钦赐五品”、“钦加四品”头衔。1906年5月,他曾一度回美国,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同《万国公报》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于1870年来华,在山东、山西进行了多年传教、赈灾活动,同一些地方官员有来往。1881年11月至1882年2月,他以“中西友”的笔名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长篇论文《近事要务》,提出了改良农业、开矿办厂、发展交

① 参见舒新城:《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载上海《学术月刊》1957年第1~4期。

② 《中西教会报》由林乐知、李提摩太编辑,终刊时间不详,现在所见止于1894年。

③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通、开办银行、设立学堂、自由传教、亲近西方各国等上百条建议,作为根治中国灾荒的办法。这是鼓吹按照他的主张变法维新的开端。1890年7月,他接受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邀请,赴天津任《时报》主笔,任职一年,写了200多篇社论,后汇编成《时事新论》一书。1891年10月起,他担任上海同文书会督办(总干事),至1916年卸任。在这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主持出版的报刊有《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成童画报》(先后改名《日新画报》、《小孩月报》)、《女铎报》等。他还主持出版了许多书籍。作为《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发表了多篇议论变法的文章,推销他的由外国人统治中国的主张。1895年,他在北京向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游说,提出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的“新政策”。他写了一份由清廷大臣转呈光绪皇帝的“改革计划”,提出7项具体建议,其中第6项就是“设立报馆,聘用有经验的外国记者帮助中国办报以启民智”^①。他同康有为、梁启超来往密切,力图将正在掀起的维新运动纳入殖民者设计的轨道。光绪皇帝曾决定李提摩太任皇帝顾问,因戊戌政变而未实现。后来,李提摩太又写文章反对义和团运动,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1916年他返回英国,1919年4月17日病故。

三、外资中文日报的兴起和《申报》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禁大开,通商成为首要事务。外国人要推销商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中国人也急需了解洋人和洋货。于是,以沟通贸易为主的商业报刊应运而生。许多新出的报刊,或外文报刊增出的中文版,都是以商业报刊的面貌出现。

商业贸易讲究时效,需要迅速、全面了解市场行情,因此出版日报势在必需。而传输手段与排印设备的进步,又为日报出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1837年首台电报机在美国诞生后,在50、60年代欧美各国已广泛采用电报通讯,在1871年中国开通同世界各地的电报业务的同时,铅字排版、滚筒机印刷等技术及设备,也传入了中国。对于日报的问世,这些都是促进因素。

第一批中文日报,是外国人创办的,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在这以前,有些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内容以刊载商业新闻为主,形式也近似日报,只是没有

^① 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6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182页。

每日出版。例如,1857年11月3日创刊的《香港船头货价纸》^①,是英文《孖刺报》出版的中文报纸,以船期、行情等商业新闻和广告为主要内容,以商人为读者对象,每周二、四、六刊行,每期一张,两面印刷,是第一家中文商业报纸。大约在60年代初(1865年4月以前),它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内容和形式照旧,但每周二、四、六出“新闻纸”,一、三、五出“行情纸”,周日无报。1872年5月4日后,“行情纸”成为日刊(除周日外)。1873年,《香港中外新报》正式成为每日发行的报纸,出至1919年停刊。该报早期编辑为黄胜(平甫),伍廷芳也参加了办报工作。

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它是英文《北华捷报》(周刊)出版的中文报纸,初为周刊,1862年5月7日改为周三刊,1872年7月2日起改为日刊。四开单张,两面印刷,以商业新闻为主,也有社会新闻与政治新闻,广告较多,是上海第一家中文日报。然而,它在与《申报》竞争中失败,于1872年12月31日终刊。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由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 183?—1908)同伍华特(C. Woodward)、普莱亚(W. B. Pryer)、麦基洛(John Machillop)集资合办,后来股权归美查一人所有。《申报》初为双日刊,从第5号(5月7日)起改为日刊(周日除外^②)。

美查是在上海经营茶叶和棉布生意亏损后创办《申报》的,显然他要把商业经营的思路与经验也用在办报上。而“原为谋业所开”^③的《申报》,无疑是一家商业报纸。但它的内容却是多方面的,“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④。因此,又可以说它是一家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日报。为了争夺销售市场,同在一个城市中出版的《申报》和《上海新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申报》以明显的优势成为后来居上者。

《申报》在竞争中取胜的首要原因是,它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力求适合中国人阅读。为此,它聘请中国人担任编辑工作,如总主笔蒋芷湘、钱昕伯、主笔何桂笙等都是有能力的人,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和读者心理。而《上海新报》的历任主编伍德、林乐知、傅兰雅(J. Fryer)等,虽然也了解中国情况,但毕竟

^① 有关《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情况,参见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台北正中书店1998年版。

^② 《申报》从1879年4月27日起,星期日也出版。

^③ 《申报》评论:《论本馆作报本意》,1875年10月11日。

^④ 《本馆告白》,载《申报》第1号(1872年4月30日),该报第2号、第3号曾重刊。

是外国人,不如前者得心应手。

其次,《申报》是一张较为完备的日报,既有新闻、评论,也有文艺作品、广告,上下各阶层人等都可阅读。而《上海新报》主要为新闻,评论极少,并且带有宗教色彩,读者圈子不大。

再次,《申报》重视经营管理,注意争取读者和刊发广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设立了分工明确的报馆,并制订了《本馆条例》。对于广告、发行也提出了具体办法,还降低成本,廉价销售。当时,《上海新报》用进口白报纸,每份零售铜钱30文,而《申报》却用中国产毛太纸,每份售价为8文,两者售价比几近4比1,前者自然难以匹敌。

《申报》的问世,标志着这种每日刊行的、面向社会公众的、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纸,开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媒介。在上海,与《申报》齐名的还有《字林沪报》和《新闻报》。《字林沪报》于1882年4月2日创刊,字林洋行主办,初名《沪报》,出至第73号改此名。《新闻报》于1893年2月17日创刊,创办人是英国商人丹福士,1899年转让给美国商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该报后来成为一家以经济新闻为主要内容、以工商界为主要发行对象的报纸,重视经营与广告,发行量曾居全国报纸前列。

沪上《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同时刊行,形成三报鼎立的格局。但三报中,《申报》居首位,另两家在报纸业务与经营等诸多方面都吸取了它的经验,如聘请中国人任主笔或编辑,压低报价,多登广告,开拓销路等。《字林沪报》因销路不佳,于1900年售给日本东亚同文会,改名《同文沪报》出至1908年又改名《沪报》,终刊时间不详。申、新二报均出至1949年5月。

外国人还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城市创办了日报,一般都是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纸,也有的侧重商业新闻。较为著名的有,天津的《时报》、北京的《顺天时报》和奉天(沈阳)的《盛京时报》。

《时报》创刊于1886年11月6日,由天津怡和洋行出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瑾琳(Gustar Detring, 1842—1913)赞助出版,并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的支持。出版中文日报的同时,刊行英文《中国时报》。1890年7月,应李鸿章邀请,李提摩太出任《时报》主笔,同年8月增出中文周刊《直报》。《时报》有“谕旨”、“钞报”、“论说”、“京申新闻”、“外省新闻”等栏目,格式类似《申报》,主要刊载时事政治新闻和评论,鼓吹中国应开发矿业、铺设铁路等,宣扬殖民主义给印度、非洲带来的“益处”。1891年3月,英文《中国时报》停刊,6月《时报》和《直报》都停刊。

《顺天时报》创刊于1901年10月,得到日本官方和财界的公开支持与庇

护。它日出两大张,其中五个版为广告,重视时事政治新闻与评论、各地通讯、各地矿藏资源及政治经济情况调查等。它在中国许多城市派有记者或通讯员,提供新闻,收集情报。它公开支持中国的亲日势力,遭到中国人民反对,曾被拒售,甚至被称为“逆天时报”。它的最高日销量达 1.2 万份。1930 年 3 月 7 日停刊。它的创办人中岛真雄,还在中国先后参加或主持过《闽报》(福州)、《满洲日报》(营口)、《盛京时报》(奉天)、《大北新报》等报纸的工作。这些报纸都与《顺天时报》有着同样的政治倾向。

《盛京时报》创刊于 1906 年 10 月 18 日,由《顺天时报》公司创办,日本满洲铁路公司资助,中岛真雄曾兼任总办。1944 年 9 月 14 日终刊。

四、外资外文报刊的发展和 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

鸦片战争之后,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以上海为例,1843 年 11 月 27 日正式开埠,此前没有外国人长住,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及翻译官是从广州来的。据上海公共租界人口调查,1865 年租界内外国人已达 2 300 人,1895 年又增至 4 700 人^①。广州、天津、青岛等各通商口岸和北京,都有成群的外国人。香港、澳门更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这些外国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创办了外文报刊,总数在 120 家以上。这些报刊有英文的、法文的、葡文的、德文的、俄文的,而以英文的居多;有日刊、三日刊、周刊、月刊,而以日刊和周刊居多。

英国殖民者割据香港时,英文《香港公报》(Hongkong Gazette,又译《香港钞报》、《香港宪报》,1841 年 5 月 1 日创刊)已在刊行,并于 1843 年与《中国之友》(Friend China,1842 年 3 月 17 日在澳门创刊,同月 24 日第 2 期起迁港)合并,改名《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出至 1906 年停刊。在香港地区影响广泛、历史悠久的英文报纸是《德臣报》、《孖刺报》、《南华早报》和《士蔑西报》。

《德臣报》(The China Mail,又译《中国邮报》),1845 年 2 月 20 日创刊,创办人兼主笔为英国出版商肖锐德(Andrew Shortrede)。英商德臣(Andrew Dixon)参与创办并于 1858 年任发行人,当地人遂以其姓氏(读为“德臣”)称呼该报。初为周刊,1868 年 2 月 1 日起改为日报,出至 1974 年 8 月 17 日停刊,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外文报纸之一。该报于 1871 年 3 月 11 日创办中文《中

^①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7 页。

外新闻七日报》(中文《香港华字日报》前身)。《孖刺报》(Daily Press, 1861年改称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57年创刊, 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日报。创办人为美商赖登(George M. Ryder)和英商莫罗(Yorick Jones Murrow), 1858年为莫罗所有, 当地以其姓氏(读为“孖刺”)称呼该报。出至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时停刊。最早的中文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改名《中外新报》), 即为《孖刺报》所出。《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 又译《香港电讯报》), 1881年6月15日创刊, 因其主编、英商史密斯(Robert Fraser Smith)当地人读如“士蔑士”, 故用作中文名称。1916年该报被南华早报有限公司收购, 改为《南华早报》晚刊, 出至1950年。《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年11月7日创刊, 日军侵占香港时期停刊, 战后复刊, 至今仍继续出版, 是香港地区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纸。

在上海出版的外文报刊, 数量多, 文种也不少。英文报刊中有《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50—1951)等; 法文《上海新闻》(周刊, 1870年12月5日创刊, 1872年停刊); 日文《上海新报》(周刊, 1890年6月5日创刊, 1891年停刊); 德文《德文新报》(周刊, 1866年创刊, 1917年停刊)等, 都是各文种较早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还有一家以来华美国人为主要读者的《上海新闻通讯》(英文不定期刊, 1867年10月16日创刊), 每期都刊载新近来华的美国人名单。

在上海出版的外文报刊, 每个文种都出过两家以上, 英文的最多, 经常同时出5家左右。其中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是《字林西报》。它的前身是《北华捷报》在1856年增出的日刊《每日航运新闻》(Daily Shipping News), 1862年改名《每日航运和商业新闻》(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 又译《航务商业日报》)。1864年7月1日改出日报《字林西报》, 《北华捷报》周刊反而成为该报的附属刊物。《字林西报》同英国官方有密切关系, 英国驻沪领事馆曾指定它作为该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报的发布机关。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H. S. Parkes)曾亲自写《领事通告》, 以使该报内容具有“权威性”。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文告、新闻公报与付费广告等, 都优先在该报刊载。该报得到这些机构的资助, 财力雄厚, 拥有强大的编辑与采访队伍。它在中国内地, 包括甘肃、新疆、四川、云南等地的许多城市中, 聘有通讯员, 为它搜集新闻材料和情报。它以“公正而不中立”作为社训, 并印在言论版上。其实, 它公开维护英国政府和商人的在华利益, 宣传殖民政策, 多次成为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斗争对手, 当然是“不中立”的, 更是不“公正”的。它的最高日销量为7817份, 流传中外, 读者很多。它在版面与编辑业务上, 仿效英国正统报纸, 以沉稳、保守的面貌出现, 人

称它是“上海滩上的老太婆”(The Old Lady of the Bund)。出至 1951 年 3 月 31 日自动停刊。

北京、天津、汉口、福州、烟台等地，都有外文报刊。其中有的影响还不小，如天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894—1941)，初为周刊，1902 年改为日报。它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主要报道京津与华北各通商口岸的新闻，曾发表诋毁中国人民革命的言论。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外国通讯社和外国报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派记者常驻，向中国报刊发稿。最早是英国路透社，于 1872 年派柯林斯(Henry Collins)来华，在上海建立远东分社。首先采用路透社电讯稿的是《字林西报》。随后，除外文报刊采用该社电讯稿外，许多中文报刊也出现了“路透电”。1897 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George Ernest Morrison，又译莫理循)来到北京，担任驻华记者。该报还在上海等地聘请了通讯员。莫理逊在中国工作 20 多年，多次到内地采访，也是作窥探性旅行，收集图书约 24 000 册、地图与图片约 1 000 幅。他写了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后来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

第三节 外报的作用和影响

一、外报和中国古代报纸的同时存在

从 1815 年到 1911 年，作为近代报刊的外报，同邸报、京报等中国古代报纸，并存了将近一个世纪。这在世界新闻史上是不多见的。这种外来的新事物同原有的事物同时存在的状况，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出现的。

作为新闻传播工具，外报和邸报、京报等中国古代报纸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因此前者经常转载后者的内容。许多外报都辟有“京报全录”、“京报摘录”一类专栏。1882 年 1 月 16 日，《申报》首次刊登国内用电报传送的新闻，就是京报所载的上谕。当天的《申报》宣布：“每日京报上谕皆由中国新设之电报局传示。”但是，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正如当时人们所说：“新闻纸之制，创自西人，传于中土。”^①当时人们把这种新闻纸，统称为“新报”，各地所办的新闻纸都冠以“新报”字样，以此区别于中国原有的邸报、京报。《申报》在筹办时，拟取名《申江新报》，创刊后多次发表文章论述新报的特点及其与邸报的差别。例

^① 《本馆告白》，载《申报》，1872 年 4 月 30 日。

如,1872年7月13日发表的评论《邸报别于新报论》中指出:“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阎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这里所说的异同,虽不准确,但基本符合事实。从根本上说,两者是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闻传播工具,在许多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

在办报思想上,每一家外报都有明确的、具体的宗旨,并公之于世。如米怜写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申报》发表的《本馆告白》和《申江新报缘起》,都就办报的目的、方法、内容以及其他有关问题,向读者作了说明。米怜在文章中说,“善书乃成德之好方法”,《察世俗》要成为“善书”,使得“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志,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从而达到“成人的德”的目的。《申报》的文章不但介绍了它将刊载的内容,而且说明了它与京报不同的特征。它说“夫京报以见国家之意”,而“吾申新报一事,可谓多见博闻而便于民者也”。反观中国古代报纸,却找不出一篇直接阐述办报思想与办报方针的文章。邸报刊载的是可以抄传的官方文书,而这不过是朝廷有关官员的一项工作;刻印与发行京报,也只是报房用以谋利的手段,至于它的宣传目的、社会作用,报房主人是不用考虑的。

在内容和版式上,外报逐渐形成以新闻、评论、文艺作品(副刊)、广告为基本内容的格局,而邸报、京报始终以官方文书为基本内容。早期的外报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为《察世俗》、《东西洋考》等,以刊载文章为主,也有新闻报道;另一类,如《各国消息》等,以刊载新闻为主,或只刊载新闻。在19世纪40—60年代的外报上,新闻报道和广告日益增多,插图也屡有出现,如《遐迹贯珍》的地球图和上海地图、《中国教会新报》的圣经故事图、《上海新报》的机器图等。在70年代以后,随着日报的兴起,插图和广告更多,大多数外报都刊载文艺作品,《申报》创刊时就欢迎“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①。1897年11月24日《字林沪报》附出的《消闲报》创刊,每日一张,随报附送,成为最早的中文报纸副刊(或称附刊、附张、副张)^②。早期外报大多数为书册式,70年代创刊的日报改为单页式。

^① 《申报馆条例》中的一条是:“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另有一条是:“如有名言说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附登新报,概不取酬。”由此二条可见,当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仅无稿酬,有些反而要向报馆交费。《申报馆条例》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② 《消闲报》曾改名《同文消闲报》、《消闲录》,出至20世纪初,具体终刊日期不详。

但在书册式与单页式之间还有一种过渡形式,就是日报印成单页,只印一面,上下左右分成四版,各版高约 27 厘米,宽约 25 厘米,可以折叠成册。正如戈公振所说,“日报之编制,其初首为论说,亦有无论说者;次为新闻,其题均为四字成语,逐日更换用之;末为诗文,均杂登一处”^①。简单的标题和粗略的分栏,是早期日报版面的一个特点。起初只有“选录京报”、“中外新闻”、“近日杂报”一类栏目式综合标题。《上海新报》从 1870 年 3 月 24 日起,在每条新闻上加以简明标题,用头号字排题,四号字排正文,以后各报仿行。当然,版式、插图、副刊,这些都是邸报、京报等中国古代报纸所没有的。

在机构设置与专业分工上,外报的报馆是独立的机构,办报成为独立的社会职业。报馆内部有明确的分工,从出报到营销能有序地运作。从最早的外报起,就有专门的编辑工作人员,他们除了处理稿件外,还要制作标题、设计版面。由于采访新闻的需要,专做外勤的“访事人”(访员)也应运而生。《申报》在创办初期,就注意“招延访事”,到 1875 年就在北京、南京、汉口、宁波等 26 个省会和重要城市聘有采访人员。这些编辑(当时称撰述、主笔)、访员以及营销、广告人员,都以办报为职业,并按照职业与工作的需要同社会各界联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新闻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也由此日益显露出来。报馆内部设有编辑部门、经理部门等,采写、编辑、校对、印刷、发行、广告等都有相应的工作制度,有的报馆还有成文的章程与条例。财力雄厚的报馆,还成为产业中心,以出报为主,同时出版期刊与图书,甚至兴办文教事业与工商企业。申报馆从 1872 年 11 月至 1877 年 1 月,曾先后出版《瀛寰琐记》、《西溟琐记》、《寰宇琐记》等 3 种月刊,内容为诗词、小说、散文、翻译作品、知识小品和时论等。1876 年 3 月 30 日,申报馆创办通俗报纸《民报》,周三刊,“此报非为文人雅士而设,只为妇孺佣工粗涉文字者设也”^②。这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通俗报纸,但下层民众当时并无阅报条件,所以该报出版数月后即告停刊。同年 9 月 9 日,申报馆出版《亚洲东部地图》,这在中国也属首次。1884 年 5 月 8 日,申报馆主办的《点石斋画报》创刊,旬刊,石印,画家吴友如主编,将时事题材绘成图画,并有文字说明,内容丰富,以时事政治新闻为主,还有军事、科技、文化新闻和社会新闻。画报随《申报》附送,出至 1896 年年底终刊。这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影响较大的时事画报。此外,申报馆还开设了点石斋书局、申昌书局等企业,出版《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报纸所没有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6 章第 18 节。

^② 《劝看民报》,载《申报》,1876 年 5 月 19 日。

的。邸报运作属官方行为,没有专设的办报机构;刊行京报的报房只是出版与销售的商业机构,没有专业的编辑人员。

在新闻传输和印刷技术上,当邸报、京报还在手抄、木刻活字(或胶泥活字)印刷的时候,外报已经利用近代科学技术传输稿件和排印报纸。首批中文近代报刊是木板雕印的,但很快就出现了石印和铅印。1834年美国传教士将一套汉文木刻活字送往美国波士顿,复制成铅铸活字后送回中国。1838年法国传教士也在巴黎复制了一套汉文铅字。19世纪50年代,外国人办的印书馆又制成电镀汉文字模和以24盘常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这些成果,逐渐为各报所采用。最初用手摇印刷机,每小时印数百张,用中国生产的连史纸,单面印刷。1861年创刊的《上海新报》首先采用国外进口的白报纸,两面印刷。而首先采用煤气印刷机的是1879年4月17日在上海创刊的英文《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晚刊)。石印技术在30年代传入中国,1838年创刊的《各国消息》就是石印的。从80年代初开始,中文各报陆续采用电报传输新闻稿,加强了时效性。至于外文报刊,从开头就用铅字排印,印刷和纸张都优于中文报刊。

在传播范围和效果上,邸报传递的是官方文书,主要在官吏中传播,范围很小,发布者不需要考虑效果和市场问题;京报主要在北京发行,数量也不会很多,报房主人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商品投向市场,不会重视其传播效果和影响。而外报面向社会发行,办报者有明确的读者观念和市场意识,他们努力使报刊满足读者的需求,强化传播效果,扩大销售市场。以《申报》为例,它不仅报道重大的时事新闻,也反映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琐事,大众关心的社会新闻也屡上版面。如对“杨乃武冤案”^①,从1874年1月6日至1877年4月7日,陆续作了报道,在江南地区有很大的社会影响。《申报》自创刊的第二年1873年起,开始在上海以外的城市设立分销处,到1887年已有北京、天津、南京等32处。它的日销量也从创刊时的600份,逐渐增加,1875年为1200份,1877年为5000份,1897年为7000多份。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外报是与中国古代报纸有着不同特点的近代报刊,产生这些不同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前进了,物质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进步了,人们对新闻传播的需求提高了。虽然近代报刊与古代报纸长期并

^① “杨乃武冤案”:1873年,浙江余杭举人杨乃武被诬与“小白菜”(葛毕氏)有染,并害死毕氏丈夫葛品连。从1874年4月至1877年4月间,《申报》发表消息和评论60多篇,揭露真相,仗义执言,最终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被判无罪,有关官员受到处分。

存,但前者取代后者已是必然趋势。

二、外报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侵华活动中的作用

外报的产生与发展,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

从1815年到1840年的20多年间,外报发展极其缓慢,寥寥数家中文宗教报刊也只能在境外出版。鸦片战争以后,外报迅速在中国境内扩展,在19世纪40—60年代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中,外报占据了垄断地位。事实证明,外报的发展是同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相伴而行的。

一些外国人并不讳言他们来华办报的目的。英国传教士韦廉臣,1887年在他执笔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写道:“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只有等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也有一些外国人,在中文报刊上面对中国人说话时,笑容可掬;而在外文报刊上面对他们自己人说话时,就和盘托出其侵略意图。如郭士立,在《东西洋考》上声称办刊物之目的是“润泽汉人”,使中国的“儒农工商,各有所取”^②。他特意取了个笔名为“爱汉者”,在刊物上不断出现“子曰”,还宣传“中外雍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在英文刊物上,他公开写道:“这个月刊(按:指《东西洋考》)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利益而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③其实,他在英文刊物上曾一再粗鲁地讽刺中国人愚昧无知。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许多外资商业报刊,重在谋利,但在中外争议或冲突时,还是公开袒护外国。《申报》在《论本馆作报本意》一文中,也表明了“义利兼顾”的主旨,即要“谋利”,也“不全忘义”^④。

①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②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年2月。

③ 《中国丛报》第4卷,1838年12月。

④ 《申报》评论:《论本馆作报本意》,1875年10月11日。

外国人来中国办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准读者对象,即“影响”什么人;然后才是如何去“影响”的问题,即争取中国人心的策略。当中国大门还没有被打开时,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附近地区徘徊,即使非法入境,也只能接触下层群众,与上层官员无缘。故《察世俗》创刊时就提出:“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其中“富贵之人不多,贫穷与工作者多”^①。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多数人,成为它的主要读者。到鸦片战争后,情况就大不一样。那些传教士、商人、政客们深知,要在中国获得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必须同统治者——朝廷和各地地方当局打交道,对官员和士大夫施加影响。1891年,李提摩太任同文书会督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同文书会的读者对象。据他统计,当时清朝中央和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任职和在野士大夫、全国的秀才和应试生,共计44 000名^②。李提摩太说:“我们提议,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③于是,这一大批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包括光绪皇帝在内,就成了一些外报瞄准的读者对象。

因为读者对象前后有变化,外报的内容和重点前后也有所不同。初期,外报主要是传教布道,注重文字浅显;后来,直接干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文字也较深些。但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那就是在宣传策略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形式,特别是附会儒学,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孔子加耶稣”^④。这种争取中国人心的策略,在《察世俗》和《万国公报》上,一前一后,都有明显的表现。

《察世俗》不但反复引用孔子格言,而且把基督教义同儒家学说以及中外不同的事例,牵强附会地拼凑在一起。如把基督教义中的“爱”和儒学中的“孝”相比附,把《圣经》中制造方舟的诺亚说成是中国治水的大禹。在形式与文风上,也尽可能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1869年,林乐知发表长篇文章,提出“耶稣心合孔孟”的见解^⑤。1896年10月,《万国公报》发表德国传教士安保罗

① 米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

② 《中国基督教总会手册》(1896年),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 丁韪良:《震旦论丛》,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 林乐知:《消变明教论》,载《教会新报》,1869年12月4日至1870年1月8日。

(Paul Kranze)的文章,鼓吹“奉儒教者,正宜合救世教而一”^①。但在这时,它不再是简单地套用孔孟之言,而是积极向“奉儒教者”——从官员到皇帝,献计献策。它发表了许多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还就中国维新变法提出了不少建议。《万国公报》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家刊物,不仅官员争相阅读,连光绪皇帝也成了它的读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后来外报的政治面目显露得越清楚。它们从维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益的立场出发,一方面认为清廷腐败,非更弦易辙不可;另一方面又依赖利用这个顽固的封建政权,同它一起反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1903年,新闻记者沈葆被清廷杀害后,《万国公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误,在不知维新与革命相成而相反。果能维新矣,何必革命?亦何乐于革命?盖维新者国民之幸福,革命者国民之患难也。”^②当时,慈禧太后业已着手推行她的“维新”即“新政”,如此说来,国民当然不必革命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在对太平天国和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上,外报总是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站在一边的。

外报的主持人,大都同中国当局有密切的关系,成为达官显贵们的上宾和谋士。传教士出身的李提摩太是如此,商人出身的福开森也是如此。福开森不仅担任过清政府要员的顾问,清廷赏给他“二品顶戴”衔,民国时期又先后担任北洋政府总统顾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是一个十分显赫的人物。这类人物的言行,直接影响外报的宣传。

三、外报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

外报曾经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外报又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近代报刊,即中国人民阅读的、也有中国人参与工作的第一批近代报刊。这个“第一批”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它的出现,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一个新起点,这也是应该确认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而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工厂、铁道、枪炮等是物质条件,而人民大众的觉醒就是精神条

^① 安保罗:《救世教成全儒教说》,载《万国公报》第93册、第94册,1896年10月、11月。

^② 《沈葆案之后语》,载《万国公报》第177册,1903年10月。

件。他还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①

毛泽东的论断已为历史所证实。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是按照这种历史逻辑进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在中国办起了报刊，而这些报刊在宣传侵略政策的同时刺激了中国人民，使他们觉醒起来自己创办报刊，成为冲破外报垄断局面的强大势力。但是，外报作为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批近代报刊，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下面，略述这种影响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使中国人认识近代报刊的功能，产生自办报刊的强烈愿望。外报出现后，把西方的报刊观念、办报模式与方法带到了中国。1834年3月，《东西洋考》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全文只有300多字，简要地介绍了西方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刊的文章。此后，在一些外报上多次出现介绍西方报界情况的文章和新闻。而外报自身的实践，更加具体地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近代报刊，它有何功能，以及如何办报等问题。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并掌握了这一从国外传入的新事物，积极主张国人自行办报。

第二，为中国人提供了办报的方法与经验，并使一批中国人受到新闻工作的职业训练。外报是按照西方报刊的体制和方法设立的，在编辑、采访、广告、印刷、发行以及管理等各方面，为中国人办报提供了成套的经验。许多中国人参加外报工作，在那里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的成为著名的编辑、记者，也有的成为得力的管理人员。最早参加外报工作的是梁发(1789—1855)，又名亚发、阿发，广东高明县(今高鹤县)人，雕版工人，1815年随米怜赴马六甲，1821年受洗礼入教，1824年被伦敦布道会吸收为雇员，1827年晋升为传教士。他参加过《察世俗》的刻印和发行工作，还编写了一些传教的小册子，其中《劝世良言》是洪秀全接触基督教知识的第一本书。著名报人王韬、钱昕伯、蔡尔康、何桂笙、高太痴等，都在外报工作过多年。

第三，在印刷技术与设备上，为中国人创办报刊准备了物质条件。最早的中文铅字和印刷机，都是从国外进口，首先在外报使用的。一些大报，如上海《申报》、《字林西报》与《字林沪报》、天津《时报》等，都拥有设备完善的印刷厂，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可以承印报刊和书籍。申报馆附属的点石斋书局和申昌书局,出版过几百种书籍,是当时上海机器印刷业中的主力。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初期,有租用外报印刷设备的,而更多的是仿照外报设立自己的印刷机构。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外报逐渐衰落,其设备也以各种方式陆续转移到中国人手里。

总之,外报的实践,在多方面为中国人自办报刊准备了条件。当然,这些条件不是外国人拱手送给中国人的,而是中国人民在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中,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的。19世纪70年代出现中国人自办报刊,随后迅速增多,90年代出现高潮。于是,中国人办的报刊成为中华大地上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工具,外报从此退居次要地位。

第四节 国人办报的主张与构想

一、国人办报的主张

鸦片战争之后,外报非常活跃,在中国的新闻传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中国的社会舆论影响很大。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这些有识之士中,有报人、学者、官员和商人,如王韬、陈炽、陈衍、郑观应等^①。他们在关于报馆的论著中,既分析了外报在沟通信息、传播知识方面的作用,又注意到外报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报道和“鄙夷中国”的言论。正如郑观应所说:“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陈炽也指出,外报在倡肇兵端时,“难免不曲直混淆,荧惑视听”。因此,他们尖锐地提出:不能“坐视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愿望,主要是由于对西方国家报刊的情况有所了解,又看到了外报在中国的利弊,深感外国人操纵新闻传播与社会舆论的危害极大。王韬等人在外国报馆工作,更有切身体会。

^① 王韬,著名报人、政论家。陈炽(?—1899),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清末维新派,参加组织强学会,曾任户部郎中,著有《庸言》等书。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文学家,清末曾任学部主事,著有《石遗室文集》等。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在广东、上海等地办实业与经商,先后担任多家公司总办,著有《盛世危言》等书。

他们论述报刊的代表性论著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日报之利》、《倡设日报小引》;陈炽的《报馆》;陈衍的《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郑观应的《日报》。本节引自这些论著的文字,均不另注。

他们对于报纸(主要是日报)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作用,已经具有明确的认识,在他们的论著中作了许多分析。他们的主要见解是——

1. “通达”是报纸的基本功能

他们企求“民隐悉通,民情悉达”,而“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这是郑观应的观点,他还列举了设报馆的好处:风传灾情,有功于救荒;详述案例,有助于除暴;通达时务,有功于学习;“其余有益于国计民生、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而未易终也”。显然,这些好处都是由“通达”带来的。王韬把这种“通达”归纳为:“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

2. 报纸能够传播知识,广开民智

他们强调报纸“广见闻”的作用,可以使人“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报纸广泛介绍中外各种知识,“国民之智识启开”,这样就能出现新的社会风气。

3. 报纸应立言议政

王韬特别推崇英国《泰晤士报》,说“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所以,他力主办报应以“立言”为重,“博采舆评”,“直陈时事,举其利弊”。他还以子产不毁乡校^①的故事,说“今之新报抑亦乡校之遗意也”。即将报纸作为公众议论的园地。这种见解,体现了王韬的民主意识。

4. 报纸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郑观应认为,“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诋毁、勒索财贿者,只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公”。王韬更主张“指陈时事,无所忌讳”,即使有“不忍言者”,也“要以主文谏陈,不参毁誉之私”。

5. 报纸应参与国际斗争,维护国家利益

陈衍认为,报纸“可以张国势”,因为报纸主动作宣传报道就能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他说:“张以报纸者,遏其意于事先,其势顺而易。”否则,“恶声至而不反,唾其面任其自干,则又何施而不可哉?”王韬也主张,对于外国报纸歪曲的报道与言论,应该“随时驳诘,以究指归”^②。

但是,在清王朝腐败统治下的中国,外报占垄断地位,“利器”为他人所用。这些有识之士极为不满,在呼吁国人办报的同时,对于如何办报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主要是——

^① 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乡校是集会与学习的公共场所。战国时的郑国人那里议论当朝执政子产,有人建议取消乡校,子产不同意,认为应保留,让人们议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孔子知道子产的言行后,也予以肯定。

^② 王韬:《代上黎召民观察》,载《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0页。

1. “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

这是王韬积极主张的。当时香港、上海已有新报,他认为还不够,各省会城市都应该“仿而行之”。他为此写了专文,指出省会办报,“以其地之人言其地之事”,好处有三:“一曰知地方机宜”,当地的各种事情,“有新报则无不知之矣”;“二曰知讼狱之曲直”,新报采访报道案件,“州县不敢模糊矣”;“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乡里小民不知法律,犯种种错误,新报作报道,“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挾矣”。

2. “宜设洋文报馆”

王韬、陈衍都为此写过专文。他们认为,不仅中国人要了解外国,也要让外国人了解中国。陈衍建议:“聘西国名人为洋文主笔,所有持论专为中国自强起见,以中国人精洋文者副之,其议之不持平者,指出商改。”这种报纸要发行到五大洲,“令西人见之,知中国实有自强之策,我以何著往,彼以何著应,必将咋舌色变,不敢谓秦无人朝无人矣”。王韬、陈衍等人的主张,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宣传报道的思路与构想。

3. 办报的具体做法,“仿西方报馆章程办理”(陈炽)

王韬认为,“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他主张选用通材,否则“未免识小而遗大”。陈炽主张“主笔者公明谅直,三年无过,地方官吏据实保荐,予以出身”。

4. 限制外国人在华办报

陈炽明确提出:“至西人报馆,宜与各使妥议,毋须再出华字报章,否则按月缴捐,仍须派人查阅。此事不载通商之约,本属中国自主之权,各国当亦无词以拒也。”郑观应也主张“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

5. 官方应资助与保护国人办报

首要的是,改变“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陈炽语)的现状。这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要求,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国人办报才能发展。他们还要求政府当局协助国人办报。郑观应介绍外国官方对报纸的态度时写道:“(外国)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他认为,中国也应做到“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陈炽建议:官方“似宜晓谕民间,准其自设资本,不足,官助其成。偶值开衅之时,必派专员稽察”。

这些有识之士的见解与主张,合乎情理,表现了他们盼望中国自强的爱国热情。但是,这些见解与主张在总体上又是在清王朝统治下的改良。在19世纪中、后期的清王朝,是不会采纳这些建议的。但是这些有识之士对报纸的论

述,却为国人办报制造了舆论,有益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是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重大贡献。

二、太平天国设置新闻馆的构想

太平天国是农民参加起义的革命运动,它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后期总理朝政的洪仁玕,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作过研究,设置新闻馆的建议就是由他提出来的。

洪仁玕(1822—1864)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拜上帝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他没有参加金田起义,但在起义失败后至香港,在那里居留达6年之久。他一面在外国传教士家教书,一面研究西方社会。1859年春,他辗转到天京(今南京)。这时,太平天国正由盛转衰,危机已显露,洪秀全想借助他治理好朝政,封他为干王。洪仁玕针对太平天国的实际与需要,结合多年积累的研究西方社会的心得,写出了具有全面革新意义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其中包括了他的新闻观念与主张。洪秀全对这一文件逐条作了批示。

洪仁玕重视报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出设新闻馆、兴新闻官、准卖新闻篇等多项具体建议:

——“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钦定此策是也)①”

——“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

——“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

为了这些举措能够实行,洪仁玕还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主要有:1)关于新闻馆,“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就是说,准许民办报纸;2)“伪造新

① 括号内为洪秀全的批语,下同。

闻者,轻则罚,重则罪”;3)“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这是对报道真实性和文风的要求。洪秀全同意这些建议。1861年,洪仁玕等3名大臣,奉洪秀全之命就文风问题专门发布一道宣谕,要求一切本章禀奏及文移书启应“去浮存实”,“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这一宣谕指出:“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要求:“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耸之笔。”如“龙德龙颜”、“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字样,不得在本章中使用;“鹤算龟年,岳降嵩生”、“三生有幸”等字样,不得在祝寿词中使用。文中认为,“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今后“切不可仍蹈积习,从事虚浮,有负本军师等谆谆谕诫之至意焉”^①。

洪仁玕当政时,太平天国外部面临清军的强大压力,内部又有纷争,局势不稳,他不得不忙于实务和参加军事运筹,《资政新篇》不可能付诸实施。1864年7月,天京陷落;8月,洪仁玕从湖州护卫幼天王洪天贵到江西,10月在石城被捕,11月在南昌慷慨就义。新闻馆、新闻官、新闻篇等,只能作为构想永远载入中国新闻传播的史册。

第五节 国人办报的开端

一、国人对外报的利用

外报以其内容丰富和传播迅速吸引了大量中国读者,但在政治上替外国说话又为中国人所不满。中国人在同外报打交道中,渐渐地对它熟悉起来,甚至开始为自己所用。这种利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员与商人,从外报上收集情报,了解政治、军事、商业动向;二是在外报工作的华人,从刊发“替华人说话”的文章到利用外报的条件创办华人主编的中文报纸。前者如林则徐;后者如陈蔼廷。

1. 林则徐主持编译外报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以钦差大臣身份办理“夷务”,查禁鸦片。他除了亲自查访、派员侦察外,还注重收集“夷情”资料,聘请数名译员,专译外文报纸。起初译稿零散,随后为便于阅读与保存,将译稿装订成册。

稿件主要译自原在广州出版、后迁澳门的两家英文报纸:《广东纪录报》和《广州周报》,也有少数是译自其他报刊,如英文《中国丛报》。译稿的主要内容

^① 《天王宣谕合朝内外官员及士人等》,载萧一山辑《太平天国诏谕》。

是禁烟、抗英斗争的新闻与评论,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国家情况和科学技术知识的。现存有装订本6册,题名《澳门新闻纸》,内收1838年7月16日至1840年11月7日的译稿^①。

显然,所谓《澳门新闻纸》,只是外报的译文汇编,属参考资料性质,不是正式出版物,更不是定期刊物。汇编这种资料的目的,是供有关的主要官员甚至皇帝,作为了解“夷情”与“夷务”的参考。道光十九年二月,即林则徐抵达广州后的一个月左右,他在给怡良的信中说:“新闻纸零星译出,前本散漫,兹令统订数本,奉承台览”。由此可见,《澳门新闻纸》很快就由单页改为“统订本”了。怡良当时是广东巡抚,同林则徐有工作关系,而有同样关系的还有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多人,很可能也有“统订本”送给他们。因此,《澳门新闻纸》应该有多个抄本。

魏源是林则徐志同道合的好友,他曾受林则徐的嘱托,将林所译《四州志》和中外其他资料综合编成《海国图志》一书。其中收录有《澳门月报》共5辑,题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兵事》、《论各国事情》。这些都是译稿,系根据《澳门新闻纸》上的稿件加工整理而成,署名“林则徐译”。当然,这也不是公开的、正式的定期出版物。在《海国图志》中,还收入了林则徐向靖逆将军奕山提出的6条作战方案,其中第6条写道:“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尤须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以并观也。”^②这是林则徐主持译报的动机与体验的总结。历史已经证明,林则徐目光远大,是第一位利用外报为中国服务的有识之士。他的这项工作有益于当时,也给后代以启迪。

同样属于译报汇编的,有上海的《西国近事》,上海江南制造局主办,1873年4月创刊,选用英、美、法、瑞典等国报纸的时事材料,由洋人口译(一度是林乐知)、华人笔述,每日或数日择译要闻十余条,送官绅阅览,并汇编成册称《西国近事汇编》,不定期刊行,发行范围很小。1875年2月,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① 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十月(1840年11月)被革职,留广东以备查问,翌年离开广东。《澳门新闻纸》在林则徐去职后仍持续了一个多月。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这6条方案提出的时间是1841年4月14日至5月3日。

仍为不定期刊,每期印300~500本。1898年终刊。

2. 利用外报条件,创办华人主编的中文报纸

早期外国人所办中文报刊,多有中国人参与工作,有些还由中国人主持笔政。这些中国报人中,有怀着自办报刊愿望者,如王韬、陈蔼廷。

王韬曾在西人罗郎也(Noroha)创办的《近事编录》任主编。这是一家中文日报,1864年创刊于香港。主要内容为新闻、广告、船期、行情等,王韬为它写过一些评论。该报于1883年转到中国人手里,但王韬已于1867年应传教士理雅各之邀去英国。

王韬与陈蔼廷有着较长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办报上相互支持。陈蔼廷,又作陈霭亭(?—1905),名言(或贤),字慎,广东新会人。长于西学,1871年被英文《德臣报》聘为副主笔兼司理翻译事宜。在他的主持下,《德臣报》于1871年3月11日创刊中文专页——《中外新闻七日报》,每逢周六出版。1872年4月17日起,该专页改名《香港华字日报》,单独出版,一大张四版,每周一、三、五出“新闻纸”,二、四、六出“行情纸”。1873年起每日出版,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报。王韬编译的《普法战纪》,曾在该报上连载。

陈蔼廷有志于办一家“主笔出自华人,替华人说话”^①的中文报纸。从投身报业之日起,他就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他主编的《中外新闻七日报》以新闻为主,也有评论文章、船期、行情、广告等。对港英当局的政策,有所批评,如指出公设赌馆征税“弊多而利少”;又如报道与评论“猪仔”问题时,表示同情华人出外谋生的悲惨遭遇,建议中国当局采取“保远民”、“设领事馆”等积极措施。改出《香港华字日报》后,他又撰长文《创设香港华字日报说略》,阐释编辑方针。他希望通过该报的新闻与评论,“大可以持清议,小可以励民心”,发挥“转移风俗,鉴诫世人”的作用。陈蔼廷于1878年4月离职,该报出至1941年12月25日,因日军侵占香港而自动停刊。

《中外新闻七日报》及《香港华字日报》,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尽管《德臣报》曾宣布它“系唐人所办”,“于西人无预”,但它只是在发稿与编辑方面由华人主笔掌管,其他许多方面仍与《德臣报》有关,或者说它是在《德臣报》体制下华人主编的一张中文报纸。正如王韬所说:“然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辞命意难免径庭。或极力铺张,尊行自

^① 有关陈蔼廷及其所主编报纸的情况,参见卓南生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版。

负,顾往往详于中而略于外,此皆由未能合中外为一手也。”^①所以,陈蔼廷仍属利用外报条件,他主编的中文报纸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未完全脱离外报。

二、首批国人自办的报纸

如果将上述几家中文日报,看做走向国人办报的过渡性的报纸,那么,哪一家是完全意义上的国人办的报纸?对此,目前尚无一致认同的结论。有的书上提及1872年广州出版的《羊城采新实录》,但既无原件可考,又无有力的佐证材料,所以难以成立。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曾提出:“我国民报之产生,当以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之《昭文新报》为最早。”从现有材料看,1873年创刊的《昭文新报》今虽未见原件,但《申报》作过多次报道^②,从中可以知道:创办人为艾小梅,初为三日刊,后改五日刊,白鹿纸印,装订成书册式,内容“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我国新闻史学界,多年来一直沿用戈公振的说法。

其实,19世纪70年代,在香港、上海等地已出现多家国人所办报纸。其中香港除1874年创刊的《循环日报》外,还有一家《维新日报》,1879年创刊,创办人陆骥纯,曾参与办《近事编录》,因与西人业主意见不合,离开后自办《维新日报》。该报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曾发表中国胜利的报道,受到读者欢迎。它出至1912年停刊。

在上海,当地首家国人办的中文日报《匯报》,于1874年6月16日创刊。创办人容闳(纯甫),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1872年任清政府的留美学生监督,次年回国发起集资办报,入股的大多是他的广东同乡。容闳旋即赴美,没有直接参与报纸工作,报务的实际主持者是广东人邝其照(蓉阶)。主笔为管才叔。为了避免文字招祸,聘请英国人葛理(Grey)为名义上的总主笔。该报创刊时即宣布:“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中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后因报道与言论涉及时政,为官府所不满,有的股东由惧怕而退股,于8月31日停刊。9月1日改名《彙报》继续出版。9月2日,原《匯报》主笔管才叔:“上宪谕将匯报禁止。”改名后,葛理成为该报名义上的馆主兼主笔,另有华人主笔负责编务,报纸的基本内容与政治倾向并无明显变化。《匯报》和《彙报》为维护民族利益曾同《字林西报》、《申报》、《德臣报》

^① 王韬:《倡设日报小引》,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② 《汉口创设昭文新报馆》,载《申报》,1873年8月13日;《记汉口新报改革事》,载《申报》,1873年10月2日。

开展过多次辩论。

《彙报》出版不到一年,又遇到不少困难,于1875年7月16日再改名《益报》继续刊行,主笔为朱莲生,西人不再出面,但版面和内容都有明显的变化,论说少了,文艺作品和社会琐闻多了。它仍同《申报》论争,却远不及其前身,反而表现得意气用事、理屈词穷。如攻击《申报》主笔钱昕伯时,无端株连王韬,说他们“同恶相济”^①。1875年12月3日,朱莲生在该报上刊登离职声明,4日即停刊。

随后,上海还出现了一家名为商办、实为官办的《新报》,1876年11月23日创刊,由各商帮出面集股兴办,上海道台冯焌光为实际决策者,并拨库银资助。冯焌光为洋务官员,曾任江南制造局总办,《西国近事》就是在他主持下出版的。调任上海道台后,他要利用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并与洋人沟通。因此,《新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本馆告白》宣布:“国政则不可议”,“疾世愤时”之作不予发表。它以发表官方新闻为主,关于官府衙门的报道很多,外省与外国新闻多于本埠新闻,经贸报道突出,没有社会新闻。它聘有专职翻译,大多是采用外报译稿,曾刊发中、英文对照的新闻。华人说它是“官场新报”,洋人也说它是“道台的喉舌”。该报出至1882年2月14日停刊,主要是因为继任道台不愿再办。

在19世纪70年代,上海报业开始繁荣,走在全国各地之前。到80年代,各地又陆续出现一些国人自办的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广州的《述报》与《广报》。

《述报》于1884年4月18日创刊,当天刊登的《述报缘起》中称:“本报为日报中之创格。”的确,作为广州首家国人办的中文日报,它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它在中法战争期间问世,以2/3以上的篇幅发表战局报道与评论,谴责法国侵略者,赞扬中越军民,反映各地群众的自发声援,还将刘永福的照片与越南地图印成单页,随报附送,这些做法在同时期的报纸上是罕见的;其二,采用图文结合的办法,每期都有纪实性图画,与文字新闻穿插配合使用,使报纸显得生动活泼;其三,它将报纸内容分成两类,各自合订成册,每月各一卷,新闻与评论部分称《中西近事汇编》,译稿部分称《格致便览》,不仅弥补了每月逢十停刊的不足,还扩大了影响;其四,在我国日报中,它是首家采用石印的报纸。1885年4月3日,该报发表《本馆告白》,宣布从翌日起停刊三天,“更订章程,增聘主笔”,但此后未见复刊。

^① 义愤生:《论申报改上谕大悖谬》,载《益报》第104卷。

1886年6月24日创刊的《广报》，是广州的又一家日报。创办人邝其照。其格式仿照《申报》，内容除转载京报外，有新闻、论说、诗歌等。早期声称不涉及政治，新闻多为琐事，但偶尔也揭露一些问题。曾因暴露科举舞弊，遭到报复被捣毁。1891年，又因刊载某大员被参的奏折，触怒两广总督李瀚章，被查封。尔后，邝其照等人于同年将报局^①搬往沙面租界，并改报名为《中西日报》，由英商出面经营，言论更为大胆。不久，又迁回城内朝天街。1900年，因发表义和团战胜八国联军的消息，为英法帝国主义所不满。它们迫使广东当局查封该报。同年冬，改名《越峒纪闻》继续刊行，不久由于发行被限制而停刊。

综上所述，19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一些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数量不多，但属首批。而更为主要的是，这些报刊冲击了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代表了历史发展趋向。

三、王韬和《循环日报》

1. 王韬生平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又名瀚，1862年改名韬，字仲弢，又字紫诠，有弢园老民、天南遁叟等多个笔名。江苏吴县人。在他的一生中，有三件事对他影响最大，即：上书太平军、游历英法、主编《循环日报》。

王韬从小好学，父为塾师，家境贫寒。18岁中秀才，后两次考举人未中，遂无意于科考，转向经世致用之学。1849年到上海，入墨海书馆，协助外国传教士译书，参加《六合丛谈》工作，这是他报刊活动的开端，也是他研究西学的起点。

1862年1月初，他回乡探望母亲，于当月22日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将刘肇均，建议太平军对上海采取“阳舍而阴攻”的策略。太平军失利后，这封3900多字的信为清军缴获。王韬由此被通缉，于5月23日避入英国驻沪领事馆。10月4日乘船离沪，11日抵达香港。这是王韬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在香港，王韬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书，并任《近事编录》主编。1867年冬，应理雅各之邀赴英国，在那里居留两年，还两度游历法国，对于西方社会有了亲身观察与体验，加深了对“西学”的认识。1870年春返港后，为报刊撰稿，《香港华字日报》连载他编译的《普法战纪》一书。1873年，主持香港英华书院

^① 报局：广报原名为广报馆，官府认为馆字不妥，遂改称局。广报局原在广州城内华宁里。

的理雅各回英国,王韬和黄胜集资买下该院印刷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创刊,因黄胜已去美国,报务全由王韬主持。由此至1884年的10年多时间里,王韬全力以赴办报,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是他从事报刊活动和政论写作的高潮时期。其间他还访问过日本。

1884年,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返回上海定居。他继续著书,为《申报》、《万国公报》写稿,还创办了弢园书局,担任过格致书院掌院。1897年5月病故。

2. 王韬对报刊工作的主要贡献

王韬是我国最早重视向西方学习、提出“中体西用”的进步人士之一,他写了多篇论述变法自强的文章。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位有创见的思想家。而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他则是一位著名的报刊政论家。他在报刊工作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1) 鼓吹国人办报。如前一节所述,王韬积极主张中国应自行办报,在各省会城市办报,还要办西文报。

(2) 重视报刊政论。他认为办报的目的是“立言”,因此应“博采舆论”^①。他主编的《循环日报》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包括议论时事的时评和阐释政治思想见解的政论。他的著作《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政论文集,书中收入他在《循环日报》上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或未发表过的政论文章100多篇。他为在我国办报论政作了最早的尝试,也为政治家办报作了舆论准备。

(3) 致力于革新文风。晚清文风,受桐城派影响极大,讲究“清真雅正”,义理、考证、辞章合一,而不敢大胆地触及时政,不敢直抒己见。王韬却赞成经世致用,认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②。他的文章,采用浅显的文言,议论时政,坦陈己见,冲击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保守文风,对后来报章体的形成与流行,起了先导作用。

3. 《循环日报》——“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③

《循环日报》在创刊之初就宣布:“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

^① 《倡设日报小引》,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

^③ 卓南生:《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循环日报〉》,载《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版。

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①，“是报之行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②。该报之所以命名为“循环”，是因为“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因此，宣传“变法自强”就是该报的基本任务。王韬的主张和《循环日报》的宣传，虽然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下的改良，但是表明了华人的尊严和企盼国家富强的良好愿望。

王韬任该报主笔，参加编务的还有钱昕伯、洪干甫等。除星期日休刊外，该报每日出两张4版，用进口纸两面印刷。第1版为行情版，第2版为新闻与评论版，第3版为船运消息与广告版（第2版的文字未刊完者转至第3版），第4版为广告和启事版。

第2版的新闻和评论，分为《京报全录》、《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3个专栏。其中《中外新闻》专栏首登评论，每期1篇，有时2~3篇，多由王韬执笔。评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中外时事和社会实际问题的，如反对日本侵略我国台湾的《论日本侵犯台湾事》（1874年7月27日），支持中越抗法斗争的《论黑旗智败法人》（1883年6月12日），声援华侨的《论出洋华民亟宜保护》（1881年9月14日），有关于社会生活的《论省垣创设自来水》（1882年10月12日）等；也有一部分是论述变法思想与提出具体建议的，如《论宜变古以通今》（1881年8月12日）、《论建铁路》（1881年3月25日）等。其评论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当时报纸中都是很突出的。因此，《循环日报》成为一家著名的政论报纸。

《循环日报》创刊的第二年，曾选择重要时事新闻与评论汇编成册，每月一册，后因销路不佳，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为了争取时间以利竞争，该报从1878年起，每天提早在前一天晚上派送，实际上成为中文报纸中最早的晚刊。4年后，恢复当日上午出报。1904年该报扩大篇幅，分庄、谐两部，庄部为新闻与评论等，谐部为歌谣、唱本等。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香港后，该报曾与《大光明报》合并为《东亚晚报》，抗战胜利后恢复原名复刊，约在1947年终刊。

① 《倡议日报小引》，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② 《本局日报通启》，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简评一则 1949 年的消息^①

这是一则 1949 年 2 月 16 日的消息,全文如次:

[新华社北平 16 日电] 本社特派员阿兰·魏宁顿^②报道:此间报贩觉得难以赶上社会公众对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的需求。该报正式订价是 2 元,但热切的读者甚至不惜以 50 块钱去争买一份。这一报纸是在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的印刷厂排印的,——《华北日报》一向是华北最大的国民党报纸,发行额为 8 千份。现在它的机器正在印刷着每天 7 万份的《人民日报》,这些报纸在城内和近郊立即销售尽净。要满足需要还得额外再印三四万份,但在能运到更多印报纸张之前,这额外份数就不可能。每天早上报纸出版时,为了取得一批报纸,总要有一番激烈的竞争。当初,甚至还有为这打架的,但现在报社人员帮助报童组织起来,争执现象就少见了。社会公众对于国内外的确实消息是这样关心,以至于有些报童远自 20 哩外骑自行车前来,发觉跑这一趟还有利可得。有一组报童甚而组织起来,从远在百哩以外的保定到这里来轮番贩报,当这一个人骑自行车带着报回去的时候,另一个人便已在赴北平的途中了。当然,这些报纸是按规定的价格卖给正规订户的,只有剩下的才给报童。工人、学生和北平的广大劳动人民都热烈地阅读这一份报,它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他们自己的报纸。每天刊登着关于工厂和学生活动的文章,其中许多是工人、学生和进步教授的作品。《人民日报》抓住了而且反映出新解放的北平的蓬勃精神,工人阶级的热情,以及被国民党压制了这样久的求知欲。

这种渴望了解事情的心情,也表现在 4 天前在此间开办的新华书

① 本文是《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教学用案例材料,属发言提纲性质,写于 1983 年初。

② 阿兰·魏宁顿(Alain Winnington, 1910—1983),英国新闻记者。早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任英共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副总编辑。1948 年,受英共中央派遣来华,在新华通讯社工作。写过许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报道。朝鲜战争期间,从事新闻报道的同时协助做战俘工作,由此被英国政府以“叛国罪”吊销护照。1959 年离开中国,赴德国柏林定居,直至逝世。

店。每天早上7点半钟就开始形成一列人群,等待着9点钟书店开门。最畅销的书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其次《论联合政府》,销路也跟前者差不多。书店里整天都是拥挤的,有许多人一时还买不起,便好几个小时地细读这些书。虽然报馆和书店的职员都在拼命地设法增加他们的供应,但要做到能够应付需要,还得一个长期间。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华北《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2月9日,新华社发了一则100多字的消息,报道“新创刊的北平和天津的人民报纸受到两城人民的热烈欢迎”。消息中有这样的描述:“2日创刊的《人民日报》北平版销售6万5千份,每天在未出版前,即有大批读者拥挤在贴报牌前等候。天津、张家口、沈阳、长春等地的外埠订户也逐日增加。”阿兰·魏宁顿写的是同一件事情,时间隔了一个星期,而他带给读者的不是重复的旧闻,却是新鲜的信息。他的报道开头一句就把读者吸引到一个新的观察角度——“此间报贩觉得难以赶上社会公众对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的需求”。他让读者透过报贩忙碌的视野,去看共产党报纸的畅销,看人们追求新知的热情,看北平解放后的新气象。

很有意思的是,报道写了这么几句:“这一报纸是在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的印刷厂排印的,——《华北日报》一向是华北最大的国民党报纸,发行额为8千份。现在它的机器正在印刷着每天7万份的《人民日报》,这些报纸在城内和近郊立即销售尽净。”这里出现的鲜明对比是很自然的,因为巨大的变化发生在同一家印刷厂里。当时,人们都知道那家《华北日报》是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是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的喉舌。1945年10月1日,即日本投降后不久,在北平出版(复刊),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停刊。这家报纸经营多年,不得人心。而《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才数日,就为人们所争购,供不应求。人们的冷淡和热情说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常说,新闻要用事实说话。这里鲜明地对比着的事实,不是向读者传播了一种思想、一种感情吗?道理尽在事实中,不用记者多费笔墨。

报纸印刷本来是个细节,这位记者却抓住它,写出了有力的几笔。接着,记者又不惜笔墨具体地描绘了报贩的活动。描写细节,不是每则消息所必须有的,但有些消息有了它,才使得新闻报道的气氛活跃起来,更能吸引读者。阿兰·魏宁顿写的这则消息,正是如此。再说,2月9日的另一则消息,写了一句“大批读者拥挤在贴报牌前等候”,也多少令读者有点具体感,比起那种只用“受到热烈欢迎”一类语句来,也略高一筹。像这样用一句话、几个字点出的细节,

往往使消息显得又具体又活泼,是值得学习的一种写法。

角度、对比、细节三者配合运用,是这则消息的特点。它给读者以新鲜、活动的感觉,而不是陈旧、静止的印象。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位记者无论是在采访上,还是在写作上,都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这则消息前后两段,一长一短,一写报纸一写书店,是以解放了的北平人民追求新知为主题的。《东北日报》1949年3月18日刊载这则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北平人民热切求知/人民日报供不应求/新华书店拥挤购阅新书人群》。我看,删去后段,前段独立成篇,只写一件事,会更显简洁、明快。当然,后段无疑也可以另写成一篇。

附 录

丁淦林：与历史同行

虽然年已古稀，外表上看去和他那个年纪的人并无两样，但丁淦林老师总让我感觉到精神饱满：他目光深邃，神态慈祥，讲话有力，步履从容。不论在哪里，大家碰到他总会亲切地唤他“丁老师”，这时他就会招手示意，微笑地大声说：“你好！”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就敏锐地关注中国的新闻改革，积极探索并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洒下汗水。他从过去走来，经历过激情岁月，体会过动荡年代，又身处开放时期。当向他提出采访意愿时，丁老师欣然应允。

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

王硕：我了解到您少年时代是在江西吉安就学的。吉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就在那里建立。当时那种环境对您以后的发展影响如何？

丁淦林：我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经历对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学校自由开放的氛围和老师们身体力行、默默耕耘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校长和一些任课老师水平很高。

吉安是一个进步力量比较活跃的地方。比如在1938年，复旦大学曾迁到庐山，有很多进步大学生就来这里组织宣传活动。我上初中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校长陈启昌是一个爱国敬业的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思想进步，禀性坦诚刚直，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厉声斥骂。其实早在1937年，他就受国民党将领的委托，在吉安创办扶园中学，还聘任余家宏、贺忠等中共党员来校任教，使那里一时成为进步思想活跃的园地。为了办学，1945年春，他变卖全部家产，倾其所有创办了私立中学——至善中学，校名取自《礼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陈启昌提倡我们博览图书报刊，自由议论各种问题。于是在两年半的初中学习中，我很喜欢读报纸、看杂志。那时候接触比较多的是《观察》、《大公报》、《文汇报》和《文萃》。1948年8月，我到阳明中学读高中，进一步接触到各种书报，比如《群众》杂志，还有艾思奇的《大众

哲学》，范文澜、翦伯赞写的书。高二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学生会负责编墙报。因为国民党机构当时就设在学校旁边，所以我们亲眼看到他们乱抓壮丁，十分腐败。每届国民党“专员”下台离任时，大家难免在背后评论：“上任是官，下任是狗”。墙报上的文章很多揭露了国民党官员的恶行。每当他们来校查看时，校长都会站在我们一边，用别的东西把墙报遮掩起来，免得惹上是非。

王硕：看来在中学时期，您接触报刊的机会就不少，也因此您决定将来学习新闻专业吗？

丁淦林：是的，因为初中、高中养成了看报习惯，也自己动手办过墙报和黑板报，于是对报刊兴趣浓厚，高考时，自然就想到了报考复旦新闻系。

当时学校里一些老师的行为和人品对我影响颇深。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性格鲜明，不求闻达，但学问过硬，功底扎实。比如刚才谈到的校长陈启昌，教我们英语课。他教学方法很到位，全用英文授课，我虽然只学了两年多时间，但打下了较扎实的英语基础，当时大致可以看懂一些英文版小说。值得一提的还有王泗原老师，讲授语文，一丝不苟。我原来对语文兴趣不是很大，记得他在改作文时，把我叫在一旁，一字一句、细致地指出问题所在；还告诉我，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写在纸上。他的指点使我的语文水平日益见长，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解放后，王泗原老师被请到了北京，专门编审语文教材。他精通古典文献，曾参与《辞源》的审稿，出版了《楚辞校释》和《古语文例释》等专著，颇受叶圣陶先生的赏识，几次催他出书，还专门为书题名。他的确是古汉语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在古音韵学方面，功底极其深厚。我想他就是那种知识分子：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这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心系祖国，对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总是想要让国家发展好。

记者本来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职业

王硕：后来您顺利地考入了复旦新闻系，开始了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大学时期您也和现在新闻系的学生一样，听课、办校园报、到外面实习吗？

丁淦林：我是在1951年7月份参加高考的。结果我如愿以偿，进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我们班上只有29人，课程包括语法修辞、哲学、国家与法权基础、俄语和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专业课有采访写作、新闻学概论、新闻史。给我们带课的不乏名师，比如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郭绍虞就教我们语法修辞课。教写作的是赵敏恒，他可是通讯社方面的元老人物，也曾是《新闻报》的总编辑。

所以学习下来,我们受益颇多。那时陈望道校长很关心新闻系的发展,要求让各系都派名师过来带课。

王硕:在大学您还继续中学时期养成的读报习惯吗?

丁淦林:是的,大学阶段仍继续这个习惯。每个星期我都会抽出半天时间,到学校的报刊阅览室看各种报刊,还进行比较。英文和俄文报刊也会看一些。这个习惯我一直在坚持。此外,我喜欢做笔记,注意积累。在报纸上看到有用的材料,我要么把全文、要么把主要内容抄在本子上,或是剪贴,网上的就下载保存。除摘抄内容外,有感而发的感想我也写在旁边。平时如果脑子里浮现出什么问题,我就随时记下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什么知识一时想不起来或是没搞清楚,我会马上动手查证,直到了解得一清二楚才安心。因此很多历史事件我都记得比较清楚,一般不会出差错。我不相信记忆,相信勤奋。我的习惯就是有什么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东西,立刻记录在案;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就马上解决。

和现在新闻系的学生一样,我们本科时候也去实习。1954年,我在《安徽日报》做实习记者,报道一届人大的情况,实习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同学都很有做记者的精神,愿意承受辛劳,不在意吃苦。记得我在淮南煤矿实习时,正好淮河发大水,我上堤采访,住在农村。一天半夜,大水冲来,我赶紧起床往外逃。我有一个同学在江苏实习,屋子倒塌了,他半身被塌陷的房顶压在下面。返校后,大家聊天,讲起这些经历,都觉得新闻工作就是这样的,很正常,因为记者本来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职业。

王硕:1955年大学毕业后,您留校工作了,当时就是很坚定地要教书育人吗?

丁淦林:我在复旦有几十年了,户口也一直在这里,尽管中间的确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别处发展,走上另一条道路,但我都放弃了,依然留在这里教书。我想这种选择与我上面所讲的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影响有关。我觉得自己适合教书,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我就会坚持不懈。

王硕:同学中流行一种说法,说“学在复旦,玩在复旦”。您和复旦朝夕相处,对复旦的印象如何呢?

丁淦林:我觉得复旦文化内涵丰富,各种学科汇集,中外沟通交流多,环境宽松。我上大学时,复旦的老师还不多,全校学生大概也只有2000人左右,所以基本上许多老师同学我都能认识(开心的笑)。复旦的知识结构比较丰富,那时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经常举办一些报告会。学生课余还可以参加各种学校工作,锻炼自己。我在复旦参与了很多社会工作,接待过外宾,参加过外

国在上海举办展览会的工作，写过展览会的说明和发言稿。我还在校学生会宣传阵地编委会工作，负责出学校的墙报和黑板报。这些都增加了我的社会阅历，结识了很多人，文化方面也提高不少。

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新闻学体系

王硕：您留校工作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接着还有“文化大革命”，您是怎样度过这一动荡时期的？

丁淦林：1955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了新闻系的中外新闻事业史教研室，算上我，当时共有5个人。主任是从英国回来的曹亨闻，还有宁树藩、新华社来的刘同舜和圣约翰大学来的伍必熙，大家关系融洽，工作很开心。但“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留在学校作研究的时间很少。除了军队，其他地方的生活我都体会过。1958年我带领学生上海第五钢铁厂参加劳动，炉前炼钢。在那里负责主持创办了《合金钢》报（最初名字叫《五钢报》）。每年暑假也不得闲，都有社会工作。1958、1959和1960年，我连续几年在上海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曾首次主编上海市高校《招生通讯》，受到了好评和肯定，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开出版的铅印招生报纸。1961年，我曾到南京《新华日报》半年。1964年到1966年，我先后在上海市奉贤县、上海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秘书工作，兼任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劳动实习队领队。

王硕：看来您当时在各种事情里忙来忙去。是不是整个国家也因为建国不久，忙于各项除旧布新的实务，所以新闻学的研究在那段时间里没什么进展和创新？

丁淦林：50年代初期，新闻学研究相对滞后，中期曾一度“学苏联”。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份期间，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目的是听苏联专家讲课，学习苏联经验。人大当时的系主任是安岗，他与我们系的王中联系，希望能派一个懂俄语的老师过去，以便与苏联专家联络。我大学时俄语学得不错，于是就有了这个进修机会。当时有两个苏联专家来讲课，一个是中共中央党校请来的乌克兰基辅大学新闻系的主任，一个是人民大学请来的列宁格勒大学新闻教研室的主任，都是副博士，听课的人大概有10多个，讲课的内容是“新闻理论与实践”。课上得很沉闷。我们很快就发现，苏联的大纲和教材并不科学，机械地搬用马列辞句和苏共决议，再加上若干事例，内容贫乏，索然无味，脱离实际，十分教条。而且只能老师讲，下面听课的“学生”却不能提问，其实那些“学生”的新闻业务实践经验都很丰富。那次学习使我对苏联报纸历

史的沿革以及俄国报刊史有了了解,也让我认识到了教条主义教学的弊端,因为这种教学没有理论分析,武断得很,根本就是“闭起眼睛说教,板起脸孔训人”。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国外东西,而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新闻学体系。

王硕:那次人大进修还有其他什么收获吗?

丁淦林:那段时间,我想办法进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资料室,看到了很多珍贵的报刊资料,没有公开发行的党报内部资料,如《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旗日报》等,使我对苏区和地下党的报刊有了真实了解。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天天去那里看报纸,这为我日后研究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中央政策研究室附近的中央保育院里访问到了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我对她印象深刻。她穿的是泛旧的军装,住房不大,一张行军床,生活非常朴素。从她那里,我还了解到了恽代英同《中国青年》的关系。

还有一次是和安岗聊天,我感触很深。当时我们聊起俄国报刊史,我觉得俄国报刊史甚为无趣,但安岗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几个知道俄国报刊史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对我后来的教学研究思想也有帮助。因为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有人去了解的,即使不必需要很多人。试想,如果在某些文化学术方面,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去钻研,那么我们的学术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连中国自己的历史问题,也要到美国去找专家解决,那就有学术上变为殖民地的危险,历史要失传,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要断代,这会让人感到非常悲哀。

编教材也是不断进行的过程

王硕:我记得本科时我们用的教材就是您主编的,到现在,您大概编过多少本教材?

丁淦林:我在1995年主编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这是国家教育部正式发布的新闻传播学方面唯一的一本大纲。此外,在2000年9月出版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新闻学专业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也是我主编的。还有我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在2002年8月出版。这几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级教材。算算看,80年代以来,我参加编写的教材,公开出版的有6种以上。

王硕:除了编教材,我听说您还负责《辞海》新闻学部分的编写?

丁淦林:是的。从1958年开始,几次《辞海》的编纂修订,我都参加了新闻

条目的编写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我也参加了编写工作；此外，还有些新闻学字典也曾请我做顾问。编订《辞海》是一项艰苦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别看一个条目只有几十个字，但这确是字字斟酌，比写几百个字困难得多啊！辛苦是辛苦，但稿费也只有不多的几十块钱，哈哈。《辞海》要求特别严格，哪怕一个字，我们都会思量再三。听说有关单位为一个“了”字进行过讨论，在“提出了问题”和“提出问题”两种写法间犹豫。后来胡乔木同志拍板，去掉“了”字，避免过多使用“了”字，没完没了。

王硕：编教材、字典都是很劳心费神的事，同时也会影响到自己写专著，您觉得值得吗？有没有觉得累？

丁淦林：的确，这些会花很多工夫，占用很多时间，但我觉得这是对学生负责，也能检验和反映科研成果，对新闻学科的基本建设有好处，是值得的。编教材也是不断进行的过程，新材料和新看法会不断增加进去。

王硕：教材对知识的传承意义重大。这么多年编教材下来，您觉得现在的新闻史教材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和可以做得更好？

丁淦林：我觉得新闻史教材有10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一是内涵与名称，内涵要扩容，名称可改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二是要研究历史的分期问题，应该体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规律与特点；三是以人为主线还是以事为主线的问题，可以以人带事，也可以因事出人，还可以两者并存；四是纵横的问题，教材是“通史”，按历史顺序，纵向评述，但也要注意到横向的各个侧面（如新闻实务、广告等）的历史演进；五是尊重历史事实，不搞片面的“以我为主”；六是“从众”问题，教材只能写大家公认的东西，但公认的不等于都是完全正确的，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需要等到以后才能得到公认，因此我们在写教材的时候，对某些事情不能把话讲得太死，要留有余地；七是写作风格问题，特别是集体编写的，应该统一风格；八是处理详、略的问题；九是图文结合问题，有时候有了图，才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十是介绍历史知识、评述历史经验、阐释历史规律问题，本科教材以介绍历史知识为主。这些都是我在编教材过程中不断思考的东西。

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要盲目跟材料跑

王硕：在评价1956年新闻改革时，您最早把北京《人民日报》改版同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相提并论，称它们“是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这种说法后来被广泛采用。当时您是如何提出这种说法的？

丁淦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当时是副系主任。在给王中平恢复名誉时，深深感到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更需要对1956年的新闻改革有正确认识，这是前提。

1956年新闻改革时，有人认为改革搞过头了，担心会动摇党性原则。1957年下半年起，改革中断了，然后，人们有意无意地不提它。1957年及其以后的几年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可能旗帜鲜明地肯定这次改革，但也没有明确做出否定的结论。到了“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这次改革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的典型，横加批判。我从1979年就收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1982年在《新闻大学》上发表了《一九五六年我国新闻工作改革概述》一文，肯定了1956年新闻改革的重要意义，认为“是为办好社会主义时期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开辟道路，创造经验”。这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是不容易的。

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是在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间撰写的。它突破了照搬苏联教材的教条主义束缚，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新闻理论。这个大纲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报纸具有两重性，即阶级性和商品性；办报要有读者观念，重视读者需要等观点。

我在1979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研究室出版的内部刊物《新闻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对王中新闻观点看法的文章，认为“王中同志的观点有益于加强新闻学理论建设”。当时压力不小。这本来是一篇发言稿，准备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却有人提出王中观点尚未定论，不同意在会上发表，我只能改在内部刊物上发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自慰，就是在1980年，我们出版了《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一书。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这是国内较早重新评论邹韬奋的书。作为一个有名的新闻人物，他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很有作为，行动上适合时代潮流，是知识分子艰苦奋斗的成功例子。“文革”前，他就很受推崇；但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被认为有资产阶级倾向。“文革”后，在还没有对他作出明确评价时，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对他进行重新研究，于是整理出版了他论述报刊的文章。在前言中，我们认为邹韬奋的思想是“人民报刊的思想”。

王硕：您觉得在学术研究中，要不断推动研究向前发展，有所创新，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

丁淦林：要严谨、务实，不能做假。还有就是，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要盲目跟潮流，也不要盲目跟着材料跑。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分析。所以对理论水平的要求很高，既要求有理论思维习惯，也要求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王硕：不少人觉得新闻史就是事件加年代，似乎没什么好学的，不学新闻史，还是干得来记者这一行。

丁淦林：不能简单地看新闻史的作用。固然不学新闻史，也能做业务，但要作为高层次人才，这方面知识不可或缺，否则难有全面、广阔的视野。历史上的名记者，比如邹韬奋、邵飘萍、戈公振、张季鸾等，都注意知识结构的完善。新闻史有助于让人站得高，望得远，看得全。

新闻史的作用还在于对当前的借鉴意义。比如《新华日报》，它是1938年1月在汉口创刊的，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大型机关报。研究它，就是要研究我们在别人执政的地方，如何合别人之法，如何成功经营、开办合法报纸。如果我们把报纸办到国外，《新华日报》的经验是不是很重要呢？

此外，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老师的授课方式不无关系。学生不同，授课重点、方式方法也相异。我觉得本科生应以传授知识性的内容为主，通过老师讲授，让他们了解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和人物；硕士生以学习经验性的内容为主，靠自己阅读来学习有关文件和政策；博士生以研讨问题为主，以讨论的方式，探求新闻规律。

不要让学生按照你的脚印走

王硕：即使您很忙，但一直以来，您都坚持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课，同时您还身兼数职。您觉得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丁淦林：我觉得自己的职责有两方面，就是教好学生，发展学科。对于后者来说，关键是全局出发，整体考虑，找到学科研究新的生长点和奋斗目标。比如2000年，复旦新闻学院开设了广播电视艺术专业，就不仅仅包括广播电视新闻，而且还包括了新闻以外其他很大一块，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此外，1999年，我们第一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我任站长；80年代，复旦新闻学院建立了“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2000年改组为“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这是教育部106个重点基地之一，全国新闻传播方面也只有3个；2002年，我们申报的“传播学”重点学科通过审批。

说到带学生，我自己带了好几批博士生。我觉得教师要一专多能，治学上客观严谨，讲求创新，找到学科研究新的生长点和奋斗目标，不要让学生按照你的脚印走，而是让他们放开手脚按自己的基础和兴趣去研究，你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指导。我带的博士生都没有局限在我研究的范围内，而是根据本人自身的

条件,确定研究题目。比如我的一个博士生是来自哲学专业,外语也很好,我就建议她研究传播理论,结果她写的博士论文颇受重视。还有三个博士学历史出身,长于整理史料与考据,我建议他们研究通讯社史、汪伪时期的报刊。有的博士生对传媒经济兴趣浓厚,我虽然对经济不了解,但传媒不是外行,就能在这方面指导他。

分析方法上,我告诉他们怎么运用材料,怎样处理观点和材料,逻辑是否严谨,等等。我的博士生论文题目包括《美国传播理论发展》、《中国通讯社史》、《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语言的发展》等,这些题目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重视,一些课题还申请了项目,获得了资助。

王硕:从上面您列举的这几个题目上看,新闻学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广了。那么,您怎样看待新闻学研究今后的发展?

丁淦林:我觉得有三点需要指出。第一是要加强理论建设,夯实学科基础。我们的新闻学体系还不完善,主要是学理性不强,政策阐释多于理论分析,甚至对某些基本概念还存在争论。只有根据自己学科的特点确立解释准确的基本概念,构建科学的理论架构,学科地位才会提高。有一些基本概念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新闻价值。第二点是,要把学科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两者并重,以极大的兴趣研究现实问题。业务单位着重进行对策性研究,院校着重进行学理研究。第三是广采众长,多学科协作。除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以外,近年凸显了新闻学、传播学同科学技术的联系,特别是同信息科学的联系。要使多学科知识能为“我”所用,促进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

王硕:您长久以来生活在上海,您怎样看上海本地媒介的发展?

丁淦林:我觉得上海媒介现在发展得比较活跃,也比较守规矩,将来新闻界有大改革的话,应该出现在北京和上海。上海新闻界的素质比较高,从历史上看经验也很丰富。此外,从媒介发展的外界环境上看,上海的国际空间大,交流多,也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这些都给媒介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空间。

王硕 2003年3月18日访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原载《传媒论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